中共孙吴县委党史研究室 孙吴县档案局 著

中国共产党孙吴县历史

第一卷

（1932—1949）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孙吴历史：1932～1949/中共孙吴县委党史研究室孙吴县档案局著.--1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12

（黑河历史丛书 ；2）

ISBN 978-7-5098-0831-3

Ⅰ.①中... Ⅱ.①中... Ⅲ.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孙吴县—1932～1949 Ⅳ.①D235.3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7422号

书　　名：中国共产党孙吴县历史（第一卷）

责任编辑：姚建萍　谢文雄（特邀）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哈尔滨嘉腾设计印务公司
印　　刷：哈尔滨博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0mm×210mm　1/32
字　　数：210千字
印　　张：10　10面前插
印　　数：2000册
版　　次：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0831－3
定　　价：98.00元（共三册）

《中国共产党孙吴县历史》编纂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孙吴县历史》（一卷本）编辑部

主　编：张建华

副主编：王春生　张　鑫　徐　冉　张东杰

编　辑：柯金凤　郑　敏　杨雁红　杨先璎

何万明　王耀绪　孙丽惠　李国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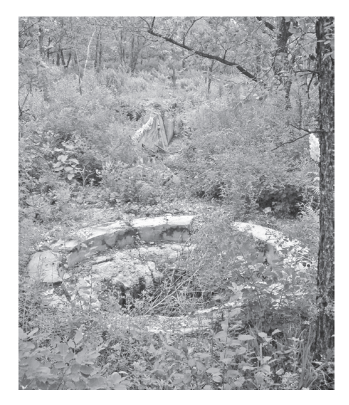
张　晶　张　焱



迟连生西兴乡西兴村村民在控诉日军暴行



警备中队



胜山要塞炮台



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孙吴支队罪证遗址解剖池



地下兵舍



苏联红军在攻打胜山要塞指挥中心



任炳麟　1945年11月
任孙吴县第二任县长



赵天野　1946年2月18日
任孙吴县第三任县长



章子冈　1947年11月任
孙吴县第四任县长



丁逢水　1948年9月任
孙吴县第五任县长



张志贤　1946年8月任孙吴县政府秘书，次年初兼任孙吴县公安局长



刘金生　1945年任自治军孙吴独立营教导员



洪涛　1945年5月12日任孙吴县委组织部长



张起云　1949年5月12日任沿江区工委书记



周文喜　1945年11月下旬任独立营一连长



1947年歼灭匪首刘山东（右一）



苏联红军驻孙吴街卫戍司令部撤销 苏军返苏前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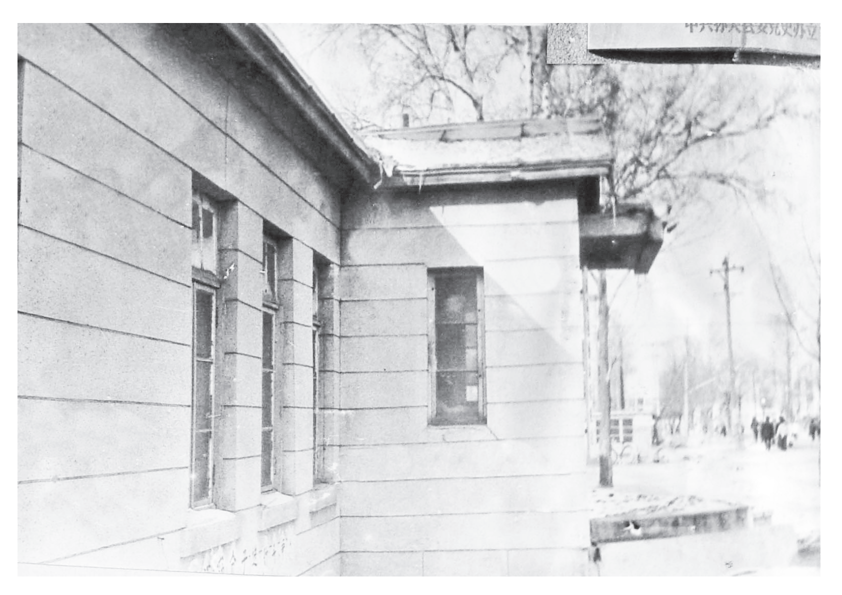
1945年12月17日孙吴县工委旧址



1945年12月17日孙吴县工委临时住址



孙吴县保安大队队部



1946年孙吴县政府迁至原苏军卫戍司令部



1946年8月三旅收集到的火炮在孙吴火车站留影



苏军烈士纪念塔



抗日暨自卫解放战争中牺牲烈士纪念碑

前　　言

在2009年3月黑龙江党史工作会议上，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对各市(地)、县党史部门明确提出了都要尽快写出一部较为完整的中共地方史的要求。由于各地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史料挖掘的难易程度不同，目前只有个别市（地）县于几年前着手研编，推进程度参差不齐，正式出版者甚少，大部分只是刚刚启动。孙吴县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在2009年初，集中力量进行《中国共产党孙吴县历史》（第一卷）的编写工作。我们通过县委组织部门抽调有关专家、骨干，配齐配强写作班子，在许多珍贵史料散失、口碑资料不多的情况下，克服诸多困难，历时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写出了全部初稿。

根据现存史料的局限，本书所述内容的年限大体是从1932年起至1949年止，1932年之前的部分史实略有所述。这本书稿现今来完成，实际上已是我们对研究、编纂这段历史的欠账了。

对于党史工作者来说，出版此书当是责无旁贷。本书虽为初创，但前人已做了大量工作。近一年来，编辑组成员在原有史料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细致的走访、搜集，并对所有资料进行了归纳疏理。工作中，致力在文献资料可涉猎的内容有闻必录，对口述史资料的把握上贴近历史

原型，有根据有背景地加以吸纳。在编研上仿效通史的选材和手法，注重史料的翔实，夹叙夹议、融会贯通，道出历史的本质，真正做到对党史工作负责，对历史负责。

本书涵盖了孙吴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史实。抗日战争时期重点戳穿了日本关东军重兵盘踞孙吴、伺机进犯苏联的狂妄野心，揭露了日军灭绝人性的战争罪行。日本军国主义者曾一度制定了《对苏作战纲领》，将孙吴划为对苏作战的“北部正面”战区，驱使数万计的我国劳工修建北黑铁路，继而进行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建设。一时间，孙吴地域营房林立，绵延达20华里，永久性地下兵营遍布沿江沿路，山洞暗堡多达千余处，军用机场3处，大中型军用物资储备仓库和各种军用后勤设施更是应有尽有。日本关东军在孙吴的驻军，最多时近10万人，当时号称“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孙吴”。侵华日军还在这里建立了“731”细菌部队孙吴“673”支队，以及宪兵队、国境警察队、山林警察队、铁路警察队等统治机构，并划定孙吴为“特别军事区”，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当地百姓受尽了屈辱，上万名中国劳工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三支队，在孙吴地域多次同日军进行过殊死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覆灭，孙吴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吴处于无政府状态，由苏联红军维持秩序。我党及时派来干部，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党建政，开展剿匪斗争，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发展经济。在剿匪斗争中，孙吴民众积极配合剿匪部

队，肃清了残匪，社会逐步趋于稳定。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和恢复发展经济，孙吴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开始步入稳步发展时期。

在抗战和剿匪斗争中，许多革命英烈长眠于孙吴大地，他们的英雄壮举永垂青史。不忘过去，我们将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进一步激发我们奋发图强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情怀。以史为鉴，开拓未来，把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国的实力提升得更加强大。

回顾历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当今军国主义的复活和霸权主义的存在，它们为求得自身利益，经常以强势国力和先进武器来威胁、教训与其观点、体制、信仰不一致的国家。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强兵，落后就要挨打。现今相对来说，我国国力并非十分强盛，人民并不是全面富庶，我们还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重科技搞生产，改革创新，拒腐防变，和谐发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我们时刻铭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决不让它重演。振兴中华，使我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书编辑部

2010年10月

绪　论

中华民国时期，孙吴地域未设立行政机构，当时所囊括的区域归属瑷珲、龙镇、奇克和逊河4县管辖，区域划分大体上是逊别拉河北属瑷珲，逊别拉河南归龙镇，霍尔漠津河北归瑷珲，霍尔漠津河南归奇克，茅兰河以东归逊河。孙吴镇所在地，当时还是一片荒原，只是沿黑龙江南岸和逊别拉河两岸有几处稀落的村庄。

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古部门在孙吴沿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胜利屯遗址”、“大桦树林子遗址”、“菜园子遗址”、“小桦树林子遗址”、和“四方城遗址”，出土大量文物。以“胜利屯遗址”为例，该地位于黑龙江上游沿岸阶地，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压制和磨制技术共存，另有少许骨器，用以从事农业和渔猎。出土的陶网坠和网状花纹在陶器装饰艺术上的应用，反映出当时渔业生产的发达，但仍然属于依赖于自然的发展变化来维持人类自立生存。这一时期相当于南北朝时期（公元460年—589年）。此时黑龙江流域的“悒娄”族已改为“勿吉”，后又称“靺鞨”，沿江先民更贴切地称自己是“黑水靺鞨”。今天的黑河城

区，结雅河口以下都是黑水靺鞨的分布区。遥想当年黑水先民在黑龙江两岸掘地为穴，树枝结棚，草泥抹面，成为“状如中国之冢墓”的民居。此时，黑水靺鞨男人狩猎，女人耕种，过着较为定居的村落生活。遗址中发现大量碎骨、烧土，文化层堆积厚，此时已大致发展到氏族社会阶段，属于原始社会晚期。

这以后的很长时期，黑水靺鞨改称女真（金元明清各历史时期，黑水先民都称为女真），一个叱咤风云的骠悍民族在中国的北方大地崛起。公元1115年，女真人建立了金国，后来又建立了后金国。1636年皇太极称帝，废除旧族名，改女真为满洲，改国号大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此时黑龙江流域征战不断，江上战船密布，山林战马嘶鸣。清康熙帝钦命大举反击沙俄入侵，两次雅克萨战争清军获胜，有功官兵被命留居屯垦戍边，其中大部分是满族人、达斡尔人，也有汉、鄂伦春人，沿黑龙江两岸定居，世代绵延。自1644年，沙俄波雅克夫匪帮侵入精奇里江口时，孙吴当地的人民同边疆地区各族同胞一起英勇抗击沙俄的入侵。1687年，萨布素率宁古塔、吉林满军和达斡尔兵2 000人，开始在黑龙江两岸屯田，其中有孙吴境内的霍尔漠津、四季屯两个屯垦点。1858年，清政府在黑龙江右岸增设卡伦11处，孙吴境内有霍尔漠津屯卡伦。1900年，沙俄侵略军越界烧掉卡房。沙俄血洗江东六十四屯时，残杀沿江居民，强占大片土地，5俄里内不许满汉各族人民居住。清政府曾在三站（今辰清）设善后局安置逃难百姓。1908年，霍尔漠津卡伦与右岸其它19处卡伦

同时恢复，各设卡官1人，卡兵30人。四季屯、哈达彦、大桦树林子、小桦树林子、霍尔漠津及曾家堡、吴家堡、东卧牛河等已形成稳定的居住屯落，土地开发3 000余亩。

1919年（民国八年）时，孙吴境内村屯的基本情况是：小桦树林子屯，30户，169人，耕地248.5垧。小河西屯，8户，46人，耕地67.5垧。额雨儿河屯（现东卧牛河屯），14户，70人，耕地94.8垧。连集窝堡屯，位于额雨儿河屯（今东卧牛河屯和吴家堡之间），时有村民16户，66人，耕地153.1垧，光复时，全屯人除2个小孩外均死于战争中。吴记窝堡屯（现吴家堡村），该屯建于清雍正年间（公元1730年前后），80户，433人，耕地459.8垧，小杂货铺一个。东霍尔漠津屯，又称东红毛鸡，建于1730年前后，先由一批何姓人家从宁古塔移居于此，在此约200年前从山东曲阜县迁来的一些曾姓人家住在此地，后来曾姓被编入汉八旗—正白旗，而何姓属镶红旗，1900年被沙俄侵占，屯民逃散，清政府收复后，屯民陆续返回，人口逐年增多。时有村民70户，430人，耕地523垧。1915年时该村的一私塾改为私立国民学校，取代了先前仅有的三四处私塾。1919年3月改为瑷珲县立第十一国民学校（属首次出现的官办小学）。三岔河屯，约建于清代末年。相传当时有李、张两姓居民因逃避官府紧急差事，由二站到此开荒种地，后来人口逐渐增多形成自然屯。因逊别拉河在屯前分三岔流过，故名三岔河。该屯共39户，219人，耕地335垧。腰岭河屯，该屯有15户，63人，耕地103垧。四季屯，曾

称四家屯，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一些吴姓八旗人从宁古塔移居此地，逐渐形成自然屯。时有村民62户，393人，耕地419.6垧。大桦树林子屯，71户，385人，有耕地447垧。1916年2月间，瑷珲县在以上3个屯设私立第十二、十三、十四国民小学。东逊别拉屯（腰屯），78户，388人，耕地603垧。西逊别拉屯（即曾家堡村），52户，400人，耕地631垧。民国以前称西逊别拉屯。建于1687年（康熙廿六年），由山东移入的曾姓人家最初到此居住而得名，1915年（民国四年）屯民达30户有耕地400垧，其后移入的户数逐年增加，九一八事变屯民离散，1933年移入大批劳工建北黑铁路，工程结束，一些人定居于此，住户逐年增多。哈达彦屯30户，150人，耕地148.4垧。在西逊别拉、东逊别拉、哈达彦设私立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四国民小学。嘎巴亮子屯，今无人居住，时有村民19户，110人，耕地36垧，于1916年在该屯设黑河至萝北邮站一处。以上16个村屯共643户，3 620人，耕地面积4 790.2垧。

当时，由警察组织管理孙吴地面，公元1909年（清宣统元年）瑷珲直隶厅谢泰钧成立乡警第三区（设区管1人，驻二站）和第五区（设区管1人，副区管1人，驻霍尔漠津屯公所），统归乡总巡长节制。公元1915年（民国四年）三区改组为警察第七派出所，区管改为巡管，驻地改为梁集屯；副区管改为巡管，仍驻二站为第七派出所之分驻所，另设巡长1名，下设常警4人，预警20人，驻二站。五区改为第八派出所。1922年（民国21年）瑷珲县城警察所附设警察队，县属各地划分为

3个区，每个区设警察队、警察分驻所和派出所。原属于瑷珲县第七派出所的三岔河、腰岭河、平顶村3个村屯，改为第二区第二分驻所管辖，分驻所仍驻二站。原警察第八派出所管辖的四季屯、大桦林子、小桦林子、小河西、东霍尔漠津、西霍尔漠津、嘎巴亮子、哈达彦、连集窝堡、西逊别拉、中逊别拉、吴记窝堡、额雨儿河13个村屯，改为第三区第一分驻所，驻所仍在霍尔漠津。原第八派出所吴记窝堡分驻所改为第三区第一派出所。1927年，组建地方保卫团第五团，团部设在大桦树林子，团总臧金庆。参加保卫团的村屯有：四季屯、大桦树林子、小桦树林子、小河西、吴家窝堡、连集窝堡、东逊别拉、西逊别拉、东卧牛河、平顶树、三岔河、南北二龙等13个屯。1929年(民国18年），瑷珲县警察所改为公安局，原属3个区的区队改为3个分局，辖区不变。

孙吴地域开发较晚，早期的如曾家堡、四季屯等才约300余年。清代以前，该区域基本是一个森林密布，灌木丛生，猛兽出没，人烟绝少之地。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有达斡尔，鄂伦春等少数民族来此以游猎捕鱼为生，兼或经营些畜牧业和农业。17世纪中叶，孙吴开发伊始，满族旗人在黑龙江右岸的四季屯、霍尔漠津、江左岸的段山屯设点屯田，而此时也有少数汉族游民出关觅食，尽管清政府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屡颁禁令，严禁汉人出关，但屡禁不止，穷苦农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勃海，多方闯关。清咸丰以后，前禁渐驰，以致封禁之令频频下

达，移民实边之议接连而上。1861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封政策。一时鲁冀游民出关谋生者日益增多，闻风附景，所至益多，蜂屯蚁聚，势难禁遏，移民浪潮已蔚为大观。至20世纪初，由于河北、山东等地连年天灾和战争，迫使很多破产农民移居东北。此时，从黑河、逊克向孙吴移入一批朝鲜族人，在这一带试栽水稻。1920年（民国9年），黑龙江沿逊河驿道，已有25处自然村落。农业产品以自食为主，村民间互通有无。生产工具是简单的人力和畜力农具。由于对粮食的需求，以致耕地逐年增加，粮食产量也有所提升，此时，以狩猎生活为主导的意识正在向农业方向上转变。因“闯关东”而迁往黑龙江一带的农民，后期以到北部为多，主要是因为东北南部人口稠密，其地已开发殆尽，东北北部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才尝试着举家迁徙所至。移民的职业大多以农业为主，故大都比较稳定，移动性不大。至20世纪20年代末，孙吴境内相继又增加了协振、腰岭、西地营子、清溪、东兴屯等村落。1932年夏，沿江王阿木岛、黄土埃子（今胜利屯）岛的中国居民与苏联居民进行“互市”贸易活动。早在清朝和民国年间，中苏边境时有自由贸易，但由于俄方官员对中方商贩的刁难，使民间往来时断时续。

四季屯附近，有许多岛屿，像霍尔漠津岛和王阿木河岛，其左右，一边是孙吴，一边是俄罗斯康斯坦丁诺夫卡，两岸相距千余米。霍尔漠津岛自1660年孙吴沿江建霍尔漠津屯起，村民开始上岛砍

柴、伐木、放牧、捕鱼、狩猎、采集药、野果等。丰富的资源以及村民的开发建设，使这个岛迅速变为沿江村屯的副业生产基地，移居岛上生活的人渐渐增多了。当对岸俄方居民登上这座小岛时，被这里的物产所吸引，中俄易货贸易便开始了。民间商贩以酒、布、小麦等进行交换。有的俄国商人还推销生活用品，购买农副产品。据记载，岛上有多处酒柜，以李振海的“双和盛”和刘子成、魏永利、王广等人的“四合盛”最有名气。在这个岛上，从早到晚都有来来往往的俄国人，每当夕阳西下时，他们才带着中国的美酒，划着小船，回到自己的家乡。王阿木河岛，盛产黄金，距俄康区最近，所以，当岛上有人开始从事生产，中俄民间贸易便迅速形成规模。到1911年，杂货柜、酒柜10余处，岛上窝棚70多个，采金工5 000多人。1932年日军入侵孙吴，把这些小岛封闭起来。

孙吴地域的历史变迁，不能脱离全国乃至东北局势的影响。

1931年的孙吴地域，正处在中华民国的第20个年头，而整个东北则是由易帜后归属国民党政府的东北军张学良部管制。早在1919年（民国8年），原东北军混成第三旅在孙吴霍尔漠津驻有骑兵一连的一个排，由连长钱金录带领，另有骑兵一连一个排的兵力驻守在孙吴第五号驿站（吴家堡），由排长李枝荣带领，其司令部设于黑河。此后，又建立了警察派出所和地方保安团。距孙吴最近、成旅团建制的正规军驻地触及到克山、拜泉

一带，与绥化、齐齐哈尔、扎兰屯、海拉尔、满洲里驻军形成一线。孙吴当时只稀疏20几个村落，归属黑河省市政筹备处管辖。

第一章　日本侵略者在孙吴的殖民统治和军事部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1932年3月1日，宣布满洲国成立，设伪国都于新京（长春），妄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

1932年秋，日军沿古龙逊官道侵入孙吴。经龙门首站北进，经过西逊别拉和腰逊别拉（曾家堡和腰屯），在吴家窝堡（龙逊官道逊河设置局第五号驿站）安营扎寨。之后，立即派出一支守备部队，大约700人左右，沿着孙吴境内的逊别拉河两岸寻觅屯兵之地。当年12月，日军在逊别拉河中段找到一处小平原，俗称“孙吴盆地”。最后，确定此地为“北部正面”军事重镇。

1933年至1934年间，伪满政府公布保甲法，逊别拉河（今逊河）以南为龙镇县第四保，下设南街甲、北街甲、二站（辰清）甲；霍尔漠津河以东的霍尔漠津屯、嘎巴亮子、哈达彦隶属奇克县干岔子保。1933年4月，日伪当局开始测量北黑铁路线。1935年11月，北黑铁路全线通车。

至此，实现了侵略者打开北安至黑河的军事要道的意图。

1937年，伪黑河省公署以孙吴驿为中心，划瑷珲、逊河、龙门县各一部分，建立了伪孙吴县公署，说什么“孙吴为各县商业交通中心，实有设县之必要”，为关东军自1939年后将孙吴以北至黑河沿江区域划为“特别军事区”确立了先决条件。

日本侵略者以所谓“特殊地位和权益”为借口，用武力来吞并孙吴、并准备随时进攻苏联，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

一、日伪时期孙吴的统治机构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成立了“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妄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建立了“满洲国”政权。伪满洲国是日本武装占领下的军政机关，为维护其军事殖民统治，设置许多军警机构，对东北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

自1935年起，日本侵略者相继在孙吴设立了宪兵队、保安局、国境警察队、铁路警护队、森林警察队等军警宪特四位一体的恐怖统治网（在黑河、呼玛、逊克各设一处特务机关，孙吴设两处），宪特多达2000余人。还在孙吴、黑河各地遍设分队、派遣队，用各种方法侦察、逮捕、审讯通苏、反满抗日嫌疑犯、苏联情报人员和监视、控制广大人民，杀害无辜群众。

（一）宪兵队

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根据孙吴的特殊战略地位，于

1936年派奥田胜、板田等人到孙吴筹建日本孙吴宪兵分队，有密侦30余名，归属齐齐哈尔宪兵队本部统辖。管辖范围：清溪、额雨、沿江、腰屯、干岔子、逊河等地区。

1937年8月，日本孙吴宪兵队本部成立，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队本部设于北孙吴日军第四军司令部附近。当时，日本孙吴宪兵队本部管辖范围南到北安、龙镇，北到黑河、神武屯，东到奇克，西到嫩江、山神府。孙吴境内均设有宪兵分队。并在霍尔漠津新设胜武屯分遣队，同时将瑷珲分驻所扩大为分遣队。1938年（康德五年）本部迁到北安，改称北安宪兵队。1939年设龙镇、神武屯、嫩江分遣队，撤消胜武屯分遣队。1940年4月，将嫩江分遣队扩大为分队，编入齐齐哈尔宪兵队。1941年4月，设泰安分驻所，同年7月本部再次迁往孙吴（原驻地），改称孙吴宪兵队，直至抗战胜利。

孙吴宪兵队各课（室）共有40人左右，设特务组据点20余处，使用密侦40余人。首要任务是向苏联派遣间谍，同时防止苏联派遣间谍（即反间谍）；防止伪满军警及伪满政权反叛和有反满抗日亲苏言行，特别注意其中的间谍分子。对中国人民实行所谓“思想”对策，镇压反满抗日亲苏人员，利用各手段搜集我地下工作者的情报。对所有中国公民，只要认为是“政治犯”、“思想犯”、“嫌疑犯”，就用日满议定书享有的“严重处分权”和“特移处分权”，即可不按法律手段，随时可以就地处决或送细菌部队作“马路大”试验。为达到镇压中国人民反满抗日的目的，做好所谓“防谍”和“思想”两对策，尤其是孙吴宪兵队内的“特高”组织，由宪兵中的所谓优秀分子和有

作特务能力的分子编成。这些警宪特系统都由日本人控制，任用日本和中国各级职员最多时达300多人，密探160多名。

（二）保安局

1937年12月1日，在伪满洲中央保安局成立的同时，组建了孙吴地方保安局，主要任务是侦察发现各国特别是苏联、蒙古及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和伪满洲的情报人员，向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其它国家派遣间谍特务，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破坏中国共产党、朝鲜民族独立爱国组织；对宗教、团体、结社等内部进行侦察，发现反满抗日分子及其他可疑分子，实行公开或秘密逮捕。为了对外保密，各地方保安局不独立单设，隐藏在各地方警察组织内，对外称“警察特务分室”。各省警务厅长兼任各省地方保安局长，各级特务科股长兼任地方保安局理事官，领导指挥各级保安局工作。保安局属军队性质，总班长在省是特务科长，县是特务股长。孙吴地方保安局理事官，先后有警察队特务股长西村留吉、森行节夫担任，下设特务分室、特谍班、防电班，编制22人，使用密侦20余人。特务分室主任由特务股长兼任，特务分室警官有日本人3人，中国人3人；特谍班，有日本人4人，总班长指挥领导三至四名特谍班长，特谍班长负责直接领导、使用密侦，实行直线领导，不发生横向关系。成立于1942年的防电班，由警察队特务股长森行节夫直接控制，地点在伪县公署西南500米的南山上，南山无线电台有日本人6人，对外普遍称为“无线电班”。设备有无线电电波操知机两台，由日本人松田具体负责，其任务是侦听苏联有关的无线电

收发报，报告给保安局长和特务机关长，以侦听查出地下无线电台和关系者，破坏抗日地下组织。保安局下设的秘密拘留所在汉城旅馆地下室，由白俄警尉补葛洛连科担任看守。

（三）国境警察队

1935年，孙吴站兴建期间，为了维护地方秩序，龙镇警察署调遣一部分人员成立了龙镇警察署管辖的孙吴驻所，所长李子阳（警尉），指挥官笹岛男（警长，日本人）。1937年，日军将孙吴站划为“特殊军事地区”，龙镇警察署将孙吴分驻所的警察全部撤回，由黑河省警务厅派出警察成立了孙吴县警务股，股长于佩珊（警政），下辖：孙吴警察署和大五家子警察署。孙吴警察署长仑地藏（警政，日本人），内部设置警务系4人，司法系6人，特务系5人，证明系4人，保安系4人，兵事系1人，共计25人。1938年10月，奉黑河省警务厅命令，将孙吴警务股改编为孙吴国境警察本队，辖孙吴国境警察中队、霍尔漠津警察中队，撤消了大五家子警察署。1942年春，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后方在职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是在乡军人，为了扩充前方的军事力量，不断召集在职警察去参加作战，因而警察数量逐渐减少。

孙吴国境警察本队，内设警务股、队伍股、特务股、督察室、警防股、司法股。本队队长先后由日本人仑地藏、堤金录和福田担任，本队人员编制53人。下属孙吴国境警察中队（虚设）和霍尔漠津警察中队，辖12个小队，分别设在各村屯街道，使用密侦40余名。对当地人民实行政治上的统治、经济上的压迫、言论上的控制、行动上的

监视。

孙吴国境警察本队在黑河省警务厅直接领导下，进行各种活动，队内各股以及所属各中小队都在本队领导下行动。特务股所属特务分室对经办的重要案件，直接向警务厅特务分室、当地宪兵队、日本驻军部队取得联系，捕获的苏地工及嫌疑，经审讯确认后，直接送交警务厅分室处理。在“崇德反苏”舆论下，向苏联派遣特务间谍以前，必须首先向当地宪兵队和该地区江岸守备队取得联系，相互熟悉暗语、口令，以免互相发生误会。孙吴国境警察本队特务分室设有秘密拘留所一处，专门扣押所谓通苏嫌疑犯，也是分室人员经常集会、日特人员相互取得联系的中心场所。

（四）铁路警护队

伪满政府为了维护所谓铁道和车站的治安，1935年(康德二年)由中东路、哈铁路警察处调集60多人，组建了孙吴铁路警务所，1937年改称孙吴铁路警护队，1943年又改称孙吴铁路警护团。属陆军性质，着陆军服装。下辖辰清、孙吴、北孙吴、清溪、额雨、潮水、瑷珲、黄金子、神武屯、黑河等10个铁路警察分所，有警察150多名。其管辖范围和任务是维护南起辰清，北至黑河铁路沿线、车站及铁路员工住宅的治安，向苏联派遣间谍，搜集苏方军政、经济情报，进行军事防御地区和交通要道、车上车下的检查。伪满时期，北黑铁路的火车一到清溪与孙吴之间的西地营子，宪兵和警护队员就巡察于各车厢，北侧车窗上的厚帆布窗帘必须拉下，有人窃看必被抓起来。车到孙吴在车厢和出口严加检查、盘问，发现可疑人立即押至警

护队，有很多人一去无回。

（五）森林警察队

1937年，日伪先后在辰清、清溪成立了两个森林警察中队，隶属北安县警务科，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日军森林采伐任务，同时在山里发现、控制、搜捕抗联和苏地工人员。各中队设中队副、医官、指挥官，下设6个小队，分布在辰清、茅兰顶子、茅兰河、清溪腰岭、平顶和腰店，共有140余人。森林警察除着装巡逻、在要道口检查外，有时穿便衣深入各采伐点探查或利用密侦进行暗查。其名义上是保护山林，实际是控制与搜捕抗联和苏联地工人员，监视森林采伐工人，镇压爱国群众，同时掠夺林产资源。

二、日军在孙吴的军事部署

（一）划定特别军事区

九一八事变是日军推行“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大陆政策”是指日本帝国主义为确立在东亚大陆的霸权，对这一地区进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其侵略对象不仅仅包括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其它国家，也包括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1932年，日军进驻黑龙江右岸，隔江与苏联对峙，随即出台《对苏作战纲领》，把中国东北与苏联为邻的边界地带，根据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划分为4个正面战区：“东部正面”、“东北部正面”、“西部正面”和“北部正面”，“北部正面”又称“孙吴正面”或“黑河正面”，以进攻苏联的阿穆尔州为目标，布置了最前沿的

阵地工事。同时，把伪黑河省所辖全境划入国境地带，实施《国境地带法》，选定孙吴霍尔漠津、瑷珲、黑河、法别拉4处重点地带修筑“国境阵地”。把孙吴以北到黑河一带的沿江地区（东起乌云，西至三间房）划为“特别军事区域”，由“北部正面”部队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

所谓“北边”，是以吉林省的长春为中心，从其正东方伪间岛省的珲春县起，沿苏联国境地带直到正北方面伪黑河省的漠河县，包括珲春、东宁、绥阳、穆棱、密山、虎林、饶河、抚远、同江、罗北、佛山、乌云、奇克、瑷珲、呼玛、鸥浦、漠河17县规定为“国境地带”，又叫“北边地方”。从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关东军强征大量劳工在中国东北中苏边境线中国一侧修筑了14处永久性战略工事，称为“国境阵地”。以孙吴为中心“北部正面”有4个“国境阵地”。其中第五“国境阵地”在孙吴沿江霍尔漠津及胜武屯一带。第六“国境阵地”在潮水，第七“国境阵地”在黑河，第十三“国境阵地”在法别拉。1936年11月25日，日德法西斯轴心国签订以进攻苏联为目标的“防共协定”。此后，关东军加紧了对苏联进攻的战略准备，在其《对苏作战设想》中，计划将一个师团的兵力集结于黑河附近，对苏采取攻势，吸引并牵制其兵力。另外，以一部分兵力集结于孙吴附近，以策应、支援东部正面日军主攻部队与河川防守、渡江作战。

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后，始终把苏联做为自己的潜在敌人。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曾设想，苏军假如武装介入抵抗日军，日方将采取应变对策，主力向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压

上，寻找苏军主力尽快歼灭之。当关东军继续向“北部正面”进犯之际，十分注意苏联的动向。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主张“控制中东铁路，速将齐齐哈尔、哈尔滨两座重镇掌握在手中，以防患苏军进攻北满，如苏联不介入，当然无需立即开战，则腾出手来对东北占领地实行有效的统治”。日本对苏联的战备既有进攻的一面，又有防备的一面。这种对苏战备的双重指导思想，一是仇视苏联，是实施“大陆政策”的需要，也是随时准备不择手段地进攻苏联的体现；二是害怕苏联，严密警戒苏军袭击它的后路。而苏联在九一八事变后，一方面为自身的利益，避免卷入战争，宣布严守中立；另一方面逐步加强滨海边疆区及其它苏联远东领土的防御，并加快速度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以巩固其边境线的防御。双方各自加强了边境线上的军事部署，并不断出现边境纠纷，仅在1932年至1934年期间，日苏在中苏、中蒙边境的纠纷达150多起。1935年后，每年都超过100起。

1938年和1939年日本的“北进”政策失败后，于1940年7月27日，日军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订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虽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进而推行对“南方”的侵略政策，把战略重点南移。但是，仍坚持“要在南迁的同时，随时解决北方问题。以消除北部边界的忧患”。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侵苏战争。苏联为了抵抗德军的入侵，开始由东线向西线抽调兵力。德国突袭苏联，使关东军特别振奋，开始由试探性北进转变成对苏采取将战即和策略，由于被中国这块肥肉牢

牢地吸引，虽然苏德战争爆发，但日本却失去了与德国夹击苏联的恰当时机。以至后来日本只能对苏联的进攻采取防御的战略准备。即使对苏有剑拔弩张之举，也是虚张声势。1941年7月2日，日本大本营制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准备对苏联要秘密采取武力。《纲要》规定："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此，"应做好对英美开战的准备"。"如果德苏战争的进展情况对帝国极为有利，就实行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于是，关东军独立第四军司令部从齐齐哈尔进驻孙吴。第四军在"北部正面"配置兵力有师团4个，独立机关枪大队、轻装甲车中队2个，野战高射炮队8个，以及战车联队、野战重炮兵旅团、重炮兵联队、炮兵情报班、独立航空队、工兵大队、野战通信队、无线情报队、气象队、测量队、架桥与渡河材料队、信鸽队等。在此基础上，第四军阵容又有扩充，新增加了驮运师团，照空部队，飞机中队，装甲中队，高射炮部队。而此时，南、北孙吴已呈现畸形的繁荣，要塞阵地、兵营、飞机场、战壕、碉堡、山洞、军需品弹药仓库等军事工程及附属设施已近固若金汤。

1941年7月7日和7月16日，日本陆军部分别下达了第一、第二号动员令，在伪满全境，特别是边境地带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与此同时，部队调动频繁，征兵、换防、实战训练等声势浩大。同时，关东军乘机加紧了经济上的掠夺。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查署东北工作团1954年调查材料中记载：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为关特演准备煤210万吨，石油10万吨，粮食100万吨以及大批干蔬菜、药品、棉布，以

备军需。古海中之以伪满经济次长身份，为关特演的实施筹集伪币5亿元。“关特演”是日本陆军史上空前的大动员。动员总兵力达71万人（一说85万人），战马14万匹，飞机约600架、71个飞行中队，总兵力较演习前几乎增加一倍。此时，日军在孙吴的总兵力由原来的4万人，增加到9.8万人，号称十万关东军，约占关东军总兵力的七分之一，在边境线上配备了最精锐的师团，虎视眈眈，窥视苏联。至此，日本军部构想的“特别军事区”全面形成。在“特别军事区条令”中规定，国境地带内居民满14岁以上者，必须向当地警察申请发给居住证明书。国境地区外居民如欲迁往国境地区居住者，须经民生部大臣或蒙汉部大臣发给移住许可证方准迁入。关东军对北部边境地区的严格管制，完全出于准备发动侵苏战争以及稳固中国东北，养精蓄锐，进而吞并东亚大陆的双向图谋。

（二）主要兵力部署和防御要塞

1936年5月，以河林恭铺中将为首的关东军第一师团主力进驻齐齐哈尔，其一部分驻北安，另派一些小部队分别进驻国境线沿黑龙江边设立哨所。对国界进行管制警戒。沿江一带从孙吴以东20公里的佛山、乌云城到黑河西北180公里的呼玛，部署了4个警备区，6个警备队，35个监视哨，全部兵员共约1 185人，其中属于孙吴境内（管辖）的有乌云、库尔滨、奇克、干岔子、四季屯等5个国境警备队和17个监视哨，总兵员720人。

霍尔漠津要塞于1937年底筑成后，驻防的守备部队被命名为独立第5国境守备队。此守备队成立于1938年3月1

日，兵源是由驻满洲的部队和日本留守的部队中抽调了4个步兵中队，两个炮兵中队，两个工兵中队组成。兵力1 500人左右。重武器装备有：轻型火炮8门（其中迫击炮4门，榴弹炮4门）、高射炮8门。分布于东、西、北三个区域。司令部位于胜山（胜武屯）阵地。1943年7月10日，根据关东军总部的整编命令，该守备队与驻瑷珲的第六国境守备队和驻黑河的第七国境守备队被编入新成立的136旅团移驻嫩江后，由关东军123师团第269联队第1大队接替其驻防，大队本部位于海拔313米的胜山阵地。

主要兵力部署 关东第四军：1938年春，独立第五国境守备队编成后不久，第四军所属部队也先后进驻孙吴，是日本关东军在“北部正面”所有部队的最高指挥机关，指挥范围包括“北部正面”的所有野战师团和孙吴、瑷珲、黑河、法别拉旅团以及“北部正面”地区的第五、六、七、十三国境守备队和军司令部直属的炮兵、工兵、通信兵等专业分队。在1941年“关特演”时，由第四军统辖的兵力达9.8万余人。第一师团：1938年和第四军司令部一起侵驻孙吴的关东军第一个野战师团，全师团兵员总数约在1.5万人左右。1941年夏“关特演”时，该师团被划为车辆师团，总编制为18 530人。1944年7月，除留少量留守人员外，整建制被调往菲律宾参加太平洋战争。123师团（代号718）：1940年10月，从北安迁至孙吴，总兵力约4万余人，此后常驻孙吴。独立混成第73旅团：1944年7月，第一师团南调后，同年10月11日，以原第一师团留守官兵为骨干，在原第一师团营址新组建了关东军独立混成73旅团，全旅团官兵总数约8 500至9 000人。

胜山要塞　1933年至1945年间，日军将各要塞定为“特、甲、乙、丙、丁”5个类别分三期筑成，第一期在东宁、绥芬河、鸡东、虎头、霍尔漠津（孙吴胜山）、及瑷珲、黑河、海拉尔等地。二期工程在吉林珲春、密山、法别拉。三期工程主要在三江地区的凤翔、富锦等地。因以孙吴为中心的第五国境阵地是四个要塞阵地中心的重中之重，故胜山要塞当属特级要塞。

构筑在孙吴的日军第五国境阵地在总体轮廓上应叫做“霍尔漠津要塞”，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胜山要塞”，位于孙吴县城周边小兴安岭低山丘陵区。北起黑龙江边，西至三岔河，东至逊河，南隔逊别拉河至一本松，要塞总面积约350平方公里，防御纵深10公里—60公里。修筑坚固，分布面积广，功能齐全，防御纵深大，被关东军高官称之为“坚固的模范阵地”。霍尔漠津要塞“由胜山、东地区、西地区、北地区、南地区阵地和逊别拉南方阵地、茅兰屯野战阵地、江岸警备阵地组成。这些阵地前后左右相互策应，一线阵地既可防御苏军进攻，又可为日本进攻苏联时提供火力支撑，消灭苏境内的有生力量和摧毁其军事设施。当一线阵地被突破时，又可退到纵深区域进行固守，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主要阵地有：①胜山阵地，是霍尔漠津要塞的主阵地，位于黑龙江边哈大阳（哈达彦）和霍尔漠津以南10公里处，是第五国境守备队（以下简称“五国守”）的指挥中心。1945年7月，“五国守”所属部队撤销并整编入123师团后，由123师团步兵第269联队第一大队接替“五国守”，驻守胜山阵地。胜山阵地西邻二道河，东接三角

山，南至庙林山。胜山阵地由胜山核心阵地、河西山、见晴台、亚雷高地等阵地组成。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14公里，面积168平方公里，胜山、见晴台、亚雷高地阵地呈三角形，胜山阵地正处于三角形尖部，而河西阵地则为胜山阵地的后方阵地。②北部区阵地，由花见山主阵地、东崖山、北崖山、东花台阵地组成。花见山主阵地是关东军123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为霍尔漠津要塞的指挥中心。花见山阵地东靠铁道线，西和北接卧牛河，南邻荒神山。南北长9公里，东西宽7公里，面积63平方公里。位于胜山核心阵地西北部，东为东地区阵地，南为南地区阵地，地处3个地区阵地的中心。123师团的主力驻扎在北地区阵地。③东地区阵地，由东风山、香取山、神乐山、一条山、二条山、三条山、西鹫台、腰屯山阵地组成。东和北以卧牛河为界，南邻孙逊公路，西靠铁道线。位于胜山阵地西南部，北地区阵地的东部，三条山、二条山、一条山阵地位于东地区阵地的东部制高点上，是主阵地东风山东南方向的前线阵地。香取山阵地在其南方，成为主阵地的屏障。④南地区阵地，由荒神山、清澄山、驹泽山、鹿岛台、北水台阵地组成。东邻铁道线，西界平关河，北接花见山和北崖山，南接逊别拉河。南北长8公里，东西宽7公里，面积56平方公里。南地区阵地位于孙逊公路北侧，是花见山核心阵地的南方防线。⑤逊别拉南方阵地，位于逊别拉河南岸的丘陵地带，北黑铁路的东部。阵地东西走向，由秋月山、南腰山、二宝山、武勇山、忠节山阵地组成。利用南部丘陵制高点构筑的阵地形成了一道守护的南部防线。⑥茅兰屯野战阵地，也称作相模山阵地，因此阵地驻守日军多为

日本相模籍官兵而得名。位于霍尔漠津东南逊别拉河南北两岸，是正北面国境阵地的最右翼。主要分布在河北岸，孙逊公路在阵地南部逊别拉河北岸从西向东通过。茅兰屯野战阵地由相模山、三角山（大天山）两个在丘陵地带修筑的阵地组成。从逊别拉河北岸至胜山阵地形成一道弧形防线，从右翼与胜山阵地连为一体，进而与胜山阵地左翼的东、北、南地区阵地形成一个面、线、点（纵深）相结合的军事工事体系，可有效掩护霍尔漠津要塞的右翼侧面。茅兰屯野战阵地从1940年开始构筑，1942年完工，在阵地上构筑了大量永备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所、观察所、炮阵地、机枪阵地、仓库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反坦克壕等。⑦江岸警备阵地，1938年，关东军在霍尔漠津要塞区设置了江岸警备阵地，同瑷珲、黑河、逊别拉要塞江岸警备阵地一起，构成了沿黑龙江边一线的江岸警备体系。霍尔漠津要塞江岸警备阵地设置了乌云、相模山、胜武屯3个警备地区。其中乌云警备地区下设乌云警备队（下辖雪水温、旧城基、常家屯监视哨）；相模山警备地区下设库尔滨警备队（下辖县官屯、东山头、栽地营子监视哨）；奇克警备队（下辖东山、西山、百合山监视哨）；干岔子警备队（下辖高滩、嘎牛户、何地营子、中地区监视哨）；胜武屯警备地区下设胜武屯警备队（下辖哈大阳、霍尔漠津、大桦树林子监视哨）；四季屯警备队（下辖四季屯、胜利屯监视哨和首山、白金山、铁甲山监视分哨）。以上江岸警备阵地由123师团步兵第268、269联队部分兵力驻守，配备专用轻重武器和车辆、船只、马匹等，并在阵地内构筑了野战工事。

孙吴“特仓”阵地　在北孙吴“复郭”阵地花见山，有个通常被叫做“特仓”的永久性地下建筑物。在战前，不随身带特别许可证的人，既使是少尉以上的军官也不能靠近。这“特仓”正是霍尔漠津要塞的指挥中心——师团司令部就在地下隧道里。为什么称为“特仓”呢？因为花见山的中心部位有弹药库、粮食库等很多的仓库（地下建筑物）。为了伪装其中的司令部驻地，所以起名叫“特别仓库”，简称“特仓”。

阵地内的道路坡度不陡，汽车能开到附近，“特仓”前能通过轻型战车、重炮车，道路不宽但很坚固。“特仓”的右侧可通往野炮队，在丁字路附近有辎重连队本部战壕，和师团通信队战壕隔道相望。“特仓”的位置在花见山的东山坡上，前方有深深的山谷，南面很开阔，可以看得见北孙吴司令部的房舍。在东西两侧山道上建成防御射击工事，敌人不能从山谷入侵。“特仓”阵地的入口在草原下面数十米的地方，有南北两个隧道口。隧道很窄，每次只能弯腰通过一个人，越过前面的射击孔，往下走数层台阶就是地下指挥部的主走廊。“特仓”内部有师团长室、参谋部、作战室和通信室等，师团的中心机构都集中在这里。

“特仓”的墙壁和顶棚用大约1.5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在当时，足以经得住大炮和炸弹的轰炸而不破损。各个房间都很宽敞，每间屋都有6张草席那么大。“特仓”总长70米，宽约10米，高2米左右。用自备发电机照明，发电站放在“特仓”附近的战壕里，走廊有天窗。进入指挥部厕所，可以从窗户向阵地入口附近扫射。阵地的

西南边有炊事战壕、水井，北面阵地有军队医院，东南山谷中有地下粮草仓库。向发电站附近的管理部中队和经理部宿舍扩展，有散兵壕构筑。隧道间各部门的联络由有线电和传令兵联络，电台总机是师团通信有线交换机，话务员有女兵，有3台100个插孔的交换机。

霍尔漠津要塞以北地区的花见山阵地，即123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为中心，以江岸警备阵地为前沿，胜山阵地为防守核心，以东地区、南地区、北地区阵地形成纵深二线防御为策应，以逊别拉南方阵地为第三道防线，茅兰屯野战阵地为侧翼掩护，构成胜山阵地右翼屏障。然而，日军处心积虑经营的所谓“模范阵地”的钢筋水泥堡垒，在1945年8月9日当苏军进攻要塞各阵地时，强大火力摧毁了日军的防线，驻守茅兰屯等野战阵地的日军只稍做抵抗便撤回后方，胜山等主阵地的日军凭险和坚固的工事拼命抵抗，也终因不敌苏军而溃败。霍尔漠津要塞并没有发挥日军想象的作用，庞大的要塞阵地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刻间土崩瓦解，无法挽回日军覆灭的命运。

第二章　日本侵略者在孙吴所犯罪行

自1932年8月日军入侵孙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长达13年的殖民地中，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关内外的大批中国劳工和战俘，仅修筑胜山要塞就有3至5万人死于非命。

一、肆意屠杀无辜百姓、抗联官兵和通苏情报人员

日伪时期，警察特务机关豢养的爪牙遍布孙吴城乡各个角落，他们依仗日军势力任意打骂群众，勒索民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他们常以“通苏”、“抗联嫌疑”、“思想不良”、“确保军事机密”、“经济犯”为名，肆意抓捕无辜群众，施以残酷的严刑拷打，审讯场面惨不忍睹。受刑过重死亡将尸体拖出喂狗或拉到山里用雪一盖的情况常有发生，每年被警察特务逮捕、冤捕、刑讯、关押、处死或折磨致死及下落不明者甚多。尤其是关东军宪兵队执行“军事警察”和“防谍与思想对策”双重任务，在残害中国人民的手法上：第一，为关东军修军事设施的中国劳工，工程竣工后，为保守军事秘密而

将中国劳工集体屠杀。其他中国民众，随便找个借口，即可杀掉。第二，惨杀抗日战士和有抗日嫌疑人员。第三，残害劳工中“磨洋工”或企图逃跑者。据孙吴宪兵西尾昭信供认：“1943年6月到1944年9月，第718部队道路部长小山以‘勤劳奉公队’和‘勤劳报国队’的名义在东北各地征用了3600多名中国青年修公别拉至辰清的公路，将不堪劳累，丧失劳动者视为磨洋工，先后杀掉19名劳工。”“1945年8月14日，于孙吴宪兵队拘留所对所谓‘通苏嫌疑犯’的8名中国人，用手榴弹炸死，并放火烧拘留所里被残害的中国人的遗体，唯恐苏军追究，又埋葬在分队的横沟内。”他还供认：“我的杀人罪行为：执行杀人4名，帮助杀人71名，总计75名。”

日本孙吴宪兵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掠中国人民的财物，遇有年青美貌妇女肆意侮辱强奸。宪兵军曹佐佐木供认，在孙吴期间，3次从满铁消费合作社抢去满钱一万多元，并从居民和小店手中抢走留声机、月饼、肥皂、鸦片等，在食堂、宿舍和居民家中强奸17岁以上妇女多名。

1944年10月，孙吴宪兵军曹岛崎卫浪因需要金钱为日本妓女赎身，在辰清车站借口检查中国人的证书，从一个伐木工人身上搜到现金800元左右和储蓄通帐一本，将其逼到辰清东山枪杀，抢走了现金和储蓄本。

经孙吴宪兵队特高机关逮捕、拷打致死的苏联间谍达21名。仅1940年伪满“国事调查”实行两次大逮捕，500余人全部被秘密杀害。

孙吴宪兵分遣队均负有防谍任务。设于北孙吴关东军

独立第四军司令部宪兵分遣队，就是专管防谍工作的。为了做好防谍工作，主要手段是“派遣”和“反派遣”，“逆反”和“跟踪”，由孙吴宪兵队特高科和孙吴宪兵队特高系领导。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大量向苏联派遣特务，刺探军事情报，进行间谍活动。1940年6月，胜武屯宪兵分遣队派遣中国人白富夫、杨中强、关金忠3人，从霍尔漠津江边柳毛子乘小船潜去苏联刺探情报。小船刚靠岸，3人因怕被苏联边防军抓获返回。不久，3人又被日本宪兵队的特高人员强行从霍尔漠津送去苏联当间谍。对苏联派来的情报人员，被捕获后不能为其使用的就残害致死。1942年12月31日，孙吴宪兵队将苏联侦察员张殿清的联络员张富捕获后，张拒不承认是苏联间谍，当天晚上在宪兵队看守时被日本宪兵加藤用木棒活活打死。1943年2月，苏联派来的女情报员王淑琴过江后即自首，供称她是苏联派到齐齐哈尔和苏联情报员接头窃取军事情报的，并供出到齐齐哈尔联络暗号，孙吴宪兵队本部特高科长获云内认为王淑琴供述的情况很重要，命令孙吴宪兵队特高主任河野率宪兵到齐齐哈尔按王淑琴提供的情报捕捉苏联情报人员，并企图从此打开缺口，一网打尽苏联在齐齐哈尔的情报人员。折腾了几天，一个和王淑琴有关的人也未捉到。日本宪兵队判定王淑琴提供的是假情报，将王淑琴送克山法院判刑。

日本宪兵队对逮捕和拘押的中国人经常进行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战犯西尾昭信供认：“直接逮捕拷问的34名，别人逮捕我拷问的5名，捏造各种理由对中国人160名进行酷行拷问。”这个战犯还具体供认说：“陆军医院丢

了一个注射器，怀疑是扫烟囱的刘某偷去，随即进行逮捕，用木刀乱打臂部，背部，在寒冷的2月天气，让他裸体站在屋外，一连三次，又用火钩烫他的鼻尖、胸部，烧伤多处，还绑在凳子上灌辣椒水。经过几天的折磨，第7天就死在拘留所里了。”

孙吴宪兵队宪补梁国屏，在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地踢死1名工人。他充当汉奸不足两年，就亲自参与逮捕苏联地工人员1名、抗联战士2名、无辜群众6名，对被捕者施以吊打酷刑，致死两名群众。1943年冬，孙吴宪兵队奇克派遣队密探为了邀功请赏，诬告说，高滩一姓张农民是苏联密探，宪兵队把他抓来严刑拷打，非人折磨，这一农民拒不承认，惨死于狱中。抗战胜利前，孙吴县设有监狱一座，有典狱长1人，看守警察数人，地址在县警察本队院内，容纳60人。日本宪兵、保安局、铁路警护团分别设有“留置场”（拘留所），每个留置场可容纳10余名“犯人”。抗战胜利时，单从孙吴宪兵队发现被害者证明书近一麻袋。1945年8月中旬，苏联红军坦克部队攻进腰屯乡腰屯村，孙吴日军宪兵队乔装成老百姓，穿便衣用手雷将苏军坦克炸毁多辆，然后逃到村子里的居民家里，致使苏军误杀当地男性居民420多名。

日本当局利用酷法和严刑，强行中国人民就范，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妄图毁灭整个中华民族，以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13年日伪统治中，反动政治法令之多实属罕见，仅在1943年编入《防谍关系法令集》的就有12种之多。1944年6月公布的《时局特别刑法》规定的，诸如“反对帝国罪”、“内乱罪”、“背叛罪”、“危害

国家罪”、“军机保护法罪”、“治安维持法罪”等各种各样罪名极其苛刻，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及的程度，使当地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惨无人道的细菌、毒气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时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其中尤其重大之罪恶就是在进行常规战争的同时，日军无视国际禁令和世界舆论的遣责秘密研用生化武器残害中国人民。日本法西斯是使用生化武器次数最频繁、实效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长达8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的生化武器战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日军人为地制造致命的、恐怖性的流行疾病，毫无人性的杀害无辜的百姓，毁灭性破坏大自然生态环境，其罪恶之深同德国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如出一辙，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抹杀的一页，其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1932年秋，日本关东军沿龙逊官道入侵孙吴，在“北边镇护”国策的昭导下，疯狂扩军。1941年7月，日本关东军第四军司令部迁至孙吴，同年9月伪满日军“731”部队孙吴“673”细菌支队建立，并步入常规性试验阶段。日军的细菌部队最臭名昭著最残忍的就是完全用活人做细菌试验的材料，来杀害被俘的抗联战士、八路军指战员、劳工及抗日反满嫌疑分子。从1940年4月至1945年8月，不到6年的时间里，“673”支队通过各种细菌试验直接致死者达278人(无从考证的则没有计算

在内），间接死亡64人。

（一）“673”支队的组建和实战试验

1935年，日军参谋部和陆军省根据天皇敕令，正式组建了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秘密部队，一个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个是关东军兽疫预防部。时有2000人，八个分部。1940年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又发布敕令，要求在进攻苏联的各个战略要地建立细菌战基地，创建“731”本部及各个支队，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紧接着，在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签署的《关于建立和分布石井部队四个支部的命令》中说：“在石井部队下，分设有许多由日本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部，它的任务是准备在战争中，实际使用该部队的细菌武器。”日本参谋本部对建队的时间、驻地以及配置人数都提出要求，规定每个支队名额为300人，雇员人数不得超过各队全员的30%，日本陆军医院和“731”部队定额抽出医生、专家和士官派往各地支队工作。

日军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实现“大东亚共荣”，开疆扩土、入侵苏联远东地区和外蒙的目的，于1938年开始改建扩编防疫给水部，同年6月，细菌部队特别军事区划定在哈尔滨市平房附近。1940年，被称为加茂部队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曾一时称呼为“东乡部队”。以3 000人之众进驻平房，建立了一支在世界战争史上规模庞大的特种部队，为掩人耳目，该部队总称为“满洲731部队”。其下设有牡丹江支队为“643”部队，林口支队为“162”部队，海拉尔支队为“543”部队，孙吴支队即“673”部队。

在孙吴县城西，有一条叫做西牡丹江的小河从南山坳淌出，湍急的细流绕过一道岗弯，略宽一些的水面就舒展开了许多。

侵华日军进驻孙吴后，沿逊别拉河两岸开始了军事工程的庞大规划。当勘测到这块台地的时候，五花草塘中有一种花草，花开的格外耀眼，形如铃铛，叶片浅蓝，侵略者就将此花命名为“铃兰花”，将此地命名为“铃兰台”。噬人恶魔们特别青睐这块宝地，“673”细菌实验基地就选在了“铃兰台”（今孙吴县西兴乡兴建村西山自然屯）。

关东军“731”本部选择孙吴建立细菌之队，其原因是：一是孙吴人口稀少，地势优越，其地依山傍水，山林茂密，驻扎区域内无沼泽，没有大块岩石之类的自然障碍，孙吴四周有重兵把守，并筑有大量的军用设施，仓库、碉堡、暗道交织纵横，拥有建队优势，对外显得更加高深莫测。二是驻扎地靠近铁路，又距县城很近，便于战略据点间的网络联系。且有仿若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管理的数万劳工，制造细菌所需的人力、设备、实验对象，都能给以充足的供应。三是孙吴当时被划为“国境线”，创建细菌试验基地容易保守机密，这里距中苏边境只有百余里，筑有被日本关东军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即东北边境地带，东起吉林珲春，西至内蒙古海拉尔长达1 700公里14处要塞群之一的“胜山要塞”。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关东军即拟定了侵略矛头直指前苏联的《对苏攻势作战计划》，其基本内容是锁定在苏联远东滨海地区，首先从东部正面突破，得手后，再向贝加尔湖进军。直到

1944年9月关东军奉命停止对苏攻势作战准备为止（因日军在太平洋战事连连失利），始终未变。故日军所研制的细菌武器用到实战上去极为便利，且有进攻苏联并扼制其南下和用来向英美进行讨价还价的战略地位。四是对于细菌战的主要武器，鼠疫的研究，这里有适宜的土地和资源，且鼠类众多，有黑线鼠、花色鼠、白鼠、黑鼠、灰色鼠、小眼鼠、大眼鼠，有野鼠、也有家鼠，还有瞎半鼠和水老鼠等，以致在细菌武器的研制正式出成果之前，用活人做试验都很方便，有抓来的劳工，有被俘的八路军指战员、抗日反满人士，也有异国俄罗斯人、蒙古人、朝鲜人等。五是有试验基础。在“673”支队之前，孙吴境内就有一个早在1938年动工修建的细菌试验基地，对外番号是2645部队，驻扎在县城东郊一带，有化验室和制药厂等配套设施，并有房屋15间，养鼠室10间，饲养动物有：灰鼠、小白鼠300只，兔子40多只，以及麻雀、江豚等。负责化验室的有5名工作人员。这里有两个大型水泥养鼠池和三个生物制品地下储存井，这一基地后来就是“673”支队的一个辅佐，其主要任务就是大量制造鼠疫，同“673”一起源源不断地向“731”本部提供所制病菌种类及样品，并抽取动物和广大劳工的血。他们以检查身体为名，从这里的3 000多名劳工中获取大量的血清，用以研制防疫菌苗，并与“673”串通一气，将有病的劳工秘密押送给“673，进行各种细菌培养观察试验的活体解剖。

基于以上诸因素，日本关东军加速“673”支队的实施计划。从1940年4月开始，日军调来大量劳工日夜抢修，仅用8个月时间，于当年12月完工。建有青灰砖房屋

300余间，有15间用做饲养试验用的动物，其余为支队官员办公室、化验室、训练室、守备部队营房及食堂、仓库、汽车间、锅炉房等。并有环山公路、电力电讯、自来水管线等设施。“673”驻地东侧的西牡丹江河的两侧堤岸，筑有2米高的大坝，铁丝网密布，基地的西侧筑有军事重仓十八处，当地百姓后来一直把此地叫“十八仓库”。基地四周有多处卫兵把守，尽管是“673”支队的人员也不准随便出入，行踪极为诡秘，真可谓与世隔绝的人间鬼域。

“673”支队的生活区和水源井。孙吴细菌支队军用地东南角有四个水泥槽，这就是细菌部队的解剖消毒室。这四个槽呈南北向，其中东槽宽1.35米，西槽宽2.7米，余下两槽均为0.75米。与大槽结构相同，间隔80厘米，在四槽周围散乱堆积有残砖，水泥板片，残瓷片，烧凝的玻璃和许多两厘米厚其上贴有白色涂料的水泥板残片，两个大槽都留有手术台的痕迹。小槽为消毒池，各种解剖的污血、污水最后可倒进消毒池。生活区位于军用地东北约500米处，由南向北排列七栋东西向的青砖房，每栋房间隔20米，其中南四栋房水泥抹面，为“673”细菌部队家属房，北面3栋房为守备队营房。正南方向的四栋房是军官和士兵宿舍。“673”部队的水源地，位于今日的西兴乡西地营子村，逊别拉河坝南100米处，现今日军供水设施仅存一口水井和南面废弃的小屋。这口井就是当年整个细菌试验基地和家属区的饮用水源。井台呈圆柱形，高50厘米，直径为6.6米，水泥砌筑。井口方形，建在井台南端，四周砌有水泥抹面的围墙，长宽均为1.05米，井体圆

柱形，井壁也为水泥面，井口距水面高度为3.55米，水深2至3米，井水来源于地下水，水质甘甜清澈。水泵设在离水井5米远的房屋中，通过地下管道供应用水，旁边废弃的小屋是看守士兵的住地。

“673”支队初建时，其人员都来自哈尔滨“731”总部，首任队长是佐佐木大佐。1942年初，由哈尔滨“731”总部派西俊英中佐来接任，并同时兼任哈尔滨本部的训练部长。孙吴“673”支队初始人员有30多人，1941年增至80多人，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已达120多人。按照支队的业务和职务，分为军官、药剂师、卫生军官、技术军官、教官、下士军官、士兵、卫生兵、教务文职人员和武装警卫等。管理人员中，金泽少尉负责培训学员，每年培训两批，两年中训练细菌研制人员50多名。管理劳工的叫“金子”，管理电源、水泵的叫“一条”，管理锅炉房的叫“大熊”，管理汽车库的叫“多井”。和“731”本部一样，“673”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和繁殖散布细菌用的寄生虫，其大量生产鼠疫、霍乱病菌，用动物人体双重试验，最终研制细菌武器用于实战。

在细菌武器研究上，不知日军何时看准了老鼠和跳蚤这一连带关系的两个物种。伪满时期，关东军“673”支队强迫群众交老鼠，责令学生停课捕捉老鼠，人们背后议论着：“日本人要这么多老鼠干什么”？然而，在“673”部队的15间鼠舍的地下，都建有贮存饲料的地窖，和供试验用的额定收养的1 000多只老鼠，还有10多只黄色老鼠，俗名“大眼贼”，是属于松鼠科田鼠类的原宗。另有兔子50只，羊3只。

当真相大白之后，人们称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为“老鼠部队”。在侵略者看来老鼠的用途很广泛，既可以培殖用于传染鼠疫的跳蚤，还可以做细菌试验的材料，同时用它的血还可以培养细菌。因此“673”支队把培养鼠类当做一项重点工作来做。抗战胜利时，“673”支队的遗址还可以看到。曾在孙吴县委党校任职的离休干部孙书志回忆：1945年秋末，日本兵都跑了，我们几个孩子在西山玩，发现有一排烧焦的房框子，从东面门洞进入，不远处有堆积成山一样的老鼠笼子垛，西南一座大型房屋旁边是一方形洞口，上边盖着镶有把手的大约一平方米的铁板，掀开它，踏着十几个台阶下去，便是一条宽敞的走廊，走廊两侧各设5个房间，左侧的第一个房间里散放着几根木头橛子，其余房间都在工作案台上摆放着数不清的玻璃试管和圆形玻璃盘，盘的直径10厘米，两个为一组上下摆在一起。这显然是细菌研究室，当时我们几个小孩子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在孙吴县建设委员会做过房产工作的退休干部杨乐先曾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初，他偶然到“673”遗址，那时还有不少残垣断壁。在一处墙角阳光照到的地方，他发现有一团一团白色的球状的东西，似乎在蠕动，近前一看，真叫人反胃，原来是一只只肥大的虱子抱成一团。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在当年“673”部队临近的中国劳工棚中曾流传着“养虱子老头”的奇闻，大致是1940年的某一天，“673”细菌工厂建设工地的日本人来到劳工住处，挑选出10个年岁大一些体弱一点的老劳工，让他们背着自己的行李来到一座黑房子里，日本人对

他们说："你们年纪大大的，就在这里休息吧，不用干活了。但是你们每天要交上100个虱子，必须是大个儿的，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一周以后，每天有穿白大衣的日本人来，分别在10个老头的开花棉袄和棉裤里捕捉火柴头大小的虱子，放进小铝盆里，对小个的虱子也不掐死，继续留在棉衣裤里养大。这样，日本人每天都要从这里带回上千只大虱子。当然，这都是秘密进行的，后来这十个"养虱子的老头"自然都被日军杀害了。再有，居住在孙吴县西兴乡西兴村的老农迟连升说，60多年前，在西兴村附近的原日军"673"细菌支队驻地的西山脚下，亲眼看到了掩埋的被害中国人的白骨一百多具。西兴村在伪满时叫"西窑地"，当时只有12岁的迟连升在窑地挖沙子、做苦工。1944年他15岁，赶上西南沟小河涨水，冲下来不少鱼，他抓了些到城里去卖。为了避开警察他绕道从小南山回家，走到山坡下通往细菌部队道路西边，看见有一群猪在一个大坑里拱什么，他走近一看吓了一跳，只见一大片白花花的人头骨，人骨架，足有100多具，这人骨不会是日本人的，也不会是中国人的坟。后来，同村的另一个老人孙国正也回忆伪满时他看见一个中国人趴在细菌部队的铁丝网上死去。迟连升的40多岁的儿子也回忆起解放后跟着大人去"673"遗址，在解剖池边看见过死人头骨。战后当地农民在西山脚下耕种，经常在犁耕过后发现白骨。

1944年5月，日本陆军省命令关东军增加细菌武器的生产，以满足日军统帅部在太平洋地区大规模推行细菌战的需要。为特种部队增添了最完善的可供连续生产细菌的新设备，孙吴、海林、林口等支队也相应建立了大量培育

细菌的生产系统。这样，一旦“731”本部的设施在战争中被摧毁，各支队可确保正常运转。日军的担心还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731”及各支队细菌基地大部设施，并将实验材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可见帝国主义野心狂的共同面目。

“马路大”的特别输送和人体试验。1938年10月，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破产，被迫停止战略进攻，1941年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后，关东军随即于同年7月初大规模启动了“关特演”行动，迅速将原来只有30余万人的关东军又增加16个师团（按当时一个师团平均3.5万人计算）总数扩编至73万，伺机而动。当德军受挫于莫斯科城下时，到1941年末，日军已基本放弃北进苏联的计划，加之美国对日本石油的禁运，日本为避免军事机器瘫痪(日本90%的石油需从美国进口)，为夺取东南亚石油资源而最终决定“南进”太平洋。1942年9月6日和11月5日，日军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决定进行南方作战，“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太平洋战争，妄想把战事搅乱，可谓背水一战，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日军为迎合其最大限度地多杀人这一猖獗之心，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微生武器的实效上。显然日军的细菌专家们处心积虑地已从老鼠等动物、寄生虫和病菌这三者之间悟出了许多道理。制造生物武器用于实战的关键一步，就是他们突发奇想，认为用人体直接尝试各种细菌实验，则是靠细菌武器扭转败局的唯一赋有实效的捷径。关于用活人进行实验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远东军事法庭的公审材

料中看到。孙吴细菌部队支队长西俊英中佐在供词中说："1945年1月，'731'部队的安达实验场，在我的参与下，由第二部部长碇中佐及该部的技师二木2人，对10名中国战俘进行传染坏疽病的试验。将中国战俘绑缚在间隔10至20公尺的木桩上，然后通过电流，将装有坏疽病的榴散弹引爆，结果10人全部被带细菌的碎片炸伤，同时染上了坏疽病，折腾了一周后痛苦的死去了。"他又看到石井部队拍的影片里面，有许多人被放在冰天雪地里，把赤裸的双臂展开听任寒风吹袭，实验者用棍棒敲打以确定是否已经冻僵。

用活人做试验的确凿证据，就是日军的"特别输送""马路大"。日军把细菌试验的受害者称作"实验的材料"，日语的发音"马路大"，意为"剥了皮的圆木"。中国人一旦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就很有可能被送到细菌部队当做实验对象。凡是进了"673"监狱的"犯人"除了有各自代表性别的符号和一个编号外，一律统称为"马路大"，和旁边关在笼子里实验用的老鼠属一个档次，即日军不把你当人看，把人看作是木头，有任意砍削之意。日本著名作家村诚一在他的著作《魔鬼的乐园》中，道出了实验对象的又一个代名词"满洲猴"。在"731"部队的技师里，前金泽医大细菌学教研室的二木秀夫博士是核心人物。自1938年以来，他在拟定的课题中，关于探索"孙吴热"病原体的研究上，一直执刀宰杀"满洲猴"（对被抓来用做试验的东北当地人的称谓），干得相当利落。据悉，在"731"细菌部队和"673"细菌支队的监狱里，一旦你成为"马路大"被关，根本就没有

活着出来的，其残忍手段与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试验的直接罪证，并清理发现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

供实验用的“马路大”，是由驻满洲日本宪兵队和日本特务掌握的。向“731”部队移送“犯人”的工作，主要由哈尔滨宪兵队负责。为了保密，宪兵队正式文件里都使用着“特密办理”、“特殊移送”、“特别移送”等字样。在由苏军缴获的满洲日本档案中，发现有日本宪兵队本部正式公文，其中有在1939年负责按“特别移送”手续把犯人押送给石井部队的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所签发的第224号命令，以及平野宪兵队的第1号作战命令等文件。

平野宪兵队在接到宪兵队司令部的224号命令后，立刻下达了由部队长平野大尉签发的第1号作战命令。详细部署了这次任务，包括平野部队派出一部分人员实施第二批“特殊移送”。由稻邑曹长率宪兵24名和卫生军士1名，从长春出发，到达山海关后，听从锦州宪兵队长指挥。出发之前还特地在宪兵司令部领取了刑具，脚镣81具，手铐52具，捕绳40根，护送绳25根。另有在其宪兵队携带的手铐30具，护送绳40根。

从上述作战命令看，“特别移送”准备是充分的，计划是周密的，戒备是森严的，行动是迅速的，目的是讳莫如深和别有用心的。

1939年8月9日，一列客车和闷罐车混合编组的列车抵达山海关车站。早就等在那里的日本宪兵立即把挂在列车尾部的一节车厢包围起来。车厢里关押着90名中国被俘人员，这是一次为“731”本部及孙吴“673”支队运送活体试验者的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特别移送”。从承德宪兵队、平野宪兵队和关东军宪兵教导队派出官兵，由锦州宪兵队担负主要任务。稻邑曹长在山海关与锦州宪兵队办好交接手续后，立即把这节车厢挂在山沈线的列车上。列车进了哈尔滨站，被押下的30名被俘人员被强行推上了早已等在站台上的“731”部队的特别囚车。其余60名仍锁在闷罐车里，沿着滨绥线，北黑线行驶，于8月30日零点到达孙吴站，随即将这60人关押在军管区的监狱内。日军肆无忌惮地在这些“马路大”身上做霍乱、斑疹、伤寒、鼠疫及冻伤前后的观察试验，同时进行了多种传染病菌的培植和传染力度的研究。日军为避免自己的士兵染上病毒，就从已经得了“孙吴热”等地方传染病，正在发高烧的病人身上抽取血液，进行培植免疫菌苗的试验和施放恶性传播病菌的制做。由此可见，不知有多少这样的“特别输送”，不知有多少中国人被当成细菌战和毒气战试验标本，不知有多少“马路大”惨死在那伙狰狞露骨操刀者的试验台上。

1945年8月10日，世岛松夫的供词：“1939年7月，我在孙吴宪兵队任庶务计主任、军曹。据情报透露，有1名由苏联派遣的谍报员，男性，30岁，中国人，潜伏在曾家堡。分队长毛利幸三大尉命令板口三藏曹长等3名宪兵前去逮捕，我给他们准备了汽车，押回分队监禁

时，我指挥宪兵看守。经过审讯将其定为‘特别移送’对象，上级批准后，分队长命令福田夫军曹带领宪兵将其送交北安宪兵队。再送往石井部队（指哈尔滨731总部，也是673支队的代名词。各地之间针对‘马路大’的或足或缺都是相互调配的），关于‘特别移送’的命令是我向福田夫军曹传达的。我还知道，1940年6月，北安宪兵队和田昌雄中佐命令孙吴分队逮捕了苏联谍报人员刘相征，中国人，审讯后，送往石井部队予以杀害”。世岛松夫还供认：1941年3月，北安宪兵队的宪兵在北黑线301次车上，检查发现赵殿清携带的是苏联颁发的居民证，和田昌雄中佐命令部下跟踪侦察。渥美清志少尉又令本部的奥田胜翻译官，带领两名宪补（中国人），从龙镇上车，先沿着北齐线跟踪，后又跟至通北车站，没有发现同伙，于是饭原金丝军曹将其逮捕，押回北安宪兵队本部审讯，然后送往石井部队杀害。

日本关东军孙吴宪兵队多次执行“特别移送”的命令，将在黑河境内被抓捕的抗日爱国人士及其它人员移交到“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试验。

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和所属军政机构、翻译、工头等，利用蒙骗、抓捕等手段，如同强捕劳工与“军事管制”、“治安肃正”结合起来，源源不断地向细菌工厂输送实验“活体材料”，在特别输送的人员中以从战场抓捕的抗日军人和抗日嫌疑分子为主，是从关内“特殊输送”到哈尔滨“731”细菌部队总部或支队做试验的，等待他们的只有痛苦和死亡。

今关喜太郎供认：“我曾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备班

任职。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我先后三次将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指示东安宪兵队等向石井部队输送5名抗日人员的命令，译成密码电报发出。1940年12月至1941年6月，孙吴宪兵队长提出拟将15名抗日人员送到石井部队的报告，我签署了“电报呈请事宜，准予执行”的意见，经司令官批准后，下达给上述部队。”

战犯日野需供认：“1943年底，我在黑河省孙吴县特务股工作时，将两名中国爱国者送孙吴日本细菌研究所（即指731部队孙吴第673支队）作了细菌试验。”被确定为“特别输送”的犯人，在被送到细菌部队的途中，他们关在闷罐车里，戴着手铐脚镣，受尽身心与肉体的折磨。曾参加运送“木头”的原日本宪兵军官阴地茂一回忆说：“1943年，他参与押送了两名中国犯人，在押送过程中，两个人的双手都被铐上了，而且两个人的鞋子又都丢了，在押送时只光着脚走路，当时天很冷，阴地茂一还想，天这么冷，这两个人没鞋穿可怎么办，但负责押运的山口说：‘没关系，反正他们早晚都得死’”。

日军细菌部队以活人做试验的另一有力事实，即“孙吴热”的由来。1939年8月，日军123师团大部去东北松花江（哈尔滨市下游40公里）进行渡河演习，之后回到中苏边境的孙吴驻地。同年9月12日，出现了20多名士兵以发热，蛋白尿出血为主症的病人，并有6人死亡。当时认为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临床病名很难确定。遂暂按发病地名命名为“孙吴热”。

在日本侵略军中，相继在虎林、二道岗、绥芬河等处发生了与“孙吴热”相同的疾病并有死亡。当地日军医院

曾诊断为斑疹伤寒，急性出血性肾病，异型腥红热等病名，到1941年在100万侵华日军中就有1万人罹患此病，经查明仍为“孙吴热”同一类疾病。从而引起日本上层的特别注意，日本陆军少将军医伊次目雄撰文说：“由于各地相继发生并且死亡，中央对在满洲发生的不明疾病的研究也很注意，深感对此要有紧急的对策。”1942年12月9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卫生部首脑们对此病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对本病尚未达到十分明确的领域，在对本病理确诊之前，可以对本病的主要症状命名。鉴于发生地域并以地名称呼本病不妥，虽然也提到了以“传染性出血性紫斑病”或“地方性紫斑病热”等命名。为确切起见，又鉴于属流行病范畴，则正式命名为“流行性出血热”。同时，制定了第989号文件，明确提出：“北满及东满发生的以发热、蛋白尿及出血性质为主症状的所称孙吴热、虎林热、地方性紫斑病热暂称的病名疾病，对此流行病定名为流行性出血热。”

至此，孙吴县成为我国流行性出血热最早的疫区之一。“731”细菌部队于1939年12月下旬在东京关东军军医官会议上和1940年3月陆军军医学研究会上做了专题报告。之后，在关东军的军医机关中先后发表了七篇有关该病的研究报告，最权威的研究是“731”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的研究。军医少将伊次目雄于1942年在日本军医团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加茂部队对此进行了解剖，阐明了特有的变化，将其血液对猿及豚鼠进行注射，获得病毒移植成功，其发烧、浮肿及出血症状传种九代。”从而引出加茂部队曾用猿及豚鼠进行了生物学发病试验。在日本的各种文献

中有的说用猿，有的说用满洲猴，有的说用志愿者，有的直接道出用中国人做试验。请看下面一段文字。“731”细菌部队的北野政次于1942年在孙吴地区曾捕获40只黑线姬鼠，在鼠身上收集到耶氏历螨203只，将螨制成悬液注入黑线鼠体内，25日后将鼠杀死，用鼠的肝、脾、胃再制成乳状液，经病毒过滤后，将此乳状液注入猿身上，19日后引起发病，再把已发病的猿的血液注入另一猿体内，也引起同样的出血热。于是确定出此病是由病毒引发的。

这里的猿到底是何物呢？我们可以肯定是人，只不过是日军对外掩人耳目而已，其理由：一是解放后在我国、我省均用猴及其同类对出血热进行了活体感染试验，实验证明，这类动物对出血热病毒不敏感，绝不能重复出北野政次拿猿做实验传染九代的结果。二是1938年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撰文《流行性出血热的新进展》中说：“日本学者四十年代在中国东北用人的志愿者试验，发现了从人到人传播的感染因子，1945年日本战败后，所有的资料和记录被遗弃。显然是用人来做试验的。而其中所谓志愿者，不可能是日本人，中国人也绝不可能去志愿做这种实验，实际是被日本人关押的中国爱国者和一些外国人。三是许多历史文献都充分证明：“731”及“673”细菌部队都曾用“马路大”做细菌实验。针对“孙吴热”、“731”本部曾先后三次派专题调研小组来孙吴。第一次是菌苗班长渡边带领，第二次由安东洪次博士牵头，第三次是北野政次挂帅。日军上层人员的陆续到来加重了被试验者所要遭受的各种苦难。1941年底，在北野主持的新组建的研究班中有一个代号为A的军医少佐，就是一个细菌

研制方面的骨干人物，他在孙吴地区用注射器，采日本兵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血液，注射到两名中国劳工身上，几小时后，被置于实验台上的人的症状清晰地出现了，全身突然出现斑点……，A军医说："我尽管做了试验，但也全部进行了治疗。"可见他们用人体进行的野蛮试验。

冈本班中的一名细菌战犯回忆，在他们的"马路大"中有名妇女被传说是中国某抗日将领的夫人，她在监狱中生了个孩子，当她被送到解剖台前时，曾哀求到："你们让我怎么都行，只要饶了我的孩子……"不管她如何哀求，这位二十四五岁的妇女还是和她的孩子一起被活生生地解剖了。

通过这系列的人体试验，北野政次、岩田茂、渡边共同发表文章《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山内和木村发表《以肠内病原性兔血做凝聚素及补体结合物质之消长》一文，证明超声波制菌的极佳效果。石井命令山内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细菌疫苗。山内丰纪在供认材料中又写到：1940年9月，孙吴发生鼠疫（即出血热），石井四郎紧急要求大张旗鼓地防疫，由菌苗班制鼠疫菌苗，日夜不停地工作。后来因设备不足，于1940年12月，菌苗班全体人员包括山内和他研制的4台超声波制菌设备，由孙吴迁往大连。

其实早在"731"本部乃至孙吴支队成立之前，细菌试验活动就已经在孙吴这个地方进行了。1933年初，关东军兽医部长渡边就指示关东军临时病马研究所着手研究细菌。这就是后来迁移到长春市孟家屯的关东军第100部队，部队长是细菌专家（兽医专家）若松次郎少将，集聚

了日本陆军中的动物、植物、细菌、微生物、解剖学、化学、药物、农艺等方面的专家。这种负有特殊使命的部队总部设在长春，支队分别设在佳木斯、克山、大连等地，人员保持在600到800人左右。除了前面提到的“673”支队在北野政次直接指挥下，在孙吴用中国人进行“出血热”病理研究外，他们还采取出血和不出血的方法从染病程度不同的人体中取出肝、脾和肾脏的罪恶行径，并在该区域内，日军至少有两次大规模施用细菌的事实。据本地档案记载，1937年，日本兵强行给居住在浦拉口子的鄂伦春人注射“防疫药剂”，结果一次死亡50多人，占这个县鄂伦春人总数的1.8%。据日军细菌部队成员加地信证实，1941年“731”本部会同孙吴“673”支队在孙吴毗邻的德都县传播霍乱菌和炭疽菌，造成人畜大量死亡。七星泡村仅50余户，有30多人感染霍乱菌死亡，村长魏志清饲养的50头牛，死得仅剩下5头。

由于日军不间断地无休止地生产细菌，如同“孙吴热”病菌泛滥肆虐一样，在其周边地区难免不发生泄漏和扩散。抗战胜利时，孙吴城郊鼠疫流行非常严重，有钱有势的人家可以得到及时医治，穷人家就不一样了，常看见荒野、路边、河边、泡泽等处扔着“死倒”。1947年又爆发了霍乱，人一但染上此病，则九死一生。

大量史实证明，“731”部队不仅研制细菌武器，也在战场上使用了细菌武器。不仅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汉事件中使用，在中国的中部宁波、承德、金华等地大肆利用细菌武器残害人民。

“孙吴热”的早期研究史，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

侵华史，也是充满了中国人民深重的血泪史，这页历史是一切善良和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二）毒气弹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除了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外，还使用大量的化学武器如毒气弹、毒气瓦斯罐、发烟筒等。战争结束后日军把大量的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领土上。孙吴境内就有大量日军遗弃的毒气弹，它给孙吴的无辜百姓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也是日本侵略者无法抵赖的铁证。

1919年8月日本建立陆军科学研究所，内设军用化学研究机构，从此，不间断地进行使用毒气的兵器、弹药和所有毒剂的研究与生产。1932年—1933年首批推出17种型号的化学武器和弹药。1935年—1937年，日军为毒剂弹药补缺配套，研制出8种型号的化学武器弹药。在1936年间，制式化的毒剂已达9种之多，包括芥子气（德式、法式）、不冻芥子气、路易氏气、二苯氰胛、光气、溴化苄基、苯氯乙酮、氢氰酸等，其性能分为糜烂性、呕吐性、窒息性、催泪性、和血液中毒性。日本于1938年成立了临时毒气调查委员会，同时进行氯气施放和防毒面具寒区试验。到1941年日军已研制出野战炮、迫击炮毒剂弹10个型号以及布毒车、布毒器3个型号，共计36种化学武器装备的弹药。其具体生产基地是大久野毒剂研究工厂。该厂是1928年11月，日本陆军在离广岛县出海町3公里的濑户内海的无人岛——大久野岛（也被称为毒气岛），建设的一座毒剂工厂，1929年建成投产，有职工2 045人。这个工厂设有德式黄1号、黄2号、青1号、茶1号、绿1号及红

筒、绿筒、发烟筒的生产车间和二个装填车间，到1945年已生产各种毒气6 615吨，日本战败时还剩下2 253吨。此外还有1938年在齐齐哈尔火车站东建的日本陆军516化学研究所，直属日军参谋本部，所研制的毒瓦斯迫击炮弹由迫击炮第三联队即526部队负责试验。除试验消耗外，其战败时研究所还储存有20万发毒气瓦斯弹。

大量的毒气试验，同细菌部队试验一样，都是以活人为对象的。原516部队队员渡国义供认：1940年7月中旬，于黑龙江省富拉尔基东4公里草地处，我指挥新兵10名在通向中国人村庄的道上散布了面积2 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 000名，毒气有效时间一星期的糜烂性持久瓦斯。结果，5名中国农民男子通过这一地区时，中毒后身体腐烂而被残害。另有25名中国男女农民的手脚被瓦斯腐蚀。在长达八年抗战中，在武汉会战、长江两岸、大别山北麓、南昌战役、长沙战役和在郑州、福州、豫中等18个省区日军施放毒气达2 000次以上。《解放日报》1942年3月15日曾有一篇题为《日军扫荡太行山地区到处施放毒气及毒瓦斯》的报道：此次敌寇扫荡太行山区撤退时，曾到处施放毒药及毒瓦斯，企图毒害我抗日军民。现辽、聚、武、涉等地均已先后发现。涉县河店一水井内，发现敌人所施毒药，无论军民与牲畜一食井水，立即毙命。所施放的毒瓦斯大部分在门框、炕席、粮食或草上。据统计，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中毒总数在4.7万人以上。在敌后，1937年—1940年，八路军中毒总数31 657人。另外，在华北敌后和日军占领的东北地区，曾在实验中使用毒剂大量屠杀平民和战俘，造成中毒和伤亡人数

9 591人。每逢在玻璃小屋——细菌、毒气室，给“马路大”穿的衣服要按使用毒气的类别和浓度做适当的更换，有时则是赤身裸体。

日军投降后的一天，在黑河地区瑷珲县张地营子区的上马厂村，一农民家发生了一起惨不忍睹的毒气致命案，被害者是一名无辜的孩子。上马厂是日本关东军“北部正面”中心地带的北侧起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军事部署十分严密。所以，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日军溃败后所遗弃的军用物资，不知情的农民成帮结伙来找自己需要的东西，有的不知何物也捡回家，结果一农民捡回了两只铁筒（每个高1米，直径半米，在筒盖上有三个铜螺帽）。打开后，筒内油状液体溅到其邻居家的一个好奇的孩子脸上。很快，这孩子的脸就发红、浮肿、溃烂。由于不知原因，又没办法医治，就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活活地烂死。太可怕了，谁也不敢再去碰那两个筒。为了防止再有意外发生，孩子的父亲忍住悲伤和疑惑，在几个乡亲的帮助下，找个适当的地方将那两只筒暂且埋起来。后来人们才得知：这就是被称之为毒气之王的糜烂毒气代表——芥子气。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专家纪学仁主编的《日军侵华战争的化学战》一书有专门的解释：芥子气，日本代号为黄1号，该毒气施放后呈液滴和汽雾状，人经呼吸道吸入或皮肤沾染后造成中毒，症状有眼睛流泪、怕光、疼痛、角膜浑浊、呼吸道障碍、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皮肤染毒后红肿、起泡、溃烂，严重者全身中毒死亡。由于它伤害途径多，持续时间长，防护较为复杂。书中还披露大量日军用中国人做“活靶”，进行各种毒气试验的事实。

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顽强地顶住敌人“闪电式”进攻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之后，又出兵帮助中国收复东北，日军全面投降，孙吴也获得了解放。伴随着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为天皇而效忠的武士们此时因大局已败不得不极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的屠刀。本不应该滋生的“673”细菌基地这颗毒瘤，终于被彻底根除。企盼和平的人们祝愿，永远不要制造那些不人道的杀人武器，永远不要提到“战争”二字。

三、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

（一）开拓民的移入

1936年7月，日本政府确定了“20年百万户送出计划”（向满洲移民20年、分批移100万户，500万人口），同年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确立为七大国策之一。为侵略战争的需要，从1937年起，日本借伪满政权的名义，实行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其中的一项“北边振兴计划”（也称“北边镇护”），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实质就是把北边布置成为一个大军事基地并解决粮食不足问题的计划，以防备苏联和作为实施大陆政策的粮食基地。

在日本统治者看来，控制满洲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前提，他们认为“以枪炮夺取的土地，还能以枪炮再夺回，以锹镐开拓的土地，要相对可靠的多”，“真正的势力分布在于农业移民”。

鉴于孙吴大军事基地的重要性，关东军决定，把孙吴、瑷珲、呼玛、北安、佛山、乌云等县的“开拓团”规定为孙吴军司令官管辖的动员（征兵）区域和复员军人的就业基地。

孙吴是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的重点地区，屯有重兵，筑有坚固的纵深军事设施。自1940年至1942年，从日本琉球群岛将15岁到19岁的日本青年移送到孙吴。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是日本的农民和普通劳动者。他们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威逼利诱下，背井离乡，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受害者。这些移民，特别是“义勇队开拓团”则根据所谓“国防地第一线的入植方针”，移至日军驻地周边和铁路、公路等主要交通干线附近。

日本把在孙吴的移民组成一个本部，设在现农场54连处。并以其为中心，统管下属7个中队，10个开拓点，移民共千余人。本部有房子10余栋，200余人，耕地50余垧，有汽车、拖拉机、三铧犁供各队使用。移民的具体分布为：

在今西兴乡范围内。西兴村设一个中队，下设两个开拓点。第一个点在西兴屯，有开拓民200人左右，120余间房子，50余垧土地。第二个点在西兴村东侧，有开拓民100人左右，80余间房子，40余垧土地。这两个点沿北黑铁路南侧驻守，与之毗邻的南面是日军细菌试验驻地，北面是日军兵营，西面是日军十八仓库。

在今腰屯乡范围内有五个中队，约400人，耕地160到170垧。第一中队位于腰屯东侧，桥东道旁，有房子7栋，70余人，耕地20余垧。第二中队位于今良种场，有房子7

栋，60余人，耕地40余垧。第三中队位于腰屯南侧，现种畜场处，有房子10余栋，百余人，地40余垧。第四中队位于新村西沟里上顶子，有房6栋，70余人，耕地20余垧。第五中队位于吴家堡东北原星火畜牧场，有房子七、八栋，60余人，耕地30余垧。除曾家堡外，整个腰屯乡均被“开拓团”包围。

在今沿江乡范围内，顺沿江军用公路设有一个中队和四个开拓点。约有耕地400垧，开拓民270人左右。中队部位于今农场46连，有房10余栋，百余人，地50余垧，有拖拉机等大型农具，这也是第一个开拓点。第二个开拓点位于小河西，有房8栋，60余人，耕地百余垧。小桦树林子开拓点有50余人，耕地200余垧。与当地农民混居，房40栋。大桦树林子开拓点有40余人，地40余垧，与当地居民混居。主要种植如“荀宝”（桔梗）、白根萝卜、土豆等，除日方民用外，还供应关东军。

日军在孙吴驻军多，为供应军需，他们采取条块结合互成网络的规划手段，建立了许多诸如马车组地营子（现孙吴镇西南屯）、大烟馆地营子（西地营子火车道基南侧）、川本商会地营子、特务股地营子（兴北乡镇南大队南侧）、山下地营子（西地营子火车道基北侧）、国际株式会社地营子（腰屯东套子）、川本地营子（西地营子北部河边一带）。这些开拓点和地营子主要以种菜为主，一般耕地在百亩左右。

至1941年8月，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总数为435个，46 300户，107 089人。到1944年末，移入东北的日本一般“开拓团”850个，约8万户，20万人。另有

“青年义勇队”、一般“勤劳奉仕队”13万人。

“开拓团”在军事上隔离我抗日联军同人民的联系，战时做后备兵员，经济上为日本侵华服务。

（二）对劳力、土地、森林等资源的掠夺

为进一步实施“北部正面”、“北边振兴”的战略计划，关东军驻孙吴的北方独立第四军司令部、宪兵队和伪满孙吴县公署先后以诱骗、摊派、强征、抓捕等手段，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山东等地骗招、押送8万余劳工，供驻孙吴的日军奴役驱使，劳工们时时面临着非人的压迫和血腥的屠杀，其任意残害劳工之极令人发指。日军役使劳工相继修筑了北满边境线上14个永久性要塞之一——孙吴胜山要塞及孙吴段166华里的北黑铁路；修建了平顶树、曾家堡、辰清三个飞机场和军用物资弹药仓库群；秘密建立了哈尔滨“731”细菌部队孙吴“673”支队；修筑了孙吴通往各县和各山里军用公路十余条；设立了长达20余华里，20万栋50万间营房以及修筑军事掩体和山洞达千余处；还陆续修造了逊别拉河大坝、秀水河沟和水闸；逊别拉河大桥；火锯厂；发电厂等，《孙吴县抗战时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一书中统计，因劳累、饥饿致死、病死和集体枪杀的劳工达67 610人，尤其残酷的是待秘密军事工程完工后劳工集体被杀灭口就更是骇人听闻。北孙吴的劳工坑和曾家堡的劳工坟就是见证（已被发现的大规模的劳工坟有三处：分别在北孙吴、曾家堡、三甲屯）。据专家学者考证，仅从1934年6月至1945年8月，仅死于（或失踪）修筑孙吴日军胜山要塞的劳工就达50 000人。

日军为实施“北边镇护计划”，主要是掠夺黑河地区林业、矿业等资源，这也就伴随着对劳力残酷掠夺。自1933年4月至1934年8月，开始勘测和实施修建北黑铁路（北安至黑河，途经孙吴境内）。修筑北黑铁路条件十分艰苦，夏季的炎热，蚊虫的叮咬，劳工住在潮湿的席棚子里，吃的是窝窝头，穿的是更生布和麻袋片，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有病又不给医治，每天都有劳工累死、饿死、病死在工棚内。途经孙吴辰清至潮水路段多是坚硬的岩石和高山峻岭，还有低洼的沼泽地段，工程复杂艰巨。北黑铁路第一期工程是北安至辰清段；第二期是辰清至黑河段。据黑河地区史料记载，至1935年11月北黑铁路全线通车止，修筑北黑铁路孙吴段的劳工至少有450人死去。

对劳力、土地的掠夺　从1937年开始，日军计划在孙吴修三处军用飞机场：一是孙吴县城西北的平顶树机场。1937年9月，从关内被骗招来的有2 000多名劳工，因不堪忍受日军的欺侮集体罢工，500多人被日军枪杀。二是1939年5月，修建孙吴曾家堡飞机场的800多名劳工，一年多时间里，有300多名劳工死去。三是辰清飞机场。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日军南下参战，修筑辰清飞机场的计划没有实施。然而日军将从孙吴抓的1 700多人，用于修山神府机场，这批劳工大多是当地男性青壮年，被抓人数占孙吴县当时总人口的21%，仅七个月时间，被饿死、打死的就有800多人，劳工死亡人数占孙吴县总人口的9%（伪满时公布《国兵法》，改募兵制为征兵制。自1940年至1945年孙吴县征集国兵5批，共100人左右。凡是年满19岁的男性青年，不论何职业都要参加体检。伪满征

兵机构由孙吴县公署行政科所属动员股、村公所、街公所以及协和会的人员组成，由日本军官、军医进行体检来确定兵员。体检不合格者被称为国兵漏，3年之内每年夏季出4个月劳工，称为勤劳奉仕，为日军修公路等）。幸存劳工李志云控拆说：“我的父母在修完飞机场后被日本兵杀掉了，我的脸上、脖子上和后背上挨了5刀，只是没被杀死。”

日军以加强“满洲国防建设”为幌子，开始在满蒙、满苏漫长的国境线上秘密构筑军事要塞。胜山要塞，属日军首批构筑的要塞。1937年至1940年日军在秘密修筑要塞时，分别从关内和东北等地骗招押送到孙吴近6万名劳工，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战场被俘的国民政府军和八路军战俘，要塞工程是劳工的“死亡工程”，从要塞逃脱的劳工是极少的，不是累死病死和饿死，或是在军事工程完工后被日军集体屠杀。在胜山要塞与黑河要塞结合部，日军决定于1934年至1938年计划从黑龙江底下开挖一条秘密隧道，经江下通往苏联，好用作战时对苏发动突然袭击。后因参加该项工程的秦某成功逃往苏联，并将这一绝密工程反应给苏远东情报机关。日军大本营得知属下报告后，当即停止了此项工程，并将参加该项工程的3 000多中国劳工就地处决。

1941年10月深秋的一天，从华北被抓到这里的3 000多名劳工，在胜山要塞某一工程将要结束时，他们早晨上工走到一个山坳里时，被事先埋伏好的日军用机枪全部射杀，为保密起见，将劳工尸体攒成一堆浇上汽油焚烧后掩埋。当年日本兵石桥清末所著的《战尘悲歌》中写道，

"……我们集合正准备过桥，路旁的山岗上立着一个大石碑，碑上刻有'构筑阵地者牺牲之碑'，这是为修筑胜武屯、胜山两个阵地工事的3 000名中国劳工作纪念的。"可见，在刽子手的灵魂深处对其所为也曾有过时时的颤抖。

腰屯乡腰屯村84岁老人关英华回忆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听从胜山要塞逃出来的劳工吕玉海、刘海山说，当时他们那一拨修胜山要塞的劳工大约有460人，1940年秋季的一天，日军不让他们上工了，被驱赶到离胜山不远的第五国境守备队指挥所的胜武屯靠西边的一片开阔地里，四周都是持枪的日本宪兵，劳工心想这下完了，本想通过九死一生的煎熬，待工程完工后回乡和亲人团聚的。此时日军的翻译讲话了，'你们是大大的良民，你们已经在这里勤劳奉仕到期了，今晚皇军在你们的工区住处好酒好菜招待你们，然后发工响和路费就可以回家了。'到了傍晚，十几处破工棚里饭菜果真比平时好了许多，每人都发一个大瓷碗，用来盛酒，酒是装在大罐子里。吕玉海和刘海山因年纪小不会喝酒，便拿起馍来吃。其他劳工争先恐后地抢着喝酒，不一会儿就看满工棚的劳工东倒西歪地抽搐、呻吟，逐个痛苦地死去。有的脸色铁青，有的嘴角流着血。显然日本人在酒里下了毒。吕、刘二人相互使个眼色，钻到死去的劳工堆里装着死去，侥幸当晚日军没有处理劳工尸体，后半夜，外面黑得很，吕玉海和刘海山俩人互相摸摸，小心地钻出工棚外，从铁丝网下爬了出去，消失在胜武屯西边山林里。天亮后二人在山上不敢走，只有等贪黑再走，大致上午10点钟左右，吕、刘二人躲在山

上看见胜武屯方向劳工棚子处浓烟四起，原来是日军将毒死的劳工摞到一起，连同劳工棚子，浇上汽油焚烧了。吕玉海、刘海山后来跑到腰屯乡南山，在一个叫董玉林的地窝棚住了下来，直到日本投降。”

日军在溃退前，曾欺骗劳工说，红毛的军队打过来了，皇军为了保护你们，以免遭到敌人的炮弹炸伤，现在为保护你们的生命及安全，都到地下坑道里隐蔽起来，战事结束后，送你们回家。这样，几千名劳工都被武装的日军驱赶到地下坑道里。待劳工全部进入坑道后，阴险毒辣的日军立即用砂石泥土将坑道分段堵隔，有的劳工发现了日军险恶用心，要冲出洞去，日军则欺骗他们说，堵上入口是为了防止毒气进入。有的劳工不相信日军的鬼话，强行要出来则被日军开枪打死。随后分段封死各个出入口。几千名劳工直到窒息昏厥时，才知道受了日军的欺骗，但此时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也是战后极少能查找到胜山要塞劳工的原因。

日军在侵占孙吴后，为把孙吴做为“北部正面”的军事基地，做为进攻原苏联的前沿阵地，在孙吴驻有成编制的师团，北山长达20华里，都是日军的兵营，仅曾家堡村左右就有日军的兵营5处，每年动用6 000多劳工来修筑营房和仓库，大量的劳工在繁重的劳动中死去。据省公安厅档案记载：1938年，仅修县城周边零星工事一项孙吴县被屠杀的中国劳工就有1 700名。如修建孙吴屯山洞被害死500多人，北孙吴打死、饿死400多人，修建东仓库的200多名劳工被集体屠杀，工人闹暴动被集体杀害300多人。零星被杀害者在300名以上。1940年6月（伪康德七年）到

1942年6月（伪康德九年），从关内外抓来的劳工和战俘6 000多人，修筑逊别拉河大坝和挖秀水河的工程，累死、病死、抓回被打死的劳工有1 200多人；1941年春，从关内外征招的1 200多名劳工修建孙吴日伪发电厂，由于日本人要求时间紧，劳动强度大，累死和病死的劳工近300人，全部葬在腰屯乡曾家堡飞机场旁的大泡子里。1944年修建孙吴火锯厂时，从辽宁招来的700多名劳工，不到一年时间里全部死在火锯厂，没有一个活着出去的。

日军在孙吴驻扎期间，为打通孙吴至逊克、孙吴至瑷珲、孙吴至嫩江各据点间的联系，从沿江国境线到内地，修筑了数十条主干军事公路。为此，他们驱使上万劳工，由关东军工兵部队直接指挥，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强制性劳动，累死病死的，惨遭杀害的中国劳工不计其数。1935年，被日本人骗来修路的3 000多名劳工，押送到孙吴修建军事工程，不到一年就死了六七百人。从北安抓来的1 300多名劳工，完工时剩下的700多人，被集体屠杀。1936年，日军在天津、沈阳抓了1 700名劳工，待工事修完后，为了保密，大部分劳工被枪杀。劳工张贵芳、张希令兄弟等5人被日本人活活打死。1937年6月，日军修筑孙吴辰清到瑷珲山神府军用公路，全程长150多华里，日本关东军小山中佐命令其属下，通过伪满地方政权，以勤劳奉公队和勤劳报国队的名义，在东北各地征招了3 600名中国劳工来修这条公路，吃穿住的条件十分恶劣，简直到了难以承受的极限，死者比比皆是。不到一年时间，来时的3 600名劳工，死去400多，到1939年秋季公路修成，3 600名劳工几乎全部死去。1939年，由天津招来的

3 000劳工在纳金口子修铁路，回去时只剩下800人，死亡2 200人。

为修筑孙吴胜山要塞和西岗子要塞之间的边境国防公路，1943年6月下旬，从北平战俘集中营，用一列闷罐车押载着1 300名战俘。这些来自国民政府军和八路军的战俘，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加上环境恶劣，患病得不到治疗，累死病死的人越来越多。在一片荒草地中逐渐地堆起了许多坟，每一座坟中都埋着十几、二十几具尸体不等。仅仅3个月时间，这批从北平押送来的1 300名特殊战俘劳工，就有800多人死于饥饿、劳累、疾病的折磨和日军的屠杀。

据当年劳工幸存者退休老工人吴杏仁回忆，他原籍江苏无锡，被招劳工，至上海上船，被日本兵用刺刀押上轮船，到大连上火车就装在闷罐车里，一路上没人管吃喝，一直拉到北安，才知闯关东发财是受骗上当。1940年3月，从北安开往孙吴的火车中，有一节装满劳工的闷罐车，一盏煤油灯吊在车厢里，火车运行途中由于震动，将煤油灯晃倒，引起火灾。闷罐车的铁门上了锁，押运和看管的人又不在这个车厢，这一节闷罐车里的劳工全被烧死和闷死，直到孙吴站才知道。

1940年，日军在孙吴北山修筑数十华里的营房，为防止营房被洪水冲淹，在逊别拉河左岸，即从东南腰屯乡腰屯村到北孙吴南，修建了一处30多华里长的防护堤坝，在现孙吴县西兴乡东侧挖一条长20华里的秀水河。76岁的老人苏茂群证言："修我们村南的大坝和水闸，从吴家堡到曾家堡，曾家堡到孙吴30华里的大坝有4 000多劳工，挑

着土篮子担土修筑，河岸上都是劳工住的席棚子，席棚子里面铺着杂草或席子，有病根本就不给医治，饿死的、累死的人可多了，曾家堡村南河边旁，就埋了500多人，埋的时候一个挨着一个，总共4排。每天从劳工棚子里抬出来的劳工按着顺序埋，有的用席子卷着，有的干脆连席子都没有，就那么埋了。”据《孙吴县志》记载：日军集中1 000余名中国劳工修筑逊别拉河大堤，每天劳动19个小时，当年死去600多人；修筑曾家堡(腰屯乡)西侧水闸，参加施工的被俘抗联官兵100多人，他们身上被烧红的铁器打上烙印，劳动强度大，比其他劳工更为悲惨，修完水闸后全部被秘密处死。同年，在孙吴北三架山，1 200多劳工因修完秘密工程后被集体屠杀；从哈尔滨到孙吴的劳工700多人冻饿死亡。

位于孙吴县城东六华里的逊别拉河大桥，是当时日军从孙吴通往黑河、孙吴通往胜山要塞等地的必经之处，桥长100多米，始建于1941年（伪康德八年）。在日军强迫劳工修筑逊别拉河桥的两年时间里，3 000多劳工，因劳动强度大，饿死、病死、累死的有1 000多人。据健在的劳工马永春老人证实：“在修逊别拉河大桥时，我亲自参加了，当时是支盒子，我在修筑中认识的两个人，一个叫徐凡太，一个叫刘金奎，两人都先后累死了，计划修3年，2年多就完工了，被抓来的3 000多劳工，由于劳动强度大，每天要干14个小时的活，真是太苦了。完工时大约有900多人死掉了。关东军孙吴基地的军事设施就是在数万中国劳工的白骨上建成的。”

日本侵略者“移民政策”的实施，无疑又增添了一条

掠夺、强占、欺压当地人民的渠道。正如日本人在《北黑铁路线建设纪要》中所述“黑龙江沿岸各城镇，物资丰富……本线建设，不仅为加强沿线居民的福利，也在于日本不可分之满洲国国防上负有重要使命，从经济上开发黑龙江沿岸大量的矿产、林产，开垦沿线到处皆有的荒地。将来与苏联自由贸易时，其交通量之增大不难想象，而建设本线之使命之重大，亦可知矣”。这是日本侵略者绝妙的自供书，增进沿岸居民的福利是假，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其中森林资源，粮食是其掠夺的主要目标。当时中国东北拥有3 000万公顷以上的耕地，农业人口占居民80%以上，是举世闻名粮仓之一。但在日军的掠夺下，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以1931年为基数。1934年农业生产最低点是耕地面积下降到86.6%，大豆播种面积则下降到77.9%，农产品总产量下降到72.7%，大豆产量则下降到68.8%。

土地同样是孙吴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农户祖辈垦荒种植的。日本开拓民在关东军和伪满政府的庇护支持下，借口所谓“危险地区”和“维持社会治安”的需要，或以国有地、公有地、地主不明土地等名义进行强占；或以移民、并村、整理土地等手段进行没收。有时名义上是出钱买，但出价还不足当时地价的1/10，甚至还有在支付地款时就预扣三年的国税，实际上等于无偿占有，硬从农民手中掠夺去上好耕地1 000余垧，日军营房占地达15 000余亩。当时兴北乡100多户菜农的200多垧好地几乎全部被抢占。“开拓团”看中哪块地好就要哪块地。大桦树林子被抢去了300多垧土地，仅臧来庆家就被

抢去120垧地。小桦树林子全屯种的300多垧差不多全被占去。小河西屯除四家农户土地幸免外，剩余200多垧地全被占去。然而，开拓民所占的地并不全种，好的种，差一些的宁可荒废。比如，大桦树林子屯被抢占去的300多垧地，只挑最好的地种30多垧，其余的全被荒废。

“开拓团”在孙吴不仅从农民手中夺去土地，而且还强占民房，逼得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开拓团”在曾家堡等村屯霸占民房210间，赶走农民约90户，使310人无家可归。西兴村和铁道北被赶走20余户农民，其中10余户自己有车有马的搬迁到西南屯和西地营子重建家园。没有车马的，有的弃农投工出卖劳力，有的投靠无门，流浪街头。前、后协振屯的建屯历史是孙吴人民遭难的见证。1942年春，伪政府下令小河西的住户，限期3个月搬出，还没到期，就将屯中心的20余户农民强行赶走，房屋抢占。没车马的各奔他乡，自谋生路；有车马的5户40多口人，含泪弃舍搬迁到荒无人烟的腰屯乡北山南坡，就地砍杆，打些羊草，撮起“撮罗子”，挖“地窨子”，几家挤在一起，从此这里叫协振后屯。小桦树林子屯原有30户人家，“开拓团”先借住房，后强行没收，全屯被赶走的26户搬迁到腰屯北山重建家园，由此叫协振前屯。

日本“开拓团”对中国人经常打骂欺压。小桦树林子吴小奎是侥幸没被赶走的4户之一，经常受日本开拓民的欺辱，不敢出门。吴小奎的孩子因掐了“开拓团”地里的一根葱叶，吴小奎就挨了3个日本开拓民的毒打，而且孩子也没放过。傅锁山家的小猪跑到“开拓团”的园子里，傅锁山被日本“开拓团”打得倒在地上，全家人敢怒不敢

言，还得笑脸赔不是。

对森林资源的掠夺 日军在孙吴除了掠夺土地和房屋外，还掠夺了大量的森林资源。孙吴县地处寒温带的小兴安岭北麓，黑龙江右岸。地势沿小兴安岭山脉，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倾斜。在本县的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低山沟谷丘陵漫岗地带，地势比较平缓，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昼夜温差大这些有利条件，很适于森林的生长。1932年以前，这里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古木参天，到处生长着寒温带代表树红松、落叶松、樟子松、彬松、臭松、白松等针叶树和耐旱的蒙古柞、椴树、榆树，喜湿润的首推白桦、水曲柳及喜阳光的山杨、柞树、黄波罗等。林相齐正的针阔叶混交林和阔叶林，覆盖面积和蓄积量居黑河地区北部的首位，素有原始林海之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由于日伪反动统治时期滥伐的结果，针叶林几乎绝迹，上好的阔叶林也多遭砍伐。抗战胜利后，放眼俯瞰，形成很大“窝集”的优质树海已寥寥无几。而今只有在较为偏僻的红皮营子和群山林场等个别小区域的林带上，还能看出一丝原始风貌。

日本在“为了国防上的重要……开发黑龙江沿岸的矿藏森林资源”的幌子掩盖下，决定修建北黑铁路，来掠夺北黑铁路中部地区丰富的森林资源，以缓解木材资源的匮乏。

1934年，日本侵略者修建北黑铁路的辰清——黑河段，计166公里，铺轨所用枕木和架设通讯线路的电柱，全部就地采伐，取自于孙吴县境内辰清林场区域的优质林木，共用去枕木近34万根，电信杆4 000根，以及为修建

沿线桥梁所需的木材若干。为了加快修建北黑铁路，不得降低了质量标准，清溪河、三站河、第十一、第十二辰清河桥，是用木桥梁代替钢桥梁赶制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大量兵力屯驻孙吴，“关特演”前后，关东军达10万人。一切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大肆掠夺孙吴县宝贵的森林资源，其用途为日本修建北黑铁路孙吴地段及修建兵营和兵工厂，修建地下仓库和工事，修筑军用公路，满足孙吴当地日本军民的生活所需，全是就地获取的优质木材。至日本投降时的13年间，其掠夺的森林资源难以数计，仅清溪一地就采伐原木119 000立方米。这些优质木材，除保证驻孙吴的日军军用外，其余的均用火车向南运走。为了掠夺红皮营子的优质木材，日本关东军在清溪乡清溪村成立川本商会木材场。每年冬天每日约投入470付马套子集材，用近千人的廉价劳动力，往返近60华里，把木材集到清溪木材场，日集约160立方米，年生产木材约9 000立方米，一年共采伐木材约119 000立方米。“关特演“前后，为了保证驻孙吴的10万关东军冬季取暖和炊事烧柴，川本商会于1932年开始建立木柈子场，每个柈子需消耗原木1.75立方米，每年生产木柈子2 000个，13年共消耗原木45 000万立方米。其中红皮营子1处作业面积就达55平方公里。川本商会还在打木柈子区内建立30个炭窑烧木炭，每天出木炭1 800斤，每年烧炭实际为120天，年烧木炭约1 100吨，13年中共消耗中龄柞、桦木近6万立方米。仅上述三项共掠夺木材22.12万立方米。

日本侵略者为保证对森林资源的掠夺，设立了一支20

余人的森林警察队。日本侵略者出于帝国主义本性，对森林资源完全是野蛮掠夺式采伐，使孙吴县森林覆盖率下降，出现了荒山、荒地、水土流失。掠夺式开采具体表现为：伐根高、不清林、只采不造。由于掠夺式采伐，又烧掉大量的中龄林木，当地老百姓形容为“剃光头”、“拔大毛”，森林资源破坏非常严重。

分布在孙吴县街里和红皮营子与茅兰顶林场的这些森林警察，不是防火和防止破坏森林，而是对付我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的抗联队伍，防止有人偷盗其木材和监督劳工干活。这种掠夺性开采遗害无穷。直到今天，孙吴虽处在林区，但却缺乏上好的木材，这对县域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很大。

对矿产及其它行业的掠夺 自1934年始，日本人成立了采金株式会社，控制黄金生产和销售，先后在哈达彦、四季屯、大桦树林子、小河西、小四站、清溪、卧牛河等地大量开采，每年仅沿江地区采金工人曾达千余人。日本侵略者为配合军事基地建设，1939年和1943年，孙吴南、北电厂先后竣工，孙吴和黑河等地全部由孙吴电厂供电。随着交通、电力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和劳工、开拓民的大量涌入，殖民地商业也发展起来，1941年，孙吴街内私营商店达200余家。私营手工业迅速兴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全县共有铁木、服装、皮革、鞋帽、钟刻等11个行业78家作坊，从业人员271人，拥有资金191 700元（伪币），年产值599 900元。这些作坊多为4至8人，最大的是周新所设大兴鞋帽厂，雇工26人，有资金1万元，年产鞋帽5 000双（顶），产值5万元。但这些行业的大部

优质产品都得优先提供给日本人所需，主要行业都得看日本人的眼色行事，有的行业慢慢被日本人兼并，有的个体老板与日本特务有勾结，本地的个体民营经济处于被排挤状态。日军几乎垄断了孙吴所有的工商业，廉价的日本工商业品充斥市场，对人民生活必须品实行“配给”，中国公民不准吃细粮，农户打下的小麦，依地折合产量，由村里保甲组织监督，晒干后先用水泥将装麦子的缸口封好，待充皇粮。畸形的社会发展，市面上看似繁荣，实则是日军被疯狂掠夺，孙吴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殖民主义奴化教育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年，孙吴境内连遭洪水，沿江沿河村屯一片汪洋，学校停办（当时有霍尔漠津、四季屯、大桦树林子、三岔河、曾家堡、腰屯、吴家堡、哈达彦等私立国民小学。其中，有个别学校仍在开课）。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忙于军事侵略、武装镇压，策划建立伪政权的同时，为了消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抗日斗争，使东北人民永远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顺民”供其驱使、压榨与剥削，对东北原有的学校教育进行了疯狂地破坏与摧残。曾下令：所有的学校一律停办。1932年伪政权建立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狡猾地想用“文治”这一手段来笼络人心。凭借“傀儡国家型”的“王道乐土、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民族协和、建设道义世界”，先是沿用了一段民国教育制，然后立刻灌输让中国人民成为天皇奴隶的“皇民化教育”。于是对中、小学校进行所谓的“整顿、恢复和发展”，对高等学校也由停办转为恢复。

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的教育领域从未忽视，而且他们

还发现，法西斯德国之所以能够迅速重新武装，苏联之所以能够抗击德国的强大进攻，归根结底全都是“经过相当年月默默经营实践”教育的结果。为此，至1934年12月颁布新的行政制度之后，伪黑河省“以沿边八县为一体环境，民情略同，依立国之精神及文教部‘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诏书之旨趣，以促使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养成中良之国民’之大意”独自制定一套教育方针，其根本宗旨是实行奴化教育，孙吴境内各学校遵照执行。

日本侵略者为推行殖民主义奴化教育，妄图在精神方面摧残人民，逐渐废除了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教材，重新编写了教育课本，规定各学校必须使用日本文部省编印的课本。在课程设置上，日语被列为各学校的主课。其在高级小学的《国史教科书》中写道“满洲自肃慎至有清，有特殊之风俗礼教，与中国习俗不同，文质尚异，实有对峙独立根据。满洲以长城东北自成一区，建国之帮形成之然。”妄图先通过青少年教育造成这种舆论，进而毒害全民。1937年5月2日，伪满民生部颁布了“新学制”。民生部在《训会》里说：“新学制的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新学制的核心是：“1933年8月5日，日内阁《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中所规定的‘劳作教育’和‘实业教育’也就是让人们‘只知劳动，不懂学问’。而劳动不为自己，是对内阁‘尽阁、奉仕’”。日本在伪满推行的基本教育方针是：培养丧失民族意识，“体得建国精神”，对傀儡政权怀有“国家观

念”的“忠良国民”，即殖民地奴才。他们将县城高级小学改为国民优级学校；初级小学改为公立国民学校；乡村初级国民学校改为公立国民学舍；县立国民优级学校和国民学校设在一起（当时黑河有“国高”，孙吴未设），除校长外，增加一名日本人主事（即副校长）。

伪满时期的课程设置，是根据其进行奴化教育的需要而定，国民学校设修身、国文、日语、算术、自然、作文、习字、图画、音乐、手工、体育等11科，每周总时数不超过28课时，国民优级学校除上述学科外，增加历史（满洲史）、地理家业科，每周总时数不超过36课时。1935年5月2日《回銮训民诏书》颁发以后，中小学教科书重新编纂，至同年12月编出22种39册。在国民优级学校国文课本中，有“靖国神社”、“仁德天皇”、“孝子政事”、“日本三景”、“良好之满洲国人”。日语教科书中有“ 国旗”、“国都”、《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建国宣言》”，要求学生娴熟背诵，并默写全文。伪满洲国文教部1936年1月14日通令各地，“小学课程标准统一，日本语得由初级小学校第一学年教授之。”后将国语改为满语（即汉语），将日语改为国语，作为各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修身改为灌输“日满一体”不可分的“国民道德”课。1937年孙吴境内共有小学7所，国民学舍6所，共12个班，学生478人，教师12名。

1942年11月改革了课程内容，取消了历史、地理课，1943年6月选择增加了亲近日本，提倡日本精神的新教材，“王道”让位给“神道”，将“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课，并增添“勤劳奉仕”一科。在各科教

科书中充满着“忠孝仁爱”、“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等“忠君”、“亲日”的思想，以期养成“忠良国民”。强令师生必须虔诚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每天的朝会，全体师生高声歌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共同背诵《国民训》，并面向东南向日本“皇宫”（日本天皇）遥拜三鞠躬，再面向西南向伪满“帝岩”（伪满皇帝）遥拜三鞠躬。每周一的朝会，举行“（伪）国旗揭扬仪式”，校长捧读《回銮训民诏书》（后改为捧读《国民尊定诏书》），继而训话，对学生进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灌输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孙吴街里有小学3所：日本寻常高级小学（建于1937年，对日本学生进行特殊教育，1945年8月日本败退，学校解散）、朝鲜小学（建于1940年）、东光国民学校（原孙吴县天庆街公立国民学校，今二中地址。后改名为孙吴县立国民优级学校。共12个班，学生750人，教职工17人）。孙吴县农村共有小学16所，21个教学班，分2组复式和3组、4组多式不等，学生489人，教员21人。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作战，城乡小学停课。

日本帝国主义不只是通过初级教育奴化中国人，而且他们还通过“满映馆、靖国神社、协和会”等进行思想宣传，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劳。

伪满时期孙吴境内有3个满映馆（电影院），由日本人开办，放映日本影片，同时也放映伪满洲国内流行影片，对中国居民开放。日本帝国主义一向把电影看成执行“官办文化”，向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灌输日

本文化的工具。1937年，伪满政府成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在3座电影院中以放映日语原版为主的电影院和123师团司令部内的军中影院。放映的影片大致有3类，一是所谓的“启民电影”，鼓吹“日满一体”，制造满洲繁荣的假象；二是“时事电影”，就是新闻纪录片；三是“娱民电影”，主要是故事片、文艺片，有黄色猥亵内容的，也有宣扬为建立“新满洲”立下功绩的人物，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满映对自己做如下解释：“满洲映画协会，是满洲国的国策会社，根据日满一德一心的正义，本着东亚和平理想的真精神，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对于满洲国精神建国有重大的责任，对于日本与中国等国家，应当将满洲国的实在情形，充分介绍，使他们充分的认识，而且对于其他满洲国内一般文化提供献资料。”到了一旦有事的时候，他的责任更大了，就是与日本腌臜一气，借着电影这种东西，实行对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战！

日本原有叫做招魂社的神庙，到了明治12年改名为“靖国神社”，专门供奉、祭祀阵亡将士。“靖国”是“镇护国家”之意，“神”指的是“神道”，即“神之道”。公元538年佛教传入日本后，日本兴起了神道意识，神道受到佛教、道教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其独特之处在于没有教主，没有经典，没有教义。它有四个基本精神：敬神、敬祖先、爱国、尊重皇室。一百多年来，日本对外进行的多次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官兵名单，都在靖国神社祭祀、供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更把“靖国神社”变成鼓吹侵略战争有功，为死亡战犯招

魂的场所。

1942年入侵孙吴的关东军和伪满孙吴公署在孙吴县北部建制了“靖国神社”，该“神社”有正殿和东西厢房，在一米多高的青石基座上是木结构的建筑，典型的日本风格式样，大殿有100多平方米，内供“天照大神”以及摆放着日军死亡者用白布包着的骨灰盒。每年12月8日，关东军为给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官兵招魂，召集孙吴县城的日本军民、伪满官员、学校学生参加祭祀活动。同时，每月8日定为“诏书奉戴日”，这天上午学校学生身着统一的操衣，列队到神社参加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完遂”祈祷会，先是由日本官员训话，然后由身穿绣金大袍、头戴高冠、腰系白带的僧人手挥用白纸条扎的招魂幡，口念日本语的祷文，日本军民和中国人分立院中，全体人员双手垂下，面对大殿，低头默祷，肃静恭听。祷文毕，中国人要背诵“国民训”五条，其中一条说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祈祷会结束时，发给每人一红一白两个糯米面做的豆馅小饼。以后，经常有被抗日武装打死的日军骨灰盒送到神社的时候，即要召集青少年听宣读日本军国主义的“德政”和日本军人的“功绩”，对中国人民和青少年灌输神道和武力的精神毒素。从此，“惟神之道”就成了摧残中国人民意识的荒唐说教。

孙吴“协和会”成立于1938年，设本部，长官由县长和副县长兼任。“协和会”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在伪满洲国内推行“建国精神”思想、教化的政治实践组织。是伪满政府的“政府之母”。在孙吴街内有4个分会，有会员300

多人，大都是伪满职员和伪村长。“协和青年团”组织孙吴当时的两所小学师生出黑板报、演出、演讲、远足等活动，灌输日本大和民族文化。孙吴“协和义勇奉公队”成立于1943年，是由孙吴街内的青壮年组成，其成员也叫做“特设安抚员”，其队也称为“文化思想别动队”。这支别动队配合各种文化机构随时出击，从割裂中国文化入手，为伪满政权合法化击鼓惑众。教官王连灯、王锡负责军事训练科目，为培养“第三代国民兵”效劳。

日本殖民统治者积极利用官办文化企图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完全成为“皇道顺民”。同时，利用公开设立鸦片馆、妓院、赌博场来腐蚀、毒害、麻醉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使其沉迷之中，忘掉国耻之恨，实现其民族同化政策以便于他们的殖民统治。

大烟馆基本上是供有钱有势与日本人有关系的或二把头、伪警察、土匪等光顾。1933年，日本关东厅公布了“鸦片专卖法”，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使鸦片的种植、经营、吸食都合法化。不少农民停种大豆、高粱、小麦，改种罂粟，使孙吴慢慢变成毒化世界。鸦片专卖法公布之后的两年，东北地区年均生产鸦片500余吨。日本人推销毒品的手段多种多样，在孙吴城乡到处开设烟馆，不管是谁只要到警察署申请登记领到许可证，就可以凭证每天领取鸦片烟2至3份。而私人开设的烟馆里备有烟灯烟枪，吸食者整天吞云吐雾，许多人由此倾家荡产，严重摧残了身体。据93岁的米回回讲，那时要凭烟票进烟馆，预定不上烟票的，要到黑市上购买。一个大烟泡在烟馆里卖3角钱，若在街面黑市上买一个烟泡则要3元钱。

每当夜幕降临，孙吴县城街头巷尾许多浓妆艳抹的妓女招睐客人。伪满时孙吴各类妓院多达134家，其中还有供关东军玩乐的慰安所和朝鲜妓院，明妓暗娼充斥社会，成为日本侵略者与政治、军事、经济统治同时采用的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手段。日军在中国、朝鲜、东南亚等所践踏的地方，不仅疯狂施暴于女性，又在本土、朝鲜和中国大量骗招抓捕妇女作慰安妇，设置慰安所。日本军方建立“慰安”机构的动机是为了更多秘密地征用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和肉体上安慰官兵树立必胜的信心，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日军溃败时大批慰安妇被遗弃，不少人被命令服氰化钾自杀。在菲律宾战场，在缅甸、台湾，在南洋群岛，在东南亚的原始森林中，有家难回的慰安妇过着非人的生活，直到葬身他乡。能够苟活的女性，也在风烛残年的心中深深埋下仇恨和怨痛。当时南北孙吴有四个士兵慰安所和一个高级军官慰安所，有50余名来自朝鲜、日本、中国的女性强迫为其服务。

孙吴作为日本关东军“北部正面”的中心要地，曾先后有第四军第一师团的上村干男、服部晓太郎和123师团的北泽贞治三位中将在此坐镇指挥。由于在“北部正面”驻军的日军将帅经常召集会议，这些军官的军人会馆就开始筹建了，军人会馆与当时孙吴城内的另外四个慰安所不同，这里是日本关东军设置的专门供日本将校级军官服务的场所。这里始终保持有20名女性在此为将校级军官提供性服务。据伪满时期孙吴当地居民回忆，慰安所的玻璃窗上有的贴着透明的花纸，有的是磨沙玻璃。北孙吴军人会馆的一楼设有食堂、餐厅、酒

吧，兼做舞厅的电影厅，放映日语原版影片，浴池、健身房一应俱全。二楼走廊一侧是20个房间，里面吊着厚重的丝绒窗帘，地上是地毯，宽大的双人床、衣柜、壁橱、梳妆台、沙发、茶几，每个房间都住有一个年轻的慰安妇，貌美、温柔、会歌舞弹唱。她们每一次的梳妆打扮都是为了迎接从孙吴、黑河、北安等主要阵地来的寻求淫乐的高级军官。在一份来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的地图资料上，明显标出孙吴境内由日军设立的一个军人会馆和4个慰安所的位置，并详细记述了有50名慰安妇为当时孙吴上万名关东军军官和士兵服务的情况。

这个军人会馆二层楼西面第四个房间是一位叫文明金的朝鲜女人居住过的房间。她是在18岁那年，在集市上被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以帮助找到“好工作”为名骗了出来，通过多次转手，将她从朝鲜庆尚道带到孙吴。当时同文明金一道被骗来的另外7名朝鲜未婚少女，大的20岁，小的年仅16岁。她们到这个军人会馆的第一天便遭受了厄运。据文明金回忆，一位中等身材50多岁的日本军官走进了她的房间，他腰挂战刀，一脸恐怖，在他的威逼和胁迫下，文明金由一名花季少女沦为日本关东军的一名慰安妇。另几位南朝鲜女孩与文明金的遭遇也完全相同。第二天，她们在军人会馆院内的草坪上抱头痛哭。她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离自己的家乡有多远，怎样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中，家里的亲人找不到她们会怎样着急，哪里会想到她们远在异国他乡竟在遭受身心欺侮和蹂躏。她们中有两个女孩逃跑过一次，但被抓回来后，打得死去活来。除此之外，那些专门看管她们的日本兵，不是要把她

们扔到狼狗圈里和狼狗同睡，就是要把她们送到“士兵服务队”（指另外4个慰安所），并使用各种殴打和恐吓手段让她们屈从。她们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开始过着暗无天日的“慰安妇”生活。她们每天都要接待那些日本军官，凡遇到这里召开会议的日子，她们每人一天要“接待”十几次，稍有不从便会遭到打骂。她们不仅肉体受到摧残和蹂躏，而且她们的人生也遭到无情的践踏。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她们才结束了屈辱的慰安妇生活。

残酷的战争给这些无辜的“慰安妇”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侵略军吞噬了她们如花般的青春，铸成了她们一生的不幸。她们这段慰安妇的生活遭遇就如同“军人会馆”这栋楼房一样，是日本侵略者兽行的一隅再现，作为铁铮铮的事实，向世人控拆着日本关东军惨无人道的罪行。

宝局。即伪满孙吴所设的官办赌场，俗称宝局号，以“押宝”，推“牌九”为主，昼夜开赌，门庭若市，当地及周边地域许多人因赌博而卖子典妻，家破人亡。

酒保。驻孙吴的关东军各独立和分驻的大队以上的营区内或营区附近都设置了为官兵提供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烟、酒、糖、茶、罐头、饼干等的小卖店和兼做娱乐的场所。酒保的建筑外观和室内格局都具有典型的日本建筑风格。内部布局基本分为售货区和放映室两部分。酒保所销售的商品基本都是日本国内生产的香烟、糖、酒、毛巾、牙膏、肥皂、信纸等日用品。酒保放映的影片大多都是宣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和鼓吹“圣战”功绩的所谓鼓舞士气题材的影片。孙吴现保留的酒保有两处，一处位于

三里丁村，另一处位于曾家堡村，属关东军7590部队，至今保留完好。

“忠灵塔”。关东军在孙吴建有3处“忠灵塔”（也称“忠魂碑”），以此彰显日本帝国军人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同时也是悼念那些亡灵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孙吴至逊河大路北侧附近的“忠灵塔”高2米，塔形为三级阶梯式。第二个塔建于铁路小四站附近，是关东军为悼念日本铁路员工而建。第三个塔建于“胜山要塞”核心阵地旁边，名为战争期间日本将士祝福自身宝贵的生命之地，实为日军屠杀太多的劳工，内心深感愧疚，防其“心寒”祈祷“消灾”而立。

孙吴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统治，他们为达到禁锢青少年思想，麻痹人们灵魂的目的，开始了对孙吴学生进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教育和反共产党的宣传。伪孙吴县公署教育机构秉承其日本主子的旨意，驻有日本顾问、辅佐官等，总揽大权，为在沦陷区执行奴化教育出谋划策，日伪政府强令普及全县的“一体切实遵行”八条“训育方针”的宗旨，就是要把中国国民和学生教育成供日军驱使的奴隶。日军通过多种渠道，推行“汉人日化”教育，妄图使我国青少年淡忘母语，一味歌颂日本的“王道乐土”，除了对在校学生推行奴化教育外，对孙吴县广大人民也用尽欺骗麻木、腐蚀奴化的手段。他们培养了一大批汉奸，拉拢收买上层知识分子，极力浊化人们的思想。吸毒、嫖娼、聚赌等奢侈糜烂的生活充斥社会。日本地痞、流氓、恶霸比比皆是，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亲日、色情歌曲

《何日君再来》、《盼君早日返家园》、《忘记了当初那段美姻缘》、《阳春小调》等不绝于耳。为进一步控制和束缚孙吴人民的思想和言行，还推行“自肃自励运动”，规定每月的1日和15日为“自肃自励运动日”，是日，各界民众一律停止宴会、停止饮酒，如遇婚丧嫁娶，也不得置备宴席。还规定日伪政府各机关及新民会，每月最后一周为“职员反共自肃运动周”，此周内，各机关办公室要悬挂“反共自肃”的标语口号，机关长官要对其属员进行训话、告诫、考察，凡“遇有言行不谨，应切实纠正”。工作人员每天要穿上“制服”，列队聆听日本特务机关长的“莅临指导”和伪市长的“精神讲话”等，为达到全面奴化的目的，他们在全县街道、建筑物上悬挂布幕，宣传“剿灭共匪”、“完成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反共、亲日思想。他们强令商店使用的包装纸、报纸杂志的封面，戏剧院戏单、票证、年画上，都须印刷“中日亲善”、“满洲乐土”等字样，以此来麻痹孙吴人民，企图以此达到最终灭亡中国的目的。

第三章　爱国军民的反抗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而蒋介石则不断为他推行的不抵抗主义辩护，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胜于外者”。继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争夺。然而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会师，表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正当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的时候，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当时国民党有他的统治地盘，共产党有自己的根据地，而日本侵略者一开始是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国民党也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曾先后进行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

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毕竟是敌强我弱，加之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单纯防御方针，致使正面战场的战局十分不利。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夺取了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大片领土，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致使中国军民30多万人被杀害。

而此时正是东北抗日游击战异常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1936年1月正式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后编为三路大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指挥。抗联部队的11个军共30 000余人，活动于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游击区覆盖70余县，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密营，与东北爱国民众建立了广泛联系，取得了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有力的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一、抗联在孙吴的战斗

在艰苦卓绝地抗日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和不屈的孙吴民众时刻也没有停止与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为主的部分北满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孙吴铁路沿线袭击日军，毙俘顽敌，缴马夺粮。1933年4月至1935年9月，抗联部队利用各种巧妙灵活机动的战术，不断袭击日伪军和为其服务的工程技术及办事人员，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弹药、粮食、马匹、药品、衣物等战略物资，不断壮大自己的武装。从1934年起，每月发动袭击日军次数1到7次，个别月份次数高达11次之多。日

本人所著的《北黑铁路建设纪要》第七章中曾无可奈何地记述："在孙吴驿至辰清间横行的土匪，是以孙宪章为首的小集团，人数不多，仅150人左右，但他们深知地理，可以到处出没，袭击施工现场，或袭击事务所、宿舍、劳工小屋，抢夺金钱和贵重物品，或者夺取向外输送中的物资，或者杀伤办事员，或者绑架办事员等，然后又巧妙地逃到山中摆脱讨伐，窥探好时机，就再出现，在施工建设中受到这伙土匪的很多次威胁"。日军为了防止我抗联部队不断袭击，日益加强对北黑铁路沿线的武装防范和警备，利用日本警备队及满铁守备队，甚至动用关东军师团，来对付我抗日武装力量。抗联部队利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依托山地丛林，不断打击敌人，使日本侵略者屡遭挫败和损失，同时遏制日本侵略者修建北黑铁路的进程。在此期间，就有以下8名日军官兵被击毙，分别是：曹长井出清吉、伍长野村正治、上等兵朝仓信夫、一等兵轮千谨吾、二等兵清水，雇员桐纲幸、山本晴造和村田操。田中大治、滕福治等7人被击伤，另有多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被击毙。

1935年10月到1936年10月，各地劳工中有20余起武装反抗和怠工斗争，平均每半个月一起，打死打伤及抓捕日伪职员近20名，烧毁材料仓库一座，缴获了大量的粮食、物资和马匹，解救劳工40余名，其中有20余人参加了抗日武装。1935年6月，抗联部队在距辰清站南10华里的曙光村袭击了一个日军据点，缴获军马10匹，并有10名劳工参加了抗日队伍；同年8月，抗联部队袭击了一日军守备小队，击毙日军军曹井平。1936年秋，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

赵尚志率部西征，次年3月横亘孙吴南部山区，歼敌町田少佐以下21人。1937年8月，抗联第六军代军长戴鸿宾率西征部队在孙吴万葛山痛歼日伪军。1938年底，李兆麟领导的龙北抗联，辟建德都朝阳山后方基地。此后，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三支队，经常活动在孙吴茅兰顶子、松木山、北黑沿线游击区（辰清、清溪、小兴安一带铁路各站点附近），灵活多变地打击日军。

1939年至1940年间，日伪调集重兵对我抗联部队实行“围剿”，同时配合归屯并户政策，把周边区变成无人区，大量的敌人在深山里用围堵和穷追的办法，使抗联部队大量减员，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为了扭转不利的形势，1940年11月以后，抗联第三路军大部开始越境去苏，在苏联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和沃罗什诺夫城郊分别设立南北两个临时屯所，即南野营和北野营，建立抗联整训基地，同时成立了东北抗联教导旅，又称苏联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过境的抗联部队官兵，在苏联境内进行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为抗联部队保存了实力，培养了干部，使其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抗联主力大批返回东北受到限制，但仍不断派出精干人员组成的小分队，回国执行侦察和打击日军的各项任务。期间，抗联三支队通过冰封的黑龙江进入日军“国防工事”防御区，通过封锁线，踏上了从逊河通往孙吴的公路，之后跨过逊河，沿着茅兰河向上游走去。茅兰河是逊河的一条支流，一百多公里长，一二十米宽，河堤很陡，两岸长满了柳蒿毛子。茅兰河的弯曲度大，且河底多大块岩石，部队每天只能行

走七八十里路，每天早晚各吃一顿饭，中午休息片刻，穿冰窟窿取水饮马，晚上在河湾背风处宿营，拢起篝火。就这样，他们走了三四天来到茅兰河上游的茅兰顶子。茅兰顶子遍布参天的树木，是一片原始森林区，山峦起伏，渺无人烟。部队选择了一处靠山近水、蔽风向阳的地方露营，大家一齐动手，用树枝当扫帚，扫出两丈宽、三丈多长的地方，四周堆起高高的雪墙，把树枝铺在地上，中间架起一排木头，燃起熊熊的篝火。从孙吴到嫩江还有500里的路程，此时最迫切的是解决粮食的问题。附近的炭窑和小兴安车站存粮不多，解决不了部队太大的问题。北面有一个较大的火车站——辰清站，是北黑铁路上的一个较大车站，位于孙吴正南40公里，那里设有警察署、日本人军需器材仓库，驻有铁路警察、马爬犁运输队，那里既存有粮食，还有马匹，三支队决定攻打孙吴辰清火车站，然后穿越北黑铁路西进。

部队在小兴安东边的东兴山炭窑窝棚向烧炭工人了解敌情之后，决定按计划奔袭辰清，行至离辰清20多里处时，同一队乘马爬犁的日军遭遇。原来，当部队穿过辰清至茅兰顶子的公路时，敌人判断我军要去打茅兰顶子木营，便迅速从孙吴调来许多日军，乘坐马爬犁前往茅兰顶子木营，同时调辰清和小兴安两处守敌前去支援。从辰清出来的这股敌人，刚离开辰清不远就与我三支队遭遇。在雪夜里，敌我双方交火对射。三支队七大队长白福厚果断地指挥先头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打了一阵子便向辰清撤退，在对敌人进行包抄时，白福厚等5名同志牺牲。

战马的嘶鸣声，将姚世同从昏迷中惊醒。其实，遭遇战一开始，姚凭经验判断，这是一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如果不迅速将其击溃，长时间打阵地战，日军的后续部队上来，对我军非常不利。于是，姚世同率领两名战士从侧翼向日军阵地包抄过去，当走到日军阵地侧后面时，发现了日军的马爬犁，借着月光看，只有两名日军看守，姚世同与两名战士每人扔出一棵手榴弹，乘着烟雾一人夺取一副马爬犁，边向日军射击，边打马奔往我军阵地。然而，在日军密集火力截击下，两名战士先后牺牲，姚世同腿部中弹，马屁股被子弹打伤后受惊，拉着姚世同沿着山间林路狂奔起来。等到马被拢住，回头去找部队时，阵地已经一片沉寂，我军已经撤离阵地。日军因严重受损，深夜未敢反击，撤回据点。姚世同只好独自一人赶着马爬犁，奔向抗联部队经常站脚的东兴山炭窖窝棚。他忍着剧痛，赶着马爬犁走了半夜，离炭窖窝棚不远时，因失血过多不知不觉昏迷过去。炭窖工人发现后把他抬到屋内，看他是抗联，便热情地给他做饭，替他包扎伤口。炭窖窝棚共有15人，大把头郭柏雷是日本人的忠实走狗，为了邀功请赏，当天偷偷地跑到孙吴城内向日本宪兵队报告去了。

第二天时近中午，大批日伪军将东兴山炭窖窝棚包围。姚世同凭借炭窖窝棚作掩护，拖着残腿，拿着长枪，敌人一露头就射击，接连打死6名日伪军。时近傍晚，长枪子弹打没了，手枪也只剩下两粒子弹。当敌人再次向他喊话劝降时，姚世同机智的回答，“上来一个当官的，可以谈判”。敌人以为可以活捉抗联战士回去报功，于是一

日本军官走上前来，姚世同怀着满腔怒火，一枪击毙了他。敌人疯狂地向窝棚射击，姚世同宁死不屈，用最后一发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辰清遭遇战，破坏了三支队夜袭辰清的计划，迫在眉睫的粮食马匹问题仍未解决。抗联三支队通过当地老乡了解到孙吴东山设有木营，木营里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弹药等物资。之后，果断决定攻打东山木营，尽快获得给养。王明贵、王钧等支队领导重新制定了“截马夺粮”的作战方案。次日天黑，部队顺着杜德河东岸通往孙吴的马爬犁道行军20余公里，天亮时，出其不意地迂回到孙吴东10公里日军木营附近。这里，每天早晨都有从县城出来的二三百张马爬犁，到东山木营往回运木材。三支队埋伏在山脚下两座山包后面的河汊里。天亮后，果然有一队没有武装的马爬犁从孙吴开来，等到100多张爬犁进了埋伏圈后，战士们一跃而出，迅速予以截获。赶爬犁的人知道遇见了抗日联军，都顺从地把马爬犁交给了战士，并积级配合，提供了东山木营的详细情况。战士们骑上缴获的200多匹马迅速冲向木营，守在木营里的20几个日本人见抗联部队人多势猛，哪里还敢顽抗，早已闻风而逃，只剩下200多伐木工人和一座无人把守的粮食仓库。战士们一枪未放，冲进木营，打开仓库，获得许多大米、白面、豆油、食盐等。之后，每人带上3袋粮食立即撤离，顺着公路向辰清方向走了20多里路，进入风雪覆盖的茅兰顶子原始森林。战士们在自己趟出的雪蹓子旁，一边走一边布上手榴弹跸雷。鹅毛大雪不停地下着，战士们在雪深近3尺的山路中艰难的行军。两天之后，在茅兰顶子（今茅兰河

上游）建起了雪中密营，以作休整。

为保存战斗力，部队决定除每人留一匹坐骑外，杀掉其余马食用，节省粮食给马做饲料，同时派人打些野兽充饥。一个月后，小兴安岭的春天来了，冰雪消融。三支队在避开敌人“进剿”向朝阳山转移之前，再次决定攻打辰清，目的是挫伤敌人势气，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进一步为自身补充武器和粮食。在战前的动员会上，战士们同仇敌忾，表示一定要消灭敌人，为白大队长报仇。天黑下来，在离辰清车站还有2里远的地方，队伍步行前进。辰清火车站灯火明亮，火车冒着浓烟呼啸而过。袭击警察署的八大队，在共产党员、支队副官吴法川的率领下，冲到哨兵面前，将50多名伪警察堵在屋里，缴获了四五十支枪和2 000发子弹。在辰清火车站，七大队用同样的战术俘虏了十多个站警，顺利地占领了辰清伪政府，缴获了一些伪币和好几箱大烟土（1万份大烟）。在辰清警察署的拘留所里，部队解放了关在那里的反满抗日的鄂伦春族青年莫桂林和姜海波，2人随即参加了抗联队伍。撤离辰清时，按政策释放了俘虏。

在攻克辰清火车站的战斗中，共产党员、第三支队副官吴法川冲在最前面，英勇作战，不幸负重伤，后因伤重牺牲。

攻克辰清之后，三支队打算西渡辰清河，奔赴朝阳山后方基地，但由于冰雪融化，河面变宽，无法过河，只好向东转移，再次返回茅兰顶子。不久，孙吴和北安的日军骑兵分南北两路夹击而来，敌人会师于辰清后，顺着抗联战士的足迹扑向茅兰顶子。一天拂晓，部队早早起来吃

饭，打算天一亮就转移，谁知饭还没吃完，哨兵报告，北边发现了日军马队。战士们立即撤离宿营地，由王钧在前带队，王明贵和任德福带领十几个人在后面掩护，向南密林深处转移。部队边打边退，敌人紧追不舍，在万分紧急的时刻，前面遇到了一处二三百米宽的开阔地，如果部队在这里遭到敌人的追击，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掩护先头部队安全通过这块开阔地，王明贵和任德福组织十几名战士埋伏在开阔地两侧的大树干后。敌人倾刻追到跟前，战士们的猛烈地向敌人开火。待部队顺利通过开阔地后，王明贵下令："撤！"十几名战士翻身上马，一溜烟穿过了开阔地。王明贵等十几人到了开阔地东边，正巧有一座小山坡，王钧已布置好四五挺机枪准备伏击敌人。一眨眼工夫，敌人的先头马队离三支队只有100米远了，后边的敌人也都暴露在开阔地之中。王明贵说了声："打！"四五挺机枪突然向敌人开火，头戴钢盔的日军一个个掉下马来，死伤足有上百人。狡猾的敌人重新组织进攻，并派兵向我方的两侧迂回。我三支队边撤边在雪地里埋"地雷"。可是，到了傍晚也不见敌人的影子和触踩地雷的爆炸声。天渐渐地黑了，估计敌人当晚不会再来了，部队就地露营。第二天天不亮部队迅速转移，边走边埋下地雷。到了第三天，仍然不见敌人追踪的迹象，王明贵派十几个战士返回侦察敌情，并顺便把"地雷"起回来，部队原地休息待命。晚上，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他们边走边起地雷，一直走到前天阻击敌人的开阔地，只见满地污血，从足迹判断敌人刚刚撤离不久。这次伏击战的胜利，使三支队摆脱了敌人重兵的追击，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此期间，抗联三支队曾派李国军、李俊等去北安东边的南北河地区寻找九支队。在此两个月前，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曾决定调宣传科长陈雷到三支队做宣传工作，并参加支队党委会，指示在适当时机派人到九支队去接陈雷。李俊是电报员，因辰清遭遇战后电台失灵，派他去九支队检修。王明贵与李国军约定，一个月后在朝阳山某地接头。之后，部队在辰清河上游涉水过河，向北黑铁路小兴安火车站逼近。夜晚，三支队悄悄靠近目标，突然一个冲锋，占领了火车站。战士们速战速决，带着缴获的粮食，立即穿过铁路，直奔朝阳山后方基地。日军闻讯，马上用火车运送200多关东军在后面紧追不舍。翌日下午，抗联三支队越过科勒河，甩掉追击的敌人，胜利挺进朝阳山。

值得一提的是，抗联第四支队在南阳岗伏击战中，侵华日本关东军第四军第一师团长服部晓太郎被击毙。服部晓太郎，日本兵库县人。1944年3月，任关东军第四军第一师团长，驻守齐齐哈尔、北安、孙吴、黑河地区，担负该地区以及对正北面苏联方面的警戒、作战任务。这期间，他大多都是在孙吴度过。1944年8月间，正在齐齐哈尔工作的服部晓太郎接到军令，调他到日本陆军省任教育总监任职。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记录：服部晓太郎在接到回国任职的命令后，打电话给军司令官西原贯治中将，请求允许他去孙吴看望他的部下，之后由孙吴返回国内。西原贯治本不想让他去孙吴举行告别仪式，向上司宫淳司令官作了请示，没想到宫淳司令官竟然同意服部晓太郎的回国方案。而后，服部晓太郎带一个警卫排从齐齐哈尔出发前

往孙吴。

抗联第四支队是一支活跃在松嫩平原上的抗日武装，经常对日军部队进行偷袭活动，当得知有一名日军军官要到孙吴的消息后，连长李树骅决定派出全连的兵力，埋伏在南阳岗一带，准备歼灭这股敌人。8月某日上午10点钟，金哲人披着斗篷在南阳岗最高处瞭望，看到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正朝孙吴方向驶来。当两辆汽车进入埋伏圈后，连长李树骅下达战斗令。我方70多杆枪支一齐射击，手榴弹不停地在汽车附近爆炸。仅仅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战斗，全歼了这股日军。服部晓太郎当场被击毙。此战前，我抗联部队并不知道日本军官的准确职务和名称，打扫战场时，从军服标志发现，被打死的是一名日军中将。经多方证实，这名中将是服部晓太郎。服部晓太郎死后，宫淳和西原贯治都感到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商量不能把真实的情况上报。于是，他们向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报告：服部晓太郎于8月某日上午猝死，原因不明。关东军陆军省乃至大本营当时处在被动应战的关键时期，对这个报告竟然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直到战败后，服部晓太郎的死因才在日本陆军中真相大白。

二、爱国群众对抗联部队的大力支援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里，抗联战士们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经常缺吃少穿，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一次次渡过难关，不断地打击敌人。80岁的老人李德喜回忆说：他的父亲李子臣当年在村里开饭馆，经常给抗联战士们提供食

品。辰清村还有两位贫苦百姓，一个叫韩凤刚，一个叫占德胜，俩人一同在山里烧炭窑，与抗联部队的王钧、白福厚等人比较熟悉，他们经常给部队一些小米、玉米面等粮食。他们所烧炭窑的地方与日本玉田公司的马爬犁队所驻扎的地方很近，在三支队“截马夺粮”战役之前，占德胜与韩凤刚为我军提供了准确情报，并建议部队顺着杜德河走，绕到日军木营附近。按照他们所提供的情况，三支队打了一个大胜仗。不但补给了粮草，也鼓舞了势气，同时也为当地百姓出了一口恶气。1940年的春天，大约是三四月份，由王钧带领的一支18人的队伍，从逊河、孙吴方面长途奔袭到辰清村时，已经是三天三夜没吃上一口食物了。李子臣看到是自己的队伍，非常高兴，瞧着战士们筋疲力尽的样子，马上给大家烧开水、做饭吃，并让当时十几岁的李德喜在外面给站岗放哨，并连夜赶做了200个烧饼，同时拿出两袋面让部队带走，以解燃眉之急。

1937年7月，抗联第六军戴鸿宾率234师和军部保卫团、特务连等部队西征时，在孙吴万寿山（现在的山岭）一带歼灭日军百余人。期间，当地的百姓为抗联提供吃住，帮着救助伤员。1937年秋，赵尚志部6名抗联战士组成的小分队，在当地2名群众的协助下，夜间袭击了驻守孙吴小四站的日本“开拓团”，用刺刀杀死哨兵，其他在睡梦中的日本“开拓团”员40人被俘虏，缴获20多条枪和4箱子弹。孙吴居民关任才等人为抗联小分队挑着战利品向南走了4天，到了抗联大队部营地，在这里见到了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此后，关任才又为抗联买了15包火柴和部分日用品，送到抗联的接头地点。1940年7月，日军一行

40余人沿西山军事要道到四季屯加强那里的军事力量，四季屯村民何士环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刻派其丈夫关文元与村民肖老五连夜骑马赶到西山抗联驻地报告。抗联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在大桦树林子西山日军军事道路两侧山坡密林中设伏，当日军车队到来时，我军突然袭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慌乱逃跑。此役即著名的“西山围歼战”，共歼敌22人。

1941年，抗联部队在西兴莲花山一带活动时，当地村民迟连生经常为抗联送情报和捎带一些生活用品。同年11月，抗联某部准备前往苏联休整，计划从哈达彦过境。日军探得情报，派重兵前来设伏。东屯村村民德铁柱（原日伪保长）得知此消息后，立刻派人连夜骑马把情报送到抗联。我军针对复杂形式，迅速调转部队，向力量较弱方向突围，部队集中力量，仅1个小时就打出个缺口，从东霍尔漠津岛紧过境。此役被称为“南山二道沟战斗”，共歼敌18人。

抗联三支队在孙吴一带的抗日斗争，处处得到当地爱国民众的大力支援，取得了许多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孙吴人民的抗日信心。

三、屈辱劳工的反抗斗争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定了《满洲劳工协会法》。1938年，成立了“满洲劳工协会”和各地方出张所，开始在东北全境实行劳动统治政策。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所谓“国民皆劳”政策，完全是出于掠夺中国各种资源和侵略

备战的军事需要，也是进行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据伪满洲史记载，日本关东军在东满、北满加强军事部署，加紧修筑防御阵地、兵营和各种军事设施。为修筑浩大的军事工程，日本强制征集劳工所用的最为残酷的手段叫做“紧急就劳”和“行政供出”，有时还要进行“紧急劳动力供出”。1942年，关东军就是用这种办法强征劳工219 300人，其中至少有10万人是战俘和平民，纯系武力逼迫到东北。这样，自1941年开始实行劳务新体制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行它的战争计划，每年使用中国劳动力都在200万人以上。

孙吴县地处黑河地区腹地，是侵略者理想的设防阵地和进攻出发地。因此，日本关东军在伪县公署的谋划和配合下，从中国东北、华北和华中等地先后征集了8万多劳工到当地从事各种苦役，劳工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迫下，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和灾难，其受害之深，遭罪之惨，死难之多，为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劳工的征集，一开始是分派，然后是骗招，以后发展到骗招和强征并行，进而又骗招、强征、抓捕同时进行，以实现日本对中国更大规模的经济掠夺，支援其侵略战争。

孙吴“劳工协会出张所”（简称“劳工协会”），主事为日本人岛峰真市，办事人员有20多人。其任务主要是为关东军孙吴驻军提供劳工。内部组织机构有业务系、保有设施系、庶务系、劳需系。业务系，主要任务是根据伪满洲国政府颁发的《暂行劳动票发给规则》，向劳工发劳工票，持劳工票者只能在孙吴县内通行，不准乘火车和汽车离开孙吴县境内。劳工一踏入“劳工协

会”的牢笼，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日军任意驱使的奴隶。保有设施系，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劳工的监督管理，内外联系，上下沟通全县劳工进出情况。下设专职医务人员1名，给劳工看病。实际上，6万多劳工分布在几百个工地干活，一个医生根本看不过来，也不是真正给劳工看病，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庶务系，主要是管理财务和文档，担负上司交给监督劳工耳目的任务。劳需系，主管劳工口粮和衣着分配。

当时，在孙吴有60多个招募劳工单位，这些单位有大柜（大把头）、二柜（二把头），大柜大多是日本人担任。在招募劳工时，日本大柜多在幕后，另雇中国人当把头出面。为掩饰其残酷的真面目，日本大柜都为其征集劳工的单位冠以名称。日本大柜拥有中国劳工千人以上的有“八大组”，即高冈组、松本组、长谷川组、钱高组、福田高梨组、东亚土木会社、国际公司、森田组等。仅次于“八大组”的有新田商会、川本商会、寿田公务所、牡丹江制材工业厂等。其中，钱高组有劳工6 000人左右，负责修东仓库和三里丁兵营；森田组有劳工4 000人以上，负责修北大营；北岛组负责修建平顶树飞机场；松本组修建曾家堡飞机场和铁路官房。日本人当组长、经理和社长，另雇中国人和朝鲜人当大把头，负责整个工程的实际指挥与对劳工的总监督，大把头又雇若干二把头和小把头，负责领工和现场监督劳工干活。

日本侵略者实行所谓的“全民皆劳”，也就是“派劳工、招劳工、骗劳工、抓劳工”。曾在“劳工协会”当过勤杂工的工人说：“这些名义上自愿应招的工人，实际上

都是强抓硬逼来的。当劳工紧张时，关东军就派汽车停在孙吴街里的十字路口，日本兵和“劳工协会”的见人就抓，抓住往汽车上一扔，汽车装满了就拉走。老百姓看到十字路口停汽车，吓得东躲西藏，不敢上街。”

日本关东军施以各种手段从各地“征集”的大批劳工，自踏上孙吴的第一步，就受到严密控制、残酷的压迫，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失去了人身的一切权利。当时，林昌公司骗招的1 000多名劳工，包建日军690部队营房，整个冬天都住在不生火的窝棚里。关东军对劳工的粮食供应实行严格的配给，劳工的伙食十分恶劣，一般都吃发霉的黑红高粱米和带皮苞米面，各级把头还层层克扣，劳工的粮食定量只有30斤，实际每天只吃到半斤多。1941年后，又给劳工配给橡子面，其好看不好吃，苦涩难咽，不消化。一年四季吃的菜只是咸菜条、黄豆汤、冻萝卜汤，有时干脆只有咸菜汤。修辰清至山神府军用公路的3 700多名劳工，由于环境恶劣，长期营养不足，先后有400多人丧失劳动能力。

修建前沿军事阵地和军事筑垒及重要的军事设施，因保密程度高，由日本的军警宪特人员和军事工程人员亲自监督指挥。如“胜山要塞”工程，日军将其分为几个区，再按区、棚、班组管辖，每个棚住百人左右，工棚之间的劳工严禁接触，四周都拉着铁丝网，每个工棚有一个日军小队看护，并配有3至5条大狼狗。为掩人耳目，在工棚附近设有医务所，名义上是治疗伤病的劳工，而劳工真正得了病，日本人只是观看一下面容，以得传染病的谎言予以隔离，根本不给医治。劳工一但得病干不了活，很少有坚

持下来的，有的甚至还有气，就被用花轱辘车拉到山野里埋掉了。劳工在现场施工时，四周有日本兵荷枪看守，大小把头手持皮鞭在工地来回巡逻监督，稍不如意，非打即骂。关东军还派特务伪装劳工，混在劳工中间，监视劳工消极怠工和防止逃跑。特别是监视劳工中有无“抗日反满”、“鼓动逃跑”和“间谍”分子。遇到认为是嫌疑犯者，轻者关押，重者随时杀害。

由于日军的残酷欺压和非人摧残，中国劳工不断采用消极怠工、罢工等斗争方式反抗日军的暴行，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平顶树机场罢工斗争。

平顶树在孙吴县城西12公里处，是方圆几十公里的平展高地，离伪满关东军第四军司令部遗址8公里，距中俄边境不足50公里，南、西、北群山环抱，地势隐蔽，交通方便，日军在这里修建军用机场对于反苏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937年，日本关东军123师团强迫2 000多名中国劳工在平顶树修建飞机场。阴历8月的一天，一个叫赵玉山的劳工赶着马车拉石头路过门岗时，慌忙之中忘了给站岗的日军哨兵敬礼示意，该哨兵当即从车上把他拽下来，用三八大盖枪托将其活活打死。之后，日本兵为了消气，又无故打死两名劳工。随后，义愤填膺的2 000名劳工集体罢工了。日本人调来了一大批军警，把工地包围起来，强令劳工集合，并从劳工中抓出6名所谓罢工的煽动者，将其中的4人用刺刀杀死。日本兵牵来两匹高头大马，把另外两名劳工用绳子绑好拴到马鞍子上，两名日本人骑上马，飞奔而去。两名劳工在乱石满地的机场上被拖得血肉

模糊，在场的中国劳工怒目而视。到晚上，日本兵将最先罢工的几十名劳工转移出去，秘密杀害。

几天后，五六百名劳工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逃跑。日军调集兵力，前堵后追，在黑嫩公路二站与大岭之间截获二三百人。之后，日军把抓回的劳工全部枪杀。罢工中，只有二三百人得以逃生。

据《孙吴县志》记载，日本侵略者侵占孙吴的第二年春天，从外地抓来几百名劳工，清理距县城东8公里处的曾家堡飞机场周边荒地、盖房子。每天都有一两个日本兵骑着马到工地监工，其中一人手中总是拿根镐把，看谁不顺眼就打谁，劳工们恨之入骨。一天，两个日本兵来了之后，一个操山东口音的劳工故意踩着两把铁锹扭起来，不少劳工都围着看。其中一个日本兵抡起枪把朝劳工打来，这个山东大汉用铁锹一挡就把枪把挡飞了，随即用铁锹将其脑袋砍开了瓢。接着，刚要抡起锹砍另一个日本兵，结果吓得他扑通一声跪下，哀求说："你的杀死我的容易，这几百人的命死了死了的有，这有大马的两匹，你的骑上到南山的干活，我的回驻地报告，你的远远的走"。这位山东大汉认为留着他也许有用，就放下铁锹对他训斥说："你回去报告，就说人是我一个人杀的，与他们无关。"说完，骑上马直奔南山而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广大劳工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始终没有间断……

第四章　苏联出兵，日军溃败，孙吴解放

自1942年起，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反攻，日军为挽救败局，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1944年2月到7月，关东军总兵力几乎都被调往太平洋战场。虽然关东军又重新动员拼凑了一支24个师团达75万人的大军，但战斗力则大大下降。关东军副参谋长曾说“关东军已将大部分武器运回日本，全都空了。苏军一旦进攻，只有举手。”驻守孙吴的第四军第1师团、57师团先后被调出，只剩123师团顽抗。苏德战争结束以后，苏军将欧洲的部队调往东边，并提前一年废除了《日苏互不侵犯协定》。孙吴县是日本关东军在北满的重要军事基地，成为苏军摧毁的重要目标。

一、苏军出兵东北

1945年8月9日零时许，苏军分三路，从满洲里、黑河、绥芬河向关东军发动了全面进攻。首先是苏军的轰炸机群长驱直入，飞临伪满洲国“首都”和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上空，一枚枚炸弹投向城郊的目标。牡丹江地区的绥芬河、东宁一线，苏军密集的炮弹倾泻到日军阵地

上，把一个个地堡掀掉盖子，在这强大的攻击下，日军阵地几乎前线崩溃。这时起，关东军总部不断接到来自各方面的告急电报。8月9日13时，关东军总司令三田已三大将从大连乘飞机回到长春，在总部只停留片刻，便匆匆赶往伪满皇宫。他对溥仪说，关东军总部准备迁到中朝边界的通化，并劝溥仪迁都临江。

当关东军总部和伪满皇室急忙登上火车向南逃窜时，苏军急速开进，向东北的各大城市进军。在西面，马林诺夫元帅指挥的贝加尔湖方面军以8个集团军60个师的兵力，一路由满洲里沿铁路线向南推进，由坦克组成的快速兵团一天前进150公里，翻过大兴安岭，向齐齐哈尔进军。一路由中蒙边境穿越广阔的戈壁，两天推进300公里，占领鲁北洮南，进入东北平原，然后分兵向沈阳、长春进军。麦次列克夫元帅指挥的远东第一方面军以7个集团军45个师的兵力，从兴凯湖以南的地区发起主攻。绥纷河、东宁一线是日军筑垒地区，是经过多年经营的永久性防御工事。苏联红军从侧面迂回并封锁筑垒地区，用坦克在原始森林里开辟道路，向牡丹江推进。另一路向朝鲜进军。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的远东第二方面军，以5个集团军23个师的兵力，在黑龙江区舰队的协同下，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松花江南下逼近佳木斯，同日军进行最后的决战。

8月8日夜晚，苏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派遣一个连偷渡黑龙江，掩护工兵在孙吴霍尔漠津至哈达彦之间的嘎巴亮子江面上架设浮桥，通过坦克、火炮等机动车辆。8月9

日，苏军先遣部队开始渡江，9日清晨7时许，苏航空兵配合渡江部队对孙吴境内的日军设施进行轰炸。日军驻北孙吴的123师团司令部、日军前沿主要防御阵地、胜武屯南山大营以及火车站、飞机场和营区等处均遭到炮火袭击，营房纷纷倒塌，曾家堡飞机场9架飞机均被炸毁。日伪军如丧家之犬，纷纷携眷抢上火车，向北安方面仓惶逃窜。8月10日清晨8时许，苏军步兵约一个加强团，乘坐军舰从四季屯登岸，沿孙四（孙吴——四季屯）公路挥师南进，配合从东南方嘎巴亮子登岸的部队进攻胜武屯南山阵地。8月11日凌晨，黑龙江舰队运载苏军主力部队渡江。从嘎巴亮子和奇克登陆的有：苏军第3、12步兵师和第73、74坦克旅。

二、日军溃败，孙吴解放

位于伪黑河省“北部正面”孙吴地域的霍尔漠津要塞，是日本关东军在满州建立的重要军事基地，要塞总面积约350平方公里，防御纵深10公里—60公里。胜山阵地是霍尔漠津要塞的主阵地，是当时日军驻扎在孙吴的第5 国境守备队的主要防御阵地，面积6.5万平方米，分地上工程和地下工程，地上工程包括永久性交通壕、坦克壕、350多个工事掩体，以及高炮阵地、兵营等设施；地下设施包括居兵室、卫兵室、指挥室、地下通道、地下瞭望孔和射击孔、地下弹药库、地下物资仓库、地下医院等。花见山阵地是123师团司令部所在地，是战时日

军的指挥中心，由于要塞修筑得十分坚固，地上地下碉堡、交通壕及电力设施配合紧密，火力配备强，是苏军摧毁的重要目标。

8月9日后，日本关东军第四军123师团的主力部队陆续开进了胜山要塞。师团长北泽贞治郎中将感到没有取胜的希望，参谋长土田大佐根据决死队防卫战术，强制部队阻击苏军。他将1 000余名日军编为两个大队，一个大队以村上实为队长向沿江防线的胜武屯急行军，兵力两个中队，约600人。另一个大队以露木基造为指挥官，在后方南阳山附近布阵，兵力约两个中队。他们分兵把守阻击苏军的第一道关隘，潜伏在霍尔漠津至小河西村南绵延三四十里的山峦中。此时，日本关东军第四军123师团已陷入四面楚歌。尽管他们把指挥部从北孙吴迁到花见山中，这里有他们称之为特仓阵地的明碉暗堡、各种坚固的军事设施，但在强大的苏军攻势面前，灭亡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8月10日，苏军与日军123师团及守备部队分头展开激战。8月12日，攻克胜山。13日，攻克四不漏子，苏军伤亡很大，牺牲一名少将。8月13日至15日，激战三昼夜，攻克胜武屯日军防线。苏军由胜武屯南下的部队与奇克西进的机械化部队在孙吴吴家堡会师，形成了攻击孙吴日军大本营的态势。期间，为阻击苏军的进攻，8月14日，日军中队长羽藤宽等分头炸毁了孙吴北大桥、纵火焚烧了全部营房、兵工厂、露天仓库、电厂、车站等重要设施，孙吴城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爆炸声震天动地。与此同时，驻孙吴西山的日本731细菌部队673支队一片混乱。支

队长西俊英中佐特地从长春赶回孙吴，组织残兵向大兴安岭撤退并处理断后事宜。此时的“673”支队还有100多名主力队员和50名家属。西俊英责令药剂少尉井上正南，组成破坏班，爆破军用建筑。用作试验的“马路大”就地枪毙深埋；锅炉班的大熊带领4人把所有机密文件、研究资料、各种数据、图片等塞进锅炉里烧掉。之后，点燃房舍，放走所有试验用的各种动物。

由于孙吴北大桥被炸，苏军一时无法渡过逊别拉河，暂时撤回曾家堡。绕道至曾家堡飞机场南老河套架设浮桥，强渡过河，攻克对面的一、二包山日军守敌后，沿龙逊官道迎头截击溃退日军，在李富窝棚予以全歼。战斗结束后，苏军沿铁路道基经三家屯，于8月16日早晨开进孙吴县城。

苏军另一支部队在攻下胜武屯南大营之后，通过胜武屯后山（丁字山）直奔协振屯，在协振屯和丁字山之间的十字路口设立指挥部，并用气球作标记。苏军通过协振屯向西挺进，攻打东兴屯后山守敌。此时，该路苏军得到了曾家堡飞机场炮兵的火力支援，战斗持续了一昼夜，苏军伤亡100余人。次日，苏军找东兴屯一名老乡带路，晚间攻下东兴屯后山，接着攻占邻近的一座山岗（毛子岗），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双方展开了白刃战，最后全歼该股守敌。而后，通过东兴屯向南到曾家堡和主力部队会师。8月17日，最后一支苏主力部队进城，俘日军17 000人。随后，苏军沿铁路挥师向龙镇、北安方向挺进。

1945年8月17日，在苏军的允许下，123师团举行军旗焚烧仪式。北泽开始考虑具体投降事宜，派参谋片山满雄

去和苏军司令官交涉。按照苏军提出的三点要求，在孙吴住户家里，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侵略者在孙吴的统治就此宣告结束。至此，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挣扎了13年之久的孙吴人民获得解放。

第五章　创建孙吴根据地

孙吴解放后，我党先后派来几批干部创建孙吴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宣传发动群众，组建人民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协同剿匪部队清剿国民党政治土匪。一边医治战争创伤、巩固发展边区，一边参军参战、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创建孙吴根据地的过程中，我党许多优秀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

一、建立人民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

（一）解放后的孙吴概况

解放后的孙吴，满目疮痍，一片战火洗劫的景象。交通阻隔、商业停顿、物价飞涨、市场萧条，伪满时的200多处工商业户几乎全都关闭，人民生活困难加剧。当时，苏军在孙吴留守有20余人，成立了卫戍司令部，对孙吴城实行全面控制。自1945年8月17日苏联红军进驻孙吴至1946年4月苏军撤离，是苏军实行军事管制时期。

苏驻孙吴卫戍司令官随即发布命令：苏联红军要把东北人民从日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要把被日本剥夺了的和平与自由还给你们。苏联红军——解放者——是中国人民

的朋友和救星。每个诚实的和爱国的中国人的天职，便是尽力帮助红军把中国领土上的日本强盗更快地肃清，并且恢复和平与安宁。从今天起，到建立中国人民政权的时候止，本城（本村）的全部政权都属于红军指挥部任命的卫戍司令官（同时就最快建立常规生活与安宁秩序又布施条令等）。授命于中共教导旅委派的中共党员抗联排长李树臣（又名李向臣），担任苏军向导进入孙吴，在苏军卫戍司令部留用联络员。

此时，一部分伪满警察和商人乘机蜂起，伺机捞取政治资本，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求成立县政权。为了稳定民心，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经苏军司令部批准，由一部分商人和伪职人员等共48人，于8月16日组成了孙吴县临时治安维持会（北孙吴、曾家堡也成立了维持会），一是办理民事纠纷，为苏联红军服务，安排食宿；二是维护治安，为迎接国民党军队接收孙吴做准备工作。会长由伪满商人、孙吴商号“老昌泰”店主、保长张华三（外号张三包）担任；副会长陈德仁（陈大胡子），也是有一定资产的商人。另一副会长王德耀，伪满时职员，自称是共产党员，曾和当时黑河行政办事处的胡宇翔相识。其他职员多系伪满时的职员。维持会下设总务、物资保管、财政、遗产调查、国有资产管理、商业、建设等9个科和公安局。公安局是伪公安局的继续，内设警务科、司法科、经理科，局长辛元福曾在中东路当过苦力，俄语很好，故红军方面比较相信。副局长李树人（伪黑河警察厅警佐）和秘书李景华（当过特务），都吸大烟，其他职员和警察约30余人，大都是伪满时期人员。同时设有牡丹江警察所及车

站派出所。期间，公安局将活动在清溪一带的土匪张鸣久部30多人收编为公安局讨伐队，张鸣久任队长。张鸣久明着说是苦力出身，其实是劳工转为“胡子”（即土匪）出身，副队长石新玉，曾在抗联部队呆过。讨伐队员多系苦力出身，直接由公安局指挥，但又与公安局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隔阂。

当时，维持会代表当地民众同苏军司令部建议，为了纪念解放孙吴而英勇献身的近千名苏联红军指战员，由苏方设计，当地工匠负责施工，城镇居民每天摊派30个义务民工修建一座纪念塔。在塔身即将建成时，苏军司令部用汽车、马车从四面八方的阵地、战壕中将苏联红军烈士遗体搜集运回塔庭后陵安葬，墓前石碑上面用俄文写着烈士姓名、职务等。8月底，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落成。两层塔基，双层塔身通体洁白，象征着烈士为解放全人类而捐躯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塔尖一颗鲜红的五角星映衬在蓝天下。塔身中部雕刻着碑文，正面是俄文，两侧是楷书中文，上面写着“为社会主义的祖国击退日本与解放中国人民而战殁之英雄其伟大荣誉千古不朽”（落款日期为1945年8月9日至18日）。28日，全镇居民六七百人参加了落成典礼。会上驻孙吴的苏军司令官讲了话，大意是：苏军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击退了日本侵华关东军，在伟大的战争中英勇战斗，把鲜血洒在中国的大地上，烈士战绩永垂不朽。还讲述了中苏友好源远流长等话。大会结束时，苏军用大炮鸣放纪念礼炮100响。为了解放孙吴这块土地，苏联红军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迄今，县城各学校把它作为对青少年进行继承和发扬

革命传统教育的校外课堂，人们年年扫墓祭奠。

孙吴县是日本侵华后发展起来的畸形县城，在不足4 5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最多人口曾达15万，其中关东军达9.8万人。日伪溃败前夕，这里遭到日军的疯狂破坏，遗留下严重的战争创伤和大量的敌伪社会基础。学堂解散，店铺关闭，人民生活无着落。到1947年底，城镇居民只能靠日伪遗留的霉高粱米充饥度日。由于日军仓惶败退，遗弃在满山遍野的枪支弹药、军用物资等被群众和一部分坏人拾去，一些坏人用这些枪支弹药装备起来后，打家劫舍，骚扰百姓。人们贩卖枪支，拣“洋捞”风靡一时，外地前来购买者络绎不绝。杀人、强奸等重大事件不断发生。赌风盛行，祸患频生。家家门户紧闭，丝毫没有安全感。当时的维持会公安局讨伐队都是伪满时期的旧有人员组成的，不管人民的死活。冬季黑龙江封冻后，据当地百姓讲，当时苏军往他们本国将日本物资用大卡车整整拉运了一冬天。苏联把北黑铁路的道轨及钢铁桥梁和工业设备、民用物资（包括大豆、小麦、土豆等食品）全部运走。将铁路沿线的一些桥梁、隧道、水塔、车库、站房炸毁。当时，北安、孙吴的2个机车库有86台机车，多是米卡楼式和米卡一式，苏军把其中一部分运走，一部分毁坏在途中。苏军运走车皮有400多节。

当时，孙吴地面是兵荒马乱，龙蛇混杂，人心浮动，群众无法生产，人民生活朝不保夕。

（二）孙吴解放区的地位和历史背景

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长期被日军奴役的孙吴人民，迎来了民族的解放，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此

时，孙吴民众要求和平，渴求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过上好日子。可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方针，要让中国仍然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美帝国主义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在战后变本加厉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蒋介石集团则与美、日、合流，从远离抗日前线的大后方，向华北、华中、华南运兵，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当时国内有三种政治力量在角逐，即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历史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这个时期的斗争是在政治战线和军事战线上同时进行，而主要是在军事战线上进行的。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定胜负的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历史的基本内容。1946年3月9日，国民党特务在哈尔滨杀害了东北抗日联军重要将领——时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李兆麟将军，就是其中一例。

孙吴当地则以一批敌伪残余势力为骨干，即以伪满孙吴县税捐局课长康崇刚为首的敌伪分子，千方百计地操纵社会，网罗伪、宪、特残渣余孽及一时四起的土匪，与外地国民党土匪勾结，趁此多事之秋，欺骗、拢络一些青壮年，拼凑一伙乌合之众，汇成一股反革命浊流——中央"胡子"。并且派员与国民党地方组织联络，秘密成立了孙吴县国民党党部和秘密组建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一军混成第六旅，康崇刚被加委书记长、旅长，率其爪牙，公然与我对抗，研究对策，伺机破坏。时常窜扰于孙吴、逊克、黑河等地，并直接阻碍人民政权的建立。在短时间

内，呈现出敌强我弱之势。

孙吴县虽是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一个边陲小县，但有其独特的战略地位。日军投降后，孙吴成为我党在执行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中创建红色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地域之一，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第一，孙吴县与黑龙江相毗邻的苏联相距只有百余里，一但战争延伸到本县可形成以孙吴为前沿，背靠苏联为依托，进可攻、退可守的态势。第二，该区域多丘陵和山地，资源丰富，盛产木材、煤碳和粮食，可以保证军需民用，支持战争。第三，抗战胜利之时孙吴县境内尚有北黑铁路，后来被苏军拆除，孙吴地区成为非铁路沿线的中小城镇行列。而当时正适应了我党提出的在偏远乡村建立根据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要求，迂回余地很大。第四，抗战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部分部队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党的工作基础较深，群众的基础条件较好。此时我党已富有远见地把建立东北根据地作为战略重点，将它视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巩固基础，全力争取。甚至认为即令为此“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也在所不惜。而国民党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东北的重要性，只是相对而言，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关内，而且以为有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东北接收过来”，对东北工作并没有做认真的研究和部署，当时国民党看重的是南满和若干大城市，这就使我党争得了时间。按照党中央的具体部署，东北局向北满、西满地区派遣了大批干部和部队，当时派出干部2万名和11万大军挺进东北，孙吴县也陆续派来了干部和部队。

延安干部桂生芳回忆：“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干部团开赴东北。延安的1/6的干部编成中队、大队，由林枫、张秀山、于震、曹毅率领挺进东北。先期是彭真等领导骑马先行。我们干部团是步行从延安出发，一直到了张家口才有了货车，有时还得用人推，燃料不足，上不了坡，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张家口以北，日本侵略者在那里制造了无人区，所到之处的情形是十分悲惨的。后来与苏军交涉才给了一列军车，到了沈阳的皇姑屯。中央东北局的首长已经到了沈阳，对我们干部团的同志进行了分配，一部分继续北上，经长春到了哈尔滨。之后，各中队就分头去了黑龙江、嫩江、合江、牡丹江各省。我们这个中队100来人去黑龙江，我和廖仲符是二大队的正副队长。到了北安，抗联的王钧等3位同志已到此多时，晋察冀的王堃骋比我们早一点。我们延安干部团在黑龙江省的负责人是范式人、赵德尊和后来的王鹤寿。我被分配到省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林一心是主任。经过发动群众，很快就组织起东北人民自治军黑龙江军区的一个支队，又开始组建第二支队。这时，国民党的部队也进了东北，并且向北进逼。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就让出去了，因为苏联是跟国民党签订的协议，哈尔滨也十分紧张。为开辟后方根据地，11月下旬，我和任炳麟，省委任命他为孙吴县县长，与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去了孙吴，与先到孙吴的吴飘萍接上了关系。象孙吴县这样，派去这么多干部是其他县所没有的。这也说明了孙吴这个地方和工作的重要。”中共军队首先进入东北，从而使孙吴根据地的创建成为可能。因此，孙吴县的战略地位和整个东北边境地区一样，成为

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

（三）与匪较量、建军建政

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是指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至1946年6月国共双方暂时停战的时期。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中，这个阶段的情况特别复杂，矛盾涉及国际国内方方面面，事态发展充满变数和未知数，曾多次变更原定的决策和部署。国民党军队在进攻的初期拥有明显优势，咄咄逼人地向前推进。我军虽已先入东北，但环境陌生，立足未稳，又受到种种限制，处境十分艰难。经过9个月的较量，力量对比逐步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终于度过最困难时期，形成双方相互对峙、此长彼消的格局。为下一阶段扭转整个战局奠定了基础。在苏联出兵东北之时，党中央决定派出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进驻孙吴是十分关键的一环。从此，也给孙吴县带来了重大转折。当时党中央已向全党明示：通过占据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继而独占东北的这种可能性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提出当前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迅速地分散到远离大城市的广大乡村、小中城市，放手发动群众，肃清汉奸土匪，改造政权，建立根据地。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逐步改变力量对比，最后夺取东北。孙吴县也是我党与国民党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谁胜谁负关系到我党创建孙吴根据地的成败。早在1945年8月，为配合苏军作战，解放自己的家园，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在东北党委会（1942年9月成立，1945年11月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联系上后撤销）在周保

中、李兆麟、冯仲云等率领下，迅速赶赴东北各城市和战略要地，同时建立了7个地区党委会，其中4个在黑龙江，即：黑龙江地区委员会，负责人王明贵；松江地区委员会，负责人李兆麟；佳木斯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彭施鲁；牡丹江地区委员会，负责人金光侠。东北党委会还派遣了100多名干部到黑龙江地区的57个市县开辟工作。

为创建孙吴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和战士提前做了大量工作：摧毁敌伪政权，收缴日伪军武器，没收敌伪财产，组建地方保安部队等。他们熟悉这里的山村、城镇，了解这里的风俗民情，与当地人民群众存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些人中，有的是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地下工作者，有的是在战斗中失散的抗联战士，也有许多人曾是抗日游击战争中积极支持、帮助抗联的爱国群众。抗联的同志积极寻找抗战时期的地下党员和党的地方组织，先期到达县城的抗联同志，在准备迎接党中央派驻东北各地的干部和军队、扩大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如抗日战争时期抗联三支队某连连长、共产党员牟景祥在一次游击战中掉队后，为了找部队，留在孙吴境内当劳工，挑土篮、修铁路，在辰清一带都知道有个牟景祥，解放后他找到了部队，后来当了黑河军分区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李树臣，是我抗联三支队的战士，1935年参加革命，后到了苏联，1945年随苏军（当向导）来到孙吴，任苏军驻孙吴司令部联络员，后被土匪头目张鸣久杀害于孙吴小南屯。抗联干部周文喜说："1945年11月上旬，我头一次去孙吴，带一个警卫员，范政委让我先发展一个旅。我先到苏联驻孙吴卫戍司令部联

系上的，苏方上校马雅鲁问我是不是中共党员，我说不是，马雅鲁接着对我说，你只要组织起人来，枪支不成问题。当时孙吴公安局里关押很多犯人，说是抢日本的东西犯的法。我说抢日本人的东西还犯什么罪，都放了。这样，这些‘犯人’就把我围起来了。要不然部队怎么能组织得那么快，都是放出来的人。当时没有统一的军装，我命令张三包，给我们准备两万元钱，不许拿老百姓钱，收购日本子黄卡吉布军用大衣，他答应了。我们还组织发动战士、群众四处找武器弹药，不久就达到人手一支枪了。记得战士们从日伪时期的仓库里找到黄豆、豆油、大酱、食盐等，解决了部分急需的问题。动员、组织指战员练兵，他们的积极性很高，斗志也很旺盛。一次，国民党派一个马上校、一个汪上校，他们有证明，苏联和国民党有条约，苏方把我也找去了。我说，他俩接收不对呀，这是我接收的。我想把他俩的枪下下来，苏联人不让，后来苏方让我们到北安苏军司令部开证明。一个车厢，火车头拉着，走到清溪隧道时，那两个人就跑了，我朝隧道里开了几枪，就带着七八个人到北安汇报工作。桂生芳、吴飘萍、任炳麟、解明、魏扬等‘二进孙吴’时我又随同而来。一下车，到旅店，我告诉岗哨，任何人不得到店里来，我们驻部队，有个秘书，查我们店，让我们把枪下了，他没敢进。不几天，老桂就把部队组织起来了。那时我们的部队无论武器、服装都很差，大都是穷苦人出身，穿的是小棉袄，有的连棉衣都没有，破破烂烂的，系着个绳子。天气很冷，冻得不行，真苦呀！孙吴保卫战前吃得还挺好，街上抽的烟卷、大米白面有得是，有一段花的还

是日本的‘金库卷’。西大营仓库里都是日本人存放的军衣、粮食和大头菜等，随便去拿。打完仗后就不行了，就是咸菜，高粱米饭”。除抗联同志外，在当地还有一批敌伪时期被长期关押坐牢的革命同志，或在敌战区长期潜伏的革命者，也积极参加了接收政权、发动群众等工作。

当时的黑龙江省共有26个县，290余万人，我党前后3批干部到达。第一批是王钧、张光迪、陈雷等23位抗联老战士，于1945年9月初随苏军到达北安。当月，王钧组成以北安失业工人为主的保安队，后改编为保安团。11月，成立了北安军区司令部，叶长庚代司令员，王钧任副司令员，范式人任政委。北安军区建立后，组成了3个支队。一支队以绥化保安队500余人为基础组成，支队长蔡明，政委陈雷；二支队以海伦保安队200余人为基础扩建，支队长张光迪，政委徐梓；三支队以北安保安团600人为基础，支队长廖中符，政委史梓明。11月22日，祝平安率领的华中新四军一个营的建制，五六十人到达北安。为集中主力组成军区的基干团，将这一个营作为骨干，编入了三支队，组成九、十两个团。九团900人，十团500人。第二批是冀察晋根据地的干部，有王堃骋、陈大凡等19人。东北局派王堃骋、陈大凡来黑，组建嫩江地区工委会。据1949年3月16日《黑龙江根据地创建历史经验总结提纲》记载，根据东北局的决定，于1945年11月15日撤销了中国共产党嫩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简称黑龙江省工委）。11月15日，第三批派来的延安干部团195人到达北安。那时总的看来，感觉还是干部太少，大的县派七八名干部，小县

只有4名干部（有的县只派一名），任县委书记、县长，大队长和公安局长。当时确定北安、海伦、绥化为第一重点，克山、拜泉为第二重点，泰安（即依安）处于嫩江省北齐铁路交界处，为另一重点（后被国民党封为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军长的尚其悦占据）。从工作步骤上说，根据实际情况，总的是先南后北，首先掌握北安地区，然后再控制黑河（包括孙吴县）。

国民党蒋介石看到我抗日联军、八路军、新四军先期动作，便迫不急待地搜罗日伪残余势力与我争夺地盘，许多伪满警察、特务、土匪、叛徒都得到国民党的委任状，他们摇身一变，当上了维持会长，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军队的司令官等要职，成为国民党的“先遣军”。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派遣了许多“中统”、“军统”特工人员，到处建立区、组、站等活动网点，散布谣言，组织暴动，策划暗杀，纵火抢劫，制造混乱，破坏社会治安。一些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不很了解，普遍存在着国民党是合法政府的“正统观念”。加之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有约：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之公务之全权，苏军必须将收复的地方转交给国民党政府。因而，苏军对我党我军的活动提出种种限制。在我党派干部刚进入孙吴时，苏军提出，一是现今孙吴镇内解放路以西为居民生活区，以东为军管禁严区，未经苏军批准不得入内，也不准随便进山，否则以日特严惩；二是中共武装不得在城区活动（起初建立的自治军营部及主要兵力驻扎在北孙吴）；三是中共方面的部队不得取用日伪遗留物资等限制条件，等待蒋介石的正规部队来

接收地盘。

这时，混在维持会内曾任伪满孙吴县公署税捐局科长的康崇刚（沈阳人，南满中学生），出于反动本性，看到当时东北的政治形势，为寻找靠山投奔新主子，于1945年10月间带着胞弟康崇义（伪大学生）和其心腹陈朋飞（伪孙吴县公署职员）赴齐齐哈尔与国民党黑龙江省党务专员罗大雨（又名罗庆春）取得联系，加入了国民党，并得到了“黑龙江省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军长”尚其悦的赏识，尚任命康崇刚为“国民党孙吴县书记长”并给以建党建军的指示。康崇刚从齐齐哈尔回到孙吴后，便到处搜罗发展党徒。他首先纠合当地伪官吏、绅士、商人（大部分是维持会的），以“国民政府即将北上接收，命我在孙吴成立县党部……”为幌子，勾结拉拢胡芷山（旧公安局司法股长）、康士亨（伪金融合作社会计）、关奎德（伪孙吴县公署督学官）、梁守经（伪满职员）、董凤岩（伪满商会会计）、崔福春（商人）、张哀书(商人)、曲永仁（伪满县公署建设局股长）、罗骥良（伪职员）、蔡某、孟庆孚（教员）、张文誉（伪满县公署民生股长）、孙文轩（商人）、吴德民（伪银行职员）、周世英（伪银行职员）、王立仁（伪县公署翻译）、陈耀洲（伪兴农合作社庶务）、陈鹏飞（伪县公署职员）等人加入国民党。1945年11月12日，康崇刚召集党徒在孙吴街旭东商店召开第一次国民党员大会，正式成立国民党孙吴县党部。会上首先由康崇刚讲话：“我奉尚军长的命令，我为孙吴县党部书记长，要把党国交给我们的任务担当起来，以便国民政府来此接收。”会议选出了执

行委员4人，吴德民为组织委员，关奎德为宣传委员，梁守经为教育委员，董凤岩为商工委员。下设干事3人，崔富春为保卫干事，张哀书（会俄语）为联络干事，康士亨为武装干事。派李万国、李万巨兄弟俩回曾家堡成立国民党支部，由李万国任支部书记长。

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中共黑龙江省工委为了“按钉子”“站住脚”，开辟龙江根据地的“战略支点”，先后派来李银全、吴飘萍、牟海波为首的第三批党、政、军干部“三进孙吴”，创建革命根据地。1945年11月，中共孙吴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同年12月7日，建立孙吴县民主政府。县工委于1946年9月改称中共孙吴县委。县委书记同时任地方部队政委，实行党政军统一领导体制。为了保密，在部队挂职的地方干部对外称部队职务。

1945年11月，省工委负责人王坤骋、陈大凡委派王肃、王文彬、李银全、刘挺进、何学东等5名晋察冀老区干部先行赴黑河地区开辟工作。途经孙吴时，王肃决定李银全留在孙吴开辟工作，接收旧政权并任县长兼公安局长。李银全是上级地方党委派孙吴工作的第一名中共党员。刚下火车，面对着陌生的一切，李银全首先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要尽可能地依靠进步力量。因此他便主动与苏联红军驻孙吴司令部取得联系，苏军司令官看到省里给李银全县长的任命书后，便亲切地与李银全握手，并热情地说：“你是县长，接收维持会可以，马上送你去，但是军队到乡下去了，因为我国同国民党政府订了条约，这样做不合法。”李银全听后笑着说：“建立自治军维持社会治安可以吗？”司令官说：“少量可以。”李银全心里

想：你准许我搞武装，数量你是控制不住的。李银全刚一出苏军司令部门口就被一位身材不高，但很粗壮的翻译紧紧拽住。李银全一惊，仔细打量，然后摘下他的帽子，摸一下他头顶深深的疤痕，二人就紧紧抱在一起。原来李银全在北安听王钧介绍情况时，李树臣头顶的疤痕是同日军夜战时被日本鬼子战刀砍后留下的刀疤。此时此刻，两位战友相逢，真是无比喜悦。李树臣说："我到孙吴后，副司令员王钧同志给我来过信，要求我尽快建立武装，这儿街面乱，张鸣久还要求咱上边派干部呢。这几天我首先建立了一个班的队伍，一会儿全交给你，武器不够，我去联系，由苏军司令部拿出一部分。"然后两人回屋，详细研究了接收孙吴的具体办法。竖日，李银全身穿一件日本军大衣，两边的口袋里各装了一支手枪，身后跟着全副武装的一个班，在一个苏军少校和李树臣的陪同下接收了维持会，关押了匪首康崇刚。李银全在接收讲话中首先宣讲共产党的政策，然后号召全体人员跟共产党走，为建立人民政权贡献力量。接着代表省委省政府宣布：李银全任孙吴县人民政府县长，并任命李树臣为公安局长，原维持会公安局长辛元福任副局长。原维持会撤销，会长、副会长任政府参议。1945年11月建立孙吴县人民政府自治军即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李银全任大队长，李树臣任政委，原讨伐队张鸣久任二排排长……　李银全住孙吴维持会（今孙吴镇中央大街100号）。为了争取群众，掌握第一手情况，李银全早出晚归，走学校，访劳工，发动革命力量。深入到劳工和闲杂人集居的旅店发动群众与土匪和反动势力作

斗争，教师生唱《保卫黄河》等革命歌曲。他到处奔走，频频与各界接触。召开社会各界人士会议，向大家宣讲“共产党、八路军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和党领导民族抗日斗争的历史。

正值政权初建，革命事业始兴之际，国民党反动势力极其恐慌，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国民党党徒辛元福、张鸣久指示3名匪徒将康崇刚从狱中放出。康匪逃跑后，便与人民为敌，阴谋策反，夺我政权，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看到共产党派人来接收政权如此之快，预感大事不妙，遂召开国民党孙吴县党部会议，阴谋筹划如何对付共产党和新生的民主政权。先是指使潜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国民党女党徒妓女出身的邵琥丽以金钱收买、色相勾引，遭到李银全的怒斥。于是，康匪主张用暗杀手段。一个寂静的晚上，李银全正在灯下办公，忽听院内枪声和警卫的喊声，他急忙携枪出屋，见警卫员小李受伤倒在血泊里。黑暗中，一匪徒正欲逃走，李银全喝令其站住，匪徒回手一枪，然后沿街狂奔，李银全甩手一枪将其击毙。待他搀扶警卫员欲回屋时，只见屋内火光熊熊，原来另一名匪徒乘机从后窗扔进屋里一枚燃烧弹，企图将李银全烧死在屋内。1945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敌人又利用李县长急于招兵的心理，由原维持会公安局长辛元福和司法股长胡芷山按事先设下的圈套向李银全假意献计说：“祝家店住有一帮年轻力壮的劳工，可招来当兵，要李县长亲自动员。”李银全便和警卫员一起去祝家店，当行至离此店不远的向荣医院门前十字路口（今孙吴镇农贸市场）时，突然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打中了李银全的头部。孙吴著名医生赵镛大和护士管凤彤闻讯立即前去抢救，由于伤势太重，医治无效，李银全县长不幸牺牲，年仅23岁。夙愿尚未实现，工作仅十余日，便血染孙吴大地，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事业。

1945年11月中旬，黑龙江省工委为实施“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加强孙吴战略支点的力量和迅速扩大武装，省工委选派延安赴东北干部团的干部吴飘萍、牟海波、魏扬等 “二进孙吴”，吴飘萍任县工委书记，牟海波任县工委副书记，魏扬任公安局长，再度开辟孙吴根据地。11月下旬，受省政府主席陈大凡委派，任炳麟、桂生芳、杨国斌、田玉富、周文喜、白风歧、解明、周德林、张洪洵等30余名干部战士奔赴孙吴。经过调查研究，周密计划，解除地方维持会，接收公安局，改编了讨伐队。他们克服局面混乱，我党势力弱，经费短缺等困难，始终把“掌握情况，发动群众，扩大党的政策影响，建立人民武装”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派到孙吴的全体干部，遵照党的指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与他们促膝谈心，向他们宣传革命理论、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敌伪人员、地主与土匪勾结妄图继续压迫人民的阴谋，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动员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在这一基础上，开展了招兵工作，设了招兵处，从本县出身贫苦的城乡青年中，从为日本关东军修建军事工程的外地劳工中招收了150多人，加上原维持会讨伐队的70多人，总共200多人，组建成东北人民自治军——黑龙江军区第四大队，成立了第四大队司令部，吴飘萍兼政委，桂生芳任司令员。司令部设

在火车站西边的一条南北街的道内，即伪满商会旧址（今中央大街北侧）。下设独立营，营长田玉富，教导员杨国斌（后调往黑河），营部设在北孙吴。独立营下辖四个连，一连长周文喜，副连长周德林。三连长兼指导员解明（又称谢明）。此时，二连长张鸣久已被国民党秘密封为康旅十九团团长。1945年11月27日，在负责孙吴县工委组织工作的刘今生抵达孙吴的当天，张在孙吴街便宜坊(饭店)蓄意制造事端，枪杀一连副连长周德林后公开叛变进山为匪。二连多是家礼教徒，成份严重不纯，又因新接收的公安局没有武装，经过孙吴县人民政府党组织研究后，交给县公安局为保安队。第四连没有人，是个空架子。故独立营只实辖两个连，130余人，有长短枪30多支。从此孙吴才算有了自己的武装，这样人民政府就可以公开组建了。1945年12月7日，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正式宣布孙吴县人民政府成立，宣布任炳麟为县长，挂起了孙吴县政府的牌子，地点为原维持会驻地。任炳麟在政府门前讲了话，主要是宣传人民民主政府的政策。据桂生芳讲："这样，我们就有了行政权，可以发布告了，调皮的就用行政手段去敲他。这也是我们同苏军卫戍司令部谈判才获准的，他们的苏联翻译很好，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的旅长才同意了。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工作了。"接下来即取消原维持会，对县政府机构进行重组，下设公安局、民政科、购粮科、农林科和文教科等5个办事机构。科下设股及科员，并委任新职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如医院、银行等。这些机构中除公安局长魏杨是我党干部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启用的旧职人员，成分比较复杂。这期间，大部分

同志都到农村、工厂去做群众工作，启发群众觉悟，扩大革命武装。与此同时，新政府发出布告：凡制造谣言、聚众放赌、贩卖吸食毒品、投机倒把以及利用迷信、“会道门”等名义进行非法活动者，必须治理和纠正，违者从严惩处；凡地主分子恶霸富农杀死百姓者，必须偿命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以慰籍死者家属；凡贫雇农的牲口、烧柴、房屋、家什农具等一切生产生活资料被侵占，必需按市价全部赔偿并受法律制裁。孙吴街内一般商号、摊床小贩迅速开业。经营妓馆业者一律废止，其所有妓女均予解放，恢复自由，任其谋生或嫁人。并附以保护公共财物，禁止出卖公产，减租减息，改造税收，清理卫生，防火防盗等条文，令各部清理以往公务，开班组长会议，宣传新政府政策，组织筹集自治军所需物资。几天里，为部队解决毯子700多条，大衣数十件，棉鞋若干双。修筑了小学校舍，并帮助苏联红军解决所用劳工及物资。公安局方面加强了夜间警戒，进行了户口调查，又增添30名警士，查出鸦片数百包（约值300余万元），加以没收。对坏人予以逮捕，如原公安局秘书李景华等有特务活动，不满我军接收而被撤职逮捕。并着手制定新的工作措施。同时与友军的苏军司令部保持密切的联系，重要工作都征得他们的意见，但因没有好的翻译，有些问题仍不能互相通达。1945年12月上旬，由逊河县来了两个人，要求我方给派个县长。孙吴县工委领导经商量后，从自治军独立营抽调顾延龄等18名干部战士，去逊河街（今逊克县逊河镇）接收政权。顾延龄为逊河县长。

正当县政府忙于开展各项工作的紧张时刻，敌人却在

暗地里召开秘密会议，组织反动武装，和隐藏在各级组织里的坏人，与外县的反动武装相勾结准备进攻孙吴，妄图消灭人民自治军，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死在摇篮中。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此时，东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十三军、五十二军在美国的帮助下，先后在秦皇岛登陆，并向山海关猛烈进攻。国民党军陆续从秦皇岛登陆加强了进攻东北的兵力，这时苏方又向我党提出：长春之各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介石政府，有红军之处不准我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并要我党交出在东北已接收的政权。随后，黑龙江省各地相继发生了反革命政变。

康崇刚为了和我党夺取政权，妄想在国民党军队打到孙吴时取而代之，他急于“建军”并发展反动武装力量。1945年11月下旬，康与国民党孙吴县党部执行委员董凤岩赴齐齐哈尔，找到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军长尚其悦，请示正式成立反动武装并汇报了夺取政权的阴谋，当即得到尚其悦的批准，尚指令“以党建军”即组建武装，收编康崇刚已在孙吴网罗的匪徒组建为国民党东北挺进军混成第六旅，委任康崇刚为少将旅长。康崇刚得到委任状和指示之后，便和国民党黑龙江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的蔡某回到孙吴，具体策划成立六旅和武装进攻孙吴的阴谋。由于我党干部吴飘萍、任炳麟、桂生芳、田玉富、刘今生、魏扬等已在孙吴组织成立了人民政府和人民自治军，加上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不允许这伙匪徒在城内活动，康的匪窝便迁至曾家堡，加紧策划和组建土匪武装。康崇刚坐镇曾家堡，派国民党专员到三站、四站（均为地名）和叛徒张鸣

久联络，派董风岩赴逊河县与金焕章（日伪警尉）勾连，经过收编收买、封官许愿和利用封建会道门以及裙带关系，一支接受国民党领导、专和我党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治土匪武装—国民党东北挺进军混成六旅在孙吴编成，下属3个团（十八、十九和二十团）和1个独立营。建旅初期，总人数约为600余人。

挺匪十八团以曾家堡的地主、伪满孙吴县兴农合作社股长李万国为团长，以曾家堡为窝点，利用孙吴县刚解放，人民对共产党不了解，对国民党持“正统观念”，以建立自卫团，保卫曾家堡的名义采取封官许愿强征搜罗等手段，并利用家族观念，欺骗不明真相的农民入伙为匪，在腰屯各村屯拉起270余人的挺匪队伍。

挺匪十九团是以张鸣久的讨伐队为基础，乘乱世之际，网罗家礼教徒11人，后发展到70余人，拣了日伪遗弃的枪支，在孙吴县腰岭河、南河林场一带明火执仗，打家劫舍，当起“胡子”。孙吴县维持会建立公安局时，张鸣久被收降为讨伐队当队长。同年12月我党接收孙吴时，将原讨伐队改编为县独立营第二连，张鸣久任连长，不久率队叛变。1945年11月27日下午，张鸣久借口为部下办喜事，在便宜坊饭店大摆酒席。当时，我自治军田玉富营长和副连长周德林从北孙吴营部赶到街里办事，在便宜坊和张鸣久相遇。张鸣久借口田营长和周德林干涉他们吃喝，向周开枪，子弹从周的眼睛穿过后脑，当场牺牲，并下了田营长的手枪。两名执勤苏联红军听到枪声赶到，进屋相劝，保护田营长离开。随后，张鸣久率其部下，坐上事先准备好的马爬犁，一声长笛为号，向清溪逃窜而去。张鸣

久叛变时，他手下的73人大部同时尾随，余下的也三三两两四散而去，自治军第二连随之瓦解。张鸣久叛变后，康崇刚指使董凤岩凑了四五千伪币送往清溪山中，给张匪用作活动经费，继而张鸣久又窜回西南屯，以该屯为窝点，网罗该屯家礼教徒李云鹤，拉入十九团编为二营。到1945年12月中旬，挺匪十九团已扩充到200余人。

挺匪二十团是以逊河为根据地，团长金焕章原系逊河县维持会所辖公安局局长，由康崇刚和李万国拉拢加入挺匪。该团起初约有180余人。金焕章被俘后，由张景云、刘光才先后继任二十团团长。

旅部独立营，多数是被欺骗的鄂伦春族人，营长是莫东升，实际只有一个连的兵力。

孙吴县委的扩军工作并没有因为张鸣久的叛变而停止，城内的新兵入伍处仍然继续招兵，由周文喜负责。同时，派解明、刘今生到各村扩大部队并建立村政权，收集民间的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一时间，自治军独立营、公安局及周边分局、村自卫团等发展到500余人。

1945年12月14日，国民党孙吴县党部、匪混成第六旅康崇刚等秘谋发动孙吴街事变，匪部各团接到康匪的命令后立即着手行动。匪十八团团长李万国令其胞弟李万巨（团参谋长）到东兴屯和吴家堡一带纠合匪徒；令其副团长凌振春率匪徒攻打我驻北孙吴的自治军营部；令赵振刚率匪徒星夜攻打我驻韩家店营房的自治军三连。孙吴自治军三连连长兼指导员解明等27名新战士，由于没及时得到消息，又缺少武器，只有3支枪（部分有武器的战士随顾延龄去了逊河），抵抗力极弱，又无防备，措手不及，被

挺匪十八团200余人包围逮捕，武器和被服都被抢去，于17日凌晨土匪临进孙吴之前在曾家堡韩家店被匪十八团全部杀害。北孙吴营部的20余名徒手兵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只有教导员刘今生等几人幸免于难。驻逊河的匪二十团金焕章部，在董凤岩的指使下，于15日夜袭了驻逊河的顾延龄县长的住宅，顾县长等18名同志全部被杀害于逊河岸边。而后匪二十团在张锡爵、关凌玉的带领下，乘马爬犁赶到孙吴曾家堡集结。匪十九团在张鸣久带领下，于16日晨从瑷珲县的二站出发，当天下午赶到孙吴城郊西南屯集结。16日傍晚，中共党员原抗联排长、苏联红军进攻孙吴的向导兼苏军驻孙吴司令部翻译李树臣（绰号“李小个子”），被19团匪徒暗害于孙吴西南屯。当时驻苏军司令部有2名中国人，一名为李树臣。另一名叫李文德，原在东北军供职，做过抗日工作，但此人仇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暗中与张鸣久勾结。为了配合挺匪进攻孙吴破坏我军与苏军司令部的联系，李文德和西南屯土匪骨干分子载耀先、孙见启、石新玉设毒计加害李树臣。16日清晨，李文德假意邀李树臣去西南屯视察自卫团组建情况，把其骗至载耀先家的后道上，突然用手枪逼住李树臣，早已埋伏好的敌人蜂拥而出，石新玉下了李树臣的枪，载耀先扒下李的大衣，然后把他押到该屯刘振龙家的地窖里。当日晚李文德把李树臣从地窖押出，挺匪载耀先从背后开枪，李树臣当即牺牲。一时间孙吴上空阴云密布，所有匪徒蠢蠢欲动，待机进攻。

12月16日上午，县长任炳麟接到公安局新任秘书李树

仁（原维持会公安局副局长）的报告：张鸣久匪部定于晚5点进攻孙吴，口令规定为“延安”，“胡子”在城里还有内线，并指明了其中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接着，陆续又得到消息，说二站方向的敌人正向孙吴进发。铁路上的同志报告，清溪自卫团及公安分局被拉出去投靠了敌人。牡丹江分局的头目扬言不准人们参加自治军，并囚禁了袁连长。原以为公安局新增加的30几名警士是比较可靠的，几次派人去找他们，均被杀害。还有一些我方收编的自卫团也都被敌人收买为反动武装。我方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西南屯有情况。吴飘萍政委、桂生芳司令员和公安局长魏杨在掌握基本情况之后，立刻来到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向苏军提供了挺匪将要进攻孙吴的情况，提请苏军注意和提供必要的援助。16日下午6时许，挺匪张鸣久自恃力量强大，不等匪首康崇刚下令，率全团兵力抢先从西南屯出发开始进攻。敌人也是乌合之众，他们以为一打一哄我方也就完了。进攻时，敌人不敢冲。我方在司令部门前的工事里，张洪洵身边一圈摆的都是手雷，在工事里跑着打，这边放几枪那边扔几个手雷。一时间我方在窗子、围墙、房顶上、工事里同时射击猛打，弄得敌人搞不清楚我方到底有多少人。张匪率200余人，兵分两路：一路由张鸣久亲自带领，进攻我自治军司令部；一路由李云鹤和胡芷山带领进攻我公安局。张匪在进攻我自治军司令部时，遇到我自治军一营指战员的顽强抵抗，我司令部、县政府和新兵入伍处构成了交叉火力，与张匪展开激烈的巷战，扼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当时，在南孙吴自治军司令部和县政府，两处有我军指战员80人左右，其中包括司

令部和县政府的20多名同志，自治军一连的30多人，以及营部和三连来的22人。在武器装备上，所有长短枪不过30余支，一件重武器也没有。全体指战员除吴飘萍、桂生芳等少数人有战斗经验以外，有些战士根本就没参加过战斗，好一点的还能打枪，有的甚至连手榴弹都不会用，拿到手里直接就扔了出去。但是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全体指战员表现出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顽强地阻击4倍于我的敌人。战斗中，我自治军司令部的电话与苏联红军的电话始终通着。近两个小时，苏方司令官只说情况他们都知道了，说是已发电报，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这个消息虽然给我方战士很大鼓舞，但他们心里还是没有底，不知道苏联援军什么时间才能到。时隔不久，我司令部与北孙吴的电话被切断，司令部与招兵处的联系终断，只好各自为战，坚守待援。张匪一时未能得手，遂又改变计划，先于李云鹤进攻我公安局，在隐藏于我公安局的“挺匪”辛元福（孙吴保卫战之后被我处决）的里应外合下，占领了公安局，公安局长魏扬迅速撤到了苏军司令部。这伙匪徒首先打开监狱，放走被我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砸开金库，抢走我自治军收缴的财物，公安局李秘书被俘，“挺匪”内线的辛元福仍留在公安局。张鸣久攻占公安局得手后，集中全团兵力进攻我自治军司令部，一时枪声大作，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战斗十分激烈，彻夜未停。此时，周文喜身负重伤，我方指战员已作了最坏的准备，把带的文件全都烧掉了，准备作最后的决战。在敌强我弱的危急时刻，我军指战员在桂生芳司令员、吴飘萍政委、田玉富营长的指挥下，英勇顽强，沉着应战，始终坚

守着阵地，敌人的阴谋一直未能得逞。

挺匪在进攻我军司令部时，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也受到了敌人的火力威胁，苏军司令部的20余人对土匪予以还击。第二天拂晓，敌人的另外两个团也到了，号称2 000多人。17日晨7时左右，正当挺匪十八团、二十团从东部刚要进攻孙吴街时，苏方从黑河开来了20余辆汽车，拉着派来增援的五六百名官兵终于赶到，其中还有几台汽车拉着“卡秋沙”大炮，未等下车即投入战斗。苏军用机枪、轮式冲锋枪一阵扫射，打死很多土匪，遍地是乱跑的马（土匪是俩马一张爬犁，足有800余匹马），这样就把敌人击溃了。匪十八团、二十团见状，自感不妙，仓惶向逊河方向逃窜。在此之前，李云鹤见拿不下孙吴街，率匪部单独溜走；胡芷山、祝耀清也慌忙逃回西南屯。匪十九团张鸣久部，被苏军消灭一部分，余下的10余人被苏军包围在一处房框子里，匪徒一看没办法，就出来装做诈降，打着国民党的旗子，说他们是接收大员，在苏军面前集合起来。苏军当时很大意，看到他们拿着枪、打着旗，怎么会是接收大员呢？待苏军副旅长等在银行门前刚下台阶时，土匪抬枪就打，打伤了苏军的副旅长，并打死几十个士兵，逃跑了。那时孙吴火车站附近都是被火烧的没有门窗和屋顶的破房框子，土匪从这个门窜到那个房溜掉了。17日8时左右，战斗结束。因苏军死伤了四五十人，苏军急了，甚至要调动“卡秋莎”师团（“卡秋莎”师团是苏联战场作战最优秀的部队，被称为“炮兵之神”），清洗我当地的村庄。后经交涉，苏军还是听从了我方的意见，没乱动干戈。过后，为打

击跑到山里的残匪，我方出了一批人，苏军参加一批人，共同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剿匪。

我军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粉碎了国民党挺匪的阴谋，胜利地保卫了刚刚建立的孙吴新政权。这次战斗，毙敌60余人，俘虏100余人。自治军牺牲40余人，伤10余人。

孙吴保卫战，是孙吴县工委开辟孙吴根据地中第一次敌我之间殊死的军事较量，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粉碎了10倍于己之敌有计划、有预谋的进攻，保卫了新生政权，锻炼、考验了孙吴人民自治军，为此后建立并巩固新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保卫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孙吴四周匪军众多，省里机动部队暂时无暇顾及，孙吴的局势仍十分严重。

1945年12月下旬，黑龙江军区主力部队攻打土匪尚其悦巢穴泰安，省工委派军区三大队十团政委吴沛专程来孙吴，指导孙吴县工委县政府及所属部队撤至北安集结待命。吴飘萍政委、任炳麟县长安排后续工作，公安局长魏杨、政委吴沛等抓紧审讯在押犯人，并由田玉富营长执行了一批土匪及罪犯。迫于当时的形势，1946年1月12日，孙吴县工委县政府及所属自治军独立营奉命回守北安。随即，干部战士近200人携武器、弹药及部分被我方俘虏的敌人，乘火车向北安进发。当火车行至100余里的小兴安火车站时，由于苏军撤退时把桥炸毁了，火车无法继续行驶，只好派人和上级取得联系，从北安重新发来火车接应，大家一齐动手把弹药搬到接应的列车上，中途耽误了二三天时间。回到北安，所属部队经休整后编入黑龙江军

区警备三旅九团、十团。至后，孙吴县再一次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地方维持会又得以恢复，公安局临时由张文誉代理局长。

抗战胜利后，单从孙吴县来看，我党在捣毁伪政权和挺匪争夺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也力争抢前一步。但刚开始派入的干部人数太少，工作开展难度极大。到1945年11月底，尽管在扩军中按上级“要能掌握”的要求，但由于群众基础较差，坏人还是混进不少。在刚刚建立革命政权之时，还来不及对内做全面了解和进行改造，有的组织虽然换了领导人，下面还是原班人马，一些坏分子隐匿下来，危害很大。然而在动荡、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我党派来干部，不顾生命危险，抢时机建政权，秘密吸收新党员，发展武装力量，冲破了敌伪长期的欺骗宣传，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还很不了解，同时受反动势力极力破坏，这一时期工作的开展极其艰难。但是我们党有了武装，就能肃清胡匪，抵御国民党的进攻，保卫根据地建设。

1945年12月29日，“泰安战役”胜利，到1946年初黑龙江省中西部局势趋于平稳。龙江根据地战略重点迅速向北推进，主力部队相继北上，“战略支点”的黑河、孙吴转变为“战略基点”。1946年2月，黑龙江省工委选派牟海波、赵天野、王树棠、魏扬、田玉富等18名同志“三进孙吴”，恢复和巩固人民政权。1946年2月18日，这18名同志穿山林、走小道来到孙吴。他们当中，除了魏杨、田玉富是重返孙吴外，其余都是新来的干部。

省委为配合当时的工作，从省军区警备三旅九团抽出两个营的兵力随后跟进孙吴。三旅九团进驻孙吴后，首先打击附近的小股匪徒，保护了县委安全，帮助县委发动群众，保证了县委迅速开展工作，从此站稳了脚根。首先，恢复了孙吴县工委，牟海波任县委书记兼保安大队政委；王树棠任组织部长兼保安大队政治处主任。恢复了孙吴县民主政府，赵天野任县长兼孙吴完小校长。省军区警备三旅九团来的这两个营是主力部队，他们根据形势的发展随时都有开拔的可能，要想保卫和巩固地方政权，还要迅速组建地方武装。于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动员了100多人，组建了孙吴县保安大队，由田玉富任大队长，公安局长魏扬兼任副大队长，实有一个连的兵力，以保证县人民政府正常工作。我军撤回北安时成立的维持会公安局，在我军到来时由局长张文誉率领投匪，原公安局瓦解。1946年2月魏扬任公安局长后，清理了公安局内部大部分旧职人员，重新设立机构，安置新干警。1946年4月，成立城防司令部，司令员桂生芳，副司令员魏扬，政委牟海波，政治部主任王树棠。城防司令部下设纠察队，社会治安工作由保安大队移交城防司令部管理，具体工作由纠察队负责。魏杨任孙吴县公安局局长兼孙吴城防司令部副司令，田玉富仍任孙吴县保安大队队长。队伍组建之后，发动战士四处寻找武器弹药，不久就达到人手一枪。发动战士从日伪时期的仓库里找到黄豆、豆油、大酱、食盐等，解决了部分急需的生活问题。动员、组织指战员练兵，战士们的积极性很高，斗志也很旺盛。为稳定治安状况，颁发了县保安大队布告：1. 全县以本队之鸣笛为标准时间，每日

早午晚鸣笛3次，正午12时对表，晚6时开始戒严。在戒严期内，除公事外，无论军民人等绝对禁止通行。2.外乡来的车辆，一定要住店，民户绝对禁止留宿。3.外乡来人，除至亲可以留宿（但必须报告），其他朋友以及近况不甚了解之亲戚等一律不准客留，必须住店。

1946年3月2日，黑龙江省警备三旅、孙吴县人民政府和孙吴县保安大队为收集散落于民间的枪支，联合发布布告，布告中说：为布告事，查我军自进入孙吴境内，即着手收集流落于民间的枪支弹药及军用品，其目的在于避免使武器落于匪手，扰乱社会治安，此后，为肃清孙吴境内的土匪……必须将留落于民间的枪支、弹药及军用品收回，以断绝土匪枪弹物资的来源。这一联合行动，对散落民间的枪支弹药、武器装备进行一次大收缴。后又明文规定，凡少数地主富农和其他分子私藏枪支弹药等武器者，按时上缴当地政府，不得损坏。自动交出的赏，搜出者罚。如有抗拒不交企图继续隐藏者，一经查出，以反革命论罪。此间共出赏金近百万元(东北券)，收缴各种枪械1 000余支，弹药10 000多发，还有大量军火和武器装备，断绝了土匪枪支弹药的来源，对我军装备是一次大补给。此时，县工委遵照黑河地工委指示，牟海波带几名同志到清溪住了十来天，在那儿组建了清溪武装自卫队(洋枪队)，生产队中的积极分子当队长，有家有业老实农民均可参加，站岗放哨查路条，一边搞生产，一边保卫村屯。对这个自卫队的情况还专门有个通讯，登在西满分局的党刊上。随即以此为样板，号召全县在各村屯建自卫队，保村庄，促生产，同时与县里的地方武装公安部门相呼应，遏

制匪患。自三旅九团来了以后，孙吴才真正打开了根据地的新局面，土匪不再敢骚扰孙吴街了。从此，孙吴不但是北通南联的交通要道，而且也是联络工作的指挥中心。

为剿匪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黑龙江省警备三旅于1945年底在北安组建了炮兵大队。组建前，旅长廖中符曾向东北军区炮兵司令部朱瑞司令员汇报了黑河地区的形势，组建炮兵部队的有利条件，得到上级重视和有力支持。当时组建炮兵大队只有一个连的建制，启用的连长是一位在旧军队中当过炮兵的李某，仅有4门小钢炮，隶属警备三旅九团建制，炮和炮弹是从日军武器库中找来的，由于战士尚未进行过正规训练，火炮还发挥不了威力。在攻打泰安战斗中，因炮弹头没有引信（当时不懂）发射出去打不响。1946年2月，三旅九团进驻孙吴县后，由上级派来7名同志，以曾在延安炮校受过专门训练的吴某、杨天祥2人为骨干负责炮兵工作，发动群众在孙吴一带山里收集日军遗弃的火炮器材、炮弹等，经过整修组装，修复了7门大炮（其中有4门加农炮）。从而，使炮兵装备得到加强，编制也由一个连发展到三个连（比当时营的编制要大一些）。炮兵装备的充实，增强了整个部队的战斗力，每门炮是用八匹马拉着行军。后来，在我军在攻打老西窝棚、桦树林子等战斗中发挥了威力，在进攻逊河顽匪刘山东战斗中也起到很大作用。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省警备三旅炮兵大队接受上级命令，于1946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孙吴火车站前检阅后，调往东北军区炮兵总部开赴前线，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

1946年5月，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钧带领警备二旅张光

迪的部队来孙吴剿匪，打完大桦树林子、老西地窝堡之后，九团调回北安，由十团接替，三旅旅长廖中符率领，进行了一段时间艰苦的战斗。在当时，主要是由省军区的部队来完成剿匪任务，地方上是配合部队剿匪。待洪学智率新四军三师所部一到，令土匪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在县城周围再也不敢有大的举动。

新政权日益巩固。孙吴县建立的地方武装和党政领导机关，在稳定政治局势、安定社会秩序、支持各区村打开工作局面、消灭匪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实践中使孙吴县党政军干部认识到，只有紧紧抓住建立政权，发展自己的武装，团结教育群众，才能壮大自己，打击敌人，顶住压力，共度难关，使孙吴根据地一步步地稳固起来。

二、消除匪患，进一步巩固根据地

（一）土匪猖獗，根据地建设严重受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争夺东北，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往东北运兵，同时派遣大批接收大员进入东北各地，网罗伪军、警、宪、特及地方土匪，建立反动武装。一时间，所谓“地下军”、“抗战胜利军”、“先遣军”、“挺进军”“忠义救国军”、“民众救国军”纷纷出笼。当时，黑河区域上起漠河下至佛山土匪遍地，其中较大股的有：呼玛的张伯钧、赵子民；瑷珲的杨青山、李云鹤、老靠山、苏海山、贺景山；孙吴的张鸣久、康崇刚、李万国、李万聚；逊克的刘山东、张景云、李亚洲、关作舟、曾桂山、莫东升等，除这伙国民党委任的政治土匪外，还

有“黑虎”、“草上飞”、“逢山好”、“长顺”、“访友”、“群臣”、“双山”和“四季好”等十多股“绺子”（报号的经济土匪）。这些土匪有的是被我打散的挺进军和抗战胜利军残匪，也有自然纠合的乌合之众。这些反动的土匪武装，尤其是出于同蒋介石集团共同的阶级利益，在加官进爵的诱惑下，纷纷接受国民党的改编，一张委任状便成了他们向共产党进攻的令箭。这时的土匪武装，已不是历史意义上打家劫舍的土匪了，而是完全带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由分散状态聚集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给我党根据地建设带来极大的威胁。被国民党收编后的土匪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因为土匪头目大多数都是由伪、军、警、宪、特和反动地主充任，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相一致，加之他们又都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受其指挥，自然要为国民党效力。所以，他们出于反动的阶级本质和所处的地位，必然要反对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和民主改革的主张，与共产党为敌，千方百计破坏党的根据地建设，妄图配合国民党的正规军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势力。这些土匪多系土生土长，有着广泛的关系网，有的土匪是几代惯匪，有的土匪匪首在日伪时期就担任一定要职，他们同地方恶霸和反动地主及社会各层有密切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实力。三是具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和活动经验。大地主在历史上就有养家护院的传统。日本投降后，丢弃武器很多，为土匪加强武器装备提供了条件。另外，一些惯匪凭借多年为匪的经验，在深山密林建

立了匪窝，囤集粮食，选择熟悉的地域进行活动，并建立起灵活的情报网；同时，利用封建迷信和组织帮会等办法，进行内部统治，因此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所以，当时土匪的活动很猖獗，给后方建设造成严重危胁。其危害主要是：①破坏交通，占据城镇四周要害，阻止我党对根据地的接收。如孙吴县剿匪部队进驻之前，广大村屯几乎被骚扰或占据，破坏桥梁，设卡切断与外界的交通，阻止我党干部和部队进入。刚刚从日伪铁蹄下解放的孙吴大众，又重新受到国民党和反动土匪武装的残酷欺压。②发动武装暴动和叛乱事件，破坏我军初期的建军工作。我党开辟孙吴根据地建立地方武装之时，他们利用这一机会，派遣特务反动分子深入我武装部队，采取“先八路，后中央”的手段，进行破坏活动，一遇时机，便发动武装叛变。比如，孙吴地方自治军中由于成份复杂，曾有200余人叛变投敌。建政初期，这些土匪活动非常频繁，具有很大势力。③袭击我党控制的县城，杀害我干部，破坏我政权建设。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土匪相互勾结，采取偷袭、围攻的办法，组织武装力量攻击我地方政府，采用派遣特务和收买动摇分子的手段，暗杀我党政军领导干部。比如在土匪攻打孙吴街之前，我政府几次请公安局副局长辛元福商讨工作，他百般推脱，反而盗用苏军司令部名义两次将桂生芳同志骗出公安局，企图施以阴谋手段未逞。④骚扰威胁人民群众，破坏我党发动群众和各项民主改革工作。解放后，孙吴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流窜作乱，百姓的衣物、粮食、马匹、饲草被抢，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敌伪遗留的残渣余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组织土匪烧

杀抢掠，明火执仗，打家劫舍，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据史料记载，北孙吴当时有个叫刘继洲的百姓，对我自治军贴近，将一把小手枪给了田队长，后来被土匪得知将其杀害。那时在孙吴财粮局一个叫李静的，家住大河口西侧的平顶村，她说她的父亲曾将自己拣的一支日式小手枪给了一个姓周的老八路，因此以通共罪被土匪杀害。

土匪武装虽然接受了国民党的收编加委，但丝毫也没有改变其搜刮财富、鱼肉人民的本性，他们仍旧敲诈勒索、巧取豪夺、独霸一方，群众恨之入骨，称之为“讨伐队”、“害人团”。老百姓在精神、心理上，特别是对土匪暴虐行为具有历史遗留的恐惧感，加之他们长年深居穷乡僻壤，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不甚了解，同时受所谓正统观念影响，盲目盼“中央”，对共产党怀疑观望。所以在土匪的威胁骚扰下，不敢与我党接近，这样就对发动群众和初级的民主改革，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土匪起初有一定的控制区，大肆宣传反动言论，造谣生事，使一部分群众上当受骗，被逼为匪。他们疯狂地对抗人民军队，加害共产党干部。如孙吴的保安队一开始常对人民军队干部、战士打黑枪。张鸣久、石玉新等杀我自治军干部后投敌。土匪的蜂起和破坏活动，为我党各项工作的开展设置了重重困难。土匪的存在，已成为建立北满根据地的一大障碍。不把这些土匪武装消灭干净，根据地建设就无法进行。因此，彻底消灭土匪，就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二）清剿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

对于严重的匪患威胁，党中央十分重视，指示东北局要坚决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根据党中央

的指示，东北局将东北划分为东满、西满、北满、南满四大军区，提出了“改编部队，肃清土匪，发动群众”的任务，以便集中全党的力量消灭土匪，在战略形势上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达到最后彻底肃清土匪的目的。

1945年12月28日，东北局又进一步指出：迅速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巩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按照上级精神，黑龙江省工委先后对北安、黑河地区的剿匪斗争作了详细部署，作出了“巩固克山、保卫拜泉、打下泰安，然后回解德都之围，最后进军黑河”的决策。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钧任总指挥，二旅旅长张光迪为副总指挥，三旅旅长廖中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三旅副政委亚民为政治部主任。调集了二、三旅的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共4 000余人，于12月31日攻下泰安城，毙敌3名旅长，消灭600余匪徒，生俘千余人，匪军长尚其悦化装带百余人逃走。泰安战役结束后，我军分三路，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副司令员于天放率一旅在南线，向绥化、绥棱、庆安一带山区进剿；三旅旅长廖中符、二旅旅长张光迪在中线，向克东、通北、拜泉等地进剿；副司令员王钧在北线，向黑河地区进剿。到1946年3月，北安以南地区的土匪已基本肃清。此时，我前方战事吃紧，国民党先头部队十三军、五十二军由美国军舰运到秦皇岛，开始向我山海关守军发动全面进攻，我军奋起反击，但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军被迫撤出山海关。由于装备精良的蒋军兵力集中，来势凶猛，我军为保存实力，主动从一部分地区撤离。我军当时未得到完好

休整，武器装备又不足，加之部队又来自各个解放区，一时无法集中兵力与优势敌军作战，只能是寻找战机。但在后方根据地，我方抓住这一时机，逐步实施剿匪计划。

孙吴保卫战抗击了挺匪的暴乱，但匪情仍十分严重，土匪被击溃后，逃匿山林潜伏，企图乘机再起，剿匪任务十分艰巨。匪六旅进攻孙吴失败后，康崇刚率十八团逃往逊河。1946年1月中旬，匪六旅副官处长胡芷山从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军部泰安经孙吴赶赴逊河与康崇刚会面，并召开由各团团长等匪首参加的临时会议，研究失败后的行动计划，有的主张就地潜伏，有的提出转移，南迁泰安，争执不下。1月16日拂晓，突然被苏军包围。当时，康崇刚还抱有一丝幻想，错误地估计形势，拿出“国民党委任状”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要求与苏军谈判，被苏方当即拒绝，并以“战时叛乱罪”将匪旅部主要人员及卫兵连30余人，匪二十团60余人缴械，收缴长短枪90余支。苏军将康崇刚、胡芷山、金焕章、杨逢甲、衡长春、李万国等从逊河押到孙吴，由苏军审训。四五天后，连同孙吴保卫战活捉的匪首8人同时押往黑河，1946年2月一并押送苏联判刑。匪六旅遭此打击后，组织曾一度陷于混乱瘫痪状态。康崇义闻讯，气急败坏袭击苏军进行报复，反被苏军俘获后处决，康氏兄弟这场“接收孙吴、邀功请赏”的美梦也随之化为一枕黄粱。此举给予挺匪以致命打击，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山林。但匪十八团和匪二十团的主要战斗力仍然存在，继续流窜于逊河、孙吴一带为非作歹。

此时，我主力部队正在北安以南剿匪，孙吴只靠地方自治武装强力支撑新生政权。土匪正值猖狂之时，尤其刘光

才、张鸣久两股匪徒气焰仍十分嚣张。张鸣久在进攻孙吴遭到惨败，被苏军俘虏，又从俘虏群中逃跑后，率匪十九团残部逃往清溪、腰屯一带继续为匪。张鸣久从孙吴逃出时，身边只有残匪六七十人，中途又散去一部分，逃到三岔河时，只剩下40余名匪徒。同戴耀先汇合后，又见到胡芷山、祝耀清和外号叫“黑虎”的马耀武所带的20余人，张鸣久重新组织人马。这期间，匪卫队连连长张伯钧和原“讨伐队”副队长石新玉与张鸣久队伍分裂，张鸣久到后獾子洞，股匪“北海”带100余人来投奔，张鸣久手下已有二百六七十人。1946年正月间，李云鹤投奔关作舟当团长，带走100多人，“九江”也叛出带走百余人，张鸣久身边只剩40余人，到西地营子又收田万禄60多人共100多人。

中共黑河地委在转发省委的指示中强调：战争已开始，各县委与工作团均不能离开本县，一但战争进入到本县，必须在本县坚持工作，我们已无路可退，退到黑河而放弃广大农村就是我们自卫战争的失败。我部队有可能抽调一部分去参战，战争又可能直接伸展到黑龙江各县，故在军事上，当务之急即是执行彻底肃清土匪的计划，一切部队中的干部须争取时间，在战争未进入本地域之前，在未抽调部队参战之前，把土匪肃清，以免后顾之忧。

1946年1月2日，剿匪部队开始朝孙吴方向开进。三旅九团通讯参谋汪洋在龙门至辰清地带被挺匪赵光明围困，袁大文带领第一营去解围。当时的天气很冷，情况十分紧急。赵是刘山东子匪帮的一个支队，足有400人。激战中，赵光明负伤，由一伙叫楼林人的护着，土匪们顽抗了半个来小时，便丢下80多辆大车逃跑了，我军把马卸下来

统统骑马追。这一仗毙敌120余人，伤70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掷弹筒6个，子弹4 000多发。这是我剿匪部队向北的第一次战斗。

1946年初，黑龙江省以南的土匪基本上被消灭了，省会北安以南已经稳定，只剩下混成六旅的刘山东、张景云、李亚洲驻在逊河，控制奇克、乌云、嘉阴等县，窜扰孙吴、瑷珲。在瑷珲和孙吴两县窜扰的还有张鸣久、杨青山、苏海山、老靠山、李云鹤等，此外还有莫金生纠集的部分不明真相鄂伦春人，加上挺匪第七旅关作舟残部和第十旅张青龙残部合起来号称三千人马，仍然肆无忌惮地骚扰百姓。

1946年2月中旬，黑龙江省委为打通北黑通道，建立北满战略后方，使我党我军免受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于2月18日，黑龙江省军区警备三旅政委冯兴武、副政委亚民、副参谋长姚国金、政治处主任王汉雨、三旅九团团长邢魁、副团长唐克带领的九团三营1 500余人，奉命护送牟海波、赵天野、王树棠、魏扬、田玉富等再次进入孙吴。部队穿山越岭向孙吴进发，行至清溪遭到匪十九团张鸣久部的阻击，我五连连长及数十名战士牺牲。张鸣久匪部袭击孙吴失败后，并没有和康崇刚匪部合拢，想自立山头，于是逃到逊河和匪十八、匪二十团会合。这期间，李振东、杨青山带领300多人投奔张鸣久，十九团又增至400余人。因康崇刚被俘，在纳金口子，挺匪临时推举张鸣久为六旅旅长，并对其匪部进行收编。编后大约半个月，在五道沟被苏军打散，杨青山和原18团黄玉林单独将队伍拉走，张鸣久剩下百余人逃至海伦，被我警备二旅击败。匪三营

营长田万录率匪64人投降，张鸣久带30余人逃往嫩江和讷河交界处，又被我嫩江部队重创。这时张鸣久只身带支手枪领其剩下的六七个人潜逃，到依安一带活动，后在我部队跟踪追击下，四处逃亡，至漠河东边的青龙岗，与女匪花蝴蝶汇合。当时黑河地工委建立了电台，地域之间匪情传递的很快，剿匪部队迅速出击，张鸣久被击毙。至此，挺匪十九团覆灭。

1946年4月20日，苏联红军撤离孙吴回国，挺匪六旅更加有恃无恐，甚至滥印发纸币，强行流通；到处抢劫，硬将群众的马匹、粮食及某些物品抢光。5月5日，在四季屯被土匪抢去谷子1 000捆，杂粮1 200斤；在大桦树林子抢去谷子1 000捆，杂粮1 000斤。

此时，前方国民党军开始沿中长路北犯四平，南攻本溪，向我展开全面进攻，妄图夺占四平、长春，并控制吉林省，以此作为北犯基地，一举消灭我军，独霸东北。党中央及时下达了保卫长春、哈尔滨市，保卫四平、本溪的指示，取得了历时一个月歼敌一万余人的四平保卫战的胜利，为我军抽调兵力大踏步进入北满和西满，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5月，黑龙江省委省军区贯彻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的指示。任命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钧为北路剿匪总指挥，偕同省军区参谋长关静寰、省警备二旅旅长张光迪、省警卫团团长李春生、省骑兵团团长李行和先期到达的三旅九团到达黑河地区剿匪。

5月8日，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北路剿匪总指挥王钧，率警备三旅九团、骑兵团等在孙吴县城集结。王钧的司令部开始就设在孙吴。据王钧本人回忆："我们是1946年5月5日从北安出发，8日到孙吴，听汇报。9日开会，向部队将这里的情况讲一讲：第一，农村地广人稀，到孙吴这儿剿匪比较困难，屯子少，孙吴原来只是一个国境线，小日本被缴械以后这县城只有几千人口，让大家一定要抱着刻苦这个精神；第二，省委让我们来剿匪，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地方的土匪消灭掉，才能回去，是比较长期的；第三，我们要纪律严明，注意群众纪律，部队武装要在这里得到新的补充。当时，我们所保存住的只有孙吴和黑河，老瑷珲是经常拉锯的，从省委省军区这个角度看，孙吴一放弃，黑河地区就定要失守了，孙吴是个战略要地。"

就在王钧率部到达孙吴时，挺匪六旅所属十八团和二十团正从逊河流窜到孙吴县境内的大桦树林子屯，为首的是匪十八团团长李亚洲和匪二十团副团长张景云，共有匪徒500余人。这伙匪徒进屯后如狼似虎，硬从百姓手中抢夺粮食、马匹和农物，并强迫十几名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加入土匪。把一个平静的山村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王钧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率省警备二旅、三旅、骑兵团和警卫团前去剿匪。王钧和三旅九团团长邢魁、三旅参谋长姚国金、孙吴县委书记牟海波、县长赵天野等人研究了敌情，确定了"引蛇出洞"的战斗方案：决定派少数部队正面进攻，其余部队在周围设伏待机歼敌。由三旅九团三营长袁大文担任正面攻击，三旅骑兵团背后穿插截击敌人。大桦树林子屯位于孙吴东北方向100华里处，孙吴

至四季屯公路从大桦树林子屯的东边穿过，村屯周围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加之屯边的树林子可做依托，易守难攻。在此之前，袁大文派侦察兵化妆成渔夫对敌实施侦察，侦察反馈的情况是：大桦树林子周围有工事，约有一个团的兵力。5月11日，袁大文所部迅速开到小桦树林子。这里，土匪设有一个班的监视哨，发现我部队行动后，立刻逃回大桦树林子送信。部队又向北急行军2.5公里接近大桦树林子，下午战斗打响。敌人用密集火力封锁公路，企图切断剿匪部队进攻的路线，我方把在孙吴刚刚装备起来的三旅炮兵连的两门野炮推上来，对准敌群连开三炮，几发炮弹都落到敌人的栓马桩上，土匪顿时大乱。此时一、三营很快接近敌人，并从大桦树林子东南插入，我军骑兵一个冲锋就拔掉了村口的匪据点。这时，黑河军分区所属部队也从北面四季屯包抄过来，土匪见势不妙，慌忙骑马从屯子的西北角“淘金坑”处钻入密林，沿山边草地经霍尔漠津向逊河方向逃窜。我军当即派李忠民率骑兵团从霍尔漠津插过去截击敌人，由于地形不熟，夜幕降临，仅击毙敌人4名，俘匪第六混成旅黄副官、匪十八团团副李万巨以下10余人，其余土匪溜掉。两天后，该股土匪在哈达彦南侧的老西窝棚被我军打垮。此次战斗，我军牺牲4人，村屯百姓无伤亡。这是我军到孙吴后清剿挺匪旗开得胜的一仗，使骄横一时的土匪胆颤心惊，预感末日的来临。当天下午，我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为达到政治劝降的目的，决定释放土匪头子、十八团副团长李万巨和姓黄的营长，用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感化他们，希望他们回去宣传共产党宽大俘虏的政策，弃暗投明，接受共产

党的领导。同时，发动四季屯的群众给挺匪胁迫走的家属写信，动员他们回到人民一边。王钧副司令亲自给挺匪头目写了劝降信，痛陈利害，由释放的李万巨送交匪首刘光才。信的内容大致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大好河山13年，把东北的财富抢掠一空，我三千万东北同胞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中国共产党发动人民浴血战斗13年，广大人民盼望已久的解放现已实现了。人民是想要重建家园，安心生产建设，人民想得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局面，你们应从人民利益着想。你们这些人在伪满时为日军卖命欺压人民，今天不应再顽固地扰乱人民，不要受国民党特务欺骗。你们要回心转意放下武器，立功赎罪还不晚。你们若继续为非作歹与人民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消灭的，望你们再三思考，否则悔之晚矣"。李、黄二人一再表示，回去按共产党要求去做，并且提出让他们骑马快点回去。当时，决定给他们两匹马，允许带走个人的一切物品。

大桦树林子这场战斗，实际上还同时包含着一架山战斗。原黑河警卫团一营营长张泉山回忆说：

"一架山位于四季屯北部三四里地处，它的东面是波涛汹涌的黑龙江，山势东西走向，突兀而起，宛若一道城墙拦住了南北走向的沿江公路，是黑河连结孙吴、奇克的重要关卡，山上遗留了大量日伪时期构筑的工事。一架山的北面还有两道与它几乎平行的山梁，即二架山、三架山，由于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成为挺匪的巢穴。

一架山战斗是1946年6月初进行的。坤河战斗结束后，我军又集中了5个连，有一营二连、三连、机炮连和

二营的五连、六连准备攻打一架山。在一架山战斗之前，黑河部队二营四连叛变，投靠挺匪混成六旅副旅长关作舟，扩大了关匪的势力，致使黑河形势告急。一营一连在大五家子受阻，迫使退守坤河。二营在孙营长、王教导员指挥下，曾两次攻打一架山，都由于敌人死守，没有拿下来。当时我正率一营二、三连和机炮连在罕达气一带剿匪，黑河军分区命令我火速带兵增援坤河。在坤河战斗中，匪首关作舟负了重伤，在往黑河抬送的途中，死在大五家子。

6月3日，一架山战斗打响了，这场战斗的总指挥是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北路剿匪总指挥王钧同志，副总指挥是黑河军分区首任参谋长张继成同志。一架山战斗，是大桦树林子剿匪战斗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国民党东北挺进军混成第六旅第十八团、二十团驻在大桦树林子，有五六百人。在一架山有一百多人，两地相距10多里路。为了歼灭这伙匪徒，王钧率三旅部队从北安挺进孙吴，从南面进攻大桦树林子，张继成率黑河军分区部队进军一架山，两支部队南北夹击敌人。我带部队进军到二架山时，指挥部就设在二架山上。当时的作战部署是：一营担任主攻，二营担任佯攻。参谋长指示说：‘千万不要打误会。因为三旅早已从孙吴出发，已经到了大桦树林子，在我们南面10多里路的地方，一架山也可能被收复了。’我带着部队刚刚接近一架山西北侧，就发现对面山上有人。在我们部队出发之前，黑河军分区派出去的两名侦察员一直没有回来，我想也许是我们的侦察员与三旅联系上了？一时间好多问号难解。所以，我们决定先用信号旗联系。旗语

就是摆旗，用旗说话。对面山上的人看我们摆旗，他们也跟着摆旗，他们的旗是红白色的，我们的旗是红黄色的，旗语在当时来说是比较秘密的，然而他们的旗正好和三旅的联络旗一样的，也是红白色，而且，摆旗的方法也是左一下，右一下，上下一下。旗语对上号了，我又命令号兵用号联系，结果也联系上了，当时我就以为一定是三旅的同志来了，这时我就带着通信员郭福成和司号员刘志华前去接头，准备见面详谈一下。

二架山和一架山中间有道沟，不一会我们三个人就到了沟底。在离对面只有3米远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刘志华大喊一声：‘营长，不是三旅，是挺进军，快往后撤！’于是他啪地一下，把刺刀展开，把三八马枪子弹推上了膛，郭福成端起了手里一支苏式连珠枪，我也亮出了20响驳壳枪。3个敌人也抽出了3支手枪对着我们，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各自都持着枪慢慢地往后撤，因为双方距离太近了，也都看清楚了敌人穿的灰军装（三旅的军装也是灰色的），白底黑字臂章。敌人不知从哪里搞到了我们的联络信号，他们这次上来有3个人，可能是想抓我们‘当舌头’的。由于我们及时发现，出枪主动，加之接头地点处在双方的火力封锁区，如果动手，谁也别想活着回去，所以我们没开枪，敌人也没开枪。当我们都退到各自的阵地时，我下命令‘二连冲上去，三连机枪掩护，消灭敌人！’当时连长吴景春接到命令，毫不迟疑，带着100多人冲了上去。那时我们是每个排都有一挺轻机枪，每个连有4具掷弹筒，机炮连有两挺重机枪和三门迫击炮。就这样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敌人那边有好多日伪时期遗留

的旧工事，在前沿的工事里有一门机关炮，在后面的制高点上有一挺重机枪。战斗开始后，我军机炮连的重机枪把敌人的火力死死压住，敌人的机枪哑巴了，我们的战士勇猛冲杀，强夺了敌人占领的一架山。敌人在前边跑，我们在后边追，顺着通往四季屯的公路一气把他们赶到了四季屯和大桦树林子交界的公路桥上。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又抵挡了一阵，然后向大桦树林子逃去。这次战斗从上午九时开始，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半钟。就在我们追击敌人的途中，我军二连在一架山南侧的山坡上，抓到了挺匪头子、十八团副团长李万巨和一名姓黄的营长。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毙敌12人，俘虏2人，缴获11支三八步枪，一门机关炮。我军牺牲6人。

一架山占领了，四季屯解放了，到了四季屯，只见房子不见人。这时，指挥部移到一架山，根据情况张参谋长下令，就地宿营，不准进屯子。一天紧张战斗，战士们已经疲惫极了，饥饿难忍，因为我们还是前一天在坤河上的给养。部队有纪律，屯子里又没人，这一带老百姓都让土匪闹得不明真相，还不理解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屯。战士们饿了就忍着，渴了就爬在路边喝几口坑里的水。这时候，就能零星地听到大桦树林子那边三旅剿匪的枪声。到了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枪声停止，山野、村庄恢复了平静，我们的战士都露宿在村外的公路上。

第2天，即6月4日，正好是五月节。一早上，我们的岗哨富万良就跑来报告说：发现有个老太太在村里东张西望的。我告诉战士们不要惊动她，同时我们老远地就听见老太太用满族语骂骂吵吵地说：‘天杀的，八路军逃跑到哪里去

了……’我们想，这阵子土匪来了也冒充八路军，抢粮抢物，吓得老百姓东躲西藏，真的八路军来了老百姓也弄不清谁真谁假。于是，等到8点多钟，我就亲自到了老太太家。老太太一见我来到眼前吓得直哆嗦，我赶忙向她解释说：‘我们是黑河自治军，您不要害怕，我们不伤害老百姓，是来解放四季屯的。’老太太一听，稍稍平静后，问我说：‘你们在哪住的？’我说我们是在村外大道上住的。她又问：‘你们连队咋不进村呢？’我说：‘八路军有纪律，村里没有老百姓，我们不能进。’老太太一听觉得和挺进军不一样，很受感动，于是就说：‘快让他们进村吧，我去叫屯里的人。’我问人在哪？她说：‘屯里的人都藏到江芯子（岛屿）里去了。’船也都划到那里去了，后来我们的战士富万良用房梁作了小木排，他划着，老太太坐在上面带路过江到岛子上才把全屯300多老百姓请了回来。这一来，四季屯可就热闹了，我们的战士虽然行军打仗十分疲劳，可是进村就帮助老百姓干活，挑水、劈柴、扫院子，什么都干，老百姓一看我们真和以前来的‘八路军’不一样，心里才托底，但是他们又怕我们也‘二里挑一’把他们的两个儿子挑走一个去当兵。因为挺进军前几天刚刚从这里强行挑走了十八个年轻人去‘当兵’。为了让百姓放心，我们就主动宣传党的政策，向他们解释我们部队的性质。打这开始，老百姓才从心里信服我们。大桦树林子剿匪战斗以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王钧同志也带三旅的领导同志赶到四季屯和张继成所带的部队胜利会师。”

随后，我军又向老西窝堡进剿。

刘山东这股土匪是黑河地区大大小小土匪的靠山，

是国民党特务赖以宣传的主要势力。他们用窗户纸乱制纸币，强行发给群众，并说中央军来建立政府就换给大家。用假钞票大量购买群众的物资，群众心里明镜儿地称“这，开屁股纸!”不愿意要，他们就说是思想反动，反对中央政府。刘匪是骑兵队伍，行军力强，一贯是避强打弱，当他们遇到我军主力时，就远距离逃跑，寻机袭击我地方小部队。5月15日，王钧率部与黑河地方部队挺进何地营子，奇袭老西窝堡。我方先派一个营，乘打鱼的舢舨船顺流而下过老西窝堡到干岔子屯，信号弹发出后，与正面进攻的二旅、三旅的部队两面夹击，毙敌50余人，缴获日式掷弹筒4具，“三八”重机枪1挺，轻机枪7挺，步枪100余支，打通了孙吴通往逊河、奇克的咽喉要道，然后直取刘光才匪巢逊河，刘匪逃遁。自孙吴沿江之役的胜利，打击了挺匪的嚣张气焰，形成了我强敌弱之势，稳定了孙吴的局面，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创造了先决条件。这一阶段是对土匪发动规模性攻击之时，主要是组织剿匪部队对盘据以及经常流窜在各地的大股土匪进行重点攻击，把大股土匪击溃，夺回和打通了土匪封锁控制的交通。但因群众工作未能普遍组织发动起来，人情地情尚不十分了解，只是单线的军事进剿，战斗也多为击溃战，缺乏党政军民的有力配合，致使土匪未能全部肃清，只是初步扭转了土匪猖獗的形势，结束了受土匪严重威胁的局面。在初期阶段的剿匪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深山剿匪的经验，锻练发展了地方武装。并迫使大股土匪逃往深山老林，虽受到重创，但没有被彻底消灭。

6月中旬，由王钧率领的剿匪部队回到孙吴，正赶上

西满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率原新四军三师特一团2 000多人入黑河剿匪，首驻孙吴街五洲旅馆（今孙吴中央大街119号）。时因东北局作出“为了迅速而有效地巩固和拓展广大的根据地，应以主力兵团的一部，配合当地的地方武装，采取积极行动，肃清政治土匪”的决议，于是，西满军区派出原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洪学智从四平前线撤回，赶赴黑河兼任地委书记、黑河军分区司令员，并统一指挥进入黑河地区剿匪的我各旅、团和地方武装。此前，黑河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地工委书记王肃去北安开会后返回黑河，省委派任黑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光烈及其爱人江燕一同来黑，经孙吴走到二站，遭到土匪袭击，两台汽车被土匪打坏一台，黑河军分区最早秘密吸收入党的排长荣雅轩和5名战士牺牲，迫使王肃等返回孙吴。第二次，绕道桦树林子，又遇土匪骑兵，再次返回孙吴。第三次，即6月12日，在孙吴驻扎的三旅旅部指派作战股长杨春和一个排的兵力，将王肃等安全送到西岗子。西岗子区区长宁新春接待了王肃一行。此时，王肃考虑到孙吴城内空虚，担心土匪会进攻孙吴，遂于午饭后令护送的杨春和带部返回孙吴，自己同刘光烈、江燕一起带黑河军分区一个班战士从西岗子直接返黑。汽车沿岗黑公路行驶，车行至后獾洞附近，突遭杨青山匪帮张海匪部的袭击，警卫班战士跳下车，伏于公路两侧与土匪接火。王肃、刘光烈、江燕和警卫员王学富、通讯员刘忠义继续乘车向前冲，行不多远，又遇到第二道卡子，敌人子弹如雨点般射来，王肃、刘光烈、江燕等奋力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刘光烈、江燕、刘忠义牺牲。王肃、王学富边打边撤，敌死盯

不放。王肃撤到后獾洞屯边，见有一草房，遂同王学富退入房内。匪徒见王肃进屋，即将房子包围，有的喊烧房子，有的喊捉活的，王肃持枪拚死抵抗，使敌人始终冲不进去。最后，房子被土匪点燃，王肃在烟火中仍坚持战斗。待我援军赶到时，张海部匪徒已逃遁，王肃司令员壮烈牺牲（时年32岁），头部、身上两处中弹，并有烧伤。其随身携带的小包裹里装有抗战时穿的一件旧军衣和一条旧衬裤。见此情景，战士们纷纷落泪。战友们用面袋子改制了一套军装，为他穿上入殓。

此时，国民党占据了山海关、锦州等地，又先后把新一军、新三军、五十三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运到东北，开始向我东北解放区腹地进攻，气焰十分嚣张。

1946年夏，被我军追剿潜入深山密林的刘山东匪股部分死硬分子，仍不断窜扰于孙吴、逊克、黑河等地，抢掠马匹和粮食，严重破坏这一地区的社会安宁。这时，孙吴县和黑河镇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敌人若占据孙吴，就会把黑河地委、军分区和在北安的省委、省军区割断联系。6月下旬，驻守逊河双河镇的我军八连连长马玉山受国民党特务于风池、王仲藻策动，带队叛变投敌，助长了刘匪气焰，一些溃散的匪徒又重新聚拢。刘光才派张景云去哈市与国民党行营联系，得到正式委任。在党徒要员张文誉的撮合下，6月28日，刘山东在沾格达重新改编第六旅，自任少将旅长。

改编后的匪六旅，又开始窜扰于孙吴的协振屯、杨木山、哈达彦、腰岭一带。

面对前方国民党大军压境，后有土匪破坏骚扰的严重形势，中央东北局于1946年6月底作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根据目前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北满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肃清土匪，以支持长期斗争。《决定》对半年来的剿匪斗争经验作了总结，找出了未能彻底消灭土匪的关键问题，首先是群众没有广泛地发动起来，以致没有铲除那些顽匪"地头蛇"的基础。土匪有匪窝，有储备粮，有混在村屯里的"耳目"；其次是我军缺少老部队做骨干，新成分多，又缺乏剿匪经验，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在战术上，我军多是采取威胁战和击溃战，没有坚决地穷追，彻底消灭。而土匪非常狡猾，他们有一套集中、分散、隐蔽的游击战术。我方应尽量动员多数干部带队下乡剿匪，贴近群众调查匪情，采取包围、奔袭、夜袭等战术，使土匪无休息机会，不要仅仅将其击溃，击散，而要彻底消灭。为达此目的，要避免白天浩浩荡荡的行军办法，以先掌握透情况为主，突然地围歼消灭或逼其投降。

7月中旬，我剿匪部队在去黑河途经孙吴北山时，与匪刘光才部交火。当时，天下着毛毛雨，大多连队就地抢时间烧火做饭。正当傍晚，有几百土匪出现了。站在山顶一看，土匪人很多，有几个已过河上山。土匪有炮，迫击炮支了三、四门，周围摞着十几发炮弹。特一团派出两个连从侧面迂回围着山打，把土匪打掉了一个连，还抓了十几名俘虏。土匪一看不对呀，于是都逃跑了，我方缴获了4门炮和几挺机枪。这一仗，把刘山东子打得再也不敢接触八路军了。

1946年7月以来，洪学智率三师特一团、三旅九团、

骑兵团和黑河军分区部队，由逊河出发向沾河一带围剿匪六旅十八团、二十团，经过多次连续清剿战斗，使六旅遭到重创，损失很大，我军物资缴获，毙伤俘敌甚多。先期，三旅九团同混成六旅作战，损失很大，尤其在黑河保卫战中，仅袁大文的营147名战士损失过半，仅存60多人。省委省军区决定九团回北安休整，由三旅供给处（供给处长张锦伦）和十团前来换防，团长祝平安，政委吴沛。该团没有营建制，直属6个连队及团直骑兵警卫连，连排级干部都是从关内来的战斗骨干。根据陈云同志“大官做小事”的号召，原团营职充任营连职，其中五连连长张泉，曾任过省保安大队政委和营长，是久经战斗考验的老红军；指导员刘今生是延安中央党校来的，曾是老十团三营的教导员。五连是克东县在解放战争初期扩军组建的，全连150多人。

1946年8月上旬，十团奉命奔赴孙吴剿匪，部队行至辰清时，接到廖旅长命令：“匪情复杂，不宜沿大路向孙吴县城开进，部队暂住辰清停止前进。”这样，十团在辰清住了4天。期间，五连连长张泉接到群众报告，土匪住在腰岭，把他的猪截去了，并到老百姓家抓鸡抓猪杀了大吃大喝。祝团长得知敌情后，派出侦察员到腰岭侦察，查清匪六旅有五六百人，其中有不少骑兵，正在杀猪宰鸡庆祝与我九团战斗中取得的“胜利”。根据敌情，廖旅长、祝团长、吴政委等共商剿匪之策。首先认为，敌人是一个旅，五六百人，又多是骑兵，我方虽称一个团，因后续部队未到，实际只有两个战斗连，在火力和兵力上相比都是敌强我弱。第二，敌人多是地头蛇，地形熟，骑兵运动速

度快。第三，敌人尚未受到我军毁灭性打击，比较骄横。但是，唯一对我方有利的是敌人不知我十团已到辰清，又无防备，遂下决心打他个措手不及。制定的战斗方案是：使用精干连队，在夜幕和青纱帐掩护下，乘敌不备，采取奇袭的办法出奇制胜。最后，祝团长把战斗任务交给了五连，并将四连一个排拨给五连指挥，共4个排190余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张泉连长领完任务回到连队，由于指导员刘今生患病，暂离队治疗，便和徐连本副连长、耿平章副指导员具体研究战斗方案，并在辰清找了七八个老乡，详细了解腰岭的地形地貌，请4个最了解腰岭地形的老乡充当向导。腰岭是北黑铁路上的一个车站，在辰清西北方向40华里处，全村近百户居民，并有部分日伪遗弃的兵营，有公路相通，交通方便。腰岭东边是较陡的山峦，山下是河，村南村北是平原青纱帐，便于隐蔽接近，突然袭击。村西两面是山，中间是约七、八十米的低洼地，便于伏击逃敌。夜幕降临，战士们便向腰岭疾进。由于要保守军事机密，不使敌人察觉我军意图，部队在先进至离辰清十多里的一条山沟里集合，由张泉连长作战斗动员：“十团组建后，到孙吴来剿匪，必须打胜第一仗，敌人虽多，但骄兵必败……”根据腰岭村的地形特点，张泉下达的具体战斗布署是：南北夹击，虚留西面，让敌人钻口袋，徐连长带一个排从南往北打，耿副指导员带两个排从东北往南压，张泉亲自带一个排埋伏在村西低洼沟内，并架起三挺轻机枪，准备堵截逃窜之敌。徐副排长带一个班从南面直扑“川本商会”大院敌旅部指挥所，先打掉蛇头，使其群魔无首，失去指挥。待敌向西逃跑时，因敌兵过多，先

放跑一部分，打其中间和后尾。半夜时分，全连各排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攻击位置，一切准备就绪。张泉连长的攻击信号一发，南北两路的战士如猛虎下山，直扑村内。尤其是耿副指导员带的两个排，攻的更猛，动作更快，直攻到敌人的窗户底下，敌人尚未发觉。进攻的枪声几面一响，酒足饭饱后正在梦中的匪徒惊慌失措乱成一团，仓促应战。黑夜中，土匪分不清哪是我军哪是土匪自己，一时村内轻重机枪声大作，原来是敌人在慌乱中自己打起自己人来了，丈二摸不着头脑地互相对射。张泉连长看得清楚，立即抓住战机，命令司号员吹起嘹亮的冲锋号。敌指挥机关首先被徐副排长带的一个班冲进去打乱了阵脚，战士车仁方冲到指挥部门口，发现大院内有敌哨兵，就扔了一颗手榴弹，战士们接着冲了进去，抓住了敌指挥官的手枪，正当枪到手时，敌挣脱逃掉。匪徒在五连指战员的冲杀下，只好向西突围溃逃，有的竟连马都来不及骑。张泉连长观察到匪徒黑压压一大片向他们阵地慌慌张张逃来，由于敌人数太多，先放走一部分之后，三挺机枪同时开火，敌匪逃出去的再不敢回头救援，只顾自己逃命去了。张泉连长便带二排战士冲进村内，到拂晓时分结束了战斗。这场战斗共击毙匪徒50余名，俘虏80余名，缴获全鞍战马80多匹，掷弹筒6具，轻机枪两挺，步枪五十余支，驳克枪七支，橹子手枪一支，子弹10 000发，伪满钞票一皮箱。腰岭战斗，是十团到孙吴剿匪旗开得胜的重大胜利，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袭范例，也是当时黑龙江省剿匪战斗的重大胜利。为此，得到了西满军区的通令嘉奖，表扬为新式整军的模范，增发了奖金作为奖励。

黑龙江日报专门报导了这一胜利的消息。腰岭战斗，有力的打击了匪首刘光才为旅长的混成第六旅，使匪六旅损失惨重，元气大伤。随即，黑龙江军区警备三旅旅部进驻孙吴，十团派一个连驻守孙吴，祝团长率4个连队前往逊河，继续清剿六旅匪徒。

不久，洪学智被调南下，由王钧接任黑河军分区司令员。我剿匪各旅团和黑河军分区部队云集逊河，在司令员王钧、政委林一心的统一指挥下，对刘山东匪帮展开歼灭性围剿。1946年10月，挺匪六旅遭我重创后，率残部500余人，逃往萝北县为非作歹，遭我合江地区部队打击后窜回乌云县，部队跟踪追击至乌云。1946年12月，挺匪六旅在合江地区无法存身，又窜回瑷珲，袭击西岗子和瑷珲城，遭我三旅十团和军分区部队的有力反击。穷途末路的刘匪率残部西窜嫩江，遭我嫩江军分区警卫团打击后逃往德都，又被我嫩江军分区骑兵团穷追不舍，予以痛击。最后，刘匪又窜回逊克，途中再一次遭我三旅十团的堵击。这期间，省地委先后要求各县广泛发动群众，揭发土匪罪恶，实行清查户口，群众检举，保安连坐，军民联防，挖匪根、捣匪窝等措施，使匪徒在村屯无安身之处。

1946年冬，保安队政委牟海波率部在清溪附近的“高丽窑”活捉匪首“双山”、“四季好”以下数十人，两匪首就地枪决，随从教育后全部释放。在省军区特一团、三旅十团及黑河军分区部队联合打击下，刘山东感到黑龙江已巩固，想到长春找国民党去，继而从逊克东边的车陆一带又一次向嫩江逃窜，遭我嫩江警卫团一部的沉重打击后西窜，又遭我克山一带的县大队和讷河老达子队一顿痛

打，匪徒们又往东返。因缺衣少粮，土匪内部开始分化，在强大压力和我人民政府政策感召下，部分土匪向人民政府投降，有的隐匿归正。

内战7个月以来，蒋军大量被我歼灭，总共达55个旅之多，造成蒋军兵力不足、分散，引起内部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日益加剧，而受蒋介石压迫排挤的杂牌军队必然更加动摇。1946年11月9日，黑河地委翻印省委的文件中提到：11月8日国民党广播蒋介石宣布在国民大会期间命令“国军”一律停止军事行动，这不过又是其政治阴谋的一种花样与调整兵力预备更大的进攻而已。此时要抓住东北战场捷报频传，采取对土匪外部打击与内部打击相结合的手法，发动全面对敌攻势，迅速编印对敌斗争的小册子、传单、标语、书报、歌谣、布告等，动员家属给受蒙蔽落草为寇者写信劝降。1946年岁尾，与鄂伦春人的关系问题凸显出来，省委指示，鄂伦春问题是民族关系问题，不是敌我矛盾，适当时机解放军对他们要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以夺取政治优势，孤立挺匪。孙吴县民主政府，严格执行有关政策，部分受骗的鄂伦春族入匪者被降伏，致使残匪纷纷来孙吴投诚。此时，挺匪刘山东见军心动摇，败局已定，最后只好和张景云、李亚洲等少数死硬分子藏匿于逊克县李双福地营子一带。

1947年2月初，龙江、合江、嫩江三省剿匪部队，从乌云至孙吴采取拉网式搜索的办法，联合会剿于黑河地区。1947年阴历正月十二凌晨，刘今生带领二连在逊克县松树沟西南的李小锅地营子搜索时，发现房内有灯光，立即警觉起来，悄悄干掉了敌人的岗哨后，马上将这所房子

包围起来，并开始喊话，命令屋里面的敌人投降。一开始，敌人拒不投降，并向外打枪抵抗，我军集中火力打击敌人。相持一阵后，战士们掷出了手榴弹，在弥漫的硝烟中，敌人实在顶不住了，便一个个举起手来，狼狈地投降了。这时，一个战士惊讶地喊："刘山东，抓到刘山东了！"刘山东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终于被抓到了。这次战斗，我军活捉土匪40多人，马60多匹和一大批枪支弹药，生俘刘光才（刘山东）、张景云、李亚洲等10余名匪首，国民党政府给刘光才的委任状也一并成了我军的战利品。1947年3月，经黑河人民公审，公开枪决刘、张、李三名罪犯，为当地人民除去了最大祸患。

国民党中央政府收编委任的匪东北挺进军混成第六旅，从1945年11月在孙吴成立到1947年2月在逊克被消灭，历时仅一年半。这股政治土匪始终与人民为敌，曾穷凶极恶，骄横一时，我剿匪部队与其作战大小近二十次，最终被我彻底歼灭。挺匪六旅的覆灭，清除了孙吴乃至黑河地区最大祸患，保障了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促进了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历史证明，任何反动势力，即使一时得逞，最终必将彻底灭亡。

到1947年5月，黑河区域内大部分土匪基本上都被消灭了，但是在二站、三站还有李云鹤、黑虎等小股土匪。此外，还有一些被蒙骗的鄂伦春人民潜入山中继续为匪，其中混杂部分从挺匪刘山东那里逃脱过来的顽匪。同年5月，国民党特务段希文化装成商人由北安来孙吴，黑龙江省公安总局侦察员韩来春也化装成商人跟踪，两人在火车上都以买卖人相称，一同到孙吴。韩到孙吴后立即与公安

科联系，公安科派周清文同志配合。正在这时，特务请小南屯一农民上公安科给他办路条，这位农民跟公安科内勤丁洪财是同学，丁给办了。当天，丁得知周在侦察这个商人，向同学索回路条，那人将此事告诉了特务，特务见事不妙，抬腿就跑，刚跑出街，碰上我侦察员韩来春，韩说我明天也回北安，咱们一块走，将特务又领回街里。夜间，公安科的同志将特务逮捕，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委任状，县长赵天野亲自审问，特务交待了他此行的目的。

1947年7月25日，东北局发出《关于抽掉兵力进行群众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和五分之三的干部组成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清剿以“棲林”为主的土匪。这一时期的剿匪斗争，在军事上采取了穷追猛打、联合围剿、彻底消灭的方针，并配合瓦解土匪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建立自卫队等群众武装，成为群众性的剿匪运动。1947年夏，孙吴县保安大队随部队进山剿匪。县公安科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配合部队剿匪，加紧镇内和城郊的巡逻和搜捕零星土匪的工作。一天，小南屯一农民报告说有一股土匪进了村子。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公安科的十几名战士每人配备长短两支枪，在张志贤同志的带领下向小南屯追击，土匪以为敢追他们的公安战士一定不少，遂仓惶逃窜，公安科的同志们奋勇追击一天一夜，一直将这股土匪追进杨木山，土匪依仗熟细地形溜掉了。

11月9日深夜，吴家堡村发现匪情。该村群众到县保安队报告说：“土匪正在屯里抢群众的马匹、粮食，并伤害群众多人。”保安队长曾河清与排长杨德举率一排战士，乘马

爬犁星夜赶往距离县城40多华里的吴家堡。10日凌晨到达吴家堡，发现土匪已去朝鲜屯，据群众反映，这股土匪共有30余人。保安队来到朝鲜屯前，土匪听到风声慌慌张张逃往南山，遗弃了许多粮食和衣物。曾河清经过分析认定，这股残匪因缺衣少食，依靠掠夺百姓财产过日子，敌人没有食物很可能窜回。因此，他决定自己带一个班留下打伏击，另两个班返回吴家堡待命。12日黎明，土匪的两匹骑马溜缰从南山下来，被我埋伏战士捉住拴在明显处，以诱匪牵马。不出所料，两名匪徒果真从山上持枪下来了。因土匪人少，曾河清向战士部署说："不要先开枪，争取活捉这两个土匪，让他们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当土匪接近我埋伏圈时，曾河清高喊："举起手来，交枪不杀！"这是两名惯匪，当发现我军有埋伏，举枪向曾河清射击，后转身要逃。曾河清等予以还击，当即击中一匪腿部，另一匪徒利用山坡的土沟为掩护向我还击，曾河清胸部中弹，仍坚持带伤将这名顽匪击毙。战斗结束，曾队长伤势很重，战士周春璞牺牲，李万秋胳膊受伤。他们从河南岸返回吴家堡村到县里汇报，县政府秘书张志贤、医院大夫赵镛大赶赴吴家堡就地为曾队长包扎，行至腰屯，曾队长伤势危险不能继续返城，于是将其安排在关云峰家，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为此，县里召开了追悼大会，县长赵天野致悼词，对曾河清同志战斗的一生给予较高评价，号召全县人民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1948年5月1日，县长赵天野、县民运工作队队长冯兴义，会同黑河军分区机炮连连长景春荣以下战士16人，分两路包抄流窜到曾家堡村的土匪。掷弹筒、机枪等多路齐

发，敌怆惶逃往孙吴北山。5月2日，挺匪莫金升的骑兵，在龙镇乘我军的一个连队正集合出操突然袭击，使这个连队蒙受重大损失，之后又窜扰到了孙吴。当日，黑河军分区首长命令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火速率部队赶往孙吴县城，归孙吴县长赵天野指挥，增援孙吴，共同打击莫匪的骑兵。张泉山与从新四军来的一排长潘有义带领由警卫连、看守班和供给处抽调的41名同志，共五个班，火力配备有重机枪两挺，掷弹筒一具，每人40发子弹，4枚手榴弹，于当晚5点许乘黑河号客轮顺江而下，5个小时后到达四季屯码头。下船后，部队稍作休息，吃了点随身携带的咸菜、苞米面窝窝头后，沿着四季屯至孙吴的公路向县城急行军。5月2日清晨7时许，部队到达距东卧牛河屯七八里路的日本“开拓团”遗留的一所破房处休息。这时，协振屯村农民阎长发等4人在转移马匹时遇到了张泉山他们的小分队，阎长发等人问：“哪位是八路军的领导？”张泉山说：“我是连长，有什么事？”阎长发说：“我们准备春耕的麦种，都被挺匪抢去了，你们快去打挺匪吧！”张泉山寻思，部队的任务是赶在上午8点到达孙吴，没有中途打仗的任务。阎长发等人见张泉山犹豫不决，便向张泉山恳求说：“八路军得救救我们老百姓，小麦种被抢光了，我们没法生活了。”这时，张泉山问清了挺匪只有30多人，自己是40多人，可以打，即使消灭不了，也可吓跑。一排长潘有义更是主张打，战士们也纷纷要求歼灭这股土匪。这样，张泉山下定决心打这股敌人，便向阎长发等人问清了协振屯村和周围的地形，部署了战斗任务，以阎长发等4人为向导，向协振屯村的挺匪逼进。

上午9时许，部队接近距协振屯不远的三个山头，张泉山连长率两个班居中，一排长潘有义带两个班居右面山头，另一个班在左面山头，同时向协振屯内的挺匪攻击。一时，协振屯南山的三个山头上的机枪、掷弹筒和步枪一齐开火，敌人惊慌之中仓促应战，弄不清我军兵力到底有多少。一排长乘机率两个班向屯内直扑过去，可是敌人并不象阎长发所说的30多人，而是100多人。敌人定了神之后，发觉我军兵力不多，便抢占有利地形，有的甚至爬到树上，向一排长率领的两个班射击。这股土匪枪法较准，又熟悉地形；我军多系新战士，没有战斗经验，一排长潘有义带领的这两个班在攻击途中基本都牺牲了。由于我军伤亡较大，战斗力减弱，战斗也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5点多。张泉山连长率领的两个班也伤亡了好几名战士，敌人仍在全力进攻。张泉山一看我军的弹药快打光了，自己两腿受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保存我军力量，决定撤退。便对战士们说："你们快撤，我在后面掩护大家。"战士们不肯撤，激动地说："连长，你负伤了，你也撤，不然，我们死在一块。"张泉山果断地说："执行命令，你们快撤。"张泉山一面掩护射击，一面回头指挥战士们利用有利地形在敌人排枪的射击间隙撤退，直到眼看着每一个战士都已撤出战场，自己才背着一条马枪，一具掷弹筒，手持手枪，拖着负伤的身体，一瘸一拐艰难地从山上撤下来。此役，我军23名战士壮烈牺牲。由于战士们戴的都是狗皮帽子，张泉山戴的是狐狸皮帽子，敌人认出张泉山是指挥员，于是仍在一面射击，一面追赶。张泉山撤到山坡下，发现了26岁的协振屯农民关金禄，关金禄一看前

面不远处喝问他的人身穿灰色军装，手握一支手枪，后面还有零星土匪在追赶，断定是我军，就说："我是老百姓，找马的。"两人靠近后，凭经验观察，张泉山认定面前的是可以信赖的老乡，就说："我叫张泉山，是自治军连长，负伤了，后面土匪追上来了。"关金禄一看情况是这样危急，就不顾个人安危，奋不顾身地架起张泉山向数里外的黑沟奔去，途中张泉山左臂又中弹负伤。刚架到沟边上，关金禄回头一看，敌人仍在追赶，就急中生智将张泉山隐蔽在沟里，自己向另一个方向跑去。土匪追赶关金禄时，以为他是自治军，就向他开枪射击，连打数枪都未打中。这时，关金禄爬在一个土堆后边，用手举着帽子高喊："我是老百姓，别打了。"土匪也看清关金禄是个老百姓，就对他骂了几句，又继续向前追去。

张泉山在黑沟里隐蔽到天黑，在夜幕掩护下，支撑着失血后沉重而虚弱的身体，趟过卧牛河，连走带爬到了河西岸，被东兴屯的老乡发现后，立即用担架把张泉山抬到曾家堡，见到了县长赵天野后，曾家堡的群众又用担架把他送到县城医院医治，不久就恢复了健康，又重返前线。解放后，张泉山和关金禄始终保持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1948年8至9月间，驻逊河骑兵连指导员景春荣（又名景帆）带领两个骑兵班到腰屯驻守，以防土匪切断孙吴至逊克通道，同时伺机进山剿匪。一天，部队感到情况异常，自清晨到中午，只见公路上只有西去孙吴方向的行人，却不见东来的行人。于是，景春荣带领通讯员和几名战士朝孙吴方向步行查看情况。行至曾家堡飞机场，向村中瞭望，发现曾家堡村中有的房上有人，断定是敌人

哨兵。曾家堡村南是逊别拉河，河南岸是山，北岸是防洪堤，部队从堤坝外侧隐蔽向敌人接近，每隔20米布置1人，景春荣同通讯员和掷弹筒手在村正南方向。这时，村中敌情看得很清楚，土匪中有的备马鞍，有的搬动衣物、粮食、黄烟等物品，似撤离之状。景春荣下令射击，一时间子弹夹着炮弹飞向敌群，近百名土匪顿时慌作一团，来不及带走抢来的东西，翻身上马边逃边还击，往北山逃窜。此时，部队年轻的掷弹手歼敌心切，将掷弹筒移到坝上射击，景指导员立即去拉，但为时已晚，该掷弹筒手被敌人的子弹射中当场牺牲。通信员把他的拖下坝来，用草覆盖上，继续向敌人射击。100多匪徒逃进曾家堡北山，我方实在人少，无法追击。战斗结束后，进屯搜查发现，被我方击毙的土匪尸体有十多个，还有衣物、粮食、黄烟等来不及带走的东西。黄昏时分，孙吴县长赵天野赶来，不久，孙吴县公安大队也赶到了。当下研究决定，曾家堡由县公安队留守，景帆带原班人马赶回腰屯驻地。这就是当时孙吴盛传一时的“以一胜十”的战斗。

在部队剿匪的同时，孙吴县委始终坚持积极做好土匪反正的宣传动员工作，使大批土匪放下了枪，余下的小股残匪在深山密林里东躲西藏，在我强大的攻势面前，他们有的想投降，又怕政府不宽大处理，想继续为匪，还怕以后没有好下场，正在这矛盾心理、处境困难之际，县委抓住时机持续开展政治攻势，除广泛宣传人民政府宽大政策外，还在城乡张贴布告表明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彻底肃清残匪的决心，公布人民政府的政策，对弃暗投明，悔过自新，安分守己，回家为民者，人民政府绝不追究既往。若

不降，第一次被抓除罪大恶极的以外，经教育予以释放；第二次被抓则一律枪毙。在做土匪的反正工作上，将俘虏过来的土匪，拿路费送回家。这样，土匪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向人民政府投降。王钧回忆说："到1948年秋，土匪抢了很多伊春林区的马匹和粮食。年底，我们警卫团住在通北阻击。当时我们为了消灭土匪，和地委、孙吴、逊河县商量，就是做争取鄂伦春人民的工作，我们在很多地方设了供应点，开商店，向他们供应日用品，公买公卖，象孙吴、逊河、奇克都设过点。我们的口号是不打鄂伦春人民，这伙鄂伦春人民本身开始分化了。后来鄂伦春派一个莫德林下来，经过北安、逊河二、三次谈判，确定了逊河南山的甫洛口子，建了新鄂村。至1948年底，李云鹤那伙人也被我嫩江部队逮捕了，这样黑河地区的土匪就基本上肃清了。"在党的政策感召下，1948年12月，活动在嫩江、瑷珲两县三站、四站的一股土匪被击溃后，余部残匪七八人无计可施，向孙吴县人民政府投城。孙吴县保安队在队长李心惠带领下，出动1个排30余人乘5张马爬犁行程150华里，到三站附近的山里取回土匪抢劫的粮食、布匹、猪肉等物资，连夜返回孙吴。1949年1月，县委组织干事徐桂芝、宣传干事单景春带保安队17名战士乘马爬犁到八九十里外的清溪车网子窝棚收降活动于大岭、朝阳山一带的李文远部。双方接触后，徐、单二人向李宣传党的政策，李提出三个条件：不杀头；财产归己；安排职业。随后，同意投降。由李文远写信一封，单景春乘马爬犁前往收降。缴匪14人，马14匹，枪14支，子弹3900发。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孙吴境内最后一股残匪。至此，孙吴剿

匪取得了彻底胜利，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人民政权威望逐日增高。

在两年多的剿匪斗争中，孙吴的剿匪部队和自治民兵，奋不顾身，奋勇杀敌，许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共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牺牲的干部、战士130余人，知其姓氏的烈士不足百人，许多无名烈士长眠在孙吴大地上。从沿江到腰屯平原，从山区清溪到铁路沿线。放眼孙吴，青山处处埋忠骨，浩气长存天地间。党的优秀儿女，在创建孙吴这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后人将永远怀念他们。

剿匪斗争的胜利，保证了孙吴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巩固的后方基础，保证了发动群众和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剿匪之前，土匪活动频繁，在他们的威胁破坏和造谣宣传下，老百姓不敢接近我党，发动群众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开展剿匪斗争后，使群众免受土匪之害，受到群众的欢迎，通过发动群众进行剿匪和在剿匪中发动群众，促进了群众工作的深入发展。随着剿匪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为老百姓创造了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群众通过我党我军的行动，转变了认识，相信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胆参与剿匪，为剿匪部队带路，主动提供情报。群众积极参加自卫队，民兵涌跃参军，为扩充主力部队提供了兵源，使二线武装经过剿匪斗争的磨炼，升为主力，直接开赴前线作战。进而，广大群众在当地党组织的带领下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拥军优属、支援前线、保卫胜利果实的革命热潮，为配合全东北一盘棋，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六章　实行土地改革，开展大生产运动

一、贯彻《五四指示》、《土地法大纲》，进行清算分地斗争

（一）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策略

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五四指示）中明确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的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领导农民土地斗争的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纲，是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上正式提出来的。这次会议突出强调了没收土地的重要性，指出："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的要求，应当列为一种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田地交给农民"。

自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我党工作主要局限于国民党内部的组织工作。从中央来说，对于随着各地农民

运动（主要是广东）的开展，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所出现的强大革命风暴，促使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心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因此，在土地政纲中明确了：第一，不仅有最终目标，而且有共产国际所缺乏的最终目标之前的过渡政策（即减租）。第二，不仅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而且宣布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第三，把土地问题同政权和武装斗争联系起来。革命的工农必须获得解放，要将农民协会发展成为“乡村农民自卫军”，以维护农民的利益。以上三点说明，中共土地政纲的确定，一方面是共产国际正确指导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对农民土地斗争的实践，又给以补充、丰富和发展。

从1924年到1927年初这段时间里，由于国共合作加之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工作，农民运动（特别是广东、湖南、湖北）得到迅速发展。但是，中国农民为摆脱贫困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反而引起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惊恐和攻击。最终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随之改变。总的可看做三步来进行：第一步，将“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改为只没收富农的出租土地，给他们以经济出路的政策。也就是说，党的土地政策的转变，是以富农政策开始的。因此，以致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有了前车之鉴，孙吴县委干部对这一问题理解的透澈，带领和发动群众斗争方法得当，全县土改时对富农的政策把握在全省看也是最稳最好的，没有出现大的差错。第二步，将“地主不分

田”的政策改为也给地主分配一份土地，给他们生活出路的政策。第三步，全面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

党的土地政策的转变，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具体实施。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的变化，过去是正确的策略路线，在现在也不能采用了。”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政策。

（二）土地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进占沈阳以后气焰十分嚣张，妄图一举消灭我军，独霸东北。四平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向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猖狂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占领长春、吉林，直抵松花江南岸，战争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我党必须尽快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便有力的支援前线，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而实行土地改革，是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打败国民党进攻的关键所在。仅就孙吴县说来，抗战胜利后，被侵略者强占的山林和土地回到孙吴人民手中，仅耕地就十几万亩，如果我党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我党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

实行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彻底摧毁

封建经济基础的中心环节，也是与消灭土匪、根绝其反动势力相辅相成的一项重大的革命行动。同样，也是孙吴人民的根本要求和迫切愿望。日伪统治时期，孙吴土地经营制度极不合理。尤其开拓民的侵入，侵占了农民大量土地，日本侵略军并村合屯任意圈地。抗战胜利后，一些老牌的乡村土地占有情况大致是：占户数5％的地富，占地65％以上；占户数25％的中农，占地20％多；占户数70％的贫雇农占地才百分之十几。如霍尔漠津屯20户满族人有312垧土地，其中一家地主占有120垧，四季屯30%的土地在地富手中。孙吴地区农村阶级关系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雇工多。大多都是从山东、河北等地逃荒来的农民，靠“扛活”和打零工过日子，其人数占农民总数的40％以上。二是经营地主多。孙吴开发历史较短，1932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孙吴，他们以各种面目经营土地，并从国内派来开拓民，控制当地农民，大量的耕地被日本人操纵经营，因此，以经营土地为标志的大地主恶霸没有真正形成。日本投降后，被抓到此地当劳工侥幸活下来的人，大部分返回家园。土改前有些财富的商人、地富，也闻风纷纷奔往内地（北安、哈尔滨、关内），携财逃逸。留在孙吴农村的有当地户，也有抗战胜利之前的外来户，这些中小地富在日伪时期，为了维护其利益，多多少少与日伪反动势力相联系，敌伪实行的“粮食出荷”政策，一方面地富自身有“纳贡”份额，另一方面通过出租土地和雇用“长工”，又变相地将部分“出荷”任务转移给农民，实行剥削。广大农民被迫按定量廉价出售粮食，佃户的工钱同样也被克扣。三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相

结合。地主多兼营工商业，发财后再去购置土地，也都放高利贷。四是雇农多。农村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没有能力种地的雇农。如“半拉子”生活更苦，活重而杂，工资不及整工的一半。“青户”租种地主的地，由地主出种子、农具，“青户”耕种，实行秋后按比例分配。一般是主七佃三，这种剥削也是沉重的。“青户”一般是全家参加劳动，丰年能勉强糊口，灾年就得乞讨为生，以至难以活命。佃户租地主土地多为实物地租，地租量一般为四成，有的为五成。每到“出荷”时限逼进，日伪军警、协和会、兴农会的汉奸们强迫农民交粮，到处搜索，翻箱倒柜，殴打农民。中国人吃大米白面犯经济罪，一但在公开场合因病及晕车时呕吐发现有食细粮者，立即遭拘押毒打甚至丧命。伪满时纳税多达34种，每人每年平均负担税额6.98元，还按居民摊派公债和义务储蓄。农民在层层压榨下，只能用杂粮、橡面、糠菜充饥。

（三）贯彻《土地法大纲》，进行清算分地斗争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并指出“解决解放区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中共北满分局结合实际情况讨论了贯彻《五四指示》精神，决定组织工作组下乡发动群众挖掉穷根挖掉坏根，彻底摧毁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和肃清解放区的国特，清算分地，实行土地改革。7月7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即“七七决议”）明确提出，要把发动农民，同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地分粮

斗争相结合。号召共产党员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下乡发动群众，把进行土地改革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孙吴县的土地改革比内地晚，大约向后推迟了一年。但早在1946年3月，即出台孙吴县政府布告第八号：兹将敌产开拓地、满拓地，无代价的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期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这就是孙吴土地改革的先声。

6月初，黑龙江省工委召开了全省各地工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牟海波书记、赵天野县长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贯彻五四指示问题，决定在政治上打垮地主封建统治，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即由先前对地富的减租减息变为没收其大部分土地。会议还强调，要克服包办代替的作风，走群众路线，在斗争中，注意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当时，对剿匪部队也有明确指示：今后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全力支持土改，坚决为贫雇农服务，保卫农民彻底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与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达到农民彻底翻身。在全力支持土改中，应着重执行下列各项政策：一是非在特殊紧急上级准许情况下，部队一定要自己背起背包行李武装徒步行动作战，不坐劳动人民的车马爬犁；二是听贫雇农指挥，给贫雇农当长工，为贫雇农服务不辞辛苦，不增加负担，不得报酬，不接受贫雇农及其他人礼物，受贫雇农批评审查，不偏私，不包庇，大公无私，奉公守法；三是保障农民的翻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绝不干涉、压制、包办、代替，一切由农民说了算。四是遇有反抗土改的反动言行时必须积极行动坚决消灭之，决不使其苟延残喘，免除后患。关于形势与政策的学习，排以上干部研究学习《毛主席12月25日的报告摘要》、《北满省联席会通知摘要》、《刘少奇同志在土地会议上结论提纲

摘要》、《土地法大纲》、《告农民书》、《关于土改补充办法》、《人民法庭条例》等。战士深入了解其中的相关内容。在经过广泛土改教育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损害群众利益等行为，不问其出身历史如何，均须给以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军籍送交人民法庭惩办。对编入生产队的干部、战士除进行上述思想教育外，还要进行大生产和劳动意义的教育，并抽出十分之二时间进行时事教育与文化学习，抽出十分之三时间进行射击、投弹、刺杀、行军的教育与演练。为有力支持土改，确保部队巩固，在思想教育中对于现有成分要采取首长亲自谈话，农村调查坦白反省等方法作彻底了解，严防奸细分子及阶级异己分子隐藏面目阴谋反把。坚决反对违背党的政策、违反阶级立场、违反革命军队优良传统作风和各种损害群众利益、干涉地方工作、打骂欺压群众、同地主富农及其他坏人拉拢、撑腰来往、违犯法纪、不听命令、不执行纪律、不爱护群众、不尊重政府等行为，以及骄傲横蛮的地主富农恶霸立场与军阀恶习。反对一般生活中的剥削思想与伪满习气，如贪污腐化、自私自利、吃喝嫖赌懒、图舒服享乐、计较权利、生活特殊、不艰苦朴素等；反对内部关系中的瞒上欺下、作假报告、两面派作风、自由主义恶习、不服从组织、不维护真理、私人拉拢、邪气十足等。1946年年中，孙吴县招收一批青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的到保安队（队伍扩大到四五十人，后来发展到100多人），有文化的开办青年训练班。7月，县工委举办了首届知识青年骨干训练班，参加学员40名。以此为基础，8月，县民运工作队成立，由王树棠主任负责，下设调查、宣传两个组，分别由冯兴义、王

宜民担任组长，从训练班选出18名骨干充实为工作队员。之后，集中教育培训工作队员如何确定阶级关系，如何划分雇工、贫农、中农、贫佃、富佃、富农、经营地主、大中小地主、二地主、游民阶层，了解掌握政策，搞清各区街及农村各户的成分。

1947年5月，全县反奸清算斗争开始。先在城镇，后在乡村；先从经济斗争开始，逐步发展到政治斗争。清算斗争首先是在柈子场进行的，然后在西窑地、西地营子、铁道北、小南屯，以后扩展到清溪、曾家堡、吴家堡等地。县民运工作队首先在孙吴镇调查工商界的资本家，之后是农村地富情况。工作注重在伪满商店克扣物资、侵吞敌产情况，对私人手工业、服务业等实行了保护、支持和和平过渡、合作改造等政策。工作队向群众反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有冤申冤，有仇报仇，向剥削者进行清算斗争。清算日伪时期克扣群众的孙吴街老昌泰等14家配给店，查没了他们的非法所得，分给穷苦的群众。不久，逐步发展成以斗恶霸、挖匪根、揭发窝主为内容的清算运动。通过对有民愤的“把头”及伪警宪特等进行政治斗争和对个别奸诈商户盘剥平民的经济斗争，配给店主老老实实向政府、人民低头认罪，罪大恶极的警宪特份子和恶霸地主、挺匪头目被人民政府逐一镇压。全县被清算的有80户，店主和地富全部被押在县城一废旧冷库里等待处理。清算中，县委和工作队员牢牢掌握政策，采用说理方法，算剥削帐。工作中，大部分村屯比较稳，少数村屯出现打人行为，对罪大恶极的极少数坏人处以极刑。1948年2月21日，根据上级统一部署，组织了全县范围

内的特别行动，逮捕伪警宪特、土匪、地主等95人，集中劳动，交待问题。其中，交群众处理的32人，归为劳役的25人，继续审查的31人，当即释放3人。当时的腰屯区枪毙了5人，他们中有伪保长、挺匪团副、妓院老板、地主兼土匪和参与杀害我接管干部的凶手等。如腰屯恶霸地主关喜详，群众称谓“土皇上”，处决时，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同时，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当地的青年干部和农村的骨干力量。当时，黑龙江省委汇编了一本反奸清算斗争的书，其中有一篇是孙吴县委书记牟海波同志撰写的文章，记述了孙吴县委如何领导反奸清算斗争和发动群众的情况。

清算斗争结束后，民运工作队重组为土改工作队，由赵天野书记、章子冈县长负责，成员有冯兴义、单景春、鲍玉柱、张起云、张志贤、洪涛、张超云等。1948年2月25日，黑河地委发出《今后工作方针与任务》指出：“今后总的工作方针是集中一切力量，贯彻土改，大胆放手充分发动整个贫雇农阶级，实行彻底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与半封建制度，达到贫雇农阶级彻底翻身，真正当家作主。”随后，按照地委的指示精神，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首先，规定了土改工作队的纪律：1.站稳贫雇农立场，坚决与地主富农阶级为敌，绝对不包庇，不受拉拢。2.与贫雇农直接见面，不包办代替，一切经过贫农大会。3.不贪污斗争果实，不吃、不拿、不买、不换。4.不做假报告，不自作主张，不假造贫雇农民意，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5.努力学习，向贫雇农学习，同志间互相学习，互相批评，互相勉励，不断进步，提高自己。6.不住大户，一定住贫农家里，同贫雇农一起生活。7.无极特殊工作，不骑马，不坐车，不

私派贫雇农爬犁。土改运动大体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发动群众，算苦帐，伸冤仇，划阶级，定成份，追浮财，比人品，继续深挖、斗争地富和伪警宪特等坏人。通过宣传贯彻《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告人民书》，向贫雇农交权、交底、交政策，一切问题全由贫雇农大会解决。划阶级成分采取张榜公布的办法，全县划阶级成份的结果是：雇农1 024人、贫农2 831人、中农1 429人，富农270人、地主23人。阶级成分划分后，掀起斗争地主富农、伪警察、特务、土匪和分房屋、起东西、挖浮财高潮。第二步是成立贫雇农团，整顿内部，分胜利果实，彻底分清土地。在分配胜利果实之前，重新复查成分，成立了贫雇农团，纯洁了农会队伍。正式分配果实时，先由贫雇农团讨论按物定价，然后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一般是按户、按人口分。最后，达到真正劳而苦干的贫雇农分到东西。同时，规定区村自卫队、留守部队，机关单位和农村享受供给制待遇者，在完成今年生产任务原则下保证：去年耕地交由贫雇农分配，绝不同他们争地；种地工具种子自备，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与麻烦；每季农忙时，每人各帮贫雇农两个工，自备饭菜不要报酬。

孙吴地方土改时，除沿江、腰屯一带和西部少数村屯分了部分房子和土地外，一区只分到浮财，因人员较少，种地户少，撂荒地和房子较多，可以自由种植和居住，即可按需所取。据统计，全县土地改革运动中，贫雇农分得生产工具及浮财等价值24亿元东北流通券；按照耕者有其田、人人均等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具体分配政策，平分土地近8 000亩，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把孙吴街地域的无地户和无

业游民，统一组织安置到乡下种地，稳定了社会秩序，减轻了城镇负担。夏秋季，进行了全县土改情况普查，纠正了个别的划定成分偏高、侵犯中农及工商户利益的偏差。

在土改运动中，按照各地经验和上级精神，注意了“夹生饭”之类的右的倾向，同时防止“左”的现象发生。土改初期，并没有象预想的那样，通过个别发动，确定斗争对象，突破一点，获取经验以推广全面，而是一开始就开展的不够彻底：有的地主虽被斗争，但没丈量地，没划地界，没有交出地契；有的假分地，瞒黑地，转移浮财等，斗争果实有很多户没有得到手。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个别区与部分村政权尚未经过改造，还仍以敌伪残余老一套在行事，成为落实相关工作的障碍，群众对他们都是敢怒不敢言。某些村屯积极分子队伍不纯，斗争放不开，骨干表现差，与广大群众结合不够，致使积极分子脱离群众，农民大多数表现斗争决心不够。但更主要的是地主的威风没有打掉，反攻活动的花样多，想搞垮农民中的积极分子。结果造成：农民存在后怕心理，地主存在侥幸心理。这一右倾现象如不及时纠正，不仅土改斗争会夭折，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不能彻底消灭，而且会使共产党失信于民。1948年3月26日，中共黑河地委发出的重要通知中提到：对土改与群运，基本上应采取稳健方针，不要性急，今冬明春完成土改也不算晚。因我地区坏人阶层如警察、特务、土匪多，社会情况甚至比南边复杂得多，宜慎重，且不易掌握。若搞的不好，可能促成城乡一些坏人联合反抗，加以楼匪未平，汉匪尚未完全肃清，需谨防地富坏人合谋大反把。在黑河，不应从土改搞迟了一

步去看，而应从复杂性着眼，实事求是，从具体情况出发，细致地去掌握党的政策，应有政策观点与策略观点。稳步前进，工作慢一些没有坏处。因此，在领导上不能放纵，不能贪求闹起来就算工作搞起来，这样一定走大弯路。应深刻慎重考虑如何使真正劳动者起来。在作法上应集中力量，逐步的、波浪式的开展，避免力量太分散。在步骤上采取剥简政策，先斗大中地主与恶霸富农，注意开始打击面不超过人口的10%，小一点更好，一般的等以后再说。并规定了土改的具体政策：

1.交权交底不是放弃领导，而是领导上应经常掌握，按政策与要求在一定范围放手让农民去办，并注意引导真正贫雇农起来，不包办但也绝不是任其自流，放弃领导的尾巴主义。发动群众必须把底（政策）交的清楚明确，南边的毛病主要是光交权未交底，应明确执行以下几点：一是尽可能缩小打击面，团结农村大多数，一般富农只动多余土地牲畜，家底不动；二是中农坚决不动；三是划阶级基本原则要扣的紧一点，对大地主恶霸剥削压迫人利害的可以狠斗，一般富农小地主只动多余部分，基本生活部分不动；四是伪官吏一般只斗政治不斗经济，斗本人不斗全家，贫佣中农内部臭根黑点一定不斗，实行教育改造方针。

2.一定要订死一条，即：进行斗争时对地富，严禁打人风气，保障部队机关学校整顿队伍不能打人，因打风一起就不去多想办法，打人且弊端很大，党员干部不能提倡打人，应说服并启发提倡多想办法。不准随便打死人，不准乱杀人，杀人（死刑）一定须经县以上领导机关批准，

除罪大恶极群众要求处决者挖完财宝后经人民法庭处死并且不连带其家庭，一般都不杀，留以后从容处理之。

3. 城市工商业坚决不动，并且派有专人或组织负责掌握与保护。

4. 对村干部的方针政策，有犯罪行为者可以处理，切忌不要打或打死，一般不采取打击方针，可在大会承认错误及由大家揭发错误进行教育，有政治问题者交公安部门，不能在群众大会上进行锄保工作。干部一般可在群众大会上审查，由群众提出意见后，再由领导全面考虑问题决定处理办法，这样来提高教育群众。

工作中，工作组认真贯彻东北局《关于“半生不熟”问题的批示》，致力把“夹生饭”煮成“熟饭”。其遵循的基本标准为：一是地富恶势力被扫除；二是解决了土地问题；三是群众有了初步的政治觉悟，农会和自己武装掌握在可靠分子手里；四是有较好的积极分子进行工作。并强调，农民是否真的翻身，主要是看他们是否真正拿到土地及生产生活资料，及拿到后是否坚决的保卫胜利果实，这就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提出了深入土地斗争的具体政策，使纠偏工作有了明确目标。

针对土改初期对中农团结不够、对富农和小地主斗争过火的偏向，以及对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维护其切身利益上，县委曾作过多次补充规定：对犯有政治错误的中农，应实行政治清算，但不能清算其经济利益；对普通小地主实行减租；而对那些缺少劳力或因无其它职业而出租少量土地者，不应以小地主对待。我党强调对地主清算除罪大恶极者严惩外，一般清算到中农经济地位为限度，给他们

以生活出路。县工作队通过广泛宣传，从理论上讲明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强调土改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不应超越民主革命阶段去消灭资本主义，并坚决抵制了这种错误行动。在清算斗争时，全县只是清算了14家配给店克扣、剥削群众的那部分，一些工商业者确因此而胆战心惊，有的开始准备向内地搬迁，有的准备关门停产。县里现定：凡属封建买办资本家，政治上坚决打击，经济上彻底清算，决不留情。对于逃跑的官僚资本家没收其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对民族工商业者则分两种情况：对少数与敌伪有联系并有一定民愤的，政治上给予应有打击，经济上给予适当清算，以平民愤，但不采取消灭政策；对于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采取了保护政策，以利发展生产。对小手工业者，不仅保护，还要扶植其发展，以活跃经济。布告一出，工商业者奔走相告，效果很好。在整个纠偏过程中，腰屯区追回因“清算”中的过激行为和某些地富妄图“反把”而非法向贫雇农索要的粮食1415斤、衣物30余件、磨3盘、牛1头、农具18件。

孙吴县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广大农民彻底翻身，当家作主，分得了土地、牲畜和房子等，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同时，在斗争中，培养了基层干部，建立了基层党组织、乡村政权和群众武装，广大的农村根据地进一步巩固起来。通过土改，居统治地位达数千年之久的地主阶级，终于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都被连根拔除了。

二、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改观经济面貌

孙吴县委县政府在领导剿匪和土改斗争的同时，为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满足当地人民的生活需要，大力倡导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开展了农业大生产运动。

孙吴人口有限，而且工人、小商人、无定业者占多数，如不从事农业生产，则无工可做，无利可图。1947年春，省委曾提出党委即农委，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生产。地委还相继作出了开展大生产、大开荒和节约运动的决定。孙吴县委经过调查研究，按照上级指示的“后方根据地贯穿全年的重点任务就是尽快发展生产，壮大经济”，“各解放区中心任务之一，是开展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使大多数生产者组织在生产互助团体中，是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在不妨碍战争、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部队、机关、学校仍要适当参加生产”等等，决定并组织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及时召开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生产会议，抽调干部奔赴生产第一线，指导农民适时保质保量地完成春、夏、秋季节性工作。首批确定的生产“基点村”有城区的西地营子、东部的曾家堡和东、西霍尔漠津，分别由县长赵天野、政治处主任王树棠、政委牟海波负责。4月初，王树棠带领民运工作队部分队员，深入东部的曾家堡村，进行换工插具互助生产试点（季节性的），并在全县推广。同时，牟海波政委率领部分工作队员到孙吴沿江地带开展工作，建立健全6个屯的农会发动春耕生产及其它工

作。当时确定农会是穷人真正的翻身组织，凡是当过汉奸、伪吏、特务、警察、胡匪以及吸大烟、扎吗啡、跳大神、耍大钱、勒脖子、溜沟子的一律不准参加。针对增产节约运动，遵循上级指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1.解除顾虑。有的户怕秋后打粮多了被清算；对伪满的出荷与我民主政府的收缴公粮不了解，怕把所打的粮食全都出荷；对发家致富兴家立业政策不托底。致使一些中农户不肯多种地，上年种的够吃即可，种多了怕清算。贫雇农与无业游民盼望清算，以为来年不用自己生产，等大户打下粮食分现成的。城郊缺乏现成耕地，城市居民和四周屯子不依靠农业为主者多，不仅缺农具缺技术，对种地不习惯，还怕累，不愿种地，不如做别的来钱容易，如捡洋捞、做木铁工、采木耳、跑老客、拉脚、采金子、拉煤、卖零工等。尤其是三个街的二流子，撵他下乡种地他不去，潜伏在街里与邻近屯子和你打游击，找点临时活，这些无定业现象很严重。针对以上问题，工作组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和宣传解释工作。结合土地改革，采取半宣传半强制的手段，将城区懒散户迁徙到各屯进行妥善安置，从大局上打消了人民生活无着、纷纷要求南迁的思想顾虑。1947年春，针对当时的牛马少，尤其是马，不少让土匪抢去了，其它生产资料也极度缺乏的实际，孙吴县政府以插具互助组为单位，互相联保，为农户贷粮22.6万斤，贷籽种6.6万斤，筹马23匹，贷款92万元东北流通券，缓解了全县口粮紧张和生产资料不足的问题。6月初，赵天野县长到沿江下乡，带头帮助霍尔漠津屯农户铲谷子。

六七月间，县民运工作队队员边生产劳动，边调查全县农村经济状况，帮助各村屯培养生产骨干，组织互助组生产，开展劳动竞赛。同时，还组织了农民生产训练班，对群众宣传的主要内容是：穷人为什么穷？农会是干什么的？今明两年怎样搞生产？宣传民主政府帮助农民发财致富的政策。1948年春耕前，全县贷粮种130余万斤，解决耕马66匹（已宣布所有权），在不同程度上稳定了局势，加速了农业生产，当年种地4 000多垧。

2.鼓励勤劳致富。部分农民受“穷光荣、富可耻”思想的影响，怕发展生产成为“冒尖户”，再挨斗被分，不敢添车买马。经过工作组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明确了农民所分得的房产、地产和个人生产生活资料的私有权并予以法律保护，还辅助性地出台了奖励生产、鼓励致富的办法和合理的负担政策。特别是对土改中少量中农的纠偏，给以适当补偿。这些政策的宣传贯彻，激发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勤劳致富的积极性。

3.大开荒。早在1946年前，孙吴县委领导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47年早春，动员部队及广大农户积极开垦土地，扩大种植面积，当年新开垦荒地达300垧，使1947年的春播面积达3 689.83垧，比1946年的1 849.6垧增加99.5%。1947年5月，县政府设立了沿江生产队，1948年改为公营农场，由集体所有按工计酬的生产队，一跃转变为全民所有，职工领取国家工资的生产体制。农机技术人员主动修复日伪时期“开拓团”的“小火犁”（即履带式拖拉机）1台，复垦生产。机关干部、保安队指战员自己动手，拾废物搞维修，开荒种菜种粮，生产自给，同时开

展增产节约运动。我十团战士开创了以人力代马耕地办法，9人拉一犁，每天耕一垧地的生产范例。当时，黑河地委书记林一心到孙吴检查指导工作，进行生产调查，和干部群众一起去拣废旧物。他看到部队战士、工作队员和农民用镐头、人拉犁开荒，机关部队增产节约的作法后，返回黑河于5月19日发出了“关于发动大开荒运动的决定”，推广孙吴的经验，学习这种苦干精神。

4.组织换工插具。互助合作化运动开始于1948年，土改结束后，当年8月30日，省委办公厅发出指示：“组织起来劳动互助，是搞好生产多打粮食的重要环节，是农业生产中每个季节所必须的组织形式”。孙吴县委根据此指示，针对土改后农户分得和占有的牲畜农具不均、单户耕地力量单一、耕地面积逐年增加等问题，认为没有换工插具，就不能种好地，多打粮。孙吴县按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开始组织临时互助组，不久发展到三大季节性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农民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生产资料仍为私有，土地经营不统一，只是用插组换工的形式，组织起来共同劳动，收益归己，公粮自交。从春种到秋收按生产季节一季一小清，打完场送完粮，全都结清互助组换工的帐，根据所规定的工资给粮。人畜换工比例为“开始两个人换一个马工或一个牛工，以后比例缩小为一个人工换一个马工或一个牛工。确定以中等好的劳动力、干活细致又快为标准（十分），每天干四气儿活，每气儿记二分半，强马多记分，弱马少记分。根据每个季节人马工的劳动轻重确定，以苞米为标准：种地时人工20斤，马工

40斤；铲地打羊草开伏荒地人工27斤，马工40斤；拉地打场人工20斤，马工25斤。若第一次结帐欠下到第二次结帐还时加利10％，二次25％，三次40％，四次50％。起初，有19个互助小组。到1948年，仅腰屯区有季节性的插具互助组106个。到1949年，全县共有328个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农户为1145户，占全县总农户的48.2％。县工作队一边参加生产，一边调查全县农村经济状况，协助各村屯培养生产骨干，发挥妇女干部优秀青年人的作用，组织互助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有的还克服畜力不足的困难，组织开展牲畜防疫，选择良种，改良农具，推广耕作新技术，排水治涝，发展副业生产等。另外，县政府还辅以发放贷款，帮助农民解决购买牲畜、籽种、农具、草料等缺少生产资金的困难。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各村屯的插具互助、劳动竞赛都搞的轰轰烈烈，群众从来没有过这样高的生产热情，农业大生产运动取得显著效果，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为全力支援前线，减轻人民负担，解决财政困难，紧缩银根，又相继抓了几项工作：一是精编机构、人员，根据“紧缩精干”原则，孙吴县委机关实有干部7人（其中，警卫1名，交通员2名），以减少人员开支实行供奉制。二是因孙吴地域正处在严峻的斗争中，根据地还不牢固，为保障我党我军思想、组织、政治上的纯洁，严防奸细分子混入，或利用男女问题做鬼，因此，对于干部结婚，要求有所限制。曾规定1947年底之前，8个月内禁止干部结婚。8个月期满后，地方现任县级且军队为团级干部，党龄

7年以上，年龄在28岁以上者，准予结婚。未满18周岁的女子，禁止与男子结婚。凡已结婚，其丈夫或妻子现在关内解放区者，不许重婚。结婚仪式必须从简，反对铺张、奢靡、淫俗的习气。三是县委为照顾身体有病的干部，依照保健之暂行办法，一次性予以保健，保健费的物质标准分为四等：甲等以每月十斤猪肉计，乙等八斤，丙等六斤，丁等四斤（1946年10月后实行的贴补）。四是降低后方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标准。决定适当紧缩开支，停发临时费及特别费，实行新的供给标准。自土改任务下达后，全年蔬菜旱烟自给，粮食自给3个月，并打下明年（指1947年）完全自给的基础。部队以全自供自给为原则，规定每人种地一垧，种菜五分地。机关每人种地3亩，种菜五分地。部队、机关均应斟情种植烟叶。烤火木材，部队自给，机关自给一半。严格反对贪污、腐化、浪费、现象，加强组织纪律领导，厉行统筹统支，克服各自为政闹独立的思想，领导干部应经常督促检查。各机关部队成立生产委员会，负责计划、督促生产节约任务的完成。五是干部家属的供给问题重新做出决定：凡在抗日战争时期及以前各个革命阶段参加革命的夫妇或在革命队伍中相结合者及其子女，他们已与家庭长期或完全脱离关系，对外已无任何之经济资助，其生活应由公家按标准予以供给；凡在最近两年来及今后一个时期在东北解放区参加革命且按供给制待遇者，对其家中之配偶及其子女概不另行供给；凡在职各级工作部门之工作人员，如系按薪金制待遇者，一律实行薪金制，不得改为供给制。反对只搞农业手工业

生产不搞商业生产节约，反对浮报人数吃空额发洋财、卡冤枉、打埋伏等。通过增收节支，恢复了县域经济，为提高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七章　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建立基层党组织

一、发展生产，恢复促进工商各业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获得解放。孙吴县域内土匪基本被歼灭，生产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继农业大生产运动之后，又完善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自土改以后，部分干部和农民群众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方向还很不明确，主要表现为有平均主义的思想倾向，害怕经济发展产生资本主义。在少数干部中，甚至发生违反群众自愿的原则，采取命令的手段组织合作的错误作法。县工作组按照上级精神，及时贯彻党的发展农业的基本方针，一方面积极鼓励农民生产发家，勤劳致富，批判好吃懒做、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观念；一方面规定具体政策：1. 确定与巩固农村各阶层财产私有权。土地改革并不取消私有制，只是废除封建的私有制，代之以农民的私有制，农村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经济，颁发地照、房照，确定地权、房权，允许自由处理。同时在确保自身劳动的情况

下，允许雇人经营和正当的债息收入，允许特定条件下出租土地（比如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所得完全归自己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承认个人经营的权利，保障交换自由。2.公平合理，公私兼顾的负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规定统一的农业税率。1946年，确定按全县全年产粮的20%的任务交售公粮，一年一征收。同时取消一切杂税。3.实行生产奖励政策，鼓励精耕细作，开垦荒地，发展副业和手工业，奖励多种经营和改进、发明农业新技术。4.加强对村干部与农民的教育，组织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培养农业生产干部和合作事业干部。党的这些经济政策的宣传贯彻，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孙吴县委县政府提出近一时期农业的基本措施应以精耕细作、发展水利、提高产量为主，以奖励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为辅。

为了完成年度增产目标，采取了如下做法：第一，总结交流农业生产经验。相继有“曾家堡村换工插具标准及劳动纪律规范”、“清溪村互助大开荒”、“召开全县各屯长、农会主任、生产委员农业生产经验交流会”等经验在黑河日报上发表。1949年初，解放后的孙吴召开了首次劳模大会，各路英模登台接受党和人民的褒奖，涌现出省级劳动模范5名。其中省级特等劳模智玉魁（女），作为黑河地区代表赴省城齐齐哈尔参加全省劳模大会。适时召开春耕生产现场会，展出改良的农机具（犁杖、苞米脱粒机、除草机、小铧犁、畜力圆盘耙等）和各种作物优良品种，促进农业发展。第二，组织以换工插具为基础的互助合作，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绝大多数农民逐步地由起初的

以供销及生产合作互助为基础，朝着农产品集体生产最后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轨道。第三，奖励发展牲畜。开办兽医训练班，加强牲畜防疫，推广优良品种，强化繁育技术，严禁屠宰耕畜。第四，奖励开荒，扩大耕地面积。鼓励农民开荒种地，规定有大牲畜的农户必须进行一定数量的开荒，否则将受到处罚。并有开垦撂荒地当年不纳税，开垦生荒地3年不纳税的优惠政策。第五，发放农贷，解决农业生产困难。最先的农贷以实物无息贷给农户，并组织从外地为农户调来部分籽种，有力地帮助了那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又缺乏畜力、籽种的困难农户，以及那些生产成绩显著的互助组，解决了当务之急。第六，兴修水利，抗旱抗涝，主要是挖沟排水，筑堤防洪。第七，发展副业，以副养主，县委要求因地、因人、因时制宜。发展生产不仅仅是男人的事，妇女、老人、儿童都要想方设法谋生计，多组织人们上山拉套子、烧木炭、打渔打猎、搞纺织、编织、集柴草、搞运输等，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

由于落实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先后克服战胜了1947年晚秋的大雪、1948年的洪水和1949年的干旱，获得农业丰收。1948年全县总播种面积4 902.7垧，比1947年增加30％。1949年粮豆总产946万斤，比丰收的1948年增长35％，基本完成了农业生产恢复任务，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1949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43万元，其中种植业77万元、林业3万元、牧业39万元、副业23万元、渔业0.8万元。

按照东北局一贯强调的：“群众优势确立地区的工作

中心，主要是生产和教育。”孙吴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工作提到了党的工作日程。解放初，县政府发布动员并积极组织手工业者采取生产自救的方针，使许多原来关闭停业的私人作坊相继重新开业。1946年，县政府将私营的“福瑞祥”火磨收归国有，办起第一家县属地方国营工厂——新华工厂，加工米、面、油和酿造白酒。该厂初建时，只有粮油加工和汽车维修车间。1946年8月，公营“大众商场”在县城正式开业，是将接收的部分敌伪物资和原“永茂东”、“德丰城”、“大隆五金行”三家私营商号集中到一起开办的，经营百货、五金、食品、日用杂货和土特山产品。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间，县政府为了保证军需民用粮食，多次颁发布告，严禁用食用青苞米和用粮食酿造烧酒，号召全县居民对各种粮谷要妥善保存，严防损失浪费。1948年5月，大众商场合并到贸易公司，作为其中的一个零售门市部，将三家私营商业的投资退还原主。组织农民生产毛皮、药材、肉、蛋、盐、碱、猪鬃、马尾等土特产品及粮食，通过贸易，为国家代购大量农副产品，运往北安等地出售换回所需物资，为农民提供生产工具、种籽、种畜、布、棉花、火柴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既活跃了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农副土特产品货源，在经济上解决了不少问题。在筹建初级供销合作社模式的基础上，试办了清溪村股分制供销合作社。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以上由公营、集体企业营销。194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47万元。县委提出的“以农为主，城乡兼顾，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经济方针，为建国后县域经济有计划发展指明了方向，逐步形成了公营、集

体、公私合营、个体、私营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形式。

为保障人民日常生活及必需品的供给，1946年至1948年孙吴设立运输贸易团，由三个分团组成，拥有4马拉胶轮车90余辆，属孙吴贸易公司领导，其营运路线有北安、嫩江、黑河、逊克等地。外运物资主要是铁筋、铁瓦、木耳、皮张等；运进来的有火柴、食盐、棉布和米面等物品。当时营运路上有挺匪出没拦路抢劫，故每逢贸易团营运车辆出发时，县保安大队均派武装力量押运。当时的路况翻浆严重，车辆难行，往返北安、嫩江均需半月左右的时间。早在1945年12月7日组建县政府机构时，政府机构内设有财粮科，由于当时土匪活动猖獗，对我新政府威胁很大，市面一直不景气。针对店铺萧条，1946年初，县里发布告规定:“市内各摊床营业地点虽于本年3月4日以县政府布告第六号指定在案，但为求市街发展，将于永代路（现在的解放路）东春阳街（现新华书店以东）开辟市场区（当时称杂市），仰各摊床业者自布告之日起即迁至指定地点按指营业”，确定了交易市场。集市贸易的上市品种除农副产品、粮食，还有日本人逃跑时遗弃的衣服鞋等日用品。这时县政府管粮食的机构财粮科的任务主要是筹办军政用粮、饲草、马料等。9月间，县政府按上级精神又做出规定：为使商业生产统一于县政府，以免妨碍部队工作及党员干部贪污腐化堕落，违反政策与民争利，各部队、单位生产及工作应转到工厂作坊农业生产方面及合作社，不许做买卖，严禁采购本地食粮出口。县内任何部队地方团体无与外界任何单位及个人订立采购食粮合同之

权。县里必通过单一的贸易单位或联办财办，委托本省贸易局采购各种食粮工作。地方党政机关方面只准贸易局所属系统开设商店，除此以外的各级商店应立即取消。所有贸易机关人员不准穿戴军服佩枪，藉口官办欺压人民，违者重惩。为补助各机关部队的开支，除剿匪部队战时不能生产之外，所有在家的军人、机关和学校俱应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副业生产。

1947年，县政府财粮科改称生产科。期间，由于耕种粗放，生产力低，粮食单产不高总产不稳，每年征收的公粮数量有限，城镇居民的吃粮大部分靠外进，进入孙吴地区剿匪的部队用粮有相当部分是从德都、北安、克山、逊克等地调入。居民的少部分吃粮靠贸易公司从外地购入的棉花、布、食盐、肥皂、火柴等日用生活品向农民换取粮食。由于一年来的土匪扰乱，到处抢劫马匹、食粮、衣物，使群众不能种地，吃饭穿衣陷入极端困苦境地。当时，我党口号是：挖匪根，好生产；枪不缴，根不断；根不断，留后患。同时，县政府为解决滞留劳工和工人的就业问题，动员、组织他们到农村种地为生。1948年1月县政府取消生产科，成立贸易公司，公司下属第一商店主管油米面粉加工厂、运输车队和出售米、面、油、酒等。1948年土改以后，土匪已基本肃清，政府向农民颁发了土地执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涨。相继建起四季屯粮库和孙吴粮库，以收购沿江一带的粮食和负责水上调出的装船工作。孙吴粮库，又名公粮库，兼管收购、储存和供应，当时城镇居民的粮食供

应曾有一段时期是不限量的。1949年夺得了丰收，全县种地8.8万亩，粮豆总产达到968万斤，平均亩产110斤，完成征收小麦130万斤，征收大豆206万斤。

孙吴早期的交通工具是花轱辘车、爬犁及役马驮运。1945年抗战胜利后，日军溃逃时将铁路、隧道、桥梁和机场炸毁，站房、仓库、营舍放火焚毁。当时，孙吴硝烟弥漫，交通中断。同年，苏军为了抢运“战利品”，将铁路修复通车，日夜往江北抢运日军遗留我境内的大量物资。最后，苏军又将铁路、隧道、桥梁炸毁。1946年，黑龙江省军区警备三旅后勤供给处在孙吴新华公司设汽车队，李汉德、蒋成章先后任队长，修复了6台日军遗留的汽车，主要用于军需。1947年转移到北安，又修复2台。此间，还有李汉臣、杨万昌、董志文、李文清等私人经营的7台汽车，往返于北安、嫩江，主要运送民需物资，也捎脚载客。1948年时，县内设运输贸易团，由三个分团组成，最多时共有90辆四马胶轮车，往返于北安、嫩江、黑河、逊克。此时汽车的主要燃料是木炭，因道路、桥梁多年失修，破烂不堪，夏秋很少驶车，结冻期才能畅通。1949年，修整了重点路段，并维修了孙吴大桥。此后，改变了人们去黑河、逊河等地只能在冬季通行车辆以及人行需架设浮便桥的窘况。

1947年3月，成立了孙吴县邮电局，石忠信为第一任局长。当时，仅有电话所一处，内装置电话交换台，两个电话，仅能通至哈尔滨，本县通达各区。石忠信在《解放后的孙吴电信》一文说到：“邮政只有王文斌一个人，当时报刊信件也不少，只是在来回的马车上挂上邮政旗帜捎

脚。当时的电报是将电码用电话传，主要任务是保证电话畅通。

黑河原来对外邮政、电话都不通，通讯联系很不方便。1947年秋，西满军区司令部三科科长兼黑嫩省政府邮电管理局局长赵新田召集各县邮电局局长会议时，赵新田给我写信，让我凭信去黑河找司令员王钧、政委林一心、专员许烈和岳林同志。在地委、专署领导的关怀下，黑河邮电局宣告成立，任命我为黑河邮电局局长。1947年10月1日，黑河邮电局向全省邮电局通报、通话、通信，受到了地委和专署领导的好评，也受到群众的欢迎。黑河邮电局成立后，对黑河贸易局、黑河金矿局对外贸易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我们国家经济困难，省邮电管理局只给发些电信纸和邮票，经费开支由自己动手设法解决。尽管这样，同志们也为有了自己的邮电事业而高兴，工作干劲实足。1948年12月我们还帮助逊克县成立了邮电局。”

因孙吴县范围小，没有建立任何邮务机构。邮路由孙吴经清溪、辰清至北安210公里，邮件由孙吴至北安的6辆经商马车不定期代运。1948年，县委设机要交通员。同年在奇克、逊河各设邮电所一处，受孙吴邮电局领导。邮运方式是依靠去北安做生意的私人马车和汽车，邮局派人押运信件。

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孙吴解放后的治安状况日趋好转，对土改斗争、大生产运动、恢复发展经济等项工作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断适应了人们时时期盼的生活有保障、社会求稳定的良好愿望。

二、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从内战一开始，为痛击国民党的进攻，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孙吴县党政军各级组织，在放手发动群众、肃清日伪及国民党土匪武装、发展壮大人民武装、收集资财、创建根据地的同时，始终围绕如何配合正规兵团，致力支援东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这一中心运筹和实施工作。做为地处战争后方的孙吴县，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首先发动社会全员，做好对剿匪部队的民工、担架、车马、医药、粮食、被服、军需等后勤的供给，在保证拥有一定数量的地方武装的基础上，配合派入的正规部队，进行清剿土匪，并使地方自治军从中得到锻炼，进而逐步扩大武装，以达到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目的。在黑河地区全力剿匪之时，在地委下达的紧急文件中提到：第一，孙吴、逊克两县应保证剿匪部队有足够用的粮食、马料及运送粮食、弹药、伤兵的民力、担架、车马等。第二，组织群众将一切粮食、财物、牲口及不能一时打完的庄稼拉到较安全可靠的地方去。第三，动员爬犁马匹入山时由县统一调动，担架队准备两批，每批50人。第四，不暴露外人的财物，保证自己的财物不被胡子抢去。在黑、嫩、合三省联合会剿楼汉股匪之时，东北局指示，各地保安队的任务是担任防卫保证不被胡子抢走马匹、粮食、衣物，配合前线部队追剿残匪，尤其要充分利用冬季尽快肃清胡匪及反动武装。若不尽快地连根剿除土匪，就不能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和更好地支援前线，将来危害更无穷尽。

在保障剿匪部队粮草供应上，可根据人民负担情形临时借粮，以后由政府还给或从公粮中扣除。在3年多的时间里，孙吴县直接参加剿匪的民工有千余人，运用了500余辆爬犁和胶轮大车，动用马牛等大牲畜2 000余匹次。仅沿江各屯，当时由西屯农民曾德记带队，给驻扎在孙吴县城的剿匪部队运粮一次性用马爬犁100余辆。

支援前线的战争是孙吴县工委和政府的一项繁重的工作，在赵天野县长的带领下，干部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组织、收集、运送和提供后勤保障上不仅仅要当好剿匪部队的后勤，还要为整个东北的战争这个大前线当后勤。因为孙吴是伪满时期的军事基地，有很多日军遗弃的枪炮弹药，前线急需这些物资。1946年春，省警备三旅九团、县保安大队和三旅供给处，动员全县群众，四处采点，集中力量收集日伪时期孙吴军事基地的各类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收集到重炮、迫击炮数十门，废旧汽车100余辆，大批炮弹、子弹、枪支等，那时的交通工具就是大胶皮车，每次征用（或雇用）胶轮大车十几辆或几十辆，将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省城北安，一个来回就得十多天，路上还得有战士护送，直到次年春，全年都没有间断，有力支援了黑龙江和东北人民解放战争。时任县委书记牟海波讲："遗憾的是这些由孙吴提供的军需物资没有一个精确或一般的统计，当时只是把战争需要放在第一位了。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孙吴县为全东北的解放战争是做过大贡献的。据说，我们的物资一直运到现在的吉林和辽宁，我军在东北早期的炮兵就是用的孙吴的大炮，汽车也如此"。

1946年4月20日，廖仲符旅长率三旅十团剿灭呼玛、漠河张伯钧股匪凯旋归来时，孙吴县召开了隆重的《劳军大会》，各行各业群众踊跃捐赠慰问品，捐赠品折合东北流通卷12.28万元。同年8月，为了解决来年冬季穿衣问题，必须有大量的麻袋面袋和集中全县所有金银特货，装运出去换回布匹给部队战士做棉衣，县政府明令各单位将所存麻袋、白银、黄金一律上交国库以支援前线。同时，城乡各户以主劳力为基数，动员妇女家属积极分担制做军用鞋的光荣任务，翌年8月间一次性完成500双军鞋的支前任务。每当有大的剿匪行动，不仅有担架队，还随时组织起临时医疗队，确保对伤员的应急处理，并派医护管理人员妥善收容照顾伤员，经过一段休养重返前线。1947年秋冬起，号召全县民众先将好的粮食送给前方吃，将日用必需品送给前方用，经费先发给前方在发给后方。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虽然面临东北全境解放，但孙吴人民，为了前方部队战士能够吃好，所有干部群众都暂停吃面粉，地方守点防匪部队每月吃三分之一的面食。同时强调，今后的战争负担将会逐年加重，各区村屯必须积极把公粮征收好，前方打得好，就要地方上供给得好。按照全省统一口径，将公粮征收标准由原来的3％上调到按当地常年平均产量征收20％，如遇到自然灾害减产的减征或免征，全县广大农户积极响应。当时，人们以单位和团体的名义写信给前方，誓作前方后盾，保障充足的供应。黑河地委转发东北局“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强调：摆在我们面前新的任务是积极组织新的力量，全力准备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号召各

地党政军干部要自觉地充当革命的“兵贩子、粮贩子”，把好兵、好枪、好马、好干部拿到前线去，要在群众中干部中造成爱护主力拥护主力的热潮。此时的工作必须深入群众，同群众在一起，加倍努力，以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1949年初，为彻底消灭残匪，保障生活安定和安全生产，孙吴县20岁到45岁的青壮年民兵千余人组成担架队和车马爬犁运输队，随时听从部队调遣。全县民兵还建立联防区，昼夜执勤站岗，断绝土匪给养，扼制土匪活动。自清溪自卫队成立之后，其它村自卫队相继建立，民兵百倍警惕，白天背枪下田，晚间设立固定岗和村头流动哨，时而集中住宿，随时准备战斗，使土匪不敢轻易进村。同年9月，城区西地营子村朱万海、孙年利两民兵到西山沟查看庄稼，发现一小股土匪在山上行走，他们当机立断向敌人开枪射击，土匪逃走，在战斗中缴获2匹战马，村中民兵自治联防组织的作用得以充分显现，严防了零星残匪的骚扰。

抗战胜利后的东北北部最大的孙吴北电厂（日军溃退时破坏），针对本厂工人，在积极宣传、倡导“护厂爱国”的氛围中，组织成立了由两名党员负责、54名职工参加的护厂队，制定了厂规厂法以及更夫、看守人员的负责制等防范措施。为了保卫生产建设，支援革命战争，经1个月的抢修，恢复了孙吴至黑河的22千伏输电线路，并于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向黑河正式送电，孙吴民众普天同庆，万民狂欢。此时，孙吴县委的干部走进广场，在抗日暨自卫解放战争纪念碑前摄影留念，

他们在照片上写道：明朗的天空，眺望远处，片片白云，新中国成立，开始了人民的新时代。

在一切为前线的思想指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把做好优待军属工作作为支援前线的重要内容。对军属，主要依靠群众性的优待和帮助，辅以政府的适当救济。优待军属主要是帮助军属代耕土地，组织军属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安排好军属生活。县政府依据军人伤病、残废、死亡通知书及医师的诊断书，呈请省政府发给军人抚恤证书（病残抚恤和死亡抚恤），依其程度分为一、二、三等。同时，在社会公用事业中军属优先，军属子弟上学免收学费，生活困难的军属医病免费等。各级党组织为了提高军属的社会地位和参军的光荣感，建立了给军属赠送“功臣之家”、“光荣之家”等光荣匾制度。逢年过节都组织群众、学生给军属送礼品，进行节日慰问。1947年和1948年春，全县各村屯农会先后集中组织了2次村民为军烈属户代耕活动。

继孙吴县土地改革之后，经过纠正个别的划定成分偏高、侵犯中农及工商户利益的偏差，明确了土地私有权，颁发了土地执照，鼓励贫下中农“生产发家，勤劳致富”，使广大贫苦农民开始懂得，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前线取得的胜利，就不能得到彻底的翻身解放。继1945年底孙吴自治军独立营近200人被派往北安省军区整编、黑龙江省警备三旅炮兵大队派干部到孙吴组建了3个连的炮兵队伍于1946年下半年调入东北军区炮兵总部开赴前线、1948年1月黑河军分区组建警卫团从孙吴保安队抽调2个排的兵力赴瑷珲县金矿编入警卫团一连之后，在党

和政府的动员号召下，为了保卫土改胜利成果，保卫家乡，支援前线，积极动员适龄青年参军入伍。1948年夏秋季，一个月内，全县就有67名青壮年先后报名参军。参军的新战士，有的表态要在火线上入党，有的说要立功受奖为家乡父老争光，有的甚至提出了上战场当英雄的倡议。1949年春节，县领导丁逢水、章子冈主持召开军烈属座谈会，请军烈属看戏，给军烈属赠光荣匾，发送抚恤金90万元，补助过年费375万元（均为东北流通卷）。8月15日，各界捐资修建的孙吴县“抗日暨自卫解放战争中牺牲烈士纪念碑”落成。同时，为黑河纪念碑捐资4 000万元。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支援前线，已成为孙吴根据地的一大时尚。

三、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

秘密发展党员阶段 抗战胜利不久，随着我党我军进入东北，中共中央提出：在选准根据地并启动工作之时，地方武装壮大之后，重点工作便是群众工作，发动人民清算汉奸、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运动。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实际上，1946年孙吴县主要是剿匪、支前和发动群众这三位一体的工作，除了县城为我方控制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有土匪出没，不积极壮大自己的组织是不行的。东北局于1946年4月发出了《关于发展党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在东北的主要方针和任务是在清算、分配土地、向地主取枪，剿匪锄奸的斗争中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创造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开展

党的组织建设，认真发展党员，壮大党员干部队伍。为完成上述任务，在发动群众的斗争中，积极的发展党员与建立一个坚强的、有战斗力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使我党在东北“站得住”、“扎下根”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共孙吴县委认为，现在我们的干部已经开始了解各地情况，群众开始发动起来，清算分地斗争已进行，党与群众已开始建立了联系，为了在孙吴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组织，应该注意在斗争中慎重地发展党员。并指出，发展的对象主要是工人、雇农、贫农、佃农、店员、革命知识分子及城市贫民。要求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中勇敢积极，为人正派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来历清楚。抗战时期主要是民族斗争，而今天主要是阶级斗争，因此发展新党员尤其要注意阶级成分。从未做过坏事者，特别在发展第一批党员的地方，须经工作中有经验的老党员审查与谈话，以防阶级异己分子及投机分子混入。对于入党手续不清，无介绍人，未举行入党仪式者，应该补手续及仪式，对不纯洁分子坚决予以洗刷。根据孙吴地区的特点，发展新党员对象主要是：雇农、贫农、纯洁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本地区流氓无产阶级占相当数量，故发展工人更应重视其纯洁性，决不能马虎从事。应在扩大生产、挖匪除奸改造政权运动中，加紧教育与审查积极的雇贫农、工人、贫苦革命知识分子发展入党。从斗争中发展那些坚决勇敢，且具有阶级觉悟思想者；历史纯洁清白且未做过任何坏事者；工作积极努力，廉洁奉公守法，经常完成任务者；努力工作学习，力求进步者。对最初吸收的党员，作为县委必须指定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同志一一谈话，加以审

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

孙吴县在抗战胜利前，就有地下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此进行抗日活动。由于日伪的残酷“围剿”和屠杀，党组织基本被破坏。1945年10月，我党从晋察冀老根据地派往黑河地区一批党员干部，其中李银全同志被派到孙吴工作，只有十几天的时间就被敌人暗杀。同年11月至12月，先后派来7名党员到孙吴开辟根据地，在创建根据地的同时，把吸收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做。遵照“斗争中发现，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寻求在地方自治武装的成员中和群众中发展骨干分子作为培养对象。1945年底，建立孙吴县第一个党支部，为县工委、县政府、自治军独立营联合支部，吴飘萍任支部书记。经独立营教导员刘今生同志介绍，县工委机关支部在独立营中发展吕洪滨、张贵义等5名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孙吴县首批发展的中共党员。期间，由于国民党地方势力、匪徒的捣乱和破坏，刚刚从日伪统治压迫下解放的群众，还不了解党，我方还只能采取控制发展党员的方针，党的组织基础十分薄弱。1946年初，经我主力部队和孙吴自治军对土匪大力清剿，党与群众的联系密切了，逐步地为发展党员工作创造了条件。

1946年2月间，县工委以省委派到孙吴工作的党员为基础，开始注重秘密发展党员工作，建立了积极分子队伍，还通过举办青年培训班的方式从中选拔了一批有文化、有觉悟的骨干加入到县委和县政府行列中。1946年6月20日，正值孙吴境内土匪猖獗之时，经王树棠、魏杨介绍，秘密发展龙玉林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六个

月。王树棠等县委领导注重抓好党的组织建设，经常做队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工作很细致，就连队员生活上有困难都是处处关心。县领导亲自写文章，写宣传材料。当时，孙吴县的各项工作是比较活跃的，省委、地委很重视孙吴这个地方。

龙玉林同志回忆："我入党之后给王树棠当传达兵。当时王树棠找我谈的话，跟我说，与群众关系要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保守党的机密，不该知道的不问，知道的就是妻子、父母也不能讲，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我一笔一划地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字写得不好，知道的就填上，还是很朴实的。1947年1月20日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举行了入党仪式，地点在保安队队部，王树棠的办公室，正巧地委书记林一心到孙吴检查工作，也参加了这个仪式。当时办公室的窗子都是蒙着的，墙上挂着两面党旗，一起宣誓的有张志贤、张恒毅、冯兴义、郭子祥等几个人，王树棠领誓，他说一句，我们说一句，最后首长又叮嘱我们一番。从那以后我们就成立了党小组，老同志一个党小组，我们新党员一个党小组，组长是张志贤。""自1946年2月16日至1948年12月为秘密建党时期，从培养、填表、党小组讨论到党支部大会通过，都是秘密进行的。"

张启云回忆："我是1947年6月12日入的党，1948年转正，王树棠介绍的，王树棠问我愿不愿意入党，我说入党得经过战争的考验，我愿意但我不够条件。我印象中的共产党员都是誓死如归的英雄人物，那时是秘密入党，我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经过几次谈话，启发我，我表示

愿意参加共产党，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王树棠、张恒毅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那时，王树棠同志做为县里管组织的，和其他县委干部中的几位老党员经常找积极分子谈话，教育新党员，讲解“救国十大纲领”，自编党的知识小册子，识字课本等新党员教材，在支部中办临时性短训班，使进步青年明白了组织上发展自己入党还只是形式上的‘扎根’，在思想上的真正提高，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参加支部组织并从中积极表现，才是比较实际的真正的在党内‘扎根’。至于能否经得起大的风浪，自然还须无数次的在斗争中锻炼”。1948年7月9日，秘密发展徐桂芝同志入党，是孙吴县委批准的第一名女党员；同年11月，秘密发展腰屯区腰屯村李振国、智广起、于魁（女）等3人入党，是孙吴县农村首批发展的中共党员。

当时，机关的党员条件是：1. 在参与群众斗争中表现坚决勇敢；2. 遵守群众及一切革命团体的决议与纪律；3. 保护民主政府与人民军队；4. 政治上具有初步觉悟决心革命的；5. 言行思想拥护劳动人民利益，积极拥护群众运动；6. 工作上政治上努力学习求进步；7. 廉洁奉公。入党誓词内容：“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坚信共产主义，牺牲个人一切，为无产阶级与人民事业奋斗到底，服从组织，严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入党的暂行办法是：工人、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必须有党员2人介绍，其中至少须有1人为正式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或小组的通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党委的批准，并经过3个月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有党员2人介绍，其中至

少须有一年以上党龄正式党员1人，经过党的支部大会或支部委员会通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党委的批准，必须经过半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1946年至1947年县工委只有两个党支部，一是县委县政府支部，另一个是保安大队支部。全县在这一时期共有20名党员，主要分布在县工委、县政府、保安队及个别区和村。1948年9月始设区级党委，县委下辖一区（城镇）、二区（腰屯）、三区（沿江）3个党委。

公开建党时期　1948年12月，根据东北局作出的“普遍的、积极的、公开建党”的决定，全县开始公开建党。首先是针对进步青年，结合革命实践普遍而深入地学习《党章教材》、《党员课本》、《黑河日报》等，在考核中择优重点推荐，然后采取“自报、公议、党委批准”的方法进行。公开建党首先在县直机关中进行。12月4日，首批公开发展的中共党员有张希德、单景春、刘淳奎。翌年4月，全县发展新党员18名，使全县党员总数达到39名。其中有17名是分布在农村的，仅沿江区就公开发展关水凤等7名党员，22名党员分布在区机关和县直机关单位。直属机关支部发展的党员有郭起云、周传义、张尧良、窦文忠、吴文福、张杰英、冯兴礼等。9月15日，发展发电厂曹清波等14名新党员。全县公开建党后，党员在各领域各岗位上努力工作，带领人民群众奋不顾身地投入各项建设事业，发挥了带头作用，成为建设新孙吴的坚强骨干。

公开建党壮大了党的队伍，为今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开展党员教育、加强组织建设、培

养选拔干部奠定了基础，对全面巩固根据地建设、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

在对新党员的教育上，1945年下半年到1948年末，多通过个别谈话和在党小组和党支部会议上进行。公开建党之后，围绕中心工作举办了不定期的党员干部训练班。1949年3月，县委举办了第一期党训班，参加学习的党员30余人，时间20天。学习内容：《党章教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注重了在本职工作、各项活动中以及利用英雄事迹来教育新党员。

孙吴县在建党过程中结合土地改革，在党内进行了整风运动。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总结。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大决战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已经更加成熟、巩固，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但随着党的减租减息过渡到彻底平分土地政策的贯彻与推进，平民与绅士、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及尖锐斗争在党内有所反映。就孙吴县来讲，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创建根据地之初，对旧的不甚好的积极分子免职的免职，换的换，是不妥当的，应该改造提高他们。办法可用群众民主批评选举，也可以转移他的领导位置（有的不转移会失掉群众），并重新选择好的积极分子。对一般不称职的也不要打击，指出其缺点毛病，说服教育。要重点发展贫苦的让群众信任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随着党组织的空前发展，有些地主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入党内，歪曲党的政策，使土地改革等项工作不能彻底进行。有些党员、干部受地主富农思想的影响，不

能坚决地贯彻党的土地政策，甚至包庇和袒护地主富农分子。这种组织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不仅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进行，而且严重地影响着整个革命任务的完成。这就使我党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还面临一个解决党内不纯的问题。

坚持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从全东北局势看，过去由于党长期处于特殊战争环境中，为适应当时的斗争情况，党中央允许各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保持很大的自主权，从而极大地发挥了各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克服当时极为复杂的困难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在一些党员和干部中产生了分散主义或者地方主义的习惯，造成了党内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解放战争中，有些地方的负责人存有对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细心研究与认真执行，擅自处理某些带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造成错误，不能迅速纠正。比如孙吴县在土改工作中，在算剥削帐上，由于方法不当，与地主撕不开脸面，算来算去反而没受剥削，打长工的倒欠地主的。导致工作受阻受影响，过后也没及时汇报给地委。主要原因是老干部老党员没有深入下去，与群众还不真正贴近，宣传工作没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党的建设方面，孙吴县委曾一度狠抓了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重点组织工作，及时纠正了一些党组织内部工作的某种偏差，比如个别领导干部表现出的“要官”、“要待遇”思想。

在解放战争这个时期，我党还面临一个全新的形势。就党的地位来说，将由“在野”转为执政；就党的任务来说，将由革命转为建设；就党所处的环境来讲，将由战争转为和平。在这种全新的形势下，如何经受执政后种种考验的问题，就成为了党的建设的新课题。针对党的现状及党的建设任务，在1947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顿党的队伍，克服党内不纯的任务。之后，全国各解放区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继延安整风之后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整党运动。七届二中全会，党中央又提出了党的思想建设任务，为全党在历史转折时期抵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7年底，孙吴县在党内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三查”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三整”为内容的整党工作。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工作重心放在连队。高高在上，不下连队，专靠命令制度办事，以带老八路新四军办法来带我们的新部队是不行的。要重新认识“掌握武装”、“掌握连队”的重要性。要确实做到掌握战士思想，清洗坏分子。到部队里查三代，不应该留部队的清出去，对新参加的党员，应重视他，根据土改会议精神重新加以审查；凡不符合参军条件者，坚决洗刷淘汰。其他成分入党后一贯表现不好起坏作用者，一律从严把关。审查合格但手续不全者须补齐手续，务求彻底弄清。党的教育除加强土改学习外，应注意实际的学习与锻炼，如怎样联系群众，做工作，教育群众，反映问题等等。在领导制度建设上，

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强调了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度、组织民主制度。在思想建设方面，告诫党员不要有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党，资产阶级也出来捧场，个别党员干部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949年1月9日，孙吴县委作出《关于（反对）几种领导思想作风的决定》。通过整党整风，纠正了某些老党员干部中的思想腐化、太平观念、个人打算和小团体主义、闹地位、闹生活、不服从组织决定、不守纪律等现象。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培养锻炼了党员干部，增强了党内团结，有利保证了维护社会安定及土改、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最终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中心工作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同时，着重研究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黑龙江省于七月份召开了党代表会议，着重结合本省的实际，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1949年11月10日至12日，中共孙吴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23人，列席代表14人，代表全县80名党员。会议传达了东北局的指示，总结了全县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会议提出要从“德、才、贤”方面考核、选用和提拔干部；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改善和加强党的领

导，解决党组织的思想、组织、作风“三不纯”问题。丁逢水同志继续任中共孙吴县委书记（兼县长），洪涛、张起云任县委委员。县委提出“自己动手，有吃有穿”和“行行养人，种地当先”的生产口号。全县农村中普遍建立妇救会组织，反对并打击包办买卖婚姻和封建迷信活动，倡导男女平等，解放妇女，开展移风易俗活动。

通过侧重对新党员进行正面教育，提高了党员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增强了革命观念和群众观点。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改进了作风，纯洁了党的队伍，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党的威信，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从此，标志着党组织建设逐步跨入了更加规范化、民主化、革命化的新征程。

第八章　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建立基层政权及群团组织

一、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

孙吴解放伊始，城乡学校完全停课。11月份，在维持会的安排下，城镇学校开始复课。解放后的一二年内，土匪时常骚扰乡村，无法办学，直到1947年3月，根据县人民政府指示，农村小学开始陆续复课。较大村屯建立了初级小学，教师由县政府任用。同年4月1日，根据黑嫩省第五行政专员公署第四十三号“关于加强完全小学”的训令，规定孙吴县城的小学为全县的中心小学。当时，境内共有12所学校。第一区除县完小外，还有西兴、辰清、清溪初级小学，4所学校共有10个班、6名教师近400名学生。第二区有北孙吴、曾家堡、腰屯、吴家堡4所初级小学共7个班、7名教师100余名学生。第三区有四季屯、大桦树林子、霍尔漠津、哈达彦四所初级小学，共有13个班、4名教师145名学生。刚复课时，没有统一的教材和教学时间，由教师自编教材。学生一面上课，一面站岗放

哨。教师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教农民识字。农村为民办公助学校，采取了4条办学措施：1.乡村拨出或开出一块学田，由全村代耕，学田多少以教员多少而定，规定每个教员由村民给代耕2垧半地，其中1垧7亩的收入作为教员生活费用，另8亩收入作为学校经费。2.学田籽种由政府贷给，秋后偿还，几年以后政府不再贷给，由学田所获收入中支付。3.教员文具用品由政府发给，各村不准往农户身上摊派。4.乡村学校不准雇用勤务，政府号召教员在业余时间参加劳动，解决吃菜问题。原孙吴县政府督导员徐昶英讲："解放初从1946年开始，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解决办学经费。我是1948年参加工作的，在村屯当教师，当时是供给制，村上发给老师每人每月40斤粮，一定量的豆油，外加2.5元的文具用品费。少数乡村按月发放，多数在秋后一次供给。1949年实行半供给、半薪俸制。教师月薪一般在30至45元（东北流通卷）之间，每月领取30%—50%的现金，其余部分发给实物券，到指定的国营商店购货"。

离休教师曾德记在《建国前的孙吴农村小学》一文中还提到：

1947年春，黑河地区残余的土匪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出现安定局面。为了巩固和发展解放区的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孙吴县政府选派了一批年青人奔赴农村工作，我被分配到哈达彦村当小学教师。伪满时期的学校，在日本侵略军溃逃时纵火烧毁，校院杂草丛生，一片废墟。解放后，由于国民党土匪骚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群众生活很困难。但是当群众听说共产党派来

老师，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他们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和物，纷纷献出兴办学校。在那艰苦岁月，群众省吃俭用，过紧日子，而办学精神却十分感人。在村干部带领下，群众大力支持，20多天把伪满警察所的旧房苫上草盖，安上门窗，再把墙抹平，地上打好桩子，再安上板子，就是学生的桌凳，用锅底灰当墨，染块木板就是黑板。教室虽简陋，它聚集了全村民对政府的信任。

哈达彦村小学30多学生，分为一年至四年4个班，当时没有统一教材，县里只有个大致要求，各年级的教学内容，由教师安排。为解决教学备课困难，上级给各校发一份《黑河报》作为政治课教材，又可从中选语文教材，是一份珍贵的资料。办学总要用点钱的，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政府经济困难，群众生活又很艰苦。我们学习延安精神，走抗大办学道路，在当地群众支持下，种10多亩苞米，秋收后，还买些文具发给学生，因此，深受群众拥护，学校越办越好。农村小学教师白天教小学生，晚上为农民学校（也有叫夜校的）讲课，又兼作村的文书，教室也一室多用，教师身兼数职，与群众关系密切，群众也信任教师。当时，村里识字人不多，能写信的人就更少了。教师除了为群众代写书信，还为村长看通知，写报告等工作。

农村当时都没有收音机，甚至电灯、电话也没有。哈达彦村远离县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群众在民校里知道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道理，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知道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民校是农民的政治学校，它为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培育了人才，做出了

贡献。

教师的生活待遇是半供给半薪金制。政府除了给穿的外，每月发给120斤小米。农村教师吃住在贫苦农民家里，平时以苞米面大饼子、大楂子为主，有时吃小米。每逢节日吃点面粉也是有数的。教师去区或县开会，自带干粮。教师的生活虽然苦点，但精神上乐观，大家坚信人民解放战争会在全国取得胜利，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日子快要实现了。在教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生刻苦学习，政治上进取，简陋的教室里培养了革命的人才，有的参军、参政，有的当了工人、教师，为孙吴县的发展做贡献。

1946年春，孙吴县完全小学成立，宏伟的大门两旁刻着办学宗旨："为老百姓教育子弟，为新社会培养人才"。县领导赵天野、章子冈、丁逢水先后兼名誉校长。对恢复教育事业后留用的少数东北沦陷时期的教员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为肃清其奴化教育残余，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除县内利用寒暑假进行集训外，还选送部分教师去外地进修。1947年署假，派10名教师去黑河地区教导大队学习。到1949年，毕业三届学生。孙吴完小的早期毕业生遍及各地，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县委提出的"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向工农兵开门"、"办正规化学校"的方针指引下，教育事业发展较快。1949年底学校数虽未增加，但学生数增加到1 115人，比1947年增加64.7%；教师数增至31人，比1947年增加41%。县里还常年组织农村"冬学"、"职工夜校"。早在1947年冬，孙吴哈达彦村、霍尔漠津、大桦树林子、腰屯和县城周围少数

村屯办起冬学，请本屯小学教员教农民识字，至1949年1月，全县有10个村屯办冬学，学员人数1 106人。县城3个街道办起妇女识字班、识字组，县、区、村都建立了冬学委员会。办冬学教识字，是当时小学教员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1949年末，县城办起2所职工夜校，共30名学员。其中发电厂44人，手工业36人；文盲班33人，初小班47人。聘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任教，利用早、晚业余时间授课。文盲班只教识字，初小班设语文、算术两科。

1949年5月15日，始设孙吴县民众教育馆，积极兴办新民主主义教育文化事业。“孙吴保卫战”后，县工委委托吴沛政委召集一批青年组成宣传队，队员有冯兴义、于桂珍等，从政府、保安队和刚毕业的青年学生中抽调组成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纲领，由吴沛执笔写宣传材料，然后大家共同抄和刻，到孙吴街头巷尾、影院剧场演讲，还排练文艺节目。孙吴保卫战后，县宣传队得以重组，规定自1946年1月15日到2月15日为自卫战争宣传动员月，并选定一周作为宣传动员周。召开各种干部会、群众会、座谈会，着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捍卫和平、民主、独立。让全体民众都尽可能地知道，12月21日是世界革命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斯大林大元帅是整个被压迫被奴役人们解放斗争胜利的灯塔。指出自卫战争必胜的原因与根据，提高群众胜利信心和战斗意志，揭露特务的一切反动谣言。在宣传上，要做到“言必有中，万无一失”。县工委领导要求每名成员通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

《矛盾论》等，围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展专题讨论。

在结合剿匪宣传的同时，积极落实县政府关于发展农工商等施政方针及保护和奖励生产有成绩的集体或个人的政策。在党内特别是在老干部中进行深入讨论，揭发与纠正某些干部中的思想腐化、厌战、和平幻想、太平观念、惧怕敌人、退却逃跑、个人打算和小团体主义、闹地位闹生活、没有警惕性、不服从组织决定、不守纪律的现象，向这些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配合清算斗争、土改运动、大生产运动、互助合作运动、劳动竞赛等项工作进行重点宣传教育。制定学习计划，定时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毛泽东选集》（单行本）、《社会发展史》、《哲学概论》等理论著作，进行时势宣传和形势教育。协调妇女和青年团组织节日庆祝活动和开展农村“冬学”活动。

1946年四五月间，县工委组织了孙吴县地方青年知识分子培训班，学员来自县工委、县政府和保安大队有一定文化的青年，重点学习传授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一周后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省警备三旅进驻孙吴镇之后，群众文艺在其带动下愈发活跃。孙吴街里军民同队扭秧歌，同台演话剧；农村也随之活跃起来，秧歌队人数少则十人，多则百人。在三旅驻军指导下，县完小教师在孙吴镇内画了《蒋介石反苏反共》、《民主力量反对四大家族》、《打倒蒋介石》3幅大型壁画。同年7月1日至7日，孙吴县委、县政府组织了“扩大的7月周”活动，纪念七一建党25周年，七七抗战9周年。7月，举办了孙吴县首届运动会，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部队指战

员踊跃参加，比赛项目有：田径、体操、拔河等。

1947年元旦，公开悬挂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县完小师生、县宣传队开展业余文艺活动，演出大型话剧《战犯求和》、《血泪仇》、《翻天覆地的人们》等。1948年2月，县委设宣传干事1名。通过深入基层发动和组织群众、召开会议、演出文艺节目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对剿匪、土改、建政及为人民谋幸福的决心和行动。1949年春节前后，各区、村（街）、县委机关、部队、驻军（警卫连）、青年团、儿童团、“群众剧团”为劳模大会和春节进行了文艺汇演，演出了《让战魔发抖吧》四幕话剧，以及《引狼入室》、《换工小组》、《一个裁缝之死》、《金不换》、《跳大神》、《如此正统军》、《老耿赶队》、《妇女放哨》、《送光荣匾》、《上冬学》、《童养媳》、《姑嫂识字》、《光荣劳模》、《拥军拥属》等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县贸易公司演出街头剧《四大家族》，群众剧团演出《打渔杀家》等5 部“旧剧”。正月初一、十五晚，城区、腰屯区、沿江区出秧歌队16支，展现了孙吴人民当家作主后的欣欣向荣景象。

孙吴县政府自1946年起，多次号召并组织机关单位带头实施清洁卫生运动和义务植树活动。1946年3月2日，孙吴县人民医院成立，院长赵镛大。剿匪过程中，在孙吴境内受伤的战士，几乎都经过赵医生医护组的治疗。1947年前后，由于日军溃败时释放的鼠疫病菌，致使县内鼠疫横行，城郊许多百姓传染患病，有的死亡。1948年春耕时节，清溪屯400口人，一个月死了60人。赵镛大和孟淑珍

医生等，担当起了主抓防治的重任，通过深入调查，积累了许多防治资料，对抑制当时病情的漫延和以后对此病的医治打下了基础。1949年1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崔医生、马医生等到孙吴为克山病患者治病，数日治愈20多人，群众称“共产党的大夫真是活神仙”、“民主政府真比亲娘还亲”。

二、建立群团组织

随着根据地建设日益巩固，群团工作相继展开。新中国诞生前夜，已产生青年团组织的前身，即东北民主青年联盟孙吴小组（不公开）。这个小组是在1948年春建立起来的，当时只有3名盟员：张超云（女）、徐桂芝（女）、刘德民，3人均为黑河兆麟联立中学毕业生，在校期间加入民主青年联盟会，先后从黑河来到孙吴，分别任宣传部干事、组织部干事、税务所所长，并都兼做团的工作。同年冬，按地委关于组建青年团的指示，组成了以他们3人为基础的东北民主青年联盟小组，负责人为张超云。东北民主青年联盟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工作上都是各级党组织直接抓。土改前，部分村屯组建了爱农会领导的少年儿童组织——儿童团，由8岁至15岁儿童组成，配合自卫队站岗、放哨、查路条、监督斗争的对象。儿童团在土改中所起的作用也很大，他们年龄小，不被人注意，有些坏人坏事容易被他们发现，在土改两年多时间里，有关儿童捉特务、送信的事迹很多。中共黑龙江省委在《关于青

年团工作的指示》和《建团工作计划》中指出：建团的方针和任务是坚持积极慎重发展的方针，结合党的中心工作普遍进行建团工作。要求县里要建立团的筹委会，开好青年代表大会；要有重点地建立少先队与儿童团组织；要加强团、学生会和青联的领导。按照省、地委有关指示，1948年12月9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孙吴支部成立，由张超云兼团委书记。1949年3月，转入公开建团，10月正式开始建团工作。自此，全县团员、青年工作走上了统一领导，统一发展的道路。

1949年前，县里还没成立妇联组织，只是在各区党委、机关单位、村屯选用一部分妇女干部，组建妇女会（受农会领导），组织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该组织由广大青年妇女组成，任务是配合土改斗争，搜查和监督斗争对象的家属，为前方战士做军鞋，并协助农会完成其它工作。在挖地主财宝和大生产运动中妇女会起了很大作用。旧社会，穷人地少，有的无地，妇女下地干活的不多；农民翻身后，分到了土地、牲畜，只靠男人不行了，需要全家老小一齐下地，春耕、夏锄、秋收，处处离不开妇女，他们成了大生产运动的主力。当然，也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旧思想，有的不愿意参加生产劳动，但通过妇女会的教育，即改变了好逸恶劳的旧习，积极投身于农业生产。妇女会在支援前线的工作中充当主力军作用，出现许多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积极参军的场面。支援前线的军鞋由妇女做，军衣由妇女缝，慰问袋由妇女绣。她们当中，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成为劳动模范。在剿匪、土改、支前、发展生产、破除迷

信、抵制买卖婚姻、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等方面发挥了她们的独特作用。

1949年4月10日，孙吴县成立职工总会，主任张金玉。7月，改称孙吴县总工会，相继在企业、事业、机关中发展会员。凡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职工，承认工会章程，自愿申请，工会小组讨论通过，基层委员会批准，即为工会会员，并发给会员证。全县建立4个基层工会，共有职工总数288人，会员数150人，占职工总数的52.1%。工会成立后，注意培养积极分子，树立主人翁责任感，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心。1949年第二季度，县总工会举办了两期公营企业工人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内容主要是阶级启蒙教育，弄清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到底谁养活谁；解放区工会的地位与任务；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党的基础知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教育等。在工会的组织下，结合实际工作贯彻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业建设和工运方针，充分发挥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普遍地开展了立功竞赛和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同时，在改善职工劳工条件和福利待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46年4月至5月，成立了孙吴县工商业者联合会，即私营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共有200多个工商户），选举产生了县工商联合会正、副会长，讨论确定了工商联合会的宗旨：在政府领导下，图谋工商大业，增建工商业福利及矫正工商业弊害。主要任务是：向工商界所有人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遵章守法教育，处理工商界方面有关事宜。积极贯彻省政府的各项法令，落实县

委意图，一方面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一方面尽全力保证前方部队的物资供应，动员鼓励小手工业者努力发展生产。土改时，特别是赵天野任县长期间，执行政策较稳，在孙吴人民的心目中威望较高，工商业界对人民政府的政策感觉良好，人民政府有困难都能积极给予帮助，充分体现了党的统战工作政策的实效性。

三、建立基层政权，强化治安管理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孙吴根据地创建伊始，在当时战争的情况下，没有经过人民群众的充分酝酿，民主手续很不完备，但却始终是坚持了适应翻身农民、保卫胜利果实、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代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贫雇农为骨干、巩固地联合中农的政权。县委的同志，包括剿匪部队的同志，都去做群众工作。1946年开办的青年骨干培训班，县委的几名领导讲课，学员毕业后，从中挑选适合的组成工作队到街道、城郊、村屯搞宣传，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为了加强施政领导，1947年5月，将全县划分了5个行政村、24个自然村（屯），每个自然村普遍建立了农会。农会主席由会员选举产生，设行政、公安、生产、武装、妇女等5名委员，农村中的一切事宜农会都有权处理。县政府从便于加强领导出发，作出六条规定：第一，凡是县内原有各村均为自然村，各自然村设村长一人。第二，集合几个自然村为一个行政村，县内划分5个行政村：兴农行政村、曾家堡行政村、腰屯行政村、西霍尔漠津行政

村和清溪行政村。第三，各行政村村长应由行政村全体人民公选，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先由人民政府暂时指定代理人。第四，各行政村直接领导各自然村，各自然村遇到问题先向行政村请示；政府的命令、号召都由行政村村长向各自然村传达。第五，各行政村村长由政府每月发给一定数量的津贴粮，并发给文具用品；各自然村村长为义务服务性质。第六，各行政村村长到县城开会不准向老百姓派车和摊派路费，由政府供给食宿，如路程较远，一天不能到达，由政府按照实际情况发给路费。

1948年9月，县政府下设城区、腰屯区、沿江区3个区级政权组织，11个行政村、33个自然屯。第一区为孙吴城区，张志贤任区长，辖镇内3个街和西南、西兴、城北、兴农、清溪5个行政村（16个自然屯）；第二区为腰屯区，冯兴义任区长，辖曾家堡、腰屯、吴家堡3个行政村（9个自然屯）；第三区为沿江区，张超云任区长，辖西霍尔漠津、大桦树林子、哈达彦3个行政村（8个自然屯）。同时配备区助理、干事和村（街）干部。1949年2月10日至26日，县委组织了首届孙吴农村干部训练班，学员46人，重点学习了《婚姻法》、《革命军人优抚管理条例》、《黑龙江省公债条例》、《私立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娱乐场所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以及“农会工作条例”、农村“冬学”、职工“夜校”、民众教育和如何抓好农村季节性工作等内容。训练班上，选出6名学习模范，培养出一批到机关、农村抓组织、抓生产的干部。

1949年11月13日至15日，孙吴县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

召开，代表50人。会议听取了县长丁逢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讨论了地方剿匪和土改、建政、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等方面的成绩和问题，作出搞好冬季生产和完成征粮任务两项决定。同时决定取消农会，一切权力移交村政府，各设村长一名，负责贯彻执行上级人民政府的法令、规定等政策。

改造旧制度，强化新秩序。针对伪满时存在的一些社会恶习，1945年12月至1946年4月，孙吴县民主政府先后发布取缔妓院、暗娼，禁烟禁赌的布告，对存有诸多恶习者采取适当措施加以改造。土改前后，取缔了反动党团会道门“一贯道”，逮捕了一贯道坛主王永和、孙德珍，同时打击了恶习不改的家理教教徒。1946年8月16日，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县保安大队改为保安队，由公安局长魏扬同志兼任保安队长，县委书记牟海波兼任政委。保安队在组织、行政管理上由黑河军分区领导，在业务上受县公安局指挥。1946年9月孙吴县工委改称中国共产党孙吴县委员会。1946年县人民政府布告全县，日伪遗留房屋一律归国家所有，不得任意拆除。政府可以出售，个人不得变卖和转让。针对一些私商趁机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倒卖金银、破坏金融，造成市场混乱物价上涨的现象，采取有效措施，实施严厉打击。对主要物资如粮食、棉布、食盐、火柴、原煤等的收购价格和分配调拨权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对一些日用品和土特产品外流和外调，实行集中交易，批准采购，反对盲目抢购竞销，禁止擅自外销外购、买空卖空、抬价压价等，并按规定纳税。1946年，在县政府制定《县税暂定规程》的同时，对全县个体工商业

进行了登记，核定了资产，确定了等级和税额，并实行牲畜等票税管理制度及白酒入境税等规定。日伪遗产一律由政府没收，并加强管理和使用。同时，对罪恶重大、怙恶不悛的19个匪首予以处决，对危害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采取大张旗鼓地公判形式处理，收到了震慑敌人、大快民心的效果。1947年1月，成立公安科，魏扬任科长，任职半个月后被调地区公安处，公安科由县长赵天野亲自负责，后由县委秘书张志贤兼公安科负责人。同年8月，孙吴县政府转发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布告：凡制造谣言、聚众放赌、贩卖毒品、逃避劳动从事投机倒把以及利用迷信会门等名义进行非法活动者，必须停止，违者从严惩处；凡地主分子恶霸富农杀死百姓者，必偿命或没收其全部财产，以慰籍死者家属；凡损害雇贫农中农和革命人民的牲口、庄稼、柴火、房屋、家具等一切物品者，必须按市价全部赔偿并受法律制裁；凡服从政府法令、从事劳动生产的地富，得来的财富给以法律保护，不许任何人侵犯，如果在生产上有特殊困难的，也要适当的帮助解决。时刻警惕着保卫革命果实。1947年初，曾河清任孙吴保安队长。同年11月，曾河清在剿匪中牺牲，黑河军分区派组织干事林振帮接任保安队长。同年12月，由李心会任保安队长。1948年2月，张志贤调黑河地委，刘长发任公安科负责人。1948年6月，根据辰清地处交通要道、村内人员成分复杂、社会治安不好的实际，由县委机关和县公安科抽调12人建立了辰清派出所。同时，县内的3个区，每区配1名公安助理，主要是下基层开展锄奸保卫工作。县公安科针对全县部分居民收藏日伪遗留的枪支、弹药的严重情况，

开展了大规模收缴工作。主要方式是明令“起枪”兼“挖匪根”。挖匪根的标准，就是把枪交出来。有些人家里有枪，但未当胡子，其打算是想卖钱或留着看家，号召他们把枪献出来，献枪无罪，以避免武器再度落入扰乱社会治安的坏人手中。1948年，人民政府共动员经过清算斗争后分得果实的闲散居民上百户1 000多人到腰屯、沿江等基础较好的农村安家落户，从而解决了这些人解放后靠吃“洋捞”、“打尖”干零活过日子的历史，理顺了城镇、郊区的杂乱秩序。

1949年初，公安科改为公安局，局长李志坚，成立之初公安局只有5名干部、4名看守人员。经县委研究，设治安、行政、总务3个股，各配股长一人。不久，从公安队的人员中和县委机关中抽调成分较好、文化较高的5名同志充实局机关，省公安厅又派来1名同志，达到13人。6月，孙吴县保安队改编为公安队，李心会任公安队长兼指导员，人员编制43人，由黑河地区公安大队与孙吴县公安局双重领导。干部战士为志愿兵役制，由地方部队改编为警察部队。保安队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和剿匪除奸、武装押解看押人犯。同时，进行了为期16天的整训工作，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思想觉悟。从建立自治武装起，就注意以清理、整顿巩固地方部队为出发点，防止内部再有异已分子；通过深入连队，同吃同住同劳动，共甘苦，对参加进来的劳工，通过积极可靠的战士逐一了解，对极少数可疑的坚决清理出队外；调整班排骨干，建立了定期、不定期的汇报制度，及时掌握队伍内部的动态及思想状况，纯洁了队伍。同时在公安队伍中开展了新旧社会对比和政

治思想教育，采取自己诉苦的办法。一经引导启发，尤其是劳工出身的战士，愿意跟共产党闹翻身，要革命，保卫人民政权的觉悟大为提高，思想大为稳定。再有，通过结合攻防实际操作训练，并经过剿匪实战，锻炼成了一支觉悟高、战斗情绪旺盛的可靠队伍。在队伍内部整顿的基础上，于1949年在辰清设立孙吴县公安局辰清分驻所，有干警5人，主要任务是检查出入境人员。1949年2月，根据省公安厅和黑河公安处关于建立和加强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指示，在城镇的一街和三街建立了治保委员会。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公安部《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重点人口管理工作试行规定》，又抽出专人对全县户口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复查，加强了迁出、迁入、出生、死亡、常住、暂住、变更、更正等户口管理，力争消灭黑人黑户。共清查出国民党党员6人，挺进军24人，国民党军官及士兵112人。1949年，县公安局针对全县部分居民收藏日伪遗留的枪支、弹药的严重情况，开展了大规模收缴枪支弹药的工作。但是，暗藏的国特还有可能策动散匪武力组织游击队，某些地主坏蛋还可能继续为匪，投降的、隐匿起来的土匪也可能被某些坏人拉拢怂恿再去为匪。为此，县委要求公安局继续加强检查，严防敌特潜逃，严防地富、匿匪分子造谣惑众，藏匿枪械不交，伺机破坏社会治安的企图。1949年后，县公安局遵照上级指示精神，结合国内外对敌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坏分子实行监改管理，从而更加稳定了全县的治安局面，保证了各行业的健康发展。

县委通过强有力的施政策略，很好地解决了生产、就业及劳动关系等问题，使全县人民进一步明确了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增强人民当家作主意识，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热情，促进生产生活和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通过深入传达、学习和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孙吴县广大党员、干部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工作任务，自觉地把本职工作与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围绕落实县委确定的“城乡兼顾，农业为主，在可能和必要的条件下积极发展工商各业”的工作方针，使县域工农业及各方面工作出现了勃勃生机，不仅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同时对孙吴县建国后各项事业的持续性发展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附　录

一、访谈录

孙吴县腰屯乡腰屯村关英华的控诉

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听修筑胜山要塞的劳工吕玉海、刘海山说，我们这些修筑胜山要塞劳工，当时我们这一拨有460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日本军人让我们套着黑帽子，遮着眼睛上工了，被驱赶着到离胜山下的第五守备队指挥部驻地胜武屯，现在的红色边疆农场三分场场部，在胜武屯一个开阔地里，四周都是核枪实弹，打开长矛枪刺的日本兵，我们这些劳工心里想，这下完了，日本军人可能要枪杀我们了。这时，一个挎着指挥刀的日军军官讲话了，是用日语说的，说些什么我们听不明白，是个中国的翻译官将那个日军指挥官的话翻译给我们听，大概意思是，你们是大大的良民，你们已经在这里勤劳奉仕到期了，今晚皇军在你们的工区住处好好的招待你们，好酒好菜大大的有，然后发放工饷和路费，从此以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到了傍晚，460多人分在十几处简易劳工住的席棚里，饭菜比平常好了很多，每人都发一个大碗，用以盛酒。酒是装在大罐子里，吕玉海和刘海山因年纪小，不会喝酒，拿起馍来吃，其他的劳工都争先恐后的倒酒喝，我俩还没有吃完，就看满屋子里的劳工肩并着肩，脚挨着脚，成排地僵躺在地上死了，脸色铁青，有的嘴角还流着血，这是日本人酒中下毒了，对面站着日本兵在把守，跑不出去，我们俩个互相使个眼色，钻进死的劳工里面，当天晚上日本军人没有收尸，后半夜，外面黑得很，我们俩互相摸摸，从死了劳工同伴堆里钻了出来，不远就是山林，从铁丝网底下爬了出去，慌忙地钻进山林中，就这样我们俩算保了一条命。白天我们在山上不敢走，怕被日军发现，就在山上呆着，准备晚上贪黑走，第二天早上十点钟左右，我们俩站在山上，看见胜武屯方向，劳工棚子附近浓烟四起，原来是日军将毒死的劳工码到一起，浇上汽油给炼了，日本鬼子真是太狠毒了。

吕玉海、刘海山后来跑到腰屯村的南山，在一个董玉林的地窝棚里暂住下来，怕被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发现，董玉林当时在南山种大烟。他俩就一直在窝棚里躲着，后来俩人一直居住在腰屯乡，死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腰屯乡敬老院居住。（2006年3月24日）

黑河市土地局刘连兴的控诉

我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从逊克被迫给日

本人当劳工，当时只有十六岁，叫童年劳工。同来的还有本县的另外七个人，地点是现在的孙吴镇三里丁村附近，日军部队番号是2645，因为我是童年劳工，待遇要比那些老劳工好一些，我们每天都能看见那一千多人的老劳工，在劳工营里进进出出，出去的时候，劳工营的门口是岗哨监视，狼狗跟着日本兵，押着劳工出去干活，老劳工住得、吃得、穿得真是太苦了，可以说，天底下再也没有比劳工再苦了。他们住的是席棚了，屋里潮湿冷凉，人多空气又不好，得了病，日本人不但不给医治，说是伤寒病，以怕传染别人为名，偷偷地拉到山上活埋了。吃的都是窝窝头和橡子面，还有冻土豆子和冻白菜，没有穿的，有的劳工就将洋灰袋子套在腰上。还有的绑在腿上。和我同去的有一个叫舒守文的工友，得了病，不敢说有病，带病去干活，我们这些童年劳工给日本人钉箱子，由于有病，伙食又差，他的身体越来越消瘦，终于有一天支持不住了，躺在劳工棚子里，监工把头雇人找来一掛花轱辘车，说是给他去看病，他好像知道后果似的，说什么也不肯上车，并苦苦哀求说："我没有病啊！我现在就去干活。"但监工把头还是强行把他拉走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见回来，到现在有时我还想起他。一九四五年五、六月份，我们这些童年工有80多人，在极黑的一天夜里，被监工把头叫醒了，叫我们赶快准备行李，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我们这些人被押上卡车，是带帆布棚的，眼睛被青布蒙得严严实实，什么都看不见，车行走的时候，知道山路很颠簸，大约四个小时左右，天也放亮了，才到达这里，我当时是给

开滑车，往山上运水泥等修筑山洞的材料，每天我都能听见四面好象有很多人在叮当叮当地挖山洞，日本人感觉到战事对他们不利，对劳工看管也就放松了，我们这些童年劳工又回到了孙吴县三里丁的劳工营。后来苏联的飞机轰炸，劳工都跑了，我当时还看见劳工在往外跑时，胳膊上缠着白布和毛巾，可能是组织的领导，还将当时站在劳工营外站岗的四个日本哨兵都踩死了，我和逊克来的五个同乡，乘机逃了出来，逃到四不漏子时，我和另两个人回逊克，劳工李德元领着另外两个人到孙吴腰屯村去看望岳父，正走到腰屯村里，赶上日军和苏军交战，他们3人被苏军误认为是日本便衣特务打死了，我们同去的8个人最终就回来了3个，有5个人都先后的死去了，现在一想起来就觉得难过，一九九八年我在《黑河日报》上，分四期刊登了当劳工的回忆录，一方面揭露日本侵略者残害劳工事实，一方面祭奠死去的工友，但愿这段历史不能忘记，日本当局不承认侵略中国的事实，是不符合实际的。（2006年3月24日）

腰屯乡腰屯村张纪忠的控诉

我是在康德七年六月里被征招来孙吴的，我们一起来了53个人，到孙吴后就挖孙吴镇南边这条河，挖完后在农历八月十四日又到二六四五仓库挖东面和北面的大壕，共计有劳工170多人，因为天气冷，劳工没有棉衣，还得干活，得病的人很多，日本把头将由每人一天三斤多粮食拿出一斤二两，这样就更吃不饱了，这样被冻死了就有70多

人，因天气冷，有两个席棚子的劳工点火取暖，结果将席棚子烧着了，两个棚子烧死30多中国劳工，全部埋在三甲屯道边，除死去的还剩下70来人都跑了，我们17人一起跑的，由于对地形不熟，这些跑出去的劳工，有的被抓回来了，绑着用扁担打，打死一个十七岁的年青人叫常玉青，问我们为什么跑，当时我们大家说："天冷没有棉衣。"日本工头说："你们冷好！用冷水浇。"把我们都浇得够呛，我们呆了不两天，又都找机会跑了，有7个人被抓回来，不知道是死是活，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2006年3月24日）

腰屯乡腰屯村王立兴刘月芬的控诉

刘月芬口述：我老爹是买卖人，1945年8月，我到东兴村时，听到侦察机和轰炸机的声音，还有坦克的声音，人们都说日本子快完蛋了。小日本子的兵穿着中国穿的衣服，将通往孙吴的道路给挖断了，并下了地雷，将日本军队的罪恶阴谋强加在老百姓头上。苏联红军过来时，将其坦克和士兵炸翻炸死，苏联红军认为我们屯的老百姓其中的男性都是日本军人，就将女的都留下了，男性都带走了，带到东小桥处，我们三个哥哥和俩个侄子都死了，连吴家堡和腰屯共有460人被害，后来苏联红军说："你们中国人和日本人分不清，日本人就在你们中国。"我丈夫王立兴全家人也被枪杀，整个屯子里都变成了女儿国，因为青壮的男人都被误杀了。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是日本人搞的鬼，是日本人挑起的矛

盾，致使我们这些村都遭了殃，我娘家有7个亲人都先后遇害。他们都累死在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真把我们害死了。

王立兴口述：我给日本人当劳工，给日军修地洞子，修河南的火车道，是从四平抓来的劳工，穿什么样的都有，那人可惨了，有的都躲起来。修飞机场的北头，劳工死得不计其数，一排挨一排的埋。（2007年5月15日）

孙吴县三区王文斌的控诉

我原籍山东省章邱县住现在孙吴县三区，于康德二年被日寇招工到东北虎林县打石头（即是做劳工），于康德三年到伪黑河省孙吴县孙吴屯给日寇694部队修筑大营水道。于康德四年八九月间下午四点多钟，由694部队在外地装来十三辆汽车，全是劳工，大约五六百人，都拉进南山修山洞，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这些劳工只见拉进去以后从未见出来的，全部被日寇屠杀了。日寇一般从外地来的劳工都在夜间拉进山洞去，这就不知道了。1939年（康德六年）六七月间，孙吴屯有个人外号叫老赵头，当时给日寇放牛，在南山看见在日军694部队头道卡子水楼子西旁桥西南角有一百多劳工在该地被日寇用机枪全部集体屠杀了。这是我听老赵头说的。另外于1940年（康德七年）李景顺说（当时李在日寇大营拾遗）；南山阵地山洞西南角沟子里在1939年冬天被日寇一次屠杀劳工500多人，这都是给日寇修军事工程已经竣工，为保守军事秘密对中国劳

工进行灭绝人性的集体屠杀。（1954年9月25日）

黑河城区第七街七组居民李子厚的控诉

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在孙吴西岗子山神府一带，对我国人民的残酷杀害暴行的事由情况属实。我自康德四年由长春招工来到孙吴的，我得了严重的病症不能干活，要是一天不干活就得挨打受骂，同来的工友们偷偷将我送到孙吴街里店房养病，那年来的劳工有东北各地和关里各地的，总共有3万来人，受残害死亡的劳工数字我说不准。我病好了以后同年的七月间我又来到西岗子做工。在西岗子火车站干活，我们共有二十多个人在西岗子街里面住，每天到车站去干活，那时日本关东军正在修西岗子南山上的阵地。每天由南山来的工人三十上下的人数，也在车站干活，光许干活，不准我和里边来的工人说话。从里边出来的工人见了我们外边的工人就象要哭的样子，我们与其说话，日本鬼子兵就往死处打我们，日子长了有机会当我们问他是哪儿来的劳工，他们当时哭了，他们说是由哈尔滨抓来的。白天由汽车又押送上了火车，来到此地一年多了。这个山里现在有一千多工人，有关里、东北各地都被抓来的，他们又说："亲爱的老乡啊，我们是回不去家了"。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回不去家了？他们说："干完了活都得用机枪嘟嘟死。比我们先来的工人修完工事都给打死了"。我们问有多少人，他们说一共有四五百人。每天有用机枪打死的或者用木棒打死的，在干活时打死的，这叫我看看（有一个姓朱的劳工说）。像这样死

的，都是在哪里头受不了才奋起反抗而被活活致死的。我们在火车站的工人对我说；“在火车站的活也干完了，山里的活也干完了，日本鬼子说：“活完要往回送我们，我们看不一定，这不知是死是活呢？”我们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可给我们捎一封信来，我们就知道你们的下落了。”结果工人也不知送到哪里去了，信也没有捎来，这一千多工人一定是又被日本鬼子给杀害了。这个山里干活的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康德六年修山神府，双峡山一带的汽车道，那年旧历十月末的时候，汽车道修完了。总人数不好说了，这些人多自山东来，就在山神府往黑河来的时候就冻死饿死三百来人，来到黑河的工人都没有棉衣被，就连单衣服也都破的。露着肉的，连洋灰袋子纸都没有。这三百多人完全是冻饿死的。康德十年修山神府飞机场，由关里山东各地招来的工人有一千六七百人，是春季来的，七八月间，在这个当中就死去了有半数工人，都是打死和饿死的。由那里偷跑出来的讨饭吃的劳工据他们说，早饭和晚饭都每顿两小碗，稀高梁米粥，午饭两个小窝窝头，大约两个才四五两重，工人吃不饱饭还叫干那么多活，如果干得少了日本鬼子就往死里打，有病的工人还没有死带着气就被往山沟里扔。在这个飞机场死了有八九百人。（1954年9月27日）

黑龙江省黑河专区地方团电业局掘煤工李福的控诉

1936年4月一天，我被日本人自哈尔滨骗招到东北来做劳工，和我一起被招来的劳工共有60多人，日本人每人

分给我们两块钱，买日常用的东西、吃的等。当时讲好的每人一天挣六角钱，我们就都跟着来了。走的时就说上北安修房子，到了北安把火车的销上了，一个也不让出去，接着又向北驰进，到了孙吴只有我们六十多人，不料又跳车跑了二十多人，剩四十多人，都参加修建日本住的房舍了。从此，苦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光和我们干一样活的有二百来名，分四个工棚子，由一个把头监管，早三点钟起来干活，晚间九点钟下班，上班干活的时候，是日本人监工，手里拿着镐把，哪个劳工稍有点行动怠慢，就没头没脑地打一顿，有的工人因有病干不动也要挨打一顿，被打死的很多（因年头多了记不清了）。吃的更不用提，到冬天不干活了就不给吃的，劳工们穿的是破麻袋，腿上绑着洋灰袋子，都到了腊月天还没穿上棉衣服，原先讲的一天六角钱到孙吴只给五角钱，干到冬天连半角也没捞着，钱都让把头带着跑了，劳工们只落得两手空空，全没依靠没吃没穿。我们一个棚的四十多劳工差不多冻饿死病死了一半，死的人都扔出去被狗吃掉了，没人收殓。活着的没人管，日本人不给证明书，也走不了，活活冻死的无数。劳工们冬天还穿着胶皮鞋，腰里绑着破麻袋乱草和破纸片子，那时劳工的生活连日本人的狗都不如，他们的狗每天吃肉吃米，劳工每天连糠皮的东西都不给够。在孙吴干活的劳工据我知道的就有二万多人，生活皆是如此。死的死，亡的亡。修山洞的工人都用汽车挡着往山里神武堂运，一车一车的不知数字，光见进不见出，据说那个山洞子修好了，就把那些劳工一起枪杀掉。连尸首都看不见，如果出来怕给他们走漏军事秘密。

到当年冬天我们一看没人管了，就跟着修道的工人一起走了，就这样方算逃出来了，因为我们不是修山洞子的，没被统一杀死。解散时我们那一伙人有的回家有的逃命，有的找活干去了。有的因病不能动，活活地被冻死在那儿了，我们那一伙光在起身的时候就冻死五、六个，死人扔的那儿都是。

这就是我当劳工的一断历史，完全是我亲身体验到的，没有一句谎言。（1954年9月23日）

罗德玉回忆1937年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展开了全面进攻，不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而且开始在东北迅速扩军。随着日军的战略需要，中国人也越来越多的被抓去当劳工，受奴役。

这年春天，我的一家也被骗来到孙吴，现在回忆起当时我家四口人从吉林省怀德县同当地没有生活出路的一百多户穷人一起，受日本松本组“招工”的欺骗，来到孙吴县胜武屯的情景，真是旧景再现，伤感至极。

当时我刚刚八岁，来到这人地两生的地方，吃没吃，烧没烧，每天我都跟着哥哥一起到处拣柴禾，看热闹。那时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对中国人深受日本关东军欺凌虐待的悲惨景况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今虽然已时过半个世纪，可是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们临来孙吴之前，老家生活也很困难，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的苦日子。当时听工头讲，招这批人是到长春施

工，半年后竣工，再将工人送回原地。说实在的，虽然日子难过也是家乡难舍，故土难离呀。我父亲考虑再三，听说将来能回来，就随着工人上了瓦罐车，工头解释说，长春没活了，施工地点改到哈尔滨。然而火车到哈尔滨站后仍然没停，车门关得更紧了，工头又传话说，要到黑河去。后来许多劳工都 要下车解手，迫使他们打开了车门，但限时间上车，否则丢下不管，之后一气把我们拉到了黑河，又从黑河上了风船，顺江而下到了当时的东霍尔漠津码头（现在的沿江东屯村）。下船后，用马车拉着行李，劳工步行走到了胜武屯工地。到这时候才知道这次招工一开始就是到孙吴的，只是工头怕人们不肯来，才谎言欺骗。

面对着这人地两生的环境，人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真得“即来之则安之”，所以就自己动手搭起了席棚子，用小木杆搭起了床铺，有的就地铺草做床，对付着住，也得对付着吃，劳工的劳动时间长，作业量大，吃的一天不如一天。当时人们给这起名叫做“慢抽筋”，就是说开始给工人吃三号面，后来逐渐地降到五号面（黑面）。最后又降到吃高粱米，橡子面。说起来吃橡子面，真是活遭罪呀，又苦又涩，双辣，吃不下，便不出，真不如日本人养的狗吃得好。说吃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这一点也不假。

这些被连欺带骗来到这儿的劳工，每天都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的给他们建营房，有的挖深沟下自来水管道，有的修路，架桥等等。这些名义上自愿应招的工人，实际上都是强抓硬逼，无奈来过这非人生活的。劳工棚就是吃人的魔窟。有一次有两个劳工，实在不堪忍受工头的

凌辱和打骂，夜间逃跑未成，结果被抓回来以后，五花大绑，拳打脚踢，灌凉水踹脖子，重刑之下死去活来，那种似人非人的生活真是一言难尽。平常有人患病，工头不但不给治病，就连病休都不准。说什么："摸摸你的脑袋还硬不硬，脑袋硬就得去干活。"目不可睹的是，工头发现病人不行了，不等咽气就拉出去喂狗，狗吃人，可日本人的工头比这狗还狠。更残暴的是如狼似虎的监工，手持马棒，挨个工棚串，发现有不上工的，不问青红皂白，不由分说，抡棒就打，硬逼着去上工。就这样病累交加，含恨而死，丢与荒山的劳工数不胜数，然而活着的也是饥寒交迫。刚来那年冬天，发过一次棉衣，当时工头对大家说："领棉衣的光记帐，到结总帐时再扣回棉衣钱，不领的到时候多给工钱。"当时有好多劳工为了多领点钱养家糊口，就没要棉衣，我家也如此想多领几个钱，就用洋灰袋子作里子，用麻袋片当面做衣服，挡风遮寒谈不上，只是遮点羞，所以有的人简直就不做，干脆就把麻袋片缠在腰上，有的就把麻袋剪个洞套在身上。可是谁成想等到开支时，不管领不领棉衣的一律每人发给一元六角钱，等于工人白白的苦干了一年。

就在当年的冬季，一部分人被两手空空的送回了原地。故乡谁不想回去呢，可是我们一家四口，拿着这仅有的一元六角钱可怎么生活呀，无奈只好苦苦哀求，要求留在北方。就这样我们全家又搬到了小河西屯务农。

搬家前，发现空荡荡的工棚内，留有一小堆一小堆的东西被破烂东西盖着，打开一看，原来这一堆堆的东西全是一个个的死尸。这是工友们临走的时候，把那些病得垂

危，奄奄一息，无法随众还乡的难友用破衣滥衫掩盖上。看着这一具具死尸，心里真是难受呀。据工友们自己说，我们能一同来，不能一同走实在无奈，这样做，如果能表示对死者的尊敬，也就是对活着人的安慰。

追求真理志不移

——访赵天野

张桂馥（1990年专访）

“七一”前夕，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到长春访问了当年开辟黑河地区的革命老干部—曾任孙吴县长、黑河专署专员、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已离休的赵天野同志。

这天下午，我来到赵天野同志的家，一进大门，便看到人行道两旁种植的各种菜苗长得绿油油、水汪汪的。有几垄苞米，苗长有一尺多高，院中有一棵青松，有两棵枝叶繁茂的海棠和一棵樱桃树，都已结满了果，还没有成熟。树后，露出一座粉刷一新的乳黄色的平房。我走进屋里，赵天野同志便热情让座。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并转达黑河、孙吴一些老同志对他的问候和敬意。他深表感激。他热情地同我挚谈，询问黑河、孙吴的发展变化，尽我所知向他作了介绍。他听了高兴地说：“好哇，孙吴和黑河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些年来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党领导人们奋斗的结果。”

喜看今天的硕果，怎能忘记革命老前辈为之奋斗的风

雨春秋。我请他谈谈当年的艰苦岁月，曲折历程，以便后人了解，革命道路是前赴后继铺成的。

他说："人们在自己的一生中，总不单有阳光瑰丽的春天，也会有风雨晦阴的黑夜，作为一个追求共产主义信仰的我，在黑暗的旧社会，从小就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的曙光。1931年9月18日这天夜里，日本驻在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攻击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在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的情况下，翌日晨，日军占领沈阳，接着进占吉林、黑龙江。在这种危难关头，蒋介石要集中力量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卖国政策，命令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地完全退入关内。到1932年1月，整个东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断送了。从此东北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这时我已高中毕业。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践踏东北的大好河山，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的野蛮暴行，激起了我心中的怒火。不久，我投身革命，进行抗日活动。1936年10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我是东北辽宁生人，党派我到了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东北军大多数是东北人，看到家乡沦陷，父老兄弟姐妹受奴役，不愿意打内战，愿打回老家去，赶走日本侵略者。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抗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请求停止内战，遭到蒋介石拒绝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尽管杨虎城将军被害，张学良被囚禁，西安事变终

于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实现了新形势下的国共合作，发动了全国抗日战争。

说到这里，他吸了口烟，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1939年，我奉命离开张学良部队，回到新四军，从事教育工作。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我被国民党反动派俘虏，关在江西上饶集中营。上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又是万恶的东南各省特务大本营。上饶集中营主要分七峰岩、周田村、茅家岭、李村四部分。1942年浙赣路线战事以前，上饶集中营里关着许多革命志士，进步青年和国民党反动派所谓的思想犯。我被捕后，敌人为软化我，企图让我自首。有一次，特务将我审问："你老实交待，你和哪些共产党员联系？"我回答说："我没有啥可交待的，我是新四军的教员，我做的都是正大光明的，都是为抗日的，没有罪交待啥？我没和哪个共产党员联系过。"特务说："只要你写份自首书，不再跟着共产党，就放了你。"我说："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解放，是坚决抗日的，跟着共产党走是注定的，让我写自首书，叛变共产党，那是白日做梦！"特务看我态度挺硬，就动起硬的，把我吊起来，用鞭子抽，用烙铁烫，疼得我汗珠直往下淌，后来昏迷过去，特务又用水浇醒。尽管特务施用刑法，软硬兼施，但我就是不写自首书，只是皮肉受些苦。回到牢房里，过着难以忍受的非人生活，但信念决不动摇。

赵天野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软化和酷刑，革命者答复是逃跑和暴动，不能等死。1942年5月，我们"犯人"互相串联好，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暴动。这天，

趁放风机会，“犯人”们一声喊：冲啊！便扑向警卫人员，夺下枪冲出了监狱。当时正是夏季，绿草丛生，当警卫队员集合起来追捕时，我们已四散逃去，这就是有名的赤石暴动。

逃出了上饶集中营，到哪里去呢？还是得去重庆找党组织。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查，终于到了重庆，找到了我党重庆办事处。当时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对我说：“你现在可以找个公开身份做掩护，从事地下活动。”我说：“听从党组织安排。”于是，我在重庆税务局当上了职员，整天做税务工作，晚上做我党地下统一战线工作。1944年秋，我告别重庆，回延安，路上经过敌人层层封锁线，晓行夜宿，避过敌人搜查，终于回到了延安。就像远离亲人的儿女回到母亲的身边，望见宝塔山，畅饮延河水，心情是那么高兴。到了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军事部学习。

赵天野接着说，1945年9月3日，日本宣布投降，党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不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便组织干部团开赴东北，我参加了干部团，带队的是赵德尊、杨英杰。告别延安，翻山越岭，步行到承德，上火车到了沈阳，在沈阳休整了几天，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分析了形势，交待了任务。随后，继续北上，到了北安。北安当时是黑龙江省会，我在省政府任秘书主任。当时，无论生活条件或是工作条件都很艰苦，时值11月，冰天雪地，气候寒冷，但是同志们的革命信心很足，革命热情很高，组织纪律性很强。同志们之间团结友爱，真诚相待，齐心协力，艰苦奋斗。

说到这里，赵天野喝了口茶水，稍寻思了一会儿，接着说，1946年2月17日，旧历正月十六，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决定，再一次派干部去接收孙吴，当时省委副书记范式人找我谈话："天野同志，孙吴县土匪很嚣张，我们去了两批干部都被迫撤回来了。这次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决定，再派一批干部去接收孙吴，这次有你和牟海波、王树棠、魏杨、田玉富五位同志。那里的情况很复杂，任务很艰巨，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清剿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你有啥想法和困难？"我当即回答："服从组织调遣，克服困难完成任务。"那时，正当风华正茂之年，没什么负担，没什么顾虑，说走就走。第二天，我们五个人就坐胶皮轱辘车上路了。当时，天气严寒，冰天雪地，路途艰险，沿途土匪多，我们走的是山道，警备三旅派部队护送我们，每天走百八十里路。到辰清，三旅遇上了张鸣久一伙土匪，双方开了火，经过激烈战斗，击溃了土匪，第四天，我们到了孙吴。

他说，在我们来孙吴前，就曾派过两批干部接收孙吴。第一次是王肃司令员路过孙吴时留下了李银全接收孙吴，任第一任县长。他孤身一人，只工作了十八天，就被土匪暗害了。第二次是吴飘萍、任炳麟、桂生芳、魏杨、刘今生、田玉富、周文喜等九名同志。他们在孙吴开辟了工作，取得了成绩，有了群众基础，鉴于当时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决定，孙吴县自治军独立营和县政府工作人员暂时撤回北安。

孙吴，原来是日本关东军的重兵集结地，是连接北安至黑河，北安至逊克的咽喉。日伪政府垮台后，又成立了

维持会。维持会与土匪有关系。我们到孙吴后接收了维持会，又成立了县委县政府、保安大队。牟海波任县委书记，我任县长，王树棠任组织部长，魏杨任公安局长，田玉富任保安大队长，为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我们开始建立人民武装。因为魏杨、田玉富等人来过孙吴，有了群众基础，所以这次我们来孙吴，群众敢接近我们，青年人踊跃报名参军。由于当时孙吴人口少，只建立了一个连100多人，由曾河清任连长，刚组建时，武器装备也很缺乏，待雪化后，派战士在野外找日伪时期留下的枪，加上当地群众交上来的，枪、炮、子弹迅速增多，人手一件还有富余，堆了满满一仓库。

他说，县政府和保安大队同在一个大院，为了防止土匪袭击，在大院四周垒了围墙，修筑了碉堡。当时条件很艰苦，干部实行供给制，吃穿住都很困难，但同志们都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充满着革命乐观情绪。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县政府发动战士拣子弹，同克东、克山、海伦、拜泉等地人民政府兑换白面和猪肉，相互支援。战士们还在孙吴县城西南的日伪十八仓库里找到了黄豆、豆油、大酱、食盐。生活条件虽然困难，可是战士们的斗志很旺盛，练兵积极性很高，土匪望之而生畏，不敢前来进攻。只是在离县城较远的村屯和山林里活动。有一次，我带领几名同志到腰屯了解民情，建立人民政权。我们住在老乡家，帮助老乡挑水，扫院子、劈柴、铲地。老乡很受感动，愿意接近我们，向我们反映情况。一天傍晚，有人来报告，说有70多名土匪攻打曾家堡，我听说后，立即带领10余人急奔曾家堡，张志贤带领10余人也奔曾家堡，和土

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快天亮时，土匪被打跑了。我回到县城后，给黑河挂电话，张泉山连长速带10多人乘船赶来追击这伙土匪，在战斗中击毙土匪一名，其余逃跑。

他稍停一会儿接着说，1947年冬，我正在黑河开土改工作会议，惊悉曾河清同志牺牲，心里十分悲痛，他是同我一起来孙吴开辟工作的，他的老家在江西会昌，1933年参加革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赤胆忠心，英勇善战。他来孙吴后任连长，保安大队长。他是在孙吴县吴家堡的一次剿匪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二十七岁。县城各界人民举行了追悼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共同唱起了悼歌。说到这里，赵天野眼里滚动着泪珠。然后继续说，李银全、周德林、曾河清等中华优秀儿女，把鲜血和青春献给了孙吴大地，他们将永远活在孙吴人民的心中。

他说，1947年和1948年，孙吴县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县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土改政策，使土改运动沿着健康方向发展，调动了群众积极性，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我在孙吴期间，开展了党建工作，并发展了一批党员。有冯兴义、张恒毅、张起云同志等，后来他们都成为各方面的骨干力量，担负着领导工作。1948年秋，我调到黑河专署任实业局长，主要是把黑河出产的东西卖出去，把黑河人民需要的东西买回来，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群众生活。1949年，我任黑河专署专员，我们时刻把全区各项事业放在心上，日夜操劳，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促进各项事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他说，1951年4月，我告别黑河，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统战部工作，

1954年调到吉林省委任秘书长。“文革”初期，我被军管。我没想到，革命几十年，艰苦奋斗，南征北战，蹲过敌人的监狱，坚贞不屈，而在人民当家的年代却被人民军队来管制，真有点令人心酸。1972年我被解除军管，下放劳动，不久又到延边自治州当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回到省里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回首往事，思绪万千。赵天野深情地说，许多革命战士，艰苦奋斗几十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和青春年华，我们应当永远继承他们的遗志，去完成未完成的事业，为实现祖国宏伟蓝图而艰苦奋斗。

听了赵天野同志的深情话语，使我深受教育。赵天野同志已年近80岁，他为革命奋斗了60多年，追求真理坚定不移，被孙吴人民称为“赵青天”，这足以说明他的高风亮节，成为世人楷模。

风云激越话当年

——访任炳麟

范玉琴

任炳麟同志是继孙吴县县长李银全牺牲之后，到孙吴就职的第二任孙吴县县长。他虽然在孙吴任职不过两个月，但是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主持建立了孙吴县第一个政要机关——孙吴县政府。又恰逢孙吴保卫战一仗（孙吴小事变），给孙吴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0年9月任炳麟同志旧地重游，在孙吴小住几日，我访问了他。

见到眼前这位满头银发、身材魁梧的老县长，令人不胜感慨。他虽然已经七十五岁高龄，可仍然那样干练果断，气度不凡。他老伴姓甘，是位热情，健谈的革命老前辈。她对我说："老任这次回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到孙吴四十五年来的发展变化，很激动，这几天他连续和地方的同志座谈、书法，几乎忘记了疲劳。"

我们无拘无束的谈起往事。尽管在以前的史料中对孙吴小事变有过记载，如今见到亲自指挥战斗的老县长，我还是情不自禁的问起党把他派到孙吴不久，就赶上的那次"小事变"。老县长稍略思考，只说："那次'小事变'消息来得突然，当时政权又刚建立，处于敌众我寡武器装备也不齐全，要不是苏军司令部及时派兵支援，事情可就闹大了。在得利的指挥下，战士们英勇奋战，与援兵配合，把土匪打跑了，保证了新生的政权。要说有功，功都归于人民，你们不要写我。"

有意思的是甘老对我说的"老任到孙吴那阵儿，我正好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从校刊上发现一条消息，说黎明同志（任炳麟同志的笔名）在孙吴小事变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当时消息传开，熟悉老任的人都很心痛，可是后来老任调离孙吴后，到学校看望他的老同志，同学们突然发现了他，都很奇怪。我清楚地记得，学校还在校刊上做了更正。"老县长风趣地插话说："我当时还和校友们开玩笑说，这不没牺牲就当上烈士了。"

旧地重游，往事桩桩。我们说到从延安一起来东北的同志时，他沉痛地说："那时和我一起到孙吴来的还有个小伙子叫解明，在解放孙吴的剿匪斗争中，把鲜血洒在了

孙吴的土地上，这小伙子年轻又机灵，工作也肯干，只是没工作多久就牺牲了，实在太可惜了。”“我记得还有一位从延安同行到东北，当时被派到逊河当县长的顾延龄同志，那年他路过孙吴时，是我派了十来个战士护送他，把他送上车的，没想到还没就职工作就牺牲了。”老县长有些哽咽了。甘老接起话茬说：“顾延龄我虽然不认识，可是听老任经常念叨他，说应当给他立个碑纪念他，一直到这次回访老任始终有这个想法。他觉得顾延龄虽然没就职就被暗杀了，但他毕竟是我们党派到逊河的第一位县长，值得纪念”。心绪稳定后的任老接过来说：“再就是那个李秘书，叫李树仁，事先若不是他前来报告情况，在孙吴小事变中我们的损失可就更大了。前几年，这位李秘书还通过组织来找我打证言呢，我说是这么回事，他是有功的。”

艰苦朴素，以苦为乐。这是老一辈人的闪光之处。作为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革命来说，如今已七十五岁高龄，身居闹市沈阳，从沈阳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的职位离休，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无可非意，然而老县长他却一心想着曾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他说：“我参加革命那阵，条件十分艰苦，不管远道、近道都靠两条腿步行，哪有车坐。我是1938年参加革命来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1940年毕业，因为年轻时我非常爱好文体活动，毕业后没有分配我去前线，就把我留在学校搞宣传工作，1941年抗大改成军事学院，我既负责宣传工作又当教员，一直到1945年光复后，延安开始派大批干部充实到各地工作，抗大调出一个大队的同志分赴第一线，我被派往东

北。从当学员到当教员这段生活也是很艰苦的。我们从延安到东北来，全是靠步行，生活条件自然也很差，记得我们到孙吴来的时候，穿的是日本人的黄凡布鞡的靴子，戴的是日本人那样的帽子，看上去活象个日本兵。那时的铺盖更简单，我还记得孙吴小事变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我到北安去汇报工作，谈完工作，组织就决定调我离开孙吴，说调就走，连回孙吴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那真是人走家搬，走到哪，哪就是家。现在的年轻人想像不出那时的艰苦劲，”甘老对我说：“象老任他们这些人，说他们过去，不是宣传他们自己，其实是宣传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为了教育后人，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老任这个人是比较爱学习的，这么大年岁了，还经常读古诗，对学习他也很专研”。听说老县长至今仍读古诗，想必文化水平不低，所以我不禁问起他早年的家境。提起这个话题，还是甘老告诉我说：“老任的老家在河北省康宝县，1915年生在一个小商人的家庭。他兄弟姐妹好几个，可是先后因病无钱医治都死去了。只剩下老四（任炳麟）。当时父母节衣缩食供他读完了初中，经济拮据，无法继续求学，只好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上了察哈尔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读师范自己不拿学费，二年毕业后，也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曾经当过小职员，干过杂活，一直到1938年，他才投奔了延安，上了抗大。当时外地投奔延安的中学生是比较多的。当地投奔抗大的，多数是工农，也有些小职员。”老县长说：“在我的一生中，延安那段生活算是最有意义的了。我这辈子前半生东奔西跑，生活虽然艰苦，但

总觉得值得。现在想起来也感到很充实和欣慰。”

我觉得和这样的老前辈挚谈，总有问不完的题，有说不尽的话，一切都很新鲜，然而令人更敬佩的就是他那种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

难忘的岁月

——访革命老干部牟海波

张桂馥

翻阅黑河地区的党史资料，方知牟海波同志在解放初期艰苦的岁月里曾任过孙吴县委书记。前不久，我去沈阳时访问了他。

这天下午，细雨蒙蒙。我走进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大院，沿着板油路往前走好几里路找到了牟海波家，他和爱人都在家里，见我到来热情接待。我环视客厅里陈设简朴香雅，有书柜，有盆景，尤其虎皮兰花生长得高大挺拔，令人喜欢。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很高兴，他说：“自离开黑河、孙吴后已有四十多年没故地重游了，真想回去看看。在黑河、孙吴的时间虽短，但是艰苦的岁月难以忘怀。”接着他向我介绍了风风雨雨的革命春秋。

牟海波1919年9月1日生于河北省景县，他在学校读书时受到老师刘剑章革命思想的熏陶，耳闻目睹黑暗社会现状，逐渐增长了革命思想，懂得革命道理，投身于革命活动。1936年1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到天津警察局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天津失守，日本鬼子横行霸道，

无恶不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他回到景县参加了抗日活动，搞敌后统战工作。他出身于富裕中农家庭，父母都很开明，支持他参加革命活动。他家常有革命老干部来往，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仰。使他向往延安。

1939年，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离开景县，奔往延安。同行的人大代表有王从吾等。一边晓行夜宿，一边深入群众，一边宣传抗日，唤起民众，投入抗日活动，经过同浦铁路时遭劫，只好返回。在平县八路军总部呆5个月，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那里。不久，他们在部队的护送下，绕道西行，过黄河，沿黄河到绥德，1940年10月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仰望宝塔山，畅饮延河水，心里特别清爽。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接待。路上一年的辛苦疲劳，此时被洗刷得一干二净。随后，他到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马列，学习历史。当时延安生活艰苦，条件较差，为了自救，开展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1945年，他在延安参加了“七大”，聆听了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同志的报告，大会开了四十天，开得很成功，为争取抗日的胜利作了思想政治上的准备。

1945年9月3日，日本宣告投降，党中央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奔赴东北。他们这批干部由张秀山带队离开延安，爬山涉水，晓行夜宿，奔往东北。牟海波是打前站的，走得快，到了宿营地烧水，做饭，搭帐棚，喂牲畜。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了承德，上了火车，路过锦州，到了沈阳。在沈阳住了七天，听了彭真同志的形势报告，然后乘车继续北上一直到了北安，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前往车站迎接。稍息几天，省委组织部长赵德尊和牟海波谈："你到孙吴当县委书记兼县长，和你同去的有吴飘萍以及魏扬、田玉富等10余名同志，孙吴社会情况复杂，土匪猖獗，任务艰巨，条件艰苦，你有啥困难没有？"牟海波回答："听从党安排没困难，一定完成交给的任务。"第二天，他和吴飘萍、魏扬、田玉富等10余名同志乘火车离开北安奔孙吴，到了孙吴火车站，据说孙吴街面情况很糟，土匪甚多。于是他们直接到了黑河。地工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王肃同志接待了他们，并介绍了黑河和孙吴的情况，给他们一些装备，便又返回到孙吴。而牟海波根据王肃同志的意见，当夜乘火车离开孙吴到北安去要人。他到北安后呆了些日子，又被临时派往拜泉搞民运工作。当时拜泉一带土匪也很多，围困他们好几天，他们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加上部队的支援，打败了土匪，使民运工作得以进行。1946年2月，北国大地，银装素裹，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又决定派牟海波、赵天野、王树棠、魏扬、田玉富等人再次来孙吴。当时火车不通了，他们只好分成两路，一路坐爬犁，一路坐汽车。牟海波坐爬犁时遭到土匪的拦劫，经过激烈的战斗，土匪逃跑了。第四天下午，他们到了孙吴。孙吴县是北安通往黑河、逊克的咽喉枢纽。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活动猖獗。到孙吴后，他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组建县委县政府，牟海波任县委书记，赵天野任县长，王树棠任组织部长，魏扬任公安局长，田玉富任保安大队长。他们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他们吸收了以往的教训，注意人员质量，行动谨慎，建立了保安大

队，由牟海波任政委，建立了自治军连，由曾河清任连长。为了装备队伍，发动战士寻找日伪留下的枪支弹药，每个战士都有了枪和足够的子弹。为了改善生活，他们派车拉着枪支弹药运往克东一带，换回一些白面和猪肉。条件虽然艰苦，但干部战士们的士气很高。他们配合廖中符率领的警备三旅追剿土匪，使土匪到处挨打，无处藏身，一口一口被吃掉，一点一点被消灭。他们在追剿的同时，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开始建党。

1947年11月，牟海波奉命回北安。当时天气十分寒冷，曾河清带领几名战士护送牟海波。到北安后，牟海波接任北安县委书记史梓铭的职务，分田分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建党建政，使各项事业不断发展。1949年7月，牟海波奉命离开北安，调到齐齐哈尔市委工作，任组织部长、副书记。1952年调哈尔滨市汽轮机厂任党委书记。1966年2月，一机部调他到西北搞“三查”运动。文革开始后，他撤回到东北局工交政治部，任组织处处长。1967年2月，牟海波这位历经风雨几十年的好干部却被揪回到哈汽轮机厂挨批3年。1969年他回沈阳到干校学习，开荒种地。1972年，他调回辽宁省机械局任副局长，同年7月任省外经局局长。1983年任省经贸委顾问，1985年任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交谈时，牟海波回顾过去，意味深长。他说，几十年的革命风雨，艰难历程，不论在晋察冀、延安，还是在黑河、孙吴，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充满革命热情，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信仰坚定，不怕牺牲。在孙吴的一次剿匪中，年仅20多岁的团长李珩不幸牺牲，为中国的革命事

业献出了青春年华，宝贵生命。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无数革命先列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夺来了新中国，使人们过上了美好幸福的生活，使祖国大地铺满了鲜花，这无不凝结着先烈们的心血。革命后来人不应忘记先烈们的遗愿，应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继承先烈们的奉献精神，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采访结束后，我们共尽晚餐。傍晚，他送我到车站，只见这位年过七旬的革命老前辈两鬓如霜，身体不胖，但步履骄健，精神焕发，令人钦佩。这时，我想起古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江水悠悠忆流年

曾德记

我从小生活在黑龙江边的沿江乡，在那里我接受了党的培育，明白了革命道理，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我从教38年后于1984年离开工作岗位，每每闲暇时，回忆起以往的岁月，事事涌心头，往事历历在目。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是孙吴的黑土地养育了我，是党领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所以我每时每刻都十分想念分别多年的老同志，难以忘怀我所经历的往事。

一、初识赵天野

1946年夏季的一天上午，天下着毛毛细雨，不能下园田干活，只好在家闲看《庄家杂字》。当时我家很穷，住的是破旧的西厢房，东西有门，纸窗，房前是块菜园子，

再往前就是沿江西屯唯一可行汽车的东西大道。房北面也是园子，再往北就是黑龙江了。草房虽大，但很简陋。一天张志贤和另外一名同志来我家，听着他满口的关里腔，我心想又是一名老八路。张志贤开口便问："你是曾德记吗？"我说："你在哪见过我？""我没见过你，是赵天野同志把你的情况介绍给我的。"我问赵天野怎么没来？"他去别的村子了。"他自我介绍："我叫张志贤，今后就在沿江这一带工作，我有事还要你多帮忙呀。"我高兴地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只管说好了。"张志贤这个名字，我听赵天野提过，只是没见过面。

我回想到前不久的一天中午，我从地里回家路过王德山家西侧的南北大路，路西不远有口土井，是我们担水的地方。由于附近住户常年用水，缺乏管理，低处积水长草，夏季是鸭鹅嬉闹的地方。在东西与南北交叉路口徐小锤的马车被陷在水坑里，车上装有一麻袋苞米粒子，是要去后街磨面的。老远我就看见一个头戴草帽，卷着裤腿光着脚的人帮着推车，我走过去，先卸掉一袋苞米粒子，大家一起抬车，总算把车从泥坑里弄出来了。我问那位帮推车的人，您是从外地来的吧？"我是从孙吴来的。"他接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曾德记。然后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赵天野，到这里下乡的。"第二天傍晚，赵天野到我家串门。他很平易近人，对人热情，他详细打听了我的情况后说："你愿意上学吗？"我说："当然愿意上学了。""你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去吧。"我一看首长真的要让我去了，想了想说："我父母年迈，弟弟妹妹又年龄太小，我现在是走不了哇。"赵天野说："困难人

人都有，有群众和政府的帮助，你去吧。”结果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我又是唯一的劳动力，上学去的愿望没能实现。赵天野当时虽是县长，可是说话和气，从不摆架子。有好多次下乡到我家串门，赶上饭随便吃，不论是苞米面饼子，还是土豆、窝瓜，他什么都不挑捡，没菜就吃咸菜，生活条件的艰苦对这位老干部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然而他的性格却十分乐观，每逢见面，他都给我讲革命道理，摆明革命的前途，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觉得革命工作挺有意义，苦点累点不算什么，心里萌发了对革命的热情。我与赵天野、张志贤的相识，为我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步入革命道路，尽我所能工作

1946年的政治时局是严峻的，虽然日本投降了，但是国内革命战争从全局来说仍是敌强我弱，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美帝国主义武装下的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解放区进攻，强占到哈尔滨以南的广大地区。当时黑龙江省委已迁至北安。黑河地区日本投降后遗留下来的军、警、特宪也不甘心灭亡，特别是群众称为老挺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土匪活动猖狂。当时这批土匪相互勾结，逊克方面的土匪也经常向我县沿江一带骚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彻底消灭这股顽匪，巩固建立敌后根据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我军某旅奉命追剿土匪，我县沿江一带也有部队驻守。由于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加上必要的政治宣传，群众开始明确了人民解放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道理。因此，老百姓拥护热爱八路军，许多有志青年都主动报名参军。当时群众为解放军送菜、

送肉、送鸡蛋，给部队腾房间，提供吃、住等方便条件。

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当我就要去村外地里干活的时候，本村的邹银禄带着两位八路军干部来找我，其中一位军官说："我军在哈达彦村正跟国民党土匪战斗，要派你去给前线部队的首长送一封信，你可以去吗？"我毫不犹豫说："我去。"接着那位军官跟我说："送信是很危险的，你不怕死吗？"我说："你们不怕死，我怕什么！土匪闹得我们不得安宁，地也种不好，有他们就没我们的好日子过。"他看我态度坚决，才从文件包里取出一封早已封好了的信交给我，又叮嘱我："路上要多加小心，可不能把信丢失了，如果遇上流窜的土匪，也要把信藏好。"我第一次去完成这样的任务，心里格外的激动，双手接过信来，把它仔细装在兜里就出发了。

屯外，苞米长到一人多高了。一块块苞米地象一堵堵绿色围墙，我穿过"围墙"，急步在田间小路上，心里想着自己也能为革命贡献力量了，真是喜出望外，浑身是劲，不觉我跑了起来。刚跑过大榆树，背后一声喝令"站住！干什么的？"接着又有人喊"举起手来！"我转过身一看，原来是我军的两名潜伏哨兵。他们从树丛中端枪向我走来，警惕地望着我，我也警觉地说："我是西屯的老百姓，去哈达彦送个信。"还没等我往下说，其中一个人便说："准是给土匪送信的！"我当时就急了，跟他们喊了一句，胡说！这是给你们在哈达彦跟土匪作战部队首长的信！我把信拿出来让他们看，真糟糕，这几位都不识字。反而要把我带回屯子里去，我心急如火，便大声和他喊道，不行！不能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于是我详细和

他们说清了给我信那人的身材、脸型、口音、年龄以及衣着，最后才勉强把我放行了。这时候哈达彦屯的战斗已经结束，屯里屯外一片寂静，等我走出离哈达彦屯五十多米的地方又被哨兵截住了，我说明了来意，再把信交给他看，可是他们谁也不识字，这时从屯里走出来一位军官，他跟哨兵说："你把信交给他带着。"我接过信来，军官问："你识字吗？"我说识字。"你念一下信封上写的是什么？"我念着信上写的：张光迪同志亲收。他说："你跟我来。"我跟着他刚一进屯，就看到一个院内堆放着好多战利品。来到院子里把信交给张光迪，他是方脸型，黝黑，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很有精神，脖子上还挂着个望远镜，张光迪同志看过信跟小通讯员说："带他去吃饭吧，吃完再来。"我随着通讯员在就近一个小屋里吃过饭又见到张光迪同志，他开口就问："你会骑马吗？"我说会骑。"你骑马回去吧。把信交给你们那里部队的首长。"我急忙问："那马怎么送回来呀？""马就送给你了。"我赶忙说："我可不敢要马。""怎么你家有马？""没有。""那你为何不敢要马？""你们要走了，再来兵我就说不清楚了。"张光迪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说："小鬼！这马你骑回去吧，如果你不愿要，就交到你们那里的部队，行吧！"听了他这么说，我骑马回屯了。把信交给了王司令员，把马也交给了他。司令员说："你任务完成的很好，谢谢你。"

我为部队当向导。1946年8月上旬的一天，天气闷热，我躺在仓房午休，准备下午去铲地，忽然一位八路军战士进来了，他和气地说："我们首长请你去一趟。"我

随他来见到首长，他用洪亮的语音严肃地对我说："为了早日消灭反动派，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上级派我们来找弹药，县里领导介绍让我们找你商量一下这件事，希望你帮助我们完成任务。"我听后略加思索地对他说："解放当时，我倒是去过山上拣东西，也看见山洞子和山炮，那是日本鬼子打苏联红军的船时，炮弹在炮膛中爆炸弄坏的。苏联红军虽然也在孙吴这片土地上打过仗，但是他过来只是运吃穿用品，没运军用武器，所以炮弹是日本人丢下的。光复后，不光我们上山拣东西，土匪也经常上山，听说找到一些弹药，我记得当时，为了防止土匪上山找弹药，我军还在沿江的一些村屯驻部队，不想让日本人扔下的军火再被土匪捡去打中国人。"那位首长跟我说："你带我们去山上看看好吗？"我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告诉他们路不太好走，还需要准备车辆、锹、镐、钳子等工具，同时得小心地雷……

第二天，我们带着七辆大车，部队出八辆胶轮车，去一个工兵排，两个班警卫部队向沿江西屯的南山地带进发了。南山是小兴安岭北坡的支脉，坡长且陡，山体东西走向。时值酷暑，虽是早晨，天气也很闷热，尤其是山上，步步上坡，我们下车走着步行，手里拿着工具两个班的战士走在最前面，警惕地注视着丛林深处可能发生的情况。到达山顶，首先看到的是远处的村庄，农田和静静的黑龙江水。

我带他们先看两座山炮，大炮有罗盘，瞄准镜，从带坐标的瞄准镜清楚看见江北苏联村庄，苏方从江边到村屯大约有五里开阔地，均种着小麦，在江边丛林里，有明碉

暗堡，还有交通壕。岗楼上有人站岗瞭望，江边有军艇。我又帮部队找到了四个山洞子，从那里搬出炮弹，枪弹，炸药，地雷，工兵拆卸大炮，一直忙到午后三点钟。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霸占我国东北后，从内地抓来许多工人在沿江南山一带秘密修筑以防苏为主要目的军事设施。山洞子是水泥建筑，都有铁门，多数山洞子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近似炮楼，下层是住守间，每个山洞子间构成交叉火力点，还有战壕，三层铁刺线，洞口外埋有地雷。听说当年修建工事的人均被日本鬼子秘密杀害，这是我们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

傍晚，十二车军火拉回屯，部队首长高兴地说："我军的每一个胜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援，今天我们又立了大功，我代表部队的首长感谢你们！"我说："人民群众没有军队也过不上好日子，我们离不开部队的保卫。"就在我们在山上找弹药的这天，县机要通讯员来到屯里，送来县的命令：为了保卫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安全，为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土匪，我军近日就要进军逊河、奇克，你们村的任务是保卫二道河子桥和小河西桥，为我炮兵部队顺利通过作好一切准备工作。

当时我们屯干部，由于处于战时，为防止意外，村干部都是赵天野、张志贤同志秘密挑选的，还规定联系工作的方法和纪律。沿江东西两屯较大，人口也多，上级就把保卫二道河子桥的任务落到我们屯干部肩上了。

为了检查修补二道河桥，我带东西两屯青年小伙伴四十多名（这些人多数是小时候同学好友）自带工具、干粮，屯里派出五辆车奔赴二道河子桥。驻军积极配合，他

们派一个连其中的一个工兵排，出四辆车，带有工具、炊具粮食等和我们一同去。部队是骑兵比我们先一步到达地点，待我们赶到二道河子桥时，看到桥面塌陷，桥桩还在冒烟。连长说：“看样子是昨夜的后半夜被土匪烧坏的，土匪一日不灭，老百姓就别过好日子！”面对这种惨状，在我们心头，激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怒。桥头，群众七嘴八舌，声讨土匪的罪行，战士不断高呼口号。我与连长简单商量一下施工方案：部队除放哨之外立即清理现场，把桥下墩木锯齐，为铺架新桥作好一切准备。屯民就近伐木四十根，每根粗在20厘米左右，长在两米左右，把树修理好，扛回放在桥南。分工完毕，我领东西屯年青人出发，我对大家说：“我们都很忙，来一趟不容易，我们要伐好树，让桥结实点，保证大军顺利通过。”我分配每两人伐树一根，经验查后抬到桥头。为了便于往外抬树，我选择桥东半山坡为采伐点，这样，伐树后顺坡抬下，既省力又快。我们这些年青人，就象猛虎归山一样，连蹦带跳，好热闹。我和牟旭旺（1982年为我军驻京某部副师长）伐一根树，我们同岁，个子差不多，都带的斧子，为了方便往外抬，我叫他站在上坡，我在下坡，他先砍一斧子，我在下面也砍一斧子，不一会，伐好树，牟说：“打丫杈不用你了，你去看看大家伐的怎样了。”我沿着山坡往南走去。因为我们在家都上山砍过树，选树伐树都内行，我看了一下都行，就是有的太粗了一些，既然伐下了，也只好都抬到桥头。为了安全起见，一段圆木都四人轮着扛，粗的六个人扛，年轻小伙子边干边唱：“拿起巨大的斧头啊，砍断了敌人的铁链哪……毛主席是舵手，我

们要跟他走哇！”

当我们伐木归来，部队清理桥面即将结束，我一看水面露出整齐桥敦十二个，其中桥两头八根，拆下的木板、木头堆放在桥北面。时近中午，我们休息，就着河水洗脸，自己带的干粮都拿出来吃，有苞米面发糕，窝窝头，有的带黄米面干粮，茄子等，吃的大家都要“共产”了。嘻嘻哈哈，欢天喜地闹起来，军人们年龄比我们大些，也禁不住我们耍闹，也和我们一样下河游玩，还有的抓鱼。

铺桥工作进展的顺利，我们采取公路横铺圆木的方法，一根紧靠一根，最后用粗铁线捆绑住，桥面垫好土，使它与公路一样平。简易桥栏安装在桥左右两边，既美观，又可引起开车人的注意，便于车辆安全通过。这场紧张的劳动中，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看那，他们跟老百姓一样，光着脚站在水里坚持劳动，一干就是半天，被火烧黑了的木桩被一根根挖出，扛出来，弄得满身是黑泥水，工兵没有安全带爬电杆拧掉日本鬼子的军用电话线，人民军队爱人民，军民鱼水相亲的情景，使我们留恋。劳动就要结束了，连长悄悄地告诉我：“你们先走，我们以后再走，还要留下一部分战士轮流守卫桥的安全，你们的任务是赶快为咱们大部队安排吃住的地方。”我们离开工地时，与我们共同劳动的部队同志，立于桥头，挥手相送，情景感人。

不畏艰险送公粮。1946年冬，人民解放军仍处于敌进我退的战略防御阶段，但我党坚持依靠农村为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方针，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在局部地区争得主动权，为支援人民解放

战争，早日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县民运工作队与村干部发动了一个捐献粮食，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高潮，广大人民怀着对人民军队浓厚感情，怀着对敌人无比仇恨的心情，涌跃捐献粮食，在那艰苦的岁月，人民群众对党火一样感情，催人泪下。有个叫陈有才的老汉，年迈五十，没有成家，他仅留够口粮、种子，余下三千六百多斤粮全部都捐献给国家。很快一批粮食筹集待运。但是，那时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汽车运输队，从沿江到县城连个电话都没有，县上的重要事情就靠机要通讯员骑马送，平时路上行人也不多。

晚上，县民运工作队张志贤、张恒毅、孙广儒三位同志到我家。张志贤同志说："你还要完成一个艰巨任务，把咱们筹集的粮押送到县。估计用近百张爬犁，现在咱们去小河西，跟各屯爬犁见见面。"我忙说："送粮可以，就是路上不太平，要是遇到土匪就麻烦了，是不是带点部队同志跟去。"张说："主力部队在前方打仗，县大队要保卫县城，没有部队跟你们去，你要多加小心，要是遇上土匪，见机行事。尽量使粮食不受损失，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完成这个任务。"我忙着穿"乌拉"（猪皮制的防寒鞋）带上干粮，张恒毅说："到孙吴县政府找张习释同志。"说着，他在油灯下写了个信交给我，我将信放在鞋里，跟工作队同志到小河西。当时的小河西只有八、九家，而且住的分散，我们没去惊动他们。是夜，天阴，要下雪似的，天气较暖。在孙四公路与孙沿公路交叉路口，孙广儒同志把各屯爬犁带队的人介绍给我，我在心里记住他们的名字，由于天黑，又带着皮帽子，难以看清面目。

我对他们说："大家要辛苦了，今晚阴天，告诉大伙不要在爬犁上睡觉，更不准吸烟，我宣布了出车顺序后，我坐在第一张爬犁上出发了。过了逊哈亮子山就要走近路去孙吴，要走牧羊场，穿过协振屯，东兴屯至曾家堡，再到孙吴。至牧羊场道口时，我爬犁站下，待后面到齐，我对他们说："再往前走就离开公路了，这段路突林多，坡多，弯急，爬犁要拉开距离，人都下来步行，要保持肃静，就是发生情况也不要害怕。"

深夜，气温在零下三十多度，帽子上挂着霜，马蹄声，爬犁声在宁静的深夜特别有气势。这一切，早被土匪哨兵发现，他们如惊弓之鸟，到协振屯里报告说："八路军来了，快逃。"吓得他们慌忙跑掉。当我们进入协振屯时，各户已睡觉。我叫醒原来的同乡好友闫长发，我说："快给我们烧点水喝，冻坏了。"闫说："土匪把你们当成军队了，吓跑了，才走二十分钟，。"我说："我们喝点水，喂喂马就走，不在这里多占用时间。""把马爬犁带到后山沟里，那里树多坡陡，马叫也不容易听见。"我让他把爬犁带进去，大家在屋里喝水吃干粮。为防止土匪再来，我派出两道岗哨，每道岗哨相距二里地，大致到早晨三点钟，我们离开协振屯，到曾家堡村太阳出来了，这时我才放心了，因为离县城近土匪不敢来。到了县城，我拿信去县政府找了张习释同志，并把夜道送粮情况简要作了汇报。这是解放军老百姓首次为政府送粮。受到县政府热情招待，粮全部卸在县公安大队院里。战士帮助倒麻袋。之后，我们到旅店喂马，所有送粮人均到就近饭店吃饭，愿理发的去理发，愿

去澡塘的去澡塘，全是政府花的钱。

午后三点多钟，我们离开了孙吴县城。当我们爬犁从协振屯东山上到半坡时，我发现有几张爬犁顺下坡跑得很快，但立即停住，接着从爬犁上跳下两个人闪在道边，拉开了枪机，上了顶门子弹，高喊："站住！你们头头举手过来！"我小声跟赶爬犁的人说："可能是要麻烦，粮是送去了，你们别慌，也别跑，等我回来再说。"说完，趁着月光，我抬头，举手走过去，这两个人跑过来用步枪口顶住了我的胸口，我说："我是头，和他们没关系。"他看我年龄不大，就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沿江西屯种地的人，往县城送点粮。"这时，张恒毅同志从后面赶上，热情地跟我说："辛苦了，一路太平吗？"这两位战士听张恒毅这么说，赶忙放下枪，张跟战士说："这是咱们自己人。"我把路上，到县情况作了汇报，张说："你任务完成得很好，以后我们有事就要请你帮忙！"我一看四张爬犁上，中间两个爬犁绑着四个人，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忠实走狗，这也是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人必然下场。张说："路太平，快往回走吧！"我们到沿江西屯炊烟袅袅，太阳冉冉升起。

春回大地，冰雪初融。1947年的春天来的早。3月末的一个中午，我卸完第二爬犁柳条子，刚进屋坐下，县政府秘书张志贤同志进来就说："今天我来两次了，你干活忙没遇到你。""又有什么任务？"张说："我动员你参加革命工作。""我早就参加革命工作了，你是知道的。""那几次是临时的革命工作，你干得很好，这次干的革命工作是离开家，跟我们干一辈子……""干一辈子

我不去，我走了，年老的爸爸要受累，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没法生活，我是家的主要劳动力。”我家情况张志贤同志是深知的，他在我家吃过饭，也住过，他看我过去不论什么答应的快，干的也好，这次有点为难，于是他给我讲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等等，把我说的无话可说了。张还说：“我们那里有许多跟你年龄相同的人，他们同样也有父有母，有兄弟姐妹，现在艰苦点，以后会好的。”我说：“我跟你去，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回来时你放我回来就行。”张说：“那是你的自愿嘛！”这次我跟你走，我父母也支持，与我同年同月参加革命工作的还有曾德友、吴志明、孔金柱和孔志忠。在那黎明前的艰苦环境中，勤奋学习，努力工作，锻炼了革命意志，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光阴荏苒，三十八个春秋过去了，一九八四年末我离休回家，安度幸福的晚年。

我参加挺进军的经过

（根据臧来庆口述资料整理）

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在孙吴组织培植的东北挺进军混成第六旅遭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击后，其少将旅长康崇刚于1946年1月16日被苏联红军俘虏，群魔无首，挺匪建制混乱。同年5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又委任刘光才（刘山东子）继任混成六旅旅长，匪巢设在逊河。

1946年5月初，匪六旅十八团李亚洲为团长，二十团刘光才兼任团长，张景云为副团长，率领匪徒五百余人，

窜到我县大桦树林子村，这伙匪徒进村后真是如狼似虎，硬从老百姓手里抢夺粮食，马匹，衣物，并强迫十几名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当挺进军，这时平静的村屯，一时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大桦树林子村臧来庆这次被胁迫参加挺进军，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被强迫加入挺匪二十团后，当二十团副团长张景云召见我时，有人在一旁替我介绍，说我是日伪警佐出身，张景云很器重我，让我当团部副官，帮他出谋划策，为虎作伥。把大印和挂书交给我，让我掌握使用。1946年5月8日，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钧和西满军区原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洪学智率领的三师主力，组成剿匪大军开进孙吴县城，同县委领导研究了匪情，决定10日攻打大桦树林子匪徒。首先由营长袁大文打先锋，大部队是从三面包围，留出来东边大江，由中午战斗到黄昏，战斗十分激烈，据守在村口的匪徒纷纷被击溃。当时挺匪的指挥部设在大桦树林子村东大桥，我看到情况对挺匪不利，大事不妙，马上向张景云提议说：“如果天黑前不赶快撤退，八路军有追逼我们投江的危险，要赶快退出，才能不被消灭。”此时，匪首头子也有些惊慌害怕了，一边赶忙骑上马抢先逃跑，一边传令众匪徒赶快撤退逃跑。匪徒们一直奔向屯子西北角“淘金坑”处钻入密林，又从西山方向沿江边草地经霍尔漠津逃向逊河。这次战斗匪首参谋长李万巨以下被俘和死伤大约二十多人。我们这帮匪徒仓仓惶惶逃到逊河何地营子住了三天，又听说八路军来追击。我想仗打起来双方都会有很大伤亡，打仗要抢占有利地形。我又向匪首张景云

说："咱们住在屯内，南边靠山较远，西边靠山有四、五里，东边是江岔子，如果八路军把炮和重武器架在西山上向屯内射击，从南北两路夹击，我们就无处逃跑，如果不退至南山，等待时机，到时就悔之晚矣，莫不如马上退出。"

由于匪首缺少战斗经验，又加上匪徒七言八语，匪首也拿不定主意，就传令边打边退，一直退到逊河县城。这次战斗，匪徒伤亡很大，如不早退出逃跑，就有可能被八路军消灭了。在逊河街里住了十几天之后，由于八路军大部队追的很紧很近，慌忙中一直逃窜到浦拉口子，但粮食又断了，匪首就召集营连长，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决定，攻打奇克镇抢粮。由于八路军守奇克的人数不多，兵力火力都弱于土匪，奇克才被匪徒强行抢占，这伙土匪窜入奇克后，不顾人民死活，穷凶极恶，对人民财产又抢又夺，特别是见粮食、马匹、农物更是洗劫一空，在奇克街里住了两天后，因八路军追剿的紧，这伙匪徒又逃到孙吴辰清南山。

我从强迫加入挺进军二十团后，亲身经历了总是被八路军追剿得没处躲，没处藏，到处流窜，总是打败仗，朝夕保命的处境。我又亲眼看到土匪的粮食、马匹、农物全从人民手中抢来，但还很困难。人民对挺匪痛恨至极，我就预感到这伙匪徒肯定要失败，已到穷途末路。我就想找机会逃跑回家，避免送死。挺进军二十团的成员很多都是家礼教徒，我认识其中一个姓程外号叫程老大的，他是家礼教徒的长辈，又会算卦，在挺匪中有一定威信，程老大也觉得当下前途不妙，挺匪必定失败、灭亡，只有早日逃

回家去才有活路。于是我二人合计找机会逃跑，并暗中串联自己的亲友老乡十多人，在孙吴辰清南山逃离了挺匪的魔窟。我逃出挺匪二十团，东躲西藏，一直到1947年大股土匪被八路军消灭，才赶回到我的家乡大桦树林子屯。

收　降

徐桂芝　单景春口述

1949年1月，我俩奉孙吴县委的命令到清溪村去收降李文远匪徒。这是流窜到孙吴境内的最后一伙土匪。

1949年的春节非常热闹，家家户户杀年猪，大人小孩都穿上新衣服，到处可以听到“过年好”，“发财，发财”。大年初一，从四乡八屯涌来秧歌队，把孙吴县城挤得满满的。扭秧歌的和看秧歌的混在一起。人山人海，真看得出翻身后的农民庆祝丰收，庆祝东北解放的喜悦心情。过了春节不几天，县委秘书章文谭同志把我俩找到他的办公室。他说：“前些时流窜到我县西部山区的李文远匪徒派人到清溪村联系向孙吴县政府投降，县委决定派你们去收降。”接着我们分析了这伙土匪情况。这伙土匪是光复军刘化权团的一股残匪，十四个人，经常在瑷珲县的大岭劫道，有时到嫩江县木纳河、德都县五大连池、朝阳山，孙吴县腰岭、清溪等地抢劫。据掌握的材料，已知他们杀我区政府女干部一名，村妇女主任一名，民兵一名，群众三名，我军战士十余名。抢去马五十多匹，和许多农

资、粮食。土改前，他们在嫩江县木纳河村劫过狱，放出地主二十五人，其中十八人参加了土匪。李文远本人是伪警尉，富农，越狱的逃犯，他们即是打家劫舍，抢劫财物的土匪，又是国民党的地主武装，与人民为敌，如此嚣张的一伙匪徒，为什么要投降呢？我们分析认为：去年春天他们有150多人的时候，以为人多势众不投降，7月在象鼻子山一仗，把他们打散了，死伤过半，分成三伙。这伙匪徒分出来时是十八人，李文远是匪首。这半年的时间被我军追剿的到处流窜，被打死3人，跑掉1人，现只剩下14人。我军秦大才部队尾随追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到处乱跑。土改后各村屯都建立了民兵组织，他们不敢进屯，吃粮也弄不到。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国民党的败局已定。投国民党已无望。只有投降一条活路了。为什么嫩江的土匪要到孙吴投降呢？我们分析认为：有血债的土匪怕回去投降被杀头，最终我们认为，李文远这次投降是有诚意的，据此我们订下了如下几条投降原则，一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让他们放心；二是给他们指出，只有投降是走向光明的唯一出路；三是向他们讲清愿意留在孙吴县的给他们安排生产的地方，不愿意留下来的给开证明，发给路费任选去向。研究完我俩带领十七名公安队战士分乘汽车和大胶轮车就向清溪出发。

一进清溪就看见村长李美暄，民兵队长张喜增和一帮人在村政府门前等我们，我们走进村办公室，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在屋里。李村长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李文远。我们让他坐下，他说就是你们二位吗？我们谈的问题你们能承担吗？我们一听，他看我们俩年轻，我又

是女的，怕我俩说了不算数啊。我当时是二十一岁，县委组织部干事，单景春同志是二十三岁，县委宣传部干事，兼孙吴完小校长。我说，我俩是孙吴县委派来的，是全权代表，谈的什么问题都能承担，都算数。于是双方坐下来谈了。

首先我俩向他讲了党的政策，同时向他介绍近两年孙吴县当挺匪的人投降后的安置情况，说明我们是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李文远提出："如果同意我们三个条件，我写个信你们派一个人带去，弟兄们就下来了。"我问他是什么条件，李文远说："一个不杀头；二财产归自己；三安排职业。"我们说："可以。"李文远一听很高兴，当即表示投降。我们问他，你们弟兄什么时候来，怎么个来法？李说："我们弟兄在车网子窝棚，离这里八、九十里路，你们不要去很多人，最好去一个人，我写信，再带上点吃的东西。"李文远写完信给我们，当天下午单景春同志坐爬犁，拉上白面就上山了。

俩马爬犁出了清溪就往北走，过了三道河到了伏库山。日头就压山了，也没有爬犁道了，只有小路，爬犁走起来十分费劲。天黑以后，路更难走，一会儿上山，一会下坡，道路很滑，天气又冷，走一阵跑一阵，走了半夜，三星都落了。我问老板子："怎么还不到？"他说："快了，过了山湾再走一会儿就到啦。"真的，过了山湾就看见了在西北方向有火光，我们快马加鞭往前跑，直到跟前一看，点的松树明子。这地方是一条地窨子窝棚，后边靠山坡搭盖的。十米见长，周围有很多的大树，门前有泉眼，这伙残匪是临时在这里站脚的，他们没睡觉，都

在等消息呢。一看我们来两个人，他们就问有信没有？我把信拿出来，一个小伙子把信接过去，一边看一边念，土匪们一听，说这回行了，投降条件谈妥了，我们投降啦！这位同志就是接收我们的。第二天一早，他们象开庆祝会似的，大放鞭炮，然后下山直奔清溪。一进村，全屯的人都出来看热闹，胡子把枪都交了出来，一共交出大、小枪十四支，马十四匹。我俩和投降的土匪坐汽车前往孙吴。公安队战士坐大胶轮车，骑上马跟在后边。日落以后我们回到孙吴。直接奔“山记饭店”。县委秘书章文谭同志在那里等着我们。他看见我们到来，向我们说：“辛苦了。”我俩说：“不辛苦，为人民服务。”我们把李文远介绍给章秘书，章秘书说：“欢迎你们回到人民这边，今后要和人民一道建设国家。”李文远一看章秘书是南方人，是老八路，又听章秘书这么一说，他接着就说：“我们当土匪有罪，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宽大。”第二天，和他们商量去留问题，李文远等七人愿意留在孙吴参加生产，另外七人回嫩江和德都。留在孙吴的李文远等三人被安排到腰屯，其余四人安排到沿江西霍尔漠津屯。留下生产的给他们籽种，口粮和畜力。走的给他们路费，开了证明。

我们任务完成后，回到县委，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感，县委文书小王告诉我们说。县委书记丁逢水同志从黑河打电话来找你们，让你们回来后马上给他打电话。我们接过地委电话，丁书记首先祝贺我们，说我们很勇敢。我俩听了以后心里很高兴。我们深深感到县委对我们非常关心，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回答党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解放后的孙吴电信

石忠信口述

日本关东军为了进攻苏联，同时也怕苏联进攻关东军，就在孙吴驻了大量兵力。过去荒无人烟的地方，当时却成了人来人往的小闹市。为了适应发展起来的伪满政府各机关，各警察机关，工业以及商号电信通话，通报的需要和对外通讯的需要，于1937年（伪康德4年）成立了孙吴电报电话局。这是日本人开的隶属设在长春的日人电株式会社所辖，是营业性质，也服从军用。在此之前，只有警察局和警备电话局一处。

我是1939年9月从海伦县电报电话局转到孙吴县电报电话局的，在线路段线路班当线路工。那时孙吴的电报电话局长是日本人叫何野，主事（副局长）也是日本人叫木村。下设四课两系，就是机械系：主任是日本人德永，技术人员为德田，今井，菊正义。线路系：主任日本人吉田，线路班长为日本人南寓，技术人员有日本人左藤、深岛、广赖、吉田、东光、古木，中国工人有石忠义、肖永春、肖海丰、肖军、赵玉才、王国章、白尚余、孟洗忠等人。

电话课：课长为日本人梅本，话务员全是日本姑娘。这些日本姑娘全能听懂汉语数字，遇有中国人要电话时，只要叫出电话号码就行了。

电报课：课长为日本人松本。报务员6名，电报投递

员3名，是日本人，3名是中国人。

庶务课：课长为日本人岛田。办事人员3名。

技术课：课长宇田川，主事是渡布。

伪满时期，孙吴电报电话局装了10部市话交换机，容量为1 000门，实际上只装了800余门。长话交换机5部，容量50门，实际上装了不到30门。还有电报音响机10部。

那时，中国工人在日本人手下干活可真苦极了，架设和维修外线时，爬电杆子这样的累活都是中国人干，来回背器材的也是中国人。夏天蚊子小咬咬，冬天在冰天雪地里一干就好几个小时，手脚都冻坏了也没人问没人管，而且一不小心就要受日本技术人员的打骂。晚上深更半夜的，遇有线路故障出去查线从来都是中国工人的事。

在日本人办的电报电话局里，职级分的很细，分为：佣员（工人），准职员、职员、甲职员、副参事、理事、直到总裁。职员以上职位全由日本人担任。中国人在熬到准职员时，因为有了技术，日本人才不轻易打骂。我们线路班这些人，伪满时期，架设了孙吴至北安180杆程公里和孙吴至黑河的120公里长话线路。日本兵营内部和北孙吴的电话线，是日军通讯队架设的，日军在太平洋的战争吃紧时，原来已经复员到电话电报局的日本职员全部被征召回前线去了，留下的只有老弱病残的日本人，这样中国工人就更苦更累了。“八•一五”苏军的炮火集中到日军大营，局内的日本妇女一听炮响就乘火车逃跑了，男的只是将总线一掐断就溜之大吉了。苏联红军攻占孙吴后，日本关东军失败溃逃时来不及破坏的孙吴电报电话局各种电

信器材全部被苏联红军通讯队接管。但苏联红军通讯队对日本制造和安装的电信器材和电话线路情况不熟，就只好找原来在电报电话局工作的中国人，因为战乱原来的人都走散了，只剩我和冯兴礼两个人。苏联驻孙吴卫戍司令部把我找去，交给任务修电信机器。但我只会安装和架设技术，因此，就派我维修毁于战火的已经瘫痪的电话线路。

1945年11月，中共黑龙江省工委和黑龙江省军区派来了吴飘萍同志，当时牟海波任县委书记，赵天野任县长，田玉富任自治军大队长，魏扬当公安局局长，他们一行5人来到孙吴接收政权和开展工作。当时由于日本刚刚战败，孙吴土匪横行，敌情严重，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土匪，为了便于指挥，及时通报情况，电话联络成了重要工具。桂生芳司令从苏联红军通讯队将我要回，让我将司令部、北孙吴自治军大队、公安局都安上电话，以便及时联络工作，沟通情况。当时没有交换台，为解决当务之急，就架单线或串线，电话架上不到一个月，就遇上国民党挺进军混成第六旅进攻孙吴（就是人们俗称的“小事变”）。驻在孙吴的自治军田玉富营长就是从电话里接受桂生芳司令的命令，带领人马，跑步赶到司令部参加孙吴保卫战的。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也是通过电话要求国内迅速派兵支援的。

1946年1月16日，黑龙江省军区首长率九团来我县和逊克县一带剿匪，旅部就设在孙吴街里。18日上午，三旅参谋长姚国金把我找去说：“这里土匪很多，我们要打仗，就得随时随地和军区通电话，现在电话线断了，你带人去查找，保证通话。”于是我带着徐丙军、高玉坤共

3人，精心准备，带了工具和干粮，第二天一早就沿着孙吴—北安的长途线路查线了。由于战火毁坏和时局混乱，有的线路毁坏严重，电线被拆，有的地方线路需要绕过山顶和河流。走山路比走大路近得多，特别当时正值天寒地冻，零下40多度，沿途人烟稀少，还时时担心路遇土匪，因此我们只好起早贪黑赶路。途中饿了就点把火烤干粮，脸和脚都冻坏了，整整走了4天才到北安，修好了二对线。虽然生活艰苦，但是我们是在给自己的队伍干事，心里是甜的。省军区表彰了我们奖励了我们每人10元钱。省邮电局奖励我们每人5元。休息两天之后回孙吴。一路上边走边查找，走到20里时，正逢克山县贸易团一队人马从孙吴卖货回去，一见我们误认为是土匪，开枪就打，我们见没有分说余地，也只好拔腿就跑，结果迷山了，足足走了一夜才算回到大路上来，回到孙吴已是精疲力尽了。但是四对线路全修好了。还没等歇息又令我们迅速去修另外两对线路，尽管连累带吓已经力不从心可是命令也必须服从。我们3人又踏着厚厚的积雪、冒着严寒，第二次返回查找。

三旅没来孙吴之前，桂生芳司令员对我说："光架单机不行，一定得想办法弄台总机。"我知道北孙吴电信分局有一台100门的总机，日本关东军溃败时没有来得及破坏，还完好的留在那里。可是北孙吴一直由苏联红军驻守，去北孙吴弄不好就会被苏联红军误认为穿便衣的日军，如此只有枪杀。想来想去，也只有我去。于是就冒着生命危险到北孙吴，还好一路顺利将总机拉回来装上了。1946年5月，三旅五团正在逊克剿匪，军情紧张，三旅姚

国金参谋长说："通逊河的线路事关重要，要赶快修复，不然九团要吃亏。"我二话没说，带着徐丙军、菊正义、张忠、冯胜银5人去逊克修线路。当我们走到白家屯，正要吃饭时碰上土匪，不容解释就把我们5人抓去，从上到下搜查一番，说我们为八路军服务，要枪毙我们。白家屯的屯长害怕八路军找他算帐，在土匪面前磕头作揖，说好话为我们讲情，还好总算救了我们。可是在第二次往返逊克修线路时，我们5个人其中两个人吓病了，只剩下我们3个人，白天不敢走，就起早贪黑抢修。在回来的路上走到哈气口子时，又被土匪抓住，这回把我们穿的上衣扒去拿走，二话没说就放了。一路的担惊受怕，当我们继续走到四不漏子时，又被土匪抓住，这回可说什么也不放我们，说我们尽给八路干活，非枪毙不可。没办法我只好说："哈气口子都放了我们，你们也放了吧。"又说了不少好话，好歹算放了我们。就这样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三次往返逊克——孙吴之间维修线路，即保证了电话畅通无阻，也给三旅完成剿匪任务起到了服务作用，使我军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1947年3月，成立了孙吴县邮电局，我被任命为第一任邮电局局长。邮政只有王文斌一个人，当时报刊信件也不少，只是在来回的马车上挂上邮政旗帜捎脚。那时赶马车的可愿意给我们捎脚了，因为挂上邮政旗帜就可以受到照顾和顺利通行。当时的电报是将电码用电话传。主要任务是保证电话畅通。

黑河原来对外邮政、电话都不通，通讯联系很不方便。1947年秋，西满军区司令部三科科长兼黑嫩省政府邮

电管理局局长赵新田召集各市县邮电局局长会议时，赵新田给我写信，让我凭信去黑河找司令员王钧，政委林一心，专员许烈和岳林同志，这时组建了黑河邮电局，并任命我为黑河邮电局局长。在地委行署领导的关怀下，黑河邮电局宣告成立。1947年10月1日，黑河邮电局向全省邮电局通报、通话、通信，受到了地委和行署领导的好评，也受到群众的欢迎。黑河邮电局成立后，对黑河贸易局黑河金矿局对外贸易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我们国家经济困难，省邮电管理局只给发些电信纸和邮票，经费开支由自己动手设法解决。尽管这样，同志们也为有了自己的邮电事业而高兴，工作干劲实足。1948年12月我们还帮助逊克县成立了邮电局。

白衣大夫赵镛大

1945年8月14日，在日军溃逃的混乱中，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在妻子的协助下，将3个体积0.6立方米装西药的箱子埋在刚挖的土坑里，在上面堆些柴草后，急忙带着孩子到孙吴西部的牡丹江屯躲起来。他就是朝鲜族医生赵镛大。

赵镛大1914年5月出生在朝鲜大邱府（现韩国的大邱县南城区）一个贫苦家庭。他14岁开始学医，早年见习于大邱中央病院，曾先后在大邱医校、大邱劳务会诊所、大邱道立医院等地就读与工作。1940年3月，赵镛大携妻带子随日本开办的三先浦开拓团来到中国，被编入伪满嫩江第三开拓团，做保健指导员。他在医学上刻苦

钻研，1945年3月在伪龙江省二厅通过医师考试合格，后到孙吴劳务兴国会医院任医师兼北孙吴104部队的军医。劳务兴国会医院名义上是为劳工们治病的医院，但实际上是为管理劳工的日军和劳工“把头”服务的。赵镛大耳闻目睹了日军在中国到处烧杀、抢掠、强奸姐妹的野蛮罪行，劳工有病根本得不到医治，有的劳工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惨遭日军活埋或枪杀。赵镛大作为一个医生虽无力挽救苦难劳工的命运，但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列愤慨，他痛恨战争，向往和平，同情劳工的疾苦，情愿为劳苦人医病。所以，在日军溃逃时，他秘密地藏起三箱西药。

伪满时期受日军入侵而畸型发展的孙吴县，在日军投降之后，留下的是片片废墟，百业待兴。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在新生的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由赵镛大带领四五个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创立。他作为孙吴县的第一位西医，组织成立了孙吴县地方人民医院。他拿出了自己藏起来的三箱药，开始了他为人民群众治病的生涯。他长于治疗五官科疾病，但由于当时日伪遗留的残渣余孽及土匪活动猖獗，剿匪战事频繁，他不得不长期从事外科病治疗。赵镛大在孙吴剿匪斗争中，无数次为负伤病员治病，不辞劳苦，深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

赵镛大的医疗技术，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流的，但他从不满足于现有水平。为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他刻苦自学了日语、汉语，直至能用这两种语言顺利查阅和使用医学资料为止，同时又学习英语、俄语和德语，可借助工具书查阅这三种语言的医学资料。

1947年秋，孙吴县第三任县长赵天野患伤寒病，病情十分严重。在赵镛大七天七夜的精心治疗下得以康复。直到1983年，已是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赵天野同志回访黑河时，专程来孙吴看望赵镛大。他紧紧握住赵镛大的手说："谢谢您赵大夫，是您救了我一命啊！"接着，赵天野对随地行的人员说："就孙吴县当时的医疗条件和设备，得了那么重的伤寒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可赵大夫硬是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由于受当时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孙吴支队细菌试验的影响等因素，出血热、克山病和伤寒病一时泛滥。赵镛大以治疗出血热和克山病等方面的论文参加全国的医学研讨会，并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引起医学界的强烈反响。

1945年至1957年，孙吴县手术台只有赵镛大一人能操手术刀。此间他已能成功地做阑尾炎、妇科剖腹产、截肢、肠穿孔、肝破裂等手术。1957年，一位年仅3岁的烧伤儿童患者，下肢蜷起，大腿与腹部、小腿内侧与大腿粘在一起，他的父母抱着孩子先后走了哈尔滨几家医院，都因为无法医治或医疗费昂贵没能得到及时医治。父母只好带着孩子失望地回到孙吴农村。这时，一个邻居告诉他们说，县医院有个出名的赵大夫，心眼好，可怜穷苦人，你去求求他，也许有办法。母亲抱着孩子，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赵大夫哭诉了孩子的不幸和他们的求医过程。赵镛大操着不熟练的汉语劝慰她："不哭、不哭、我会尽力的。"他和同志们研究决定免费治疗这个可怜的烧伤患儿。赵镛大详细检查了患者的病情。要想让孩子重新站起来，必须进行切割手术，但术后创面

太大，很容易感染。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决定用鸡皮贴于创面、缝合。经过一段时间，患者的皮肤伸长，鸡皮组织逐渐坏死脱落，手术获得成功。他的这项成果，参加了黑龙江省的学术研讨会。治疗过程的照片，也参加了省里举办的十年大庆医疗成果展。

1950年，赵镛大任孙吴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当时没有正院长），1953年又被选为孙吴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选为黑河地区专署民委委员。尽管他走上了领导岗位，社会活动较多，但是他从不忘钻研业务，不忘指导年轻医生，他毫无保留地传授医疗经验。五十年代的孙吴县人民医院，设备不全，医术落后，赵镛大就刻苦钻研，反复实践，用叩诊法诊断小儿肺门淋巴结肿大，准确率较高。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就能够用肾囊封闭治疗法治消化性溃疡病；用穴位注射法治疗妇女子宫功能性出血；他的银板丝内固定法治疗骨折的技术在当时也是创新。

由于赵镛大的医疗技术水平非常高，而且又全面，在省内外知名度很高，省里几家大医院多次要调他，但他一直没离开孙吴，他说："我不能走，孙吴人民更需要我。"这样，从1945年到1979年，赵镛大在孙吴卫生战线工作了34个春秋，经他治愈的患者达十几万人次之多。就是在退休后，还经常为患者治病，直到1988年病逝。他为孙吴人民的卫生事业，贡献了一生，孙吴人民不会忘记他——人民的好医生赵镛大。

二、解放战争期间部分烈士英名录

姓名	性别	年龄	入党时间	参加革命时间	所属单位	职务	简要事迹	安葬地
李银全	男	23	党员	原籍河北省唐县	孙吴县	县长	1945年11月，受黑龙江省委派遣来我县任县长，上任仅10余天即被建军土匪暗杀。	孙吴烈士陵园
周德林	男		党员		人民自治军孙吴县独立营一连	副连长	1945年11月27日晚被叛匪张鸣久枪杀于孙吴“便宜坊”饭店	同上
解　明	男		党员	1933年	人民自治军孙吴独立营三连	连长	1945年12月17日被挺匪18团枪杀于曾家堡坝南。	二站
李树臣	男	30	1945年8月	1935年	苏联红军驻孙吴司令部	抗联排长	1945年12月17日被挺匪19团张鸣久匪部枪杀于孙吴西南屯	
曾河清	男	27	1936年8月	1933年，原籍山西省会昌	孙吴县保安大队	队长	1947年11月12日在孙吴吴家堡剿匪战斗中牺牲。	孙吴广场
周春璞	男	32		1946年8月	保安大队	战士	1947年11月12日在孙吴吴家堡剿匪战斗中牺牲。（与曾河清同时牺牲）	孙吴县站前广场
王　贵	男	18		1947年8月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王荣臣）	孙吴飞机场
关凤奎	男	23		1947年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关奉武）	同上

续表1

姓名	性别	年龄	入党时间	参加革命时间	所属单位	职务	简　要　事　迹	安葬地
吴良有	男	19		1947年7月27日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吴忠）	同上
吴绍龙	男	21		1946年11月，原籍瑷珲大五家子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吴长有）	同上
王振邦	男			1947年，原籍通北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王晨）	同上
张　起	男			1947年，原籍：泰安县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张义忠）	孙吴飞机场
刘　陆	男	25		1947年，原籍：泰安县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刘泰祥）	同上
孟宪奎	男	18		1947年原籍：泰安县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孟忠昌）	同上
于绍良	男	22		1947年，原籍：通北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在孙吴协振屯战斗中牺牲。（家长：于忠）	同上
潘义有	男	23		1943年，原籍：江苏省沭阳县	黑河警卫连	排长	1948年5月2日在孙吴协振屯战斗中牺牲。（家长：于忠）	同上
徐宝明	男			1946年6月，原籍：辽宁省	孙吴保安队	战士	1948年5月2日在孙吴协振屯战斗中牺牲。	同上

续表2

姓名	性别	年龄	入党时间	参加革命时间	所属单位	职务	简要事迹	安葬地
任　何	男	19		1947年，原籍泰安县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任福祥）	孙吴飞机场
王有贵	男	17		1945年8月原籍：石华村	黑河警卫连	上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王德元）	同上
尹树德	男			1945年5月	黑河警卫连	上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籍贯江苏）	同上
米庆山	男			1947年，原籍：泰安县	黑河警卫连	上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	同上
杨兆林	男			1947年，原籍：泰安县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杨春生）	同上
寇　发	男	26		1947年，孙吴县西南屯	黑河骑兵连（原系孙吴保安队	战士	黑河骑兵连　1948年10月在逊克浦拉口子战斗牺牲。（家长寇春）	孙吴烈士陵园
张　林	男	20		1946年8月原籍：辽宁省黑山	东北民主联军	战士		同上
李林春	男					二连班长	原籍孙吴县 事迹不详	
李向柱	男			原籍：黑龙江省		俄语翻译	1945年8月随苏军进驻孙吴后被张鸣久杀害	
于敏祥	男			1947年	警卫团一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在孙吴协振屯战斗中牺牲。	
聂和清	男	31		1946年6月原籍：河南省	孙吴保安队	战士	1946年12月14日病故于孙吴，葬于孙吴站前广场	孙吴站前广场

续表3

姓名	性别	年龄	入党时间	参加革命时间	所属单位	职务	简　要　事　迹	安葬地
安成元	男	32			黑河警卫连战士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安奉来）	孙吴飞机场
张青山	男	18		1947年5月原籍河北省乐亭县	孙吴县保安大队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曾给张泉山当通讯员）	同上
单忠义	男	27		1945年8月	黑河警卫连班长	班长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单纪云）	同上
钟殿富	男	18		1946年1月21日原籍吉林九台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　家长：李海山）	同上
陈显通	男	20		1947年8年1日原籍泰安县	黑河警卫连	战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陈责）	同上
刘树德	男			1947年11月	警卫连七连	上士		同上
安仁达	男						其事迹不详	同上
张　和	男				瑷珲公安看守班		原籍辽宁省绥中县	同上
关奉林	男			1948年5月	瑷珲公安看守班		原籍太安县	同上
刘万义	男			1948年5月	警卫团二连一排一班		原籍太安县	同上
张景玉	男				瑷珲公安看守班		原籍山东省	同上

续表4

姓名	性别	年龄	入党时间	参加革命时间	所属单位	职务	简要事迹	安葬地
谢树德	男	20		1945年8月1日，原籍辽宁沈阳	黑河警卫连	上士	1948年5月2日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 工人出身）	孙吴飞机场
徐开运	男	17		1947年12月2日，原籍泰安西安屯	孙吴县保安大队	战士	1948年5月2日由黑河警卫连连长张泉山率领去孙吴协振屯剿匪战斗中牺牲。（家长：徐广通）	同上
牛　礼	男			1948年5月	警卫连三排副		原籍江苏省	同上
杨厚业	男			1948年5月			原籍通北县	同上
刘烈士	男			1948年5月			原籍瑷珲大五家子	同上
刘凤林	男			1948年5月	瑷珲公安看守班		原籍太安县	孙吴烈士陵园
宋青山	男				瑷珲公安看守班			同上
王昶有	男						江苏省	同上
宋殿富	男				警卫连二班			同上
郝庆海	男						克山县	同上
栾普英	男						事迹不详	同上
叶青河	男						事迹不详	同上

后　　记

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孙吴县历史》（第一卷）是继承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60年来，孙吴县的经济文化、民生保障、社会秩序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此之际可谓盛世修志，不仅对推动孙吴历史前进的奋斗者是种告慰，对现今为和谐孙吴的建设者也将起到鉴古镜今的作用。同时，也必将惠及我们的后世子孙。

邑史虽小，内容涉猎却颇为广泛，她不单单使人们了解孙吴过去的历史、地理、人文、政治、经济、民族、风俗、宗教等，也将为篇目延续的故乡史册又增添出光辉的一页。在此之前，我们曾出版过《中共孙吴县组织史资料》（第一、二、三、四、五卷）、《中共孙吴县历史大事记》（1932—1993）、《孙吴抗战专题调研》（1932—1945）、《中国共产党孙吴县代表大会汇编》（1—14届）、《中共孙吴解放战争史》（1945—1949）、《辉煌历程—孙吴六十年掠影》等书籍，深受上级业务部门、县委的肯定和广大读者及老同志的欢迎与热心支持，大家一致认为出版这些书，各有侧重又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仅扩展了史料内容的余脉和支脉，丰富了县域党史及社会发展史的史实，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孙吴县历史》（第一

卷）编辑出版作了极好的基奠。在走访、查档的基础上，我们还重点参阅了《孙吴县志》（首卷）、《可爱的孙吴》、《孙吴蒙尘岁月》、《日军侵华罪证》、《北满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党史中国革命史》、《黑龙江四十年》、《黑龙江党史资料》、《黑河党史资料》、《简明政治学注释》、《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百年龙江》等书籍。在一卷本的叙述当中，一些力求依据的内容已标明出处。拟从二卷始，为把中共孙吴历史编好，热忱欢迎同志们来稿，各说并存，不求一律，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但要事实有依，有所新意。有价值史料来稿一经采纳其提供者也将标记史册。针对《中国共产党孙吴县历史》（第一卷）史料的挖掘，我们更是求之不得。请广大孙吴历史爱好者及热心读者将您多年搜集珍藏的有关实物、文字、图片，甚至口碑故事展现给我们，以便对本书进行修正和再版。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央党史出版社、黑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孙吴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同志们的关心帮助，积极为本书提供资料与业务上的谋划和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能力有限，尽管做了努力，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老同志批评赐教。

编　者

2010年10月